

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向度与规制

张宏志

(宿州职业技术学院 思政部,安徽 宿州 234101)

摘要:在新时代,完善社会治理现代化,激发内生发展动力,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引擎。基于这一判断,通过对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社会治理现代化进行治理向度的多维管理学分析得知,在政府、组织、过程以及改革等治理向度上,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表现为提升政府社会治理能力、提升社会协同治理能力、实现全流程的技术嵌入以及实现再中心化,并认为这些治理效能变化的发生主要源自数字新质生产力嵌入社会治理在各场域采取的具体行动,比如精准识别公共需求、提供科学化决策方案、为改善服务质量提供新动能、提升公众主动参与积极性等。但在这些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行动中也存在可能的异化风险,如价值观偏见、市场滥用等。对此,有效的规制措施在于,一方面要构建多元协作机制应对新场景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主导者应在主动学习中实现自我赋能。

关键词:社会治理现代化;数字新质生产力;治理向度;行动规制

中图分类号:D630;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6)04-0001-07

On the Dimensions and Regulations of Digital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Empower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ZHANG Hongzhi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Suzho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Suzhou, 234101, Anhui)

Abstract: To accelerate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in the New Era, digital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empowerment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engine. Based on this cognitive judgment, through the multidimensional management analysis on the governance dimension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enabled by digital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t found in this paper that in the governance dimension of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process and reform, Digital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empowerment is manifested as improving the government's social governance capacity, improving the social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capacity, realizing the technological embedding of the whole process and realizing the decentralization; these changes in governance effectiveness are mainly due to the specific actions taken by digital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embedded in social governance in various fields, such as accurately identifying public needs, providing scientific decision-making plans, providing new momentum for improving service quality, and enhancing the public's active participation. However, in these Digital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empowerment actions, there are also possible alienation risks, such as value bias, market misuse, so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reasonable regulatory measures. In response, effective regulatory measures involve: on the one hand, establishing a multi-stakeholder collaborative mechanism to address the uncertainties of new scenarios; on the other hand, leaders of soci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should empower themselves through proactive learning.

收稿日期:2026-01-01 * 通讯联系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2ZDA089)。

作者简介:张宏志(1970—),男,安徽灵璧人,副教授,博士。E-mail:364048230@qq.com

Key words: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Digital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governance dimension; action regulation

基于建设平安中国的战略目标,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作出了“完善社会治理体系”的战略部署,强调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1]。贯彻落实这一战略安排,处在大数据时代的今天,“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必然离不开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这一重要推动引擎^[2]的持续支持。作为新质生产力的一种发展新动能,数字新质生产力催生了前所未有的跨界融合,开拓了广阔的应用场景,对于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同样也是不可或缺的。由此,在理论层面上从治理向度多维分析数字新质生产力嵌入社会治理现代化产生的治理效能变化,明确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的场域行动,并在实践层面上合理规制由于其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之间的张力而产生的行动风险,这有利于充分发挥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作用,构建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推进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提高社会治理效能,激发内生发展动力,从而促进新时代平安中国建设高质量发展。

1 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治理向度

从字面意义上看,赋能是指改变了能力,主要指治理主体因数字新质生产力嵌入而得到能力的改善。下文主要从基层治理维度对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社会治理现代化进行分析,探究其嵌入社会治理效能后发生的变化,即治理主体通过引入数字新质生产力更好地履行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中的职能,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目标。

1.1 政府治理向度:提升政府的社会治理能力

在社会治理现代化中,政府是主导者,发挥着主导作用,因此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政府是更具根本性、全局性的策略安排。就发挥政府社会治理职能而言,当前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社会治理现代化重点要解决的有三个问题。

其一,提升政府回应能力。当下社会治理处于现实世界和虚拟空间的双重压力之下,既需要解决现实社会矛盾,又要应对虚实同构而新生的具有挑战性的社会问题。因此,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政府有效回应社会各方面各层次的诉求,是政府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基本原则,也是未来

相当长时间内政府要肩负的责任。

其二,提升政府规制能力。人类的历史经验表明,科技发展和科技应用都曾带动过制度变革。在数字时代,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的现实任务助推政府完善规制,保护公共利益,限制消极社会关系和消极社会行为,构建符合数字社会发展要求的制度体系。在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不仅要实现将政府规制转换为技术代码,强化法治政府建设,还要善于在数字技术应用于社会治理实践中,适时将有效的数字技术规则转化为社会治理的规制,必要时上升为法规制度,提高依法治理的水平。

其三,提升政府濡化能力。在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中,现代科技的应用缩短了政府与公众之间的物理距离,但也让政府在公民教育和政治认同等方面面临严峻的新挑战。为此,对于政府来说,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要致力于解决意识形态安全和核心价值观塑造等紧迫问题,同时在全社会弘扬以国家法律制度为框架的法治理念,以数字技术为动力整合社会规范,指导人们的行动。

1.2 组织治理向度:提升社会协同治理能力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催生了新的社会关系和身份认同,但社会治理体制中的条块分割、部门掣肘、文牍主义等现象加剧了治理的碎片化程度。在社会治理现代化中,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组织的目标就是实现对公共权力结构的再调整,以解决治理实践中的碎片化问题。具体措施有:

其一,以数字技术为政府组织协同创设“破窗”机会,并搭建合作治理平台。当前,围绕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不同任务目标建设的平台,已经成为相关政府部门履行职责的新空间,大幅提升了治理效能。比如,全国正在推动的“一网通办”“一网通管”平台,既为不同政府部门间的信息共享创造了机会,又为公共部门间彼此协同开辟了新途径。

其二,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主要包括三个层面的协同治理,即“政社”协同、“社社”协同和“社企”协同。社会组织协同的出现是社会分工的必然结果,也是国家倡导的政策取向。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3],明确强调把“社会协同”纳入社会管理格局之中。此后,这便成为一以贯之的制度安排。

当前,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质生产力技术的广泛应用,社会协同被赋予了智能化治理期待。比如,各地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平台日益完善公共服务供给,有效吸引了各类社会力量(含社会组织和企业单位)的积极响应,大幅提升了社会协同的透明性、公平性和公正性,成为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社会治理的新机制。总之,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组织协同创造了新的治理场景,而各种新技术的应用则有助于开展合作行动,协同解决物联网通、业务拓展和治理升级等深层次问题。

1.3 治理过程向度:实现全流程的技术嵌入

社会治理现代化虽不是中国独有的实践形态,但却是具有中国原创特征的话语表达。社会治理智能化进程的加快,客观上使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被嵌入到治理的全过程,其中算法创设的技术场景、代码规则、数据逻辑等,尽管还存在着形形色色的不确定性,但在应用上的确起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

其一,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拓展了资源发现与动员的路径。社会治理越是进入深水区,社会系统对于资源的需求就越大。在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的目标是发掘和动员尽可能丰富的资源,并有效地降低治理成本。比如,大数据的精准发现、云计算和虚拟体验的技术激励、AI的自我学习等,无不为资源开发作了技术铺垫。

其二,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拓展了共识形成的路径。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如果说信息平台为个体诉求表达提供了便利、区块链增加了社会交流,那么人工智能则可以在民意收集的过程中对数据做出标注,并对这些诉求信息进行归类和汇总计算,在发现社会治理共识的最大公约数的基础上形成解决方案。

其三,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解决了诸多现实问题,比如运用于公共服务的生产、递送与回应方面,认知与判断、行动边界、政府问责等。当前,很多政府部门采用的智能机器人服务系统大大缓解了公共服务回应能力不足的窘境。可以想见,在更为广阔的应用场景下,算法应用的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必然能够精准回应千人千面的个性化需求,为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拓展实现路径。

1.4 治理改革向度:实现再中心化

技术政治论认为,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会改变治理的权力结构与权力关系。在国外,英国的格拉斯哥和布里斯托,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和毕尔巴鄂等四个城市在开展智慧化建设的过程中,进一步向社会下放了权力,技术应用并没有出现失控,反倒随着

核心科技的应用形成了新的边界和新的城市生活方式。数字技术应用带来了社会治理权的下放,在公共生活中形成了新的权力中心或治理秩序。

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社会治理现代化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增强对旧的治理秩序的解构能力。当下,人工智能和区块链等数字技术的去中心、解构进程进一步加快,在事实上验证了该结论。需要指出的是,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的深层次动力来源于技术规则的转化,让人们有能力规避数字技术的应用风险。比如,算法歧视的源头是技术开发人员的价值偏见,建立在这种偏差基础上的所有决策都负载歧视的“代码”,由此形成的利益分配无疑会带来政策不公的恶果。如果按照这种算法演进,再中心化的过程和结果不是积极的。因此,在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有效消解了重建治理秩序中的各种风险,大大加快了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进程。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当前大量数字技术尚未充分应用于社会治理,但是很多技术禀赋有助于形成再中心化的治理格局^{[4]264-266}。

2 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场域行动

2.1 精准识别公共需求

对公共需求的识别是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基础性条件。比如公共服务需求方面的服务对象及其诉求、服务方式及其适用领域、服务产品类型及其属性等,这都是需求识别的内容。准确识别需求及其可行性已经被大数据在商业应用中得到验证,典型的案例就是亚马逊的商品推荐系统。运用大数据技术,亚马逊有效地采集和计算登录用户在网站的购买行为,分析用户与产品之间的强相关性,继而进行精准化推荐。也许在大数据时代之前,人们会比较关心推荐这些产品的原因,而在如今大数据时代,人们已经不太留意于此了。这就是说,人们更加关注事物之间的相关性,致力于寻找“是什么”,而“为什么”已经不是兴趣所在。以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使精准化识别成为现实,这必然有助于人们更好地认识和把握世界。

数字技术能够解决数据量无限接近总体的问题,因此人们如何确立社会治理任务“是什么”有了更为可靠的基础。数字技术更有助于便捷、高效地找到需求之间的内在关联性,因为同利用因果关系解决问题相比较,数字分析过程的时间周期要短很多,这为解决相关的社会治理问题提供了一个科学的新思路。比如,大数据相关性分析能够提供需求

导向的服务供给模式,就是利用数据清洗和数据挖掘技术,精准化识别公众的需求^[5]。

2.2 提供科学化决策方案

在社会治理现代化实践中,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的价值更多体现在辅助决策上,可以为决策提供科学化方案。下面以大数据技术建模应用为例对此展开论述。

多样(variety)、规模(volume)、高速(velocity)和价值(value),这是对大数据四个技术方面特征的一般概括。除此之外,也有学者把实时性、容错性、高价值等作为大数据的重要特征,这实际上是从公共治理角度进行了拓展^[6]。数据建模的技术禀赋也许有助于消减这方面的困扰,因为它能对数据进行简化处理:从大数据基本属性出发,通过对数据信息抽象组织,绘成能够形象而准确表述数据信息之间关系的逻辑结构图。借助这种数据建模,人们可以更为精准地决策。在这个意义上,公共服务递送中数据建模技术禀赋的可发掘空间还很广阔。

在实践中,历史上大量的技术嵌入实践也同样能够佐证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辅助决策的应用性。数字技术建模赋能决策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借助数据建模,两个碎片化难题,即信息来源碎片化和信息内容管理碎片化,都能够得到很好解决。一方面,公共服务系统收集的信息来源是多样的,而数据建模技术就能有针对性地处理这些多样化的原始信息;另一方面,社会治理的原始数据来源冗杂,不乏重复信息,而数据建模技术的信息甄别功能,能按照一定的逻辑关系对存疑信息进行精细化处理,从而实现科学决策。

2.3 为改善服务质量提供新动能

对于这一行动场域的认知和判断,是从治理效能角度出发的。改革开放四十多年以来,中国社会已经充分验证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智慧内涵,而事实上这也适用于社会治理领域。比如,集中运用分布式计算和虚拟资源管理等信息技术,云计算数据平台便能解决参与治理、协同治理和共享治理等问题。这在政府、社区、教育、医疗、物流等领域都能找到成功的经验,不久的将来,云服务也许会是建设新一代智慧城市的关键内容。因此,我们应保持乐观心态,期待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云计算赋能,比如社区公共服务递送,由于服务信息系统的多主体格局,往往容易产生主体之间的掣肘问题,致使服务质量提升困难,而云计算平台的应用可以破解这种掣肘困境。为了挖掘社区合作治理能力,平台对多源异构的信息服务和跨平台协作进行集成化操

作,推动信息共建、共享与共治^[7],从而为“终端”使用者便捷地享有公共服务又增加了一层保障。可见,在改善社会公共服务质量方向上,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的突出行动表现是为驱动多治理主体进行资源匹配、促进交流互动提供新动能。

2.4 提升公众主动参与的积极性

应该说,科技首先应用的场域是日常生活,然后拓展到市场,最后才是公共领域。这个过程说明,科技从来都是“人”的科技,是人基于生活需要所发明和应用的科技。因此,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的根本意义是人本价值的体现,人是数字技术应用的“起点”,也是数字技术赋能的“终点”。不同科技条件下的公众个体赋能并不一致,数字技术赋能的途径是通过创设虚拟情境来体验真实世界,因此其体验特征是虚拟化的。社会治理现代化的目标群,其实就是虚拟体验所关注的服务“终端”,也就是广大的民众,他们既是社会治理的主体,也是对象,而虚拟体验能够平衡“终点”目标与“起点”原则,为公众服务的价值理性贯穿其中。

在数字技术契合基础上,虚拟体验开拓了公众赋能的新场域。一方面,公共体验借助虚拟技术大幅降低了成本,这种成本可控的“先体验后选择”模式,为解决治理矛盾提供了可行性选项。另一方面,虚拟体验能使社会治理中的“公众参与”职能得到激活,引导公众积极有效参与。同时得承认,我国社会治理现代化更多突出了政府的主导地位,对于公众的主体性建构功能尚未充分发挥。而数字虚拟技术能够促进公众的角色改变,使公众通过虚拟体验参与其中,这有助于公众积极性的客观提升。另外,公众也可以通过数字虚拟体验表达需求、反馈建议、进行评估等,实际上这已经为社会治理现代化奠定了群众基础^{[4]268-270}。

3 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风险与规制

狭义的科技“异化”是指科技应用反过来抑制了人的主体性。马克思关于“异化”的理论对于科技异化具有启示价值:自然异化使劳动者从属于对象,打破了人与自然的原初关系;劳动异化显示出强迫性,最终演变成为自我否定,背离了自我成就的目标;类本质异化则表明,自由和有意识的活动受到抑制,创造世界的能力消失;他人异化更是偏离创造性而成为个体存在的工具,人际关系疏远。“因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所以人在积极实现自己本质的过程中创造、生产人的社会联系、社会本

质,而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的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8]那么,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多方场域行动中,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也是存在一定异化风险的,需要采取必要措施进行规制。

3.1 异化风险

在社会治理现代化中,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而产生的异化风险可以是多方面的,但主要体现在价值观偏见和市场滥用两个方面。

3.1.1 数字技术应用的价值观偏见

虽然数字技术自身并不天然具有价值观偏见,但应用者在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中有意或无意的“加戏”举动,使数字技术在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应用显示出不确定性。比如,自媒体是现代信息技术应用的产物,越是原子化的个体行动,自媒体所展示的意识形态属性越是显著,其中就不乏价值观偏见与市场滥用。在自由主义价值观下,自媒体被描绘为自由的圣洁平台。在实践中,这种情况已经发生,并会继续发生,特别是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 21 世纪。“在描绘‘现代’的外观时,黑格尔用‘自由’和‘反思’来解释‘主体性’:事实上,我们时代的伟大之处就在于自由地承认,精神财富从本质上讲是自在的。”^[9]黑格尔关于“主体性”的理论解释,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这不符主体性的真实逻辑,其主体性自由被放大了,而且如果进一步向社会弥散的话,对于社会治理而言是消极性的。“通过抑制和损害其他权利主体作为实现的前提和基础”,这种自由权利主张就需要受到限制与规范^[10]。因此,世界各国对网络言论自由权的通行做法就是给予必要的法律规制。在这个意义上,网络主权的国家公权力体现,一方面是国家权威性支配网络基础设施,另一方面是国家有效规制各类媒体及其用户。

一般认为,科技应用的前提是开放性,因此科技治理的应用空间在于这种开放的“灵活性”程度。从社会治理的角度看,规避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的价值观偏见应该至少做到两点:一是公共价值应成为科技自身的旨归。数字技术应用于社会治理,在适应现有组织体系过程中表现出的特征是可延展性或可收缩性。在社会治理现代化实践中,对数字技术的延展效应需要保持警惕,要备有措施以克服随时可能显现的两面性,特别要监管好各种偏离主流意识形态的延展行为。二是在数字技术治理过程中政府组织也应约束自身的主观灵活性。囿于主客观条件,在应用数字技术项目时政府组织会进行最优

化选择,这本无可厚非,但对于潜在的异化风险始终保持警惕。在政府组织对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的理解与安排中,这一问题已有反馈。社会治理中的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异化,会颠倒治理价值的取向,而这一风险是可以化解的,因此需要一个切实可行的数字技术规制解决方案。监管方案涉及同时解决三个核心问题,即设定数字技术应用的标准、确立奖惩的权威框架以及提供法律和正式制度的行动依据。总之,在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如果人们对数字技术治理有过高的期待,那么势必会动员起来大量的资源,而为了避免出现价值指向本末倒置的数字技术异化,就应该预设必要的措施规避异化的风险^[11]。

3.1.2 数字技术应用的市场滥用

在社会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数字技术应用的常见问题是将市场化运转方式简单移植到公共领域。但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公共产品绝对不是一般性的市场化商品,因此市场化行为的滥用风险将有可能不利于维持良好的社会治理生态。

其中的天然禀赋是科技应用于社会治理存在市场滥用风险的内在因素。因此,数字新质生产力嵌入社会治理现代化愈加深入,则愈加有可能冲击公共部门现有的科层制治理。这就是说,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与市场机制相叠加会使异化风险升级。在市场利益价值的导向下,尤其当非公共性成了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的助力特征,其必然会偏离社会治理的价值逻辑。一旦市场利益的最大化变成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的追求标的,公共治理的主导性价值基础便不复存在,治理主体的“用户”身份会被忽略,而市场主体便成了“真正的用户”。对于此类风险,下面以数字技术为例展开论证,并提出可能的规避措施。

其一,公众数据被市场化利用。有必要说明一点,这里讨论的关注点不在于“隐私”等个人信息数据的“被利用”问题,因为此类问题在现实法律框架下很容易找到解决的方案^[12]。在数据来源上,社交数据和交易数据是市场机制的偏好,而当公众需求被淹没在大量的无价值的垃圾信息中,就有很大概率发生需求失真,这显然无益于社会治理。需求失真现象也存在于交易信息,比如电商平台的“刷单”,这种虚假的交易数据不能反映真实的交易情况。因此,政府资源配置理应避开此类的偏离和诱导,并针对“公共数据”被市场化利用问题果断采取手段进行及时纠正。

其二,“公”“私”边界与治理效度。社会治理现

代化的理论依据指向“民”，边界则触及政府与市场关系。如果数字技术出现了市场化泛滥，则可能颠覆人们的现实认知。一方面，在公共服务供给侧不充分的前提下，要采取有效措施抑制科技的市场冲动。放大需求或者过滤需求信息，都有可能会导致公众对治理产生质疑。另一方面，要有效规避市场化的公共目标偏离现象，因为市场化科技应用往往会使公共目标锚定发生改变。假如公共服务目标锚定的是老年人群，那么市场化大数据就可能产生服务溢出“公”的边界。其实，这种市场泛滥现象在有些城市已经出现，比如“求助腕表”这种产品，有的公司以“公益”名义赠送给老年人使用，结果却是向老年人源源不断地推送保健品广告。市场主体利用老年“用户”的真正目的是这些看似“附加”的广告信息，因此可认为是服务溢出，伴随而来的是市场失序的风险。

其三，“用户”数据被选择性使用。数字技术赋能社会治理现代化，连续性建构的数据库有必要通过市场化的数据收集与处理来完成，但必须始终坚持公共服务目标。因为公共服务目标的偏离会使数据库漠视实时数据，那就可能产生市场行为泛滥的后果。更有必要强调的是，如果这种数据成为政策出台的依据，那么无形之中就会产生市场绑架政府现象，其危害更为深远。因此，在社会治理现代化中，需要对选择性使用“用户”的数据采取相应的规制措施。

3.2 规制措施

3.2.1 积极应对新场景的不确定性

一般认为，公共部门的技术应用能够规避异化风险。对于很多公众关心的隐私权问题，公共部门的偏好是基于秩序维持的初衷，而非对个体权利的控制，如浙江省绍兴市现代信息科技应用已经覆盖到村级公共领域，枫桥镇的“雪亮工程”富有成效。这些数字新质生产力形成的应用场景是全新的，颠覆了传统社会治理的方式，而其中的数字技术治理存在不确定性，其潜在风险可能是价值观念带来的，也可能是市场滥用带来的。

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应然层面上，“新技术场景”对人的态度和技术处理结果不能使人成为治理的“客体”。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公共价值体现在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其中，参与主体平等多元、决策过程重视协商、治理实践强调合作，这些都彰显了民主协商的特质。因此，数字化场景要立足公民参与加以建构，从数字技术应用角度服务于调动广大群众力量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和公共治理的需要。数字

技术应用的终极目标是将治理主动权还给人民。当前，一些地方试行的群众满意做法，主动将评价权交给群众，依托智慧感知体系，对办过事的群众全量访评，这种经验值得推广。

社会治理现代化应密切关注虚拟场景的数字技术应用。数字技术的应用打开了“无物理区隔”的新场景和新空间，在技术可控的前提下，虚拟空间的发展却未必能够按照“秩序”的轨道运行，因此对于现实社会的冲击需要加以警惕并采取有效措施加以应对。在传统科技应用场景下，科技赋能与社区进步呈现出共生特征，二者实现了“双赢”。但是，以智慧社区的线上方式开展的数字技术应用开启了新场景，虚拟社区与社会组织体现出更紧密的联系。按照中国社会治理的顶层设计原则，线上与线下的所有活动都应该是积极互动的，而虚拟社区与现实社区的游离不应是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的结果。

因此，在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应对新场景不确定性的措施就是积极构建多元协作机制，以有效规制价值偏见或者市场滥用可能引发的风险。一是加强数字技术层面的治理，推动算法设计逻辑的透明化，要求开发者公开关键算法的基本原理，提供通俗易懂的解释机制，并建立数据伦理审查机制；二是加强法律和政策层面的监管，进一步完善立法规范，建立算法备案与安全评估制度，并设立专门的算法监管机构；三是加强社会层面的监督，积极开展公众数字技术素养普及教育，帮助用户依法维护自身权益，鼓励公众通过投诉渠道进行举报；四是加强长效机制建设，建立动态评估与迭代机制，定期评估治理政策效果，根据技术发展及时调整监管重点，并同时兼顾创新与治理的平衡关系，支持开发者进行创新，允许其在可控环境中测试新算法新技术。

3.2.2 在主动学习中实现自我赋能

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本身就表明了社会进入学习状态，如果考虑到科技自身的“学习”，则能够想象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需要治理主体作出怎样的调适。在社会治理现代化体系中，党和政府管理层作为主导者，其学习态度和学习能力对于数字技术广泛应用下的社会治理前景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要积极反思数字技术应用的实践角色和实践价值，通俗地说，这种反思是机械的、本能的，需要有自觉性；其次，要对数字技术应用进行质疑，对社会治理现代化中数字技术应用可能出现的偏差现象要有所觉察，在知识定性上，这有助于对社会治理的知识（真理）的相对性有一定认知，有助于在未来的实践中

进一步应用;最后,要建构性地应对变化,结合具体情境寻找答案,通过对社会治理情境的判断建构(或重构)地方性知识体系,并尝试推理和演算,从而达到社会治理的目的。

因此,对于上述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社会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异化风险,政府要有相应策略,而在主动性方面,最为积极的措施莫过于在自我学习中主动应用数字技术,实现自我赋能。对于社交媒体的管控和治理,政府需要主动学习,在事件中有效利用数字技术,开辟民众利益诉求表达的渠道,特别是民意表达能够形成对政府决策积极的影响力,对于妥善处理各种冲突矛盾,就显得非常重要。“包容异质思维”,让不同的意见有表达空间以及合理地诉求表达,这是一个健康的社会所必需的^{[4]271-273}。

实行“主权坚守”和“治权开放”是党和政府在学习型社会治理中主动应对的现实选择。治理主体之间分享治权,并被赋予主权者身份,这是治权的逻辑,同时是工具理性的体现。比如,主流价值观的传播主权,既体现了政治话语的特征,也体现了生活话语的特征,因此政府把控和规制是必要的。与此同时,以治权开放为动力则显示出对于社会治理的自信。借助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社会治理,党和政府在学习中提供精准、多维的科学决策方案,从而达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有效目的^[13]。

4 结论

对于健全社会治理体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明确的战略安排,提出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城乡基层治理体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14]。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乡村治理,完善社区治理”^[1]。新时代“枫桥经验”是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深刻变化,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群众智慧而创立的一套卓有成效的基层社会治理方案,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当然,这套社会治理方案的成功是多方因素的集合,其中作为“四防并举”重要手段之一的“技防”,生动彰显了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作用。

健全社会治理体系,需要大力推广新时代“枫桥经验”,同时也需要不断创新“枫桥经验”。全国各地在学习借鉴新时代“枫桥经验”过程中,如何因地制宜挖掘数字新质生产力在社会治理现代化中的赋能,形成一套具有本地特色的有效的社会治理方案,不断提升社会治理效能,促进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创新,为平安中国建设作出新的贡献,这是一个值得持续关注和探究的时代课题。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 光明日报,2025-10-29(1).
- [2] 孙涛.“大数据”嵌入: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引擎[J]. 求索,2018(3):61-69.
- [3]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J]. 党建研究,2004(10):4-15.
- [4] 吴新叶. 社会治理的政党逻辑[M].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 [5] 吴新叶,江荣荣. 大数据下的公共服务递送:技术禀赋及其不确定性的克服[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21,22(2):15-24.
- [6]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大数据赋能公共治理研究”课题组. 大数据赋能公共治理效能提升的政策建议[J]. 中国发展观察,2025(3):115-120.
- [7] 聂磊.“互联网+”背景下的社区云服务的核心与趋势[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7,18(6):14-18.
- [8]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70-171.
- [9] 哈贝马斯.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 曹卫东,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18.
- [10] 林凌. 网络传播与法治[M]. 上海: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16:11.
- [11] 王家合,杨倩文. 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服务价值共创:结构、过程与结果[J]. 理论探讨,2024(1):70-78.
- [12] 黄文杰. 数据社会权:推进个人数据治理的权利基础[J]. 江苏社会科学,2025(3):186-195.
- [13] 吴新叶,侯劭勋. 主权坚守与治权开放:党媒公众号运转的两个逻辑[J]. 学术界,2019(7):26-36.
- [14]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 人民日报,2024-07-22(1).

责任编辑:张晓娜

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学的三重省思

刘艳玲^{1*}, 胡茜茜², 虞满华³

- (1. 蚌埠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2. 安徽科技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滁州 233100;
3. 安徽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芜湖 241000)

摘 要:习近平文化思想与大中小学思政课高度契合,是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核心教学资源,将其融入教学意义重大。从价值、内容、实践三重逻辑展开研究,价值逻辑上通过政治、思想、价值认同筑牢文化育人根基,夯实立德树人,实现思政教育主客体统一;内容逻辑上紧扣三重统一原则,阐释思想核心内涵、世界观方法论及时代价值与世界意义;实践逻辑上通过系统规划教学内容、融合信息技术、善用社会大课堂,把教学道理讲深、讲透、讲活。这一融合是辩证统一的系统工程,需遵循青少年成长规律,破解教学衔接难题,以多元方式推动思想入脑入心,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筑牢思政根基。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学;文化育人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6)04-0008-05

Three Reflections on Integrating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into the Integrated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Primary, Secondary and Higher Tertiary

LIU Yanling^{1*}, HU Qianqian², YU Manhua³

1. School of Marxism, Bengbu University, Bengbu, 233030, Anhui;
2.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Chuzhou, 233100, Anhui;
3.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Wuhu, 241000, Anhui

Abstract: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is highly compatible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education, serving as the core teaching resource for the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such courses. Integrating this thought into teaching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t conducted research in this paper from three logical dimensions: value, content and practice. In terms of value logic, it consolidates the foundation of cultural education through political, ideological and value identification, strengthens moral education and talent cultivation, and achieves the unity of subject and object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n terms of content logic, it adheres to the principle of triple unity to elaborate on the core connotation, worldview and methodology, as well as the contemporary and global significance of the thought. In terms of practice logic, it makes teaching profound, thorough and vivid by systematically planning teaching content, integrat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aking good use of social classrooms. This integration is a dialectically unified systematic project. It is necessary to follow the growth laws of adolescents, solve the problems of teaching connection, and promote the thought to take root in people's minds through diverse methods, so as to build a soli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basis for cultivating new-generation

收稿日期:2026-01-20 * 通讯联系人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AHSKYQ2023D027)。

作者简介:刘艳玲(1994—),女,安徽亳州人,讲师,硕士;胡茜茜(1993—),女,安徽凤阳人,讲师,博士。E-mail:QQ1973904285@qq.com

talents who shoulder the great responsibility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Key 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primary, secondary and high tertiary; integrated teaching; cultural education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指出,“文化自信更加坚定,主流思想舆论不断巩固壮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践行,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激发,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中华民族凝聚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显著增强,国家软实力持续提高。”^[1]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文化建设进程中的理论凝结和经验总结,是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学的重要内容。2024年5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坚持思政课建设与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同步推进^[2]。伴随党的理论创新,将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准确、深入地宣传好、阐释好已成为时代必然,对于新时代推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具有深远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立足“两个大局”“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和为谁培养人”是时代赋予的重大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3]。“思政课”作为肩负“培根铸魂”和“立德树人”的重要课程,担负着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大使命。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着丰富的内涵,是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培育学生立德成人的重要教学资源。结合时代和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以习近平文化思想熔铸连贯育人的链条,将文化发展规律与人的成长规律相结合,深入探究各学段的衔接,精心构筑一体化协同育人的体制机制,以此实现在学生群体中达到“入耳入脑入心”的教学效果,助推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学高质量发展。

1 明旨而论: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学的价值逻辑

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着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能够助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学提质增效。推进思想政治教育铸魂育人根本目的的全面实现,对保障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有效落实、促进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全面统一,具有重要价值意义。

1.1 政治认同:筑牢铸魂育人的思想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思政课教师,要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

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4]大中小学思政课是培育时代新人的关键课程,将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思政课教学之中,既是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的应然之举,也是担负新的文化使命的现实需要,可见加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是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因事而化、因时而进、因势而新的题中要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思政课要培养的是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5]。习近平文化思想内蕴着党的理想信念、价值追求、道德情操和精神风貌,蕴含着强大的铸魂育人功能。从这一层面而言,习近平文化思想与思政课铸魂育人的根本目的相互契合、互相成就。当前,我国正处于应对错乱交织的国内外环境的重重考验之中,各个学段的思政课都要为学生做好“拔节孕穗期”和“关键定向期”的思想指导和价值引领。习近平文化思想不仅能够有力地批驳文化虚无主义,也能够提振学生的志气、骨气和底气。要想真正发挥思政课铸魂育人的实效性,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针对性,就要坚定学生的理想信念,使其能够在面对各种社会思潮时辨别是非、抵制诱惑。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着丰富的育人资源,有助于引导学生坚定正确的文化立场,进而筑牢自觉抵制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干扰的有力屏障。因此,大中小学思政课要将习近平文化思想与课程理论相互融合,明确“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重大问题,切实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文化内涵与理论精髓贯穿于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学中,使其理论光芒照亮教育实践,以此实现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进而高扬新时代思政课“培根铸魂”这一宏大工程的价值伟力。

1.2 思想认同:夯实立德树人的实践底色

进入新时代,“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已经成为党和国家人才培养的重大遵循。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教育发展要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为人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将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学,是全面落实思想政治教育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然要求,能够让广大学生从思想深处认同党的教育方针^[6],使立德树

人根本任务在大中小各学段得以全面、深入地落实,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筑牢坚实的思想基础。

习近平文化思想与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内在耦合性。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提升大中小学思想水平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强化思想、激励学生从小就树立为国为民、奉献自我的价值观,以及引导学生树立“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伟大担当精神。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丰富,能够用思想理论武装以实现其“真”,道德情操涵养以实现其“善”,精神文化熏陶以实现其“美”,致力于贯彻与落实“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另一方面,习近平文化思想有利于增强大中小学思想认同,能够教育引导他们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此外,它能够提振大中小学生的爱国之情、强国之志、报国之行,以扎实的本领做好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当前,我国正处于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期,将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思政课教学能够增强立德树人的“温度”“力度”以及“强度”,提升思政课的思想性、理论性及系统性,教育引导学

1.3 价值认同:实现主客体统一的关键纽带

马克思主义哲学将主客体界定为实践基础上的对立与统一的辩证关系范畴,主体试图将自己的目的、意图传向客体,客体则是主体合目的性、合意志性的对象^[7]。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并不是绝对对立关系,两者之间呈现着既对立又统一的状态。一方面由于主客体自身学识的差距、任务的不同而存在对立性,但另一方面是由于主客体二者融合于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之中,又具有内在的统一性。

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是思政课教学的重要元素之一,贯穿在思政课教学的全过程之中。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全面统一在思政课教学过程中呈现的是教育者的主导性和受教育者的主体性之间的有机统一。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坚持主导性和主体性相统一,思政课教学离不开教师的主导,同时要加大对学生的认知规律和接受特点的研究,发挥学生主体性作用。”^[4]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要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其内在要求必须守好思想文化阵地,防止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侵蚀。当前国内外各种思想交流激荡,人们的思想认识、价值观念等受到日益多元文化的冲击,思政课作为育人的主渠道、主阵地,要构建和完善符合学生成长规律和学习规律的教育教学体

系,充分发挥学生主体的作用,将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积极推进文化育人工作。思政课教学过程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二者呈现的是一种彼此平等、相互联结、双向互动及互相耦合的状态,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体现的是主导作用与主体地位的辩证统一。教育者应充分发挥主导作用,要增强学生对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也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材施教,积极引领学生在课堂及课外充分展现自身的主体性,注重启发性教学,在不断引导中使党的创新理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润物细无声地浸润学生的心田,转化为日常行为,进而增强学生的价值判断力、价值选择力、价值塑造力。概而论之,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蕴含新思想展现的深度、新理论折射的力度和社会映射的温度,对于实现思想政治教育者的主导性和受教育者的主体性的有效融合、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的全面统一具有重要价值。

2 循理而进: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学的内容逻辑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形成的理论体系,将其有效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学之中,应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理论性和实践性、价值性和知识性的有机统一,需要全面解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内涵和核心要义,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厘清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2.1 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贯穿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内涵和核心要义

思政课教师应坚持政治性和学理性,全面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内容贯穿至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学之中,引导学生精准理解和把握这一思想的基本内涵和核心要义,为培养时代新人筑牢坚实的理论基础。首先,要以透彻的学理分析回应学生,以彻底的思想理论说服学生,用真理的强大力量引导学生。要做到政治性与学理性的统一,必须处理好思政课教学和学科建设的关系,不能将二者对立起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建设是为思政课教学提供学理支撑的重要途径,通过科研提升思政课教师自身的理论素养,提升教学中的理论性,避免空洞的政治说教。其次,要以旗帜鲜明的政治立场,牢牢把握党的文化领导权,坚守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把“十四个强调”“七个着力”等转化为育人遵循。最后,以严谨系统的学理阐释,深刻揭示习近

平文化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通过政治引领与学理支撑有机融合,启发学生锚定文化身份认同,明确“我是谁”,增强学生文化自觉,明晰“为何自信”,激发学生的文化创新创造动力,激励学生“如何传承”,培养学生文明对话、讲好中国故事的能力,指引学生“如何立足世界”。总之,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内容融入教学之中,有助于实现从理论认知到价值认同、再到实践自觉的深度转化,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筑牢思想根基与学理支撑。

2.2 坚持理论性和实践性: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内蕴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六个必须坚持,“六个必须坚持”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系统要求,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核心要义。从理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的角度把握教学内容,重点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一,坚持人民至上。能够引导学生超越个体局限,在认知上理解人民主体,在情感上贴近人民需求,在行动上践行责任担当,培养学生胸怀社会、国家民族的博大胸襟。其二,坚持自信自立。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坚定学生四个自信,筑牢学生自信自强的思想高地。其三,坚持守正创新。引导学生坚守中华文化的主体地位,践行文化传承使命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更好地构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精神力量和思想伟力。其四,坚持问题导向。教育引导增强学生问题意识,强化问题思维,不断探索出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其五,坚持系统观念,引导学生树立系统观念,教育引导把握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科学统筹各个环节,坚持运用和把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六,坚持胸怀天下。坚持胸怀天下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情怀,也是中华民族的内在文化基因。要将胸怀天下的情怀贯穿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之中,要教育引导全面洞察人类社会发展的前进趋势,深刻理解中华文化所发挥的重要价值与作用,增强学生对中华文化的深度认同感。

2.3 坚持价值性和知识性:厘清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

从价值性和知识性相统一的角度,深入阐释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中的时代价值和世界意义,以此筑牢学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情感认同、思想认同、价值认同。一方

面,从中西文化比较的维度出发,在中西文化对比中,引领学生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立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认同,继而引导他们担当新时代文化使命的历史主动和主体自觉。另一方面,思政课教师还要注意引导学生认识习近平文化思想与自身发展的内在契合性,自身的发展与社会、民族以及国家发展的耦合性,继而触发学生积极主动地投入到文化传承与创新发展的洪流之中,进而实现学思用贯通和知信行的有机统一。

此外,还可以选取中外文化交流碰撞以及中国文化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典型案例分析展现给学生,让学生直观感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独特魅力和强大生命力,帮助学生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如何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和传播指明方向,以及如何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展现中国智慧和担当,让学生亲身感受到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强大生命力和深远影响力,进而引导他们成为中华文化的积极传播者和坚定践行者。

3 依实而行: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学的实践逻辑

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是一项复杂的工程,要从多个方面构建强化机制,不断深化思政课教学的系统规划,提升融入的科学性,把道理讲“深”;促进思政课程与信息技术融合,增强融入的感染力,把道理讲“透”;善用社会大课堂的丰富素材,深挖融入教学内容的鲜活性,把道理讲“活”,以此将习近平文化思想蕴含的磅礴思想力量转化为推动实践的强大动力。

3.1 系统规划思政课教学内容,提升融入的科学性,把道理讲“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好思政课不仅有‘术’,也有‘学’,更有‘道’。”^[5]因此,思政课教师应依据教学目标与教学内容的变化灵活调整教学方法,切实增强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思政课教学的有效性,使其成为提升教学成效的最大增量。首先,立体式融入,明晰重点。例如,在小学阶段,要以具体的文化现象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在初中阶段,关键在于引导学生坚定文化自信,增强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在高中阶段,引导学生增强自身文化素养,深化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决心。在大学阶段,要注重对文化进行整体把握,对文化进行学理性的思考与反思,帮助学生努力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传播者和建设者。其次,地域性融入,激发兴趣。坚持将“社会大课堂”与“思政小课堂”紧密结合,充分利用好地区丰富的资源。例如,在城市地区,可以利用博物馆、科技馆、历史遗址等文化场所,开展现场教学活动,让大中小学生在实地感受中学习历史和文化。在农村地区,则可以依托当地的自然风光、农业实践基地等资源,开展生态教育和劳动教育,让学生在参与中体验和了解文化。通过这种地域性融入,不仅能够激起学生的学习热情,更能加深他们对本土文化的深度认同,进而培养其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厚情怀。最后,专题式融入,系统提升。通过专题式教学,使学生能够全面、系统地了解 and 掌握发展脉络,进而促进学生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全面认识与深刻理解。总之,思政课教师在大中小学各阶段要始终坚持问题思维和问题导向,持续发挥文化的化育功能,形成贯通一致、协同一体、互联互通的系统。

3.2 促进思政课程与信息技术融合,增强融入的感染力,把道理讲“透”

习近平总书记把发展人工智能与教育强国建设相结合,强调“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和教育深度融合,促进教育变革创新”^[8]。当前大数据、人工智能、5G 等科学技术的蓬勃发展,在思政课教学实践中要积极融合数字技术,选择并运用新媒体技术,从中获得有效的教学资料和教学经验,以此优化教学方式。因此,充分利用数字化赋能建构课程教学模式,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进而丰富文化育人的内容。首先,打造全方位、立体化资源库。聚合大中小学通用的教学素材和资源,包括音视频、融媒体、教学教案等,既可以让学提前学习和自主学习,又能即时互动。其次,拓展实践平台,突破传统教学场域限制。推动学校与社会有效对接,搭建专业与行业联合的实践平台,突破线下实践的地域限制,打造“行走”的实践课堂。比如,利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模拟历史文化场景、红色教育基地等,让学生“沉浸式”体验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伟力。学生可以“走进”敦煌莫高窟,感受壁画艺术的璀璨;“漫步”于故宫,体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这种沉浸式体验能够打破时空界限,变抽象理论为具象感知,极大地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参与度。第三,创新引导式、互动式的思政教学方式。如借助在线学习平台、智慧教室等技术,构建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教师可以利用弹幕提问、实时投票等功能,增强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并针对性地进行引导和解答。同时,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发智能答疑系统、个性化学习推荐等,根据

学生的学习进度和自身特点提供精准化的学习支持,满足不同学生的学习需求,实现因材施教。总而言之,通过信息技术与思政课程的深度融合,不仅能够丰富教学手段、拓展教学空间,更能使道理在潜移默化中入脑入心,进而增强学生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与情感认同。

3.3 善用社会大课堂的丰富素材,深挖融入的鲜活性,把道理讲“活”

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9]思政课并不仅仅局限于课堂上理论知识的灌输,而是需要深入到社会实践之中,久久为功,使不同阶段的学生在“内化于心”的同时能够“外化于行”。在 2025 年的全国两会政协联组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思政教育“小课堂”和社会“大课堂”有效融合起来,把德育工作做得更到位、更有效”^[10]。第一,新时代思政课应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将思政课教学中的理论知识延伸到实践领域中,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来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的实效,真正做到社会“大课堂”和思政课“小课堂”相结合的原则。学生通过参与社会实践,在社会实践这一“桥梁”的启发下不断塑造自身的认知、情感、意志,以此帮助学生更好地感知社会之美。第二,坚持将社会大课堂资源“引进来”与思政课堂“走出去”相结合的原则。社会大课堂教学素材与资源相较于思政小课堂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拓展了思政课的教学场域,让大中小学生在实践中以各种形式真实深刻地体会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让学生在承载革命文化的红色展览场馆、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以及具体生活学习的实践场景中增长知识、增才干、强本领。第三,新时代思政课应坚持潜性教育与隐性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增强思政课带给学生的内在震撼力。例如,当前“行走的思政课”在大中小学正蓬勃开展,其核心要义在于善用社会大课堂的丰富素材,突破传统课堂的时空局限,将理论讲授与社会实践深度融合,让思政教育从“课堂灌输”到“实践体悟”,实现思政内容从“单向输出”转为“双向互动”。

善用社会大课堂的素材,真正实现了博物馆鲜活资源的有机融入与红色教育基地价值的深度渗透,实现了理论知识向实践层面的有效转化,让学生真切体悟现实道理,推动学生在行走中感悟思想伟力,在实践中坚定理想信念,避免了理论“空洞化”。

(下转第 58 页)

“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论断的生成逻辑、辩证思维 及实践指向

赵桂敏, 韦 泽*

(安徽医科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32)

摘 要: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的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合力论、无产阶级政党理论、世界历史理论的创新性运用,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历程得出的宝贵经验总结,是应对当前复杂国际形势和风险挑战的必然选择。这一论断蕴含着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体能动性相统一、聚焦重点与统筹全局相统一、立足内因与善用外因相统一的辩证思维。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体现为以历史主动精神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以苦练内功来应对外部挑战。

关键词: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辩证思维;中国式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6)04-0013-07

Generative Logic, Dialectical Thinking and Practical Orientation of the Assertion “Focus on Running Our Own Affairs Well”

ZHAO Guimin, WEI Ze*

(School of Marxism,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Hefei, 230032, Anhui)

Abstract: The assertion “Focus on Running Our Own Affairs Well” was put forward at the 4th Plenary Session of the 20th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t is creatively applied as an innovative utilization of the Marxist theory of historical forces, the political party theory of the proletariat, and the world history theory. It summarized as a valuable experience gain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roughout its arduous struggle of over a century, and is inevitably chosen as a strategic approach to coping with current complex situations and potential risks and challenges. This assertion was characterized by three dialectical unities such as the unity between respecting objective laws and exerting subjective initiative, the unity between focusing on priorities and taking the whole situation into consideration, and the unity between basing on internal causes and making good use of external causes. In the practice of advancing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Focus on Running Our Own Affairs Well” can be embodied by overcoming difficulties, facing risks, and taking challenges with a historic proactive spirit, by coping with various uncertainties with the certainty brought by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by responding to external challenges with unceasing efforts to consolidate domestic foundations.

Key words: “Focus on Running Our Own Affairs Well”; dialectical think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收稿日期:2026-03-06 * 通讯联系人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类重大科研项目(2025AHGXSK20021)。

作者简介:赵桂敏(1994—),女,安徽合肥人,硕士研究生;韦泽(1970—),男,安徽临泉人,教授,博士。E-mail:1992500035@ahmu.edu.cn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1]⁴的重要论断,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以及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发扬历史主动精神,为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而做出的重要思想指引,也是党在百余年奋斗历程中表现出的重要智慧,有着深刻的理论内涵和实践指导价值。探讨其生成逻辑、辩证思维及实践指向,有助于深化对“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论断的整体性认识与系统性把握,以及进一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

1 “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的生成逻辑

任何政治话语的生成皆有源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的话语生成体现了理论性、历史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其扎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土壤,凝结于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的历史进程之中,是对新时代课题的战略回应。

1.1 理论逻辑:植根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

“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虽未由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直接提出,但其理论根基深植于“历史合力论”、无产阶级政党理论与世界历史理论之中。

“历史合力论”指明力量整合的必要性。“历史合力论”揭示了力量整合对于推动历史发展的必要性。恩格斯指出,历史发展是无数个体意志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及创造者,其个体意志具有主观性及分散性。若缺乏有效组织与统一导向,群众的力量易在内部冲突中耗散,难以汇聚成推动社会朝目标方向前进的强大合力。因此,他进一步强调,“革命活动只有在集中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全部力量”^[2]⁵⁶²,深刻阐明了集中力量的重要性。当前,面对“两个大局”相互交织的长期性、复杂性,必须克服力量分散和内耗,将全社会、各方面的意志和力量凝聚到国家发展的中心任务上来,为切实办好自己的事奠定坚实基础。

无产阶级政党是“集中力量”的核心领导。无产阶级政党鲜明的阶级性、先进的指导思想和严密的组织纪律,是“集中力量”的领导核心与政治保证。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2]⁴¹³,因而能够代表并动员人民群众,成为团结无产阶级的聚合剂^[3]。同时,共产党人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能够准确把握历史发展规律,为“集中力量”提供科学的战略引领。自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就以集中统一的领导体

制、严密高效的组织体系以及植根于人民的政治优势,成为“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的根本保证。党的十八大以来,无论是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还是科技领域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等诸多方面,都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集中力量办大事、办难事、办好自己的事”的独特制度优势和非凡治理效能。

“世界历史”理论强调自主发展的辩证智慧。国际交往进程中存在不平等,需保持独立自主。马克思恩格斯在充分肯定资本主义大工业开创“世界历史”时代的同时,深刻揭示了全球关联内嵌着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资产阶级“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2]⁴⁰⁴,其结果往往是“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东方从属于西方”^[2]⁴⁰⁵。唯物史观并未指出所有国家、民族应遵循同一条道路,反而为各国探索和追求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提供了理论空间^[4]。因此,后发国家在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同时,必须保持战略清醒,坚决维护发展的自主性,避免陷入依附与被支配的困境。当前,逆全球化思潮暗流涌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抬头,“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强调把发展的立足点放在国内,坚持独立自主,通过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构建自主可控的现代产业体系,打破外部的遏制与封锁,牢牢掌握战略主动。

1.2 历史逻辑:百年奋斗中淬炼出的智慧结晶

“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这一智慧贯穿于党领导革命、建设与改革的伟大实践中,是对历史规律的揭示、对历史经验的总结以及对历史传统的传承,虽在不同时期呈现不同的表达形式,但其本质始终是从实际出发、围绕中心任务凝聚力量,以重点突破带动全局发展。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完成救国大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独立自主探索革命道路,军事上集中力量争取战争胜利。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大革命失败教训的基础上,突破苏联经验与教条的束缚,开创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探索出符合中国实际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在军事上,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集中兵力”的作战方针,指出“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以击小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5]⁶⁷。“集中兵力”战略的成功运用使党带领人民取得了四次反“围剿”、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为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提供了保障。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完成兴国大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集中力量于工业化建设。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巩固新政权和开展经济建设的双重任务,党将革命时期的成功经验运用于国家建设,通过制定“一化三改”总路线和“一五”计划,将有限资源集中起来,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之后,党的八大进一步将“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确立为全国人民的首要任务,将工作重点转移到技术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上,不断巩固并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经过 20 多年的艰苦奋斗,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6]。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推进富国大业。改革开放新时期,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提振经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的鲜明主题。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优越性在于“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7]。在这一思想指引下,从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到应对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各类风险挑战,中国充分发挥制度优势,用短短数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数百年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推进强国大业。新时代,集中力量攻坚克难,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8]。党的十八大以来,“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的重要性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坚持以经济发展为中心,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情,不断增强我们在国际上说话办事的实力。”^[9]⁴⁴⁹面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和世界百年变局交织的复杂环境,“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成为我们完成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的核心理念。新时代的实践充分证明,坚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为中华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更为完善的思想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推动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1.3 现实逻辑:应变局开新局的战略选择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作出“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13]的重大判断。提出“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是新时代化危为机、赢得未来的必然要求。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需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的根本战略支撑。当前,全球科技竞争日趋激烈,我国

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10]¹¹,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面临外部遏制与围堵的严峻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11]²⁴⁸。在外部技术封锁日益加剧的现实背景下,只有依靠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在体制机制、资源配置与人才集聚等方面形成系统合力,才能在关键领域实现技术突破,牢牢掌握创新与发展的主动权。

满足人民群众追求美好生活的需要。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的根本价值追求。我国拥有 14 亿人口,庞大的人口规模构成了发展的巨大潜力,也对国家治理能力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着眼于就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社保等庞大而复杂的民生需求,任何零敲碎打或力量分散的治理方式都难以奏效,唯有集中资源、优化政策、系统推进,才能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理念转化为切实可行的制度安排和具体实践。

应对国际风险挑战的需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是有效应对外部风险挑战的战略定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最重要的是必须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12]“无论外部环境怎么变化,都要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13]应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关键在于保持清醒的战略头脑和坚定的战略定力,瞄准目标,不为一时一事的干扰所惑、不因风高浪急而动摇,把握宝贵的时间窗口,扎实做好自己的事,方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

2 “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所蕴含的辩证思维

“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中形成的战略智慧,深刻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

2.1 主观与客观统一:遵循规律与主动作为相结合

“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是对辩证唯物主义关于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能动性相统一原理的自觉运用和创新发展。这一战略思想既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的科学原理,又凸显了在认识规律基础上主动作为、改造世界的实践品格,体现了我们党对主客观辩证关系认识的深化。

尊重客观实际与规律是实践的前提。“办好自己的事”首先要求我们必须准确把握我国发展的客观实际与内在规律。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发展存

在客观规律。正确认识客观实际、准确把握客观规律是有效推动事业发展的关键。坚持一切从国情与实际出发,是这一论断取得实效的根本前提。唯有摒弃好高骛远、脱离实际的不良作风,谋划的事业、制定的政策、实施的方案才能契合客观实际、发展规律和科学精神。当前,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我们谋划一切工作的基本依据和最大国情。只有立足于此,确保“自己的事”符合当前发展阶段的基本特征与内在要求,“集中力量”的战略部署才能建立在坚实的科学基础之上,避免战略误判,确保力量投入产生预期的正向效果。

发挥制度优势与主体能动性是实践的关键。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集中力量”深刻体现了主体的能动性、创造性与组织性。马克思主义在承认客观决定性的同时,高度重视主体对客观世界的能动改造作用。马克思曾鲜明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种“改变世界”的实践,正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9]273}这一制度优势使我们能够超越资源分散的局限,通过统一意志、统筹规划、科学配置,将有限的社会资源高效集聚到国家发展最需要、最关键的领域。这种“集中力量”绝非简单的力量叠加,而是在科学理论指引下,遵循客观规律进行的系统性、整体性的力量整合。

提升把握与运用规律的能力是实践的保障。确保“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最大效能,必须持续提升认识和运用客观规律的能力。客观规律不会自动显现,需要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缜密科学的分析判断才能准确把握。这就要求我们不断提高辩证思维能力,增强对发展趋势的预见性和全局工作的统筹能力。察势者智,驭势者赢。唯有深刻认知并自觉遵循客观规律,主观能动性方可具备明确的指向与恰当的方式,进而使“集中力量”的实践活动既保有强劲的战略稳定性,又蕴含旺盛的创新活力。当前,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只有精准把握新时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深刻理解新发展阶段的内涵特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才能推动“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不断取得扎实成效,在新征程上始终把握主动、开创未来。

2.2 重点论与两点论相统一:聚焦关键与统筹全局

的系统方法

“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深刻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关于重点论与两点论相统一的原理,为我们提供了在复杂局面中聚焦关键、统筹全局的科学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既要讲两点论,又要讲重点论,没有主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9]23}这一精辟论述为我们在实践中正确理解和运用这一战略思想提供了根本遵循。

坚持重点论,精准把握并着力解决主要矛盾。“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首要在于坚持重点论,即精准识别并着力解决影响全局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唯物辩证法认为,主要矛盾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居于支配地位,对事物发展起决定作用。抓住了主要矛盾,就等于牵住了推动事物发展的“牛鼻子”。当前,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与风险挑战交织、不确定因素增多的阶段。在这一阶段,“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的核心在于紧扣高质量发展这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习近平强调:“发展中的矛盾和问题集中体现在发展质量上”^[14],这一重大判断精准定位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发展的关键症结,决定了我们必须把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重中之重,将资源力量集中到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上来,聚焦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绿色转型等关键领域以寻求突破,以重点领域“一子落”带动发展全局的“满盘活”。

运用两点论,统筹兼顾各项工作。坚持重点论,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次要矛盾和其他方面。两点论要求我们在分析复杂事物时,既抓住主要矛盾,也兼顾次要矛盾;在研究某一具体矛盾时,既把握矛盾的主要方面,也不忽略其次要方面。此外,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在特定条件下会相互转化。因此,在抓重点抓关键的同时也要关注“两点”,掌握统筹兼顾原则,不顾此失彼,将“十指弹琴”运用于具体实践,寻找各方面的平衡点^[15]。在实践中,要用全局视野整体把握各项部署,在围绕中心任务集中力量攻坚克难的同时配套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实现各项事业的协同推进。譬如在集中力量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既要着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也要统筹好区域协调发展、城乡融合发展;既要追求经济质量的提升,也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这种统筹兼顾的思想方法,确保了重点工作能够在协调有序的整体环境中顺利推进,防止出现因忽视次要矛盾而制约整体发展的局面。

实现重点突破与全面发展的辩证统一。重点论与两点论的有机统一,其本质是在动态发展中把握

平衡、在系统平衡中谋求发展的战略思维。“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辩证地要求我们既要坚决反对“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均衡论,又要防止“单打独斗”的片面论;同时也要求我们要具备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能力,在紧紧抓住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的同时,合理兼顾次要矛盾和其他工作,实现重点突破与全面发展的良性互动。将这一辩证思维运用于实践,就要求我们善于在纷繁复杂的任务中甄别主次、区分缓急,分类施策。对于那些事关全局、决定长远的主要矛盾和关键领域,要毫不犹豫地集中优势资源,凝聚最强力量,以钉钉子精神持续攻坚,力求突破。对于那些处于次要和辅助的工作,则要科学配置资源,注重协同跟进,为核心任务的完成提供有力支撑与保障,从而确保中国式现代化伟业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始终沿着正确方向破浪前行。

2.3 内因与外因相统一:立足自身与把握大局相统筹谋划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发展是内因与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立足于对我国发展内在规律的深刻把握,彰显了在深度全球化背景下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战略智慧,科学体现了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辩证法则。

立足内因,把握发展主动权。“办好自己的事”首先强调内因在事物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毛泽东同志指出:“社会的发展,主要地不是由于外因而是由于内因。”^{[5]302}这一科学论断指明了推动社会前进的根本力量源于解决内部矛盾,抓住了内因就抓住了发展的关键。党的八大到党的十九大,我们党每一次对社会主要矛盾的精准把握,都是立足内因的集中体现。从党的八大首次系统概括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到改革开放以来将其确立为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物质文化的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再到新时代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正是基于对内因的深刻认识,党始终将目光聚焦于自身发展,保持战略定力,坚定不移沿着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制定并实施发展战略与政策举措,带领人民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有条不紊推进各项事业,牢牢掌握发展的主动权。

善用外因,在挑战中强健自身。在强调内因决定性作用的同时,辩证唯物主义同样重视外因对事物发展的重要影响。毛泽东同志指出:“外因通过内因而引起作用”^{[5]303},科学阐明了外部条件通过影响内部矛盾而发生作用的机制。当今时代,各国前

途命运紧密相连,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孤立于世界之外求得发展。随着国际环境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增加,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这些外部因素虽带来严峻挑战,却也蕴含一定的发展机遇,是发展进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变量。“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正是我们在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下重视内因、化危为机的战略抉择。通过集中资源、凝聚共识、提升能力,不断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增强科技创新的自主性,提升社会的凝聚力和抗风险能力,从而有效抵御来自外部的各种风险冲击,乃至可以将外部压力转化为深化改革、优化结构、推动创新的内在动力。

推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良性互动。“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要求我们在把握内因决定性的同时,充分重视并积极利用外因,努力实现两个大局的良性互动。这一原则既不是关起门来搞建设的孤立主义,也不是丧失主体性的依附式发展,而是立足自身、放眼世界的科学方略。通过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才能在不断夯实自身发展基础的同时,在国际舞台上赢得更大话语权、发挥更积极作用。《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指出:“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让国家更富强、人民更幸福……这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最大贡献。”^[16]一个实现高质量发展、社会和谐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的中国,不仅能够更好地满足本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必然能够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这种通过重视内因而更好地利用外因、通过办好自己的事而更有效地参与和引领全球治理的辩证统一,正是这一战略思想的精髓要义。

3 “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的实践指向

“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及复杂严峻的内外环境下,对于实现危机中育新机、变局中开新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3.1 增强历史主动:以历史主动精神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

“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的本质,是在深刻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历史主动驾驭时代变局。马克思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17]这表明,历史并非预设剧本,人可以在遵循规律的前提下主动创造历史。当前,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从国际上看,全球化遭遇逆流,某些国家奉行“丛林法则”,地缘冲突加剧,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威胁上升,大国博弈更趋复杂激烈。

从国内看,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突出,重点科技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等仍亟待破解。面对这些现实挑战,我们不能陷入被动宿命论,而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正是这些矛盾为我们指明了奋发有为的努力方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能不能富强,一个民族能不能振兴,最重要的就是看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能不能顺应时代潮流,掌握历史前进的主动权。”^{[9]210}“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要求我们要大力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做到识变、应变、求变。识变,就是自觉以党的创新理论为指导,提升洞察时势、研判方向的能力,精准研判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科学预见潜在的风险和机遇,做到未雨绸缪、胸有全局。应变,就是面对新情况要沉着冷静、积极作为,着力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特别是针对科技关键核心技术等“堡垒”,必须集中优势资源,组织战略性、前瞻性的国家科技力量进行攻坚,将发展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求变,是历史主动精神最生动的体现,意味着跳出墨守成规的惯性思维,主动谋划、积极创造,以“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勇气,以及“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智慧,推动事物向更优状态发展。

3.2 聚焦首要任务: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

“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要求我们坚持“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统一。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系统工程时,需加强全面统筹与系统谋划,处理好“顶层设计与实践探索、战略与策略、守正与创新、效率与公平、活力与秩序、自立自强与对外开放”^[18]这六对重大关系。同时,要善于抓住关键环节,精准发力,以重点领域突破带动整体发展。“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19]。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必然选择^[20],没有高质量发展,就谈不上社会主义现代化。

聚焦高质量发展主题,必须集中力量于影响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领域,以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为核心抓手,协同推进实体经济壮大与全面绿色转型。一是以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战略重点。现代化产业体系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建议》强调“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19],要求集中优势资源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主导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其中包括运用新技术、新工艺对矿业、冶金、化工、轻工、纺织、机械等传统产业实施全产业链改造,提升其智能

化与绿色化水平;同时前瞻布局新能源、新材料、低空经济、航空航天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二是以壮大实体经济为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11]242}。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交通强国等,关键在于将力量集中于基础薄弱环节和关键核心技术领域,通过统筹教育、科技、人才资源,形成协同效应,不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抗风险能力和安全水平,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根基。三是以推动全面绿色转型为关键环节。“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绿色化、低碳化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10]321},必须集中力量破解能源结构难题,大力发展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构建适应高比例可再生能源的新型电力系统。通过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并配套通过财税、金融等政策,形成明确的绿色低碳发展市场预期,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3.3 坚持练好内功:以苦练内功来应对外部挑战

“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要求我们聚焦内因,用好外因。事物的变化发展,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这决定了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不想受制于人,首先必须强大自身。近年来,某些国家为维护其霸权地位,在经济政治上推行“脱钩断链”、加征关税、构建壁垒;在技术上筑起“小院高墙”,封锁关键领域技术,限制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科技合作,遏制他国科技进步与产业发展。此外,地缘政治冲突加剧,全球治理体系面临重构等因素,这些因素进一步放大了全球市场的波动与割裂。面对外部严峻的发展环境,必须深刻体会“打铁还需自身硬”的内在逻辑,以苦练内功的战略定力主动应对、积极作为。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中国家,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和消费市场,拥有经济底盘稳、综合优势多、发展韧性强、增长潜能大等突出特征,以及兼具制度优势、超大规模的市场、完整的产业体系、丰富的人才资源等众多优势。这些条件决定了我们必须把发展的立足点置于国内。因此,在巩固拓展既有优势的同时,要坚持问题导向,着力打通阻碍发展的卡点堵点。一是破解科技创新“卡脖子”困境。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演进,高科技领域已成为国际竞争的前沿阵地。集中力量布局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统筹优势科研团队、整合产业资源,可以有效避免市场自发整合或地方分散布局导致的重复研发和资源浪费,推动工业母机、高端仪器、生物制造等重点科技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的产学研融合和跨区域协同。二是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大国经济

具有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的独特优势。”^[21]坚持将战略重心置于做强国内大循环上,通过统筹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其中,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关键举措,必须着力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统一市场基础制度与监管,持续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内生动力和巨大红利。三是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要集中资源强化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工程,推动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集中力量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强调内因的决定性作用绝非是忽视或否定外因的重要性。历史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可能成功的。尽管某些西方大国对我国进行全方位的战略遏制和围堵打压,但以全球南方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群体性崛起的势头依然强劲,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仍在曲折中前进。无论国际环境如何变化,我们始终保持“外乱内不乱”的战略定力,坚持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以强大的国内市场夯实内因基础,以更高效的国际循环为国内发展注入新动能、拓展新空间。这正是“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中内因与外因辩证统一的生动体现。

4 结论

“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是我党应对复杂的国际局势和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提出的重要论断,兼具深厚的理论内涵、丰富的历史积淀和紧迫的现实需求,蕴含着深刻的辩证思维,具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我们应以“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为根本遵循,强化系统观念,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战略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相统一、发展系统性与阶段突破性相协调,确保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步履坚实、行稳致远。本文虽从生成逻辑、辩证思维、实践指向三个维度对该论断进行了初步探讨,但从微观视角探究该论断的贯彻落实等问题,还有待进一步深化、细化。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
-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3] 孙亮洁,刘明明. 习近平关于集中力量办大事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核心要义与时代价值[J]. 思想政治课研究,2022(3):78-88.
- [4] 刘奎,陈锡喜. 习近平关于“走自己的路”重要论述的生成逻辑、基本内涵和时代意义[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25(1):34-40.
- [5]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6] 曲青山. 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N]. 光明日报,2021-02-03(11).
- [7]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6-17.
- [8] 斯琴格日乐,郑玉. 集中力量办大事制度优势的生成逻辑[J]. 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24(2):11-15.
- [9]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 [10]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
- [11]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 [12] 本书编辑组. 习近平的小康情怀[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78.
- [13] 新华网. 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EB/OL]. (2025-10-24)[2026-04-06]. <https://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51024/492e65ce4d7d46e2bf8321c1d151dbf7/c.html>.
- [14]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114.
- [15] 陶卓睿. 习近平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的辩证思维探析[J]. 理论导刊,2022(12):11-17.
-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53.
- [17]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95.
- [18] 习近平.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N]. 人民日报,2023-02-08(1).
- [1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N]. 人民日报,2026-03-14(1).
- [20] 刘勇,刘蒙蒙. “十五五”时期推进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境遇、基本原则与实践进路[J]. 理论与改革,2026(1):13-26.
- [21] 李强. “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N]. 人民日报,2025-10-30(3).

责任编辑:寇国庆

论《杜诗详注》中的评点术语“玩”

陶承昊

(中国传媒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24)

摘要:“玩”在《杜诗详注》评点部分出现百余次,总体上代表着深入探究、细致把玩诗歌内涵的倾向。以表意的独立性和搭配的自由化为依据,可以确认“玩”是一个独立的评点术语。《杜诗详注》中“玩”的评点指向包括对作品内容的理解,对杜诗章法、结构、格律的分析,对审美效果的讨论与对杜甫作诗状态的揣摩还原这四种。“玩”是评点者接近杜诗表达意蕴内容的途径和方法,核心为“意”,体现着评点者的个体能动性 with 阐释观念,对杜诗的经典地位的确立具有正面影响。

关键词:《杜诗详注》;评点;术语;“玩”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6)04-0020-07

On the Comment Term “Wan(玩)” in *Dushi Xiangzhu*

TAO Chenghao

(School of Humanities,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100024, Beijing)

Abstract: “Wan(玩)” appears more than one hundred times in the comment section of *Dushi Xiangzhu*, which generally represents the tendency of in-depth exploration and meticulously playing the connotation of poetry. Based on the independence of expression and the liberalization of collocation, it can be confirmed that “Wan(玩)” is an independent commentary term. The commentary of “Wan(玩)” in *Dushi Xiangzhu* points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ent of the works, the analysis of the composition, structure and rhythm of Du Fu’s poems, the discussion of the aesthetic effect and the speculation and reduction of Du Fu’s poetic state. As a term of commentary, “Wan(玩)” is the core of meaning. It is the way and method for commentators to approach the content of Du Fu’s poems to express the meaning content. The core is meaning, which embodies the individual initiative and interpretation concept of commentators and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classic status of Du Fu’s poetry.

Key words: *Dushi Xiangzhu*; comment; terminology; “Wan(玩)”

在古代文论的发展中,“玩味”一词出现已久,并被多人引用发挥。魏庆之总结朱熹读《诗》之法云:“诗须是沉潜讽诵,玩味义理,咀嚼滋味,方有所益。”^[1]张炎论词有“作词者能取诸人之所长,去诸人之所短,精加玩味”^[2]的观点。“玩味”说也已经得到当今学界关注。上世纪八十年代已有学者将“玩味”与西方的接受美学并提,比较二者的异同^[3]。马兴祥《试论朱熹文学批评的“玩味”说》^[4]是以“玩味”为核心的研究中较早的成果。当前对

“玩味”说的研究普遍侧重对“味”这一范畴的理解与阐释,对“玩”的关注不足,而是将其视作“味”的连带甚至附属表达。综合来看,该说中“味”的重要地位毋庸置疑,但“玩”绝非学者随意用之,其评点术语的属性值得讨论。

考虑到《杜诗详注》在古代诗歌评点史上集大成的地位,选定该书作为观照对象,考察评点部分有关“玩”的表述,以期揭示“玩”术语在诗歌评点实践中的意义,从术语角度为古代诗歌评点研究提供新

收稿日期:2026-01-23

作者简介:陶承昊(1999—),女,安徽阜阳人,博士研究生。E-mail:tch949135806@163.com

的视角和思考。经梳理发现,“玩”在《杜诗详注》的评点部分共出现百余次。其中少数几处表达“玩忽职守”“玩世不恭”等意,是对诗作内容的解读,评点意味较弱,该种情况不属于本文讨论范围。

1 “玩”作为独立评点术语的属性确认

“玩味”是“玩”和“味”的耦合结构,读者借助“玩”来接触作品,通过“味”来体验感受作品,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阅读体验过程。“玩味”可以作为一种固定搭配存在,但“玩”和“味”各自具有独立的语义和应用范围,可以在不同的语境中独立使用,并不具有必然的绑定关系。对“玩”的研究,首先是要确证其作为评点术语的独立性。

1.1 表意的独立性

“玩”为动词,《说文》解为“弄也”^[5],本意为把玩玉石,由此引申,泛指对一切物品的欣赏行为。《周易·系辞上》云:“是故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6]陈述君子闲居时观察卦象、体会卦辞的行为,是在精神层面深入钻研、体悟易理,从物质把玩过渡到对抽象道理、言辞的深度思索,和现今诗文评点中的“玩”属同一含义。面对文学作品,这种玩赏动作升级走向沉浸状态。在行为之外,调动认知和情感协同作用,从实体的物理操作向深层次的心理体验过渡,在经过专注思考、投入品味之后,获得精神上的享受。

在文学品鉴中,“玩”是一个由表及里、认知深化的过程。把玩感受由作品本身的内涵表达决定,只有蕴藏着个人特点、风格、感受等要素的作品,才具有反复把玩的必要,才能产生与读者投入的大量思考相应的效果。读者接收的情感反馈可能是愉悦、好奇、满足等积极情感,也可能是叹惋、悲伤、遗憾等相对负向的情感,这来源于对作品本身的感知。情感反馈的正负倾向并不会对读者玩赏作品的沉浸感受产生正负影响。无甚内涵的因袭敷衍之作,则不具有玩赏的价值,也不会产生沉浸式的体验感受。

阅读后的沉浸程度与读者所投入的自我情感正相关,在立意、表达、艺术等各方面居于高位的作品有可能经由“玩”的动作成为读者的情感享受与精神寄托。随着玩赏能力的提升和心理预期的调整,读者的体验感、成就感、自我效能感都会增强,从而逐渐形成具有正向反馈的强化机制。换言之,读者长时间把玩文学作品,立足主观的人生经历和客观的文学文本,有可能将自己的人生体验与作家的写作背景形成联结,与作家产生超越文本、跨越时空的共鸣关系,并在个体经验下对原有作品生成新的阐

释。以文学作品为对象的“玩”,是一种高度投入、高度享受、旁及支脉众多的品鉴状态,是一种观照文本并再度阐释的行为。

在《杜诗详注》中,“玩”与“读”“观”“阅”“览”等都表达出一种认识原文的方法,可视作同类语词。“玩”在语义内涵和使用情境上则有所差别。“读”出现的频率高于“玩”,一般指代评点者对诗作原文表达的获取过程,是一个广泛且客观的概念,涵盖了从阅读到理解的各种环节,如仇兆鳌评《杜位宅守岁》后两联“感慨豪纵,读之可想公之为人”^{[7]109}。在内容评点之外,“读”还可用于注音和指导诵读。如注“心微傍鱼鸟”一句中的“鱼”应当“读作语”^{[7]641}，“暗飞萤自照,水宿鸟相呼”应当“上三字连读”^{[7]1176},形成先三字后二字的诵读结构。

“观”“阅”与“读”语义相近,“观”更强调一种直观的、视觉的体验,有观照意。“阅”的使用频率远低于“读”,多了一重翻览意,且时常与具体作品相连,如“及阅《南史》”^{[7]411}“偶阅《诗纪》”^{[7]1201}等,“阅”与“读”在很多情形下可以互换使用,但“阅”更侧重于对大量信息的浏览、筛选与转引,有信息处理之意,深入理解和分析的意味较弱。“览”的使用频率同样不高,一般以景观、场景为对象,“阅览”意稍淡,“观览”意较重,有“尽览诸胜”^{[7]102}“远览古迹”^{[7]1952}之类表述,包含着对诗歌所写环境的把握和欣赏。这种指向场景的使用情境使“览”在语义上带有更多的空间性和视觉性。

相比这些语词,“玩”还有“把玩”“琢磨”之意,不仅进行表面的阅读观察,还要作出深入探究和思考,具有一定主观性、主体性,与“读”“阅”等几乎完全客观的语词泾渭分明,处于相对高阶的阶段。评点者在使用“玩”时,实际上是在描述自己面对诗作时积极主动、深入、甚至是创造性的互动状态,与其他评点动词具有一定的区分度,这为其成为一个独立的评点术语提供了合理依据。

1.2 搭配的自由化

《杜诗详注》中约有百余处用“玩”作为评点术语,仅一处用“玩味”。《夔府书怀四十韵》诗后总评部分,仇兆鳌指出,杜甫长篇作品,格律严整,运思精密,解读这类诗作,需采用特定方法:“此章分枝分节,相生相应之法,必宁心静气,从容玩味,方有端绪可寻。”^{[7]1428}“玩味”在此凸显对杜诗精细品读的要求,是仇兆鳌评点策略的体现,也是在提醒读者不能走马观花。

“玩”在与“味”搭配之外,《杜诗详注》中还有两处与“文气”搭配,构成“细玩文气”的表达。“文

气”是古代文论中的典型范畴,关乎诗作内在气韵、格调与行文脉络等多个方面。诗人创作时的情思涌动、灵感迸发等借助外在的文字表达、结构安排形成“气”,它并不直接展现,而是隐匿于字句间,与行文章法相应。将“玩”与之连用,即强调对其的细致品味和揣摩,深入内在机理,感受作者的精神气质和作品的风格特点。第一处是对《剑门》中“珠玉走中原,岷峨气凄怆”一句的分析:“珠玉句,突接似乎陡健,但细玩文气,当先言蜀产之奇,而后言凄怆之故。”^{[7]720}常规理解会认为前后转折突兀,困于字面表达,通过“细玩文气”,就能够明白该句内在的因果逻辑,进而了解杜甫作诗之精妙。第二处出现在对《诸将五首》(其五)的评点中,诗云:“锦江春色逐人来,巫峡清秋万壑哀。正忆往时严仆射,共迎中使望乡台。主恩前后三持节,军令分明数举杯。西蜀地形天下险,安危须仗出群材。”评语为:“细玩文气,望乡台与锦江相应,出群材与军令相应。”^{[7]1370}诗中景观、场景更迭穿插,按照诗歌前后顺序阅读,只能理清叙事流程,避免了阅读对原文的机械拆解。之所以是“玩”文气而非其他动作,因为“玩”带有细腻、沉浸的属性。既避免了过于生硬的分条梳理,也规避了浮于表面的就景观谈景观,还能够兼顾对文本的情感体悟,不至于陷入侧重写作逻辑而忽略审美价值,从而起到更好的解读效果。

更多时候,“玩”单独使用,不与其他任何字词搭配,直接形成“玩+原文”的结构,这是《杜诗详注》中“玩”作评点术语时最常出现的情形。如《白丝行》,有“玩末二语,公之不屑随时俯仰可知”之评,末二语为“君不见才士汲引难,恐惧弃捐忍羁旅”^{[7]145},径直用“玩”,能够促进读者注意力的收拢聚焦,品读杜诗的情绪表达。对于《画鹢行》,有“玩章末云‘我今亦何伤,顾步独纡郁’,岂公在朝时不得志而云然耶”^{[7]477}之评,同样引读者进入原作营造的情绪中,看似豁达的表述背后是作者内心的郁结。“玩+原文”的结构具有简洁直接的特点,省略了中间复杂概念的过渡,直接将评点动作“玩”与杜诗紧密结合,“玩”的重点就由“味”“文气”乃至其他范畴转移到了诗句本身,能够展现出评点者对诗中具体语句的思考状态。“玩”脱离与其他字词的搭配,只作为一个评点动作存在,使用的灵活性得到凸显,更能够从容应对杜诗中的各种表达。其他字词不再作为理解框架影响或诱导着评点者及之后的读者,其主体性也就得到了体现。

《杜诗详注》中作为评点术语的“玩”,总体上代表着一种深入探究、细致把玩诗歌内涵的倾向。对

该术语的使用,大部分出自仇兆鳌之手,这或是其个人评点风格和偏好的体现。此外还出现在胡应麟、罗大经、王嗣奭、卢世淮、卢元昌、赵大纲等人笔下,则对“玩”的应用绝非仅限于仇兆鳌个人,证实了其在评点领域内的确存在和被认可的情况。“玩”在杜诗的评点实践中具有一定的适用性和有效性,能够传达出对诗歌深层次理解和欣赏的态度,也在评点者之间具有一定的认可度。这说明“玩”能够在不同的评点者之间传递相似的理解和意图,有着共识性价值。

2 “玩”的评点指向

2.1 对作品内容的理解

《杜诗详注》中,“玩”指向作品内容的频率相对高于其他用法,对于文本的判断、理解、体会具有实际意义,这具有一定合理性。第一,杜诗内涵丰富深邃,其中多有伏脉,信息表达错综,对字句的把玩细读是准确理解文意的基础,故“玩”对阅读过程具有引导意义。只有先借助“玩”将字句含义、文本信息梳理清晰,之后有关章法结构、审美效果的探究才具备可行性。第二,对作品内容的理解体现着对原文的重视,符合大部分注释的体例规范。

杜甫有《题张氏隐居二首》,读者往往先入为主地认为二首作于同时,但仇兆鳌评:“此两诗非一时之作,玩首句‘时’字末句‘每’字,可见。”其所提到的两句分别为“之子时相见,邀人晚兴留”“前村山路险,归醉每无愁”^{[7]12},“时”和“每”都包含着时间频率的差异,“时”既能够指代此时、那时,也可以表达偶尔、不时,“每”则意味着一种惯常性状态。根据对这两个字的把玩,聚焦文字表意,就可以专注于事实层面的讨论,捕捉诗句中的时间信息,对两首诗的创作时间作出正确判断。这体现出“玩”作为方法对判断作诗时间的意义。

《两当县吴十侍御江上宅》一诗,两当县究竟是吴十侍御的家宅,还是其贬谪后的居所,存在争议。仇兆鳌认为:“今玩诗题及篇中故乡句,当从地志为正。”地志即《方輿胜览》,其观点为前者家居之地。“亦知故乡乐,未敢思宿昔。”^{[7]669}若两当县是贬所,那应当与仕途受挫相联,属被迫前往,与故乡所承载的温情属性有所不同。“玩”的结果表明评点者在此处精读了诗题与关键诗句,从原文中寻找事实依据,体现出“玩”作为方法对确证诗中地点的意义。

《送灵州李判官》诗云:“羯胡腥四海,回首一茫茫。血战乾坤赤,氛迷日月黄。将军专策略,幕府盛才良。近贺中兴主,神兵动朔方。”此诗多家定为乾

元二年,仇兆鳌认为当系于至德二年,其题下批云:“玩诗中羯胡血战等语,及近贺中兴一句,当是安史正猖獗,灵武初即位时。”^{[7]369}“羯胡”“血战”两句描绘的是惨烈的战争场景,“羯胡”指代安史乱军,“腥四海”“乾坤赤”“日月黄”等体现的是乱军四处侵扰、战火不熄的景象,可见当时乱军势大。“中兴”代表着唐朝有望回归正轨,再次兴盛。结合史实可知,在安史乱军猖獗的背景下,如果还能有“中兴”之望,就应当是肃宗的出现。“近贺”则说明肃宗登基不久,应是初即位的情形。诗作背景隐含在杜甫的描写中,这体现着“玩”作为方法对参考史实、确定诗作系年的意义。

《送韩十四江东省觐》诗后张綖注:“韩盖公同乡人,必其父母避乱江东而往省之,玩次联及结可见。”次联为“我已无家寻弟妹,君今何处访庭闱”,结联为“此别应须各努力,故乡犹恐未同归”^{[7]829}。次联先写杜甫自己已经无家可归、亲人失散,从自身境遇切入,而后言对方也无处寻访,二人境况可互相对照,则应是同乡。结联中的“各”与“同归”更佐证了次联的表述,倘若二人并非同乡,杜甫无法因己况确认对方境遇,也不具有同归故乡的合理性。这是对句意的把玩,是“玩”在指向内容理解时抛却目的、体会文本的情形。

上述可以看出,“玩”对理解文意具有直接作用,是文本细读的体现,是感受作品内容时的一个重要环节。在细读把玩中,评点者能够提取出作品中已经蕴含却并不醒目的信息,为系年、定位等具体问题提供参考,也为挖掘诗人的创作意图、理解文意、感受情感、体会情境等带来帮助。

2.2 对杜诗章法、结构、格律的分析

杜诗章法谨严,布局精巧,“玩”的方式能够帮助读者体会其中的起承转合,并在多种表达方式中梳理出原文真实想要表达的内容,成为进一步解析艺术架构、品读审美效果的基础。强调“玩”之于杜诗章法、结构、格律的探究,有其必然性与关键意义。

以《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为例,仇兆鳌评:“玩其转折层次,不可增减,非汗漫敷陈者比。”^{[7]77}对层次的把玩常出现在杜甫所作的长诗之中。比起五七言律绝,长篇作品的层次结构更需要反复琢磨。诗人从表达对韦丈的感激,到倾诉不得志的心绪,再到去留间的纠结,这样的情感转折与写作逻辑得以明确。相似的,《夏夜李尚书筵送宇文石首赴县联句》后有“玩此篇,起结承转,各极自然”^{[7]1893}之评。联句诗一气呵成,阅读难度颇高,只有深入玩味,才能细致分析其中的章法次序。通过“玩”诗,读者能

够通过开篇“爱客尚书重,之官宅相贤”^{[7]1892}一句,体会出设宴的背景、参与宴会的人物,并对设宴主人的形象有所预设。后文中对宴席场景的展现、由宴饮欢乐到宴罢别离的转换也就在情理之中。最后以“单父长多暇,河阳实少年。客居逢自出,为别几凄然”^{[7]1893}作结,走完了诗作的承转合三部分,将现实时间线与回忆时间线收束合拢,回扣送别主题,自然且完整地结束全诗,并留下回味空间。

对格律用韵的把玩如《阆乡姜七少府设鲙戏赠长歌》,诗后总评:“玩此诗拈韵,知古人东冬通用也。”^{[7]504}全诗共十句,以“冬”“风”“宫”“红”“葱”“翁”“空”“极”“力”“色”“忆”字押韵,据《切韵》,“冬”为平声“二冬”韵^[8],”风”“宫”“红”“葱”“翁”“空”均为平声“一东”韵,“极”“力”“色”“忆”为入声“廿九职”韵。这与宋以后的平水韵也基本一致。可知全诗前六句押“东”韵,后四句换“职”韵,起句“冬”与“风”同用,则“东”韵、“冬”韵通押,“玩”是评点者体会杜诗用韵的途径。

“玩”在对杜诗章法、结构、格律的分析中,代表着一种深度聚焦、反复研磨的姿态,精细梳理每句语气、时态及各联间的语义跨度,勾划整首诗的书写节奏与表意框架,避免理解的碎片化。杜诗的章法结构成就在古代诗歌史上处于极高地位,是杜诗成就的重要体现。“玩”引导读者从字词句式的结构出发,逐步上溯到段落架构、篇章布局,串联起欣赏杜诗的秩序。通过对具体字句的把玩,章法格律的抽象规则能够落实于具体的作品书写当中,能够引导读者对杜甫作诗技艺的高超产生具象认知。

2.3 对审美效果的讨论

《杜诗详注》中,以“玩”对审美效果展开讨论者如《白盐山》:“卓立群峰外,蟠根积水边。他皆任厚地,尔独近高天。白翎千家邑,清秋万估船。词人取佳句,刻画竟谁传。”仇评:“此诗细玩,始知描写之工。后来选者不及,论文笑自知,信矣。”^{[7]1352}诗中白盐山的位置、形态是“玩”的整体对象。分析字词搭配与意象组合,能够体会到山的卓立姿态,与周边水、天的相应,描写刻画得工巧尽现,从山向上到天,向下到水,向远到城镇,层次细腻丰富。

对于名篇《绝句》:“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睡鸳鸯。”仇兆鳌集罗大经《鹤林玉露》中的评价:“于此而涵泳之,体认之,岂不足以感发吾心之真乐乎。大抵古人好诗,在人如何看,在人把做如何用……只把做景物看亦可,把做道理看,其中亦尽有可玩索处。大抵看诗,要胸次玲珑活络。”^{[7]1134-1135}“玩”在此是深度玩味,不停留于意象

罗列,而是要挖掘意象背后深层意涵。罗大经语首先点明该作在表面直白之下蕴含的自然意趣与生命情韵,而后将涵泳体认视作鉴赏诗歌的关键路径,要求读者沉浸于诗句营造的氛围当中,不疾不徐地玩味字词、意象,感受节奏韵律,而后设身处地,将自身情感融入诗境,体悟诗人创作时的心情。通过这样的“玩”触及诗歌内核,领悟诗歌的感染力。对于此诗,当然可以视作单纯的景物描写,若在反复玩味中,具有“玲珑活络”的心胸与思维,就能够突破窠臼,把握作品的幽微精妙,发现其中的哲理,从而获得更具超越性的审美体验。“玩索处”正是两种视角切换、融合的关键。

对于《院中晚晴怀西郭茅舍》,王嗣奭在《杜臆》中评为:“玩末二句,直欲乞休,而其词含蓄近谑,温柔敦厚之意可见。”^{[7]1172}全诗涉及幕府环境、雨后秋色等场景描写,末二句为“浣花溪里花饶笑,肯信吾兼吏隐名”^{[7]1171-1172},是“玩”的对象。初读之下,该句非常容易被视作写景抒情,“玩”驱动读者穿透表象,细究字词、意象与表达,联系杜甫此时的境遇,品出在官场与退居生活的对比下,作者内心对“乞休”的渴望,使隐晦情感逐渐明晰化。诗人用花的情态达成委婉含蓄的表意,又从“笑”与严肃话题的碰撞中,呈现出“近谑”质感,不致过于压抑沉重,组合形成“含蓄近谑”的效果。这种表达也是杜甫个人风格的体现。“乞休”话题在许多文人笔下都有涉及,写法各有不同,杜甫这样的表达具有“温柔敦厚”之感,是较高层次的审美体现。诗句节奏舒缓,情感克制,儒家诗教影响下的中和之美在人花互动情境中得以体现,抽象效果在此句中具象化,给读者带来审美感受。

“玩”诗这一方法,对体会诗歌的审美效果起到一定意义。每首诗作为有机整体,各组成元素相互交织。字词表意与情感基调相关,句式结构对情感的收束或延伸具有影响,意象承载情思,不同要素在审美表现上承担着不同的功能。读者的审美体会具有递进性,从外在形式的品味走向对作品情感的感知,最后升华至意境体悟,“玩”能够与这一规律相合,串联这些元素,并促使读者逐一探究,梳理其内在联系,最终汇聚成完整的审美体验。

2.4 对杜甫作诗心态的揣摩还原

在对作品的理解,对杜诗章法、结构、格律的分析和对审美效果的讨论三个方面,“玩”的主体都是评点者,对原诗是评价态度,二者形成截然分立的两个立场。除此之外,《杜诗详注》中作为术语使用的“玩”还有另一种情况,仍出现在评点的部分,

但描述内容由评点者“玩”杜诗变为评点者揣摩杜甫作诗时“玩”的心态。

这种情形出现次数不多,且均出自仇兆鳌之手。如仇兆鳌评《陪李金吾花下饮》云:“口吹轻颺之鸟毳,意数吐萼之花须,细写闲中玩物之趣,所谓自娱也。”^{[7]243}评《曲江二首(其二)》为“乘春玩物之意”^{[7]448},诗中有“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7]447}句可为对应。评《独酌》诗首句“步履深林晚,开樽独酌迟”为“步林向晚,独酌从容,故得详玩物情”^{[7]804}。评《桤树为风雨所拔叹》为“追叙未拔之先,佳景堪玩”^{[7]831}。当“玩”用于揣摩杜甫作诗状态时,评点者的视角发生关键转变,不再单纯从外部审视、评价诗歌成品,而是尝试回溯创作场景。这种揣摩突破了静态解读,弱化了诗歌作为文本的既定属性,强调了创作的动态过程。通过设想杜甫“玩”物的状态,能够感受字句背后的鲜活灵感,理解意象选择、情境构建的心理,提供新的阐释方式。

在这种情形下,杜诗及评点部分就形成了双重的“玩”的现象。评点者的视角是基于原文的逆向推导。借助诗作,评点者尝试着推断杜甫创作时的周边环境、心理氛围,对杜甫创作时的心理进行追溯,这本身就是对杜诗的玩味品读。评点者推测杜甫正是处于“玩”的心理才形成如此作品,其置身于生活现场,感知眼前万物,形诸笔端,这就是第二重“玩”。这种评点打破了单纯进行文本解读的封闭性,关注对象从文字走向文字背后的人,尝试描述杜诗产生的过程,使诗歌阐释从静态分析走向动态还原。这一意义上的“玩”展示出评点者与诗人之间的对话关系,成为联结文本与阅读主体、创作主体的行为媒介。评点者与读者借此越过语言,直接揣摩作者所处的情境,这种阐释路径彰显了评点者与创作者的主体性,也体现出仇兆鳌对古典诗歌评点方式的丰富。依托文本的引导,“玩”推动诗人从文本背后走向被阐释前台,为杜诗经典地位的形成与杜甫形象的塑造带来更多的视角解读意义。

对《杜诗详注》中“玩”的评点指向作出总结,“玩”的对象往往是有特点、有重点、有难点之处,具有特殊的研究价值。这让“玩”与其他泛泛而谈的评点手段划清界限,从具体语境中再次确认了其作为评点术语的独立意义。同时,“玩”是一种实践途径,读者通过“玩”来内化杜诗理解,“玩”的结果可能是个体化的,未必具有可复制性,但这一路径是可以尝试的。“玩”与杜诗在诗歌史上的定位是相合的,其思想的精深程度与艺术的精工程度都需要通过对文本的深度阅读把玩来感知。

热奈特提出副文本理论:“副文本如标题、副标题、互联型标题;前言、跋、告读者、前边的话等;插图;请予刊登类插页、磁带、护封以及其他许多附属标志,包括作者亲笔留下的还有他人留下的标志。”^[9]就此而言,与杜诗原文相比,“玩”所引领的评点内容属于副文本,“玩”引出的对内容的理解、对章法的分析和对审美的讨论与原文主文本形成比照,对于杜诗本身没有写尽说透的地方,读者通过“玩”的方法将其体悟明晰,而后落实于评点部分附于诗后,与杜诗原文形成对应互参关系,对杜诗作出补充,给予后来的读者以提示。

审美理解存在主观性,不加节制的个性化解读容易陷入主观臆断,脱离文本实际,偏离诗歌本意。“玩”紧扣原文,有文本作为支撑,一切推断基于原文细节,可以保证品读、体会、感受不偏离正轨。“玩”的意义正在于此,既兼顾了文意,没有完全背离传统解经观念中对元典的重视,又能够为评点者提出个人思考的环节,留下阐释空间。“玩”看似是一个主观性的行为表述,其实建立在对文本的深度把握中,经由“玩”形成的审美解读路径在严谨中保持了作者与评点者双方的主观性,使读者在理性框架内,能够通过个人体味触碰杜诗蕴含的审美意蕴,挖掘出贴合原意的美学价值。这也是“玩”作为一种方法应用于评点的合理性之所在。

3 “玩”的意义与评点者主体性的体现

在对杜诗的评点中,使用“玩”之处即是评点者的关注之处,对某诗、某句、某字使用“玩”即意味着评点者重视该诗、该句、该字,并愿意在对其的解读中花费精力。《杜诗详注》中,借助“玩”的指示,可以发现评点者相对关注的部分有二:一是诗中的主题句,二是诗中的关键字。主题句是诗歌表意核心的凝练,承载全诗要旨。评点者把玩主题句的行为,体现着对诗歌宏观架构与核心思想的关注。在评点者通过“玩”定位主题句并完成解读后,读者也就获得了一种指引,能够沿着评点者的理解路径快速确定诗作主旨,主题句的“主题”地位也在传承中不断加固,带来产生经典性主题表达的可能。评点者对关键字的“玩”,体现对诗歌艺术的把握和重视。关键字可能关乎平仄韵律,也可能是意象、情感、主题的触发点,具有较强的表意功能。

把玩一处意味着对该处在普通阅读之外给予额外重视,额外提出的重视就会在后人阅读中再次引起额外重视。这在一定意义上推动着秀句与诗中“眼目”的生成,也在继承与流传中塑造着后人的阅

读重经验。秀句在钟嵘《诗品》中就曾出现,“奇章秀句,往往警遒”^[10],其“旨在追求诗句工整秀丽”是对诗作中佳句妙语的称呼。“眼目”在《杜诗详注》中也被反复使用,意指一首诗中最能指称全诗中心内容或展现情感色彩的字词,是点明全诗关键、凝聚核心涵意之处。如《秋笛》诗云:“清商欲尽奏,奏苦血霑衣。他日伤心极,征人白骨归。相逢恐恨过,故作发声微。不见秋云动,悲风稍稍飞。”仇兆鳌评:“奏苦、声微四字,乃上下眼目。”^{[7]618}就是强调“奏苦”“声微”对情感基调的确认与对征人悲苦升华的含蓄表达。主题句和关键字在经过评点者的聚焦之后,主题句有可能成为秀句,关键字也有可能成为“眼目”,二者也具有协同形成秀句的空间。“玩”的对象其实是对杜诗精华的筛选。秀句与“眼目”一旦形成,也就从普通文本向上提升,具有一定的标志性意义,相应会受到更多关注。

文本吸引了评点者的关注,这是“玩”的开端。在后人阅读中,评点者的“玩”能够引发额外关注,读者结合自己的知识背景,在评点者玩味后得出的结论之上再次增添新的解读,带来新的把玩空间,这也就形成了阐释的螺旋上升。杜诗阐释也就不断丰富,意义持续增殖,对杜诗的经典地位的确立产生正面影响。

在《杜诗详注》的评点中,“玩”这一行为与“意”有着逻辑联系,其强调的是“意”,换言之,评点者关注的重心是“意”,为了能够体会到杜诗中的“意”,他们往往会采取“玩”的方式。

首先可以举出一些把玩诗“意”的例子。《赠献纳使起居田舍人澄》结语为“扬雄更有《河东赋》,唯待吹嘘送上天”,仇评曰:“玩结语,知公久怀献赋之意矣。”^{[7]203}此处“意”指的是杜甫想要通过献赋达到政治抱负的愿望。评点者玩味结语的目的在于由文及人,揭示诗句背后所蕴含的诗人的思想情感和创作意图。《至日遣兴奉寄北省旧阁老两院故人二首(其二)》云:“忆昨逍遥供奉班,去年今日侍龙颜。麒麟不动炉烟上,孔雀徐开扇影还。玉几由来天北极,朱衣只在殿中间。孤城此日肠堪断,愁对寒云雪满山。”赵大纲评:“玩‘由来’‘只在’四字,有许多怅望意。”^{[7]498}“由来”和“只在”两个词展现着身份处境的今昔落差,流露出对朝堂的不舍。与此同时,回归朝堂的希望又十分渺茫,当下身处孤寒之地,难免落寞惆怅。评点者关注的不是字词的表面意义,而在于通过对字词的玩味指向杜甫的内心情感。《春水生二绝》末句云:“鸬鹚鸕鶿莫漫喜,吾与汝曹俱眼明。”评点者以“玩末二句意,公可谓与物

委蛇,而同其波矣”^{[7]809}评此句,“意”体现出其在面对自然时融为一体的心理状态。

“意”是诗歌评点中的核心范畴,对“意”的把握是理解诗作内容、感受作者思想情感的重要环节,也是形成有价值的评点的前提条件。评点者对杜诗内容、章法、结构、格律、审美效果等方面的玩味,皆以明确诗作之“意”为目的。不同的字词能够传达出不同的情感与意义,从而影响到整首诗的“意”。章法与结构是“意”的语言组织形式,会影响表“意”效果。对诗作背景的介绍,走向对杜甫创作时间、情境与动机的理解。审美效果与“意”直接相关,故对审美效果的把玩是各类指向中较为重要的部分。

总体来说,“玩”是评点者揣度杜诗表达意蕴内容的途径和方法,是评点者个体能动性、阐释观念的体现。无论是一个评点者在不同时间去阅读杜诗,还是不同评点者阅读杜诗,其评点结果都是历时的、动态的,玩味出的内涵解读也涉及文本、读者与历史语境间的互动。“玩”首先具有较为明确的文本中心特点,要求读者以文本为基础,通过反复琢磨,力图体会作者创作瞬间的初始意义,相对尊重作者原意,没有过分强调读者的主观建构。同时,读者对杜诗的把玩不可能不结合自己的知识背景。不同人的学习经历、人生阅历有所差别,知识背景自然有所不同,个体经验与杜诗背后的创作经验、历史文化背景相互交渗,也就导致不同读者面对同一首诗,有可能把玩出不同的意蕴。故“玩”一方面以文本为中心,具有科学性,一方面也能够涵盖不同主体的个性特征,体现出各自的阐释特点。

4 结论

在《杜诗详注》中,作为评点术语“玩”勾连起杜诗文本与评点实践,是一个动作状态,意味着深度介入,反复琢磨,精细考量。杜诗的章法格律、审美效果等是极具特色的部分,这些部分在评点者手中得到关注,这一关注正是通过“玩”这一术语表现出来的。由“玩”带来的评点论断,与杜诗文本形成互参互补,对杜诗地位文学进行建构,这符合评点的基本要义。基于把玩得到的评点成果是文本解读的延伸,为杜诗的理解提供帮助,同时,文本也在反向验证评点成果,防止过度阐释,促使“玩”的成果贴合文本实际,二者相互校正、彼此增益。

“玩”意味着对文本的深度挖掘,这使其他作品在主题、艺术等方面与杜诗的差距得到更直观的展示,让杜诗的美学效果更为凸显,为杜诗作为诗歌高峰的身份提供支撑。“玩”作为一种途径,其方向受

评点主体影响,强调了读者的主动权,不同的读者有可能从内容、形式、艺术、真实价值、哲学意蕴等多个维度审视同一诗句,也可能结合不同的时代特点、时事背景,这拓宽了杜诗意涵的边界,使其有可能容纳不同时代、不同身份读者的理解诉求,对杜诗的经典地位的形成具有正面影响。

朱熹著作中,多有对“玩”字的使用,如“玩味”“潜玩”“玩赏”“把玩”等,并以此来解经^[12-13]。“玩”这个语词本身带有较为浓重的审美感受,有把玩、玩味之意,意味着主体并非浅尝辄止,而是长时间停留于某一对象,反复摩挲、体悟。这种深度介入的姿态,与审美过程契合。且这一动作的出现往往伴随着松弛、闲适的心境、从容的态度,能够催生审美感知与情感共鸣。《杜诗详注》中,“玩”在审美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但从出现频率来说,用于评点作品内容、探寻历史背景、系年系地的“玩”更为多见。这种求真求实的观点与朱熹解经的方式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在总体把握古代诗文评点史中的“玩”的用法之后,这一话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 [1] 魏庆之. 诗人玉屑[M]. 王仲闻,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 2007:384.
- [2] 张炎. 词源[M]//唐圭璋. 词话丛编. 北京:中华书局, 2005:255.
- [3] 董运庭. 中国古典美学的“玩味”说与西方接受美学[J].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86(5): 83-88.
- [4] 马兴祥. 试论朱熹文学批评的“玩味”说[J]. 廊坊师专学报, 2000(4): 16-19.
- [5] 许慎. 说文解字[M]. 北京:中华书局, 1963:12.
- [6] 黄寿祺,张善文. 周易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 2016: 476.
- [7] 仇兆鳌. 杜诗详注[M]. 北京:中华书局, 1979.
- [8] 陆法言. 切韵汇校[M]. 王仁昫等,补. 徐朝东,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 2021:24.
- [9] 杰拉德·热奈特. 热奈特论文集[M]. 史忠义,译.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2:71.
- [10] 周振甫,译注. 诗品译注[M]. 北京:中华书局, 1998:72.
- [11] 朱桦. 关于“秀句”的称谓[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4): 65.
- [12] 相关研究成果如邹其昌. 论朱熹“讽诵涵泳”的心理流程——朱熹诗经诠释学美学诠释方式研究(之一)[J]. 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6): 31-35.
- [13] 谷继明. 玩味与涵泳:宋代解经学的一个重要方法[J]. 中国哲学史, 2016(3): 55-61. 责任编辑:朱家席

文化生态视域下黄梅戏音乐的流变与创新

张源宁

(安庆师范大学 音乐学院, 安徽 安庆 246133)

摘要:以文化生态与艺术传承为研究视角,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黄梅戏音乐的流变历程、形态特征及其发展逻辑进行分析,由此可知黄梅戏音乐的形成与发展深植于特定地理环境、社会结构与多元文化交融的土壤之中,在不同历史阶段呈现出鲜明的艺术形态。其演进始终遵循艺术本体规律,在传播主体与受众的互动关系、社会文化场域的变迁中持续调适,既坚守地域文化根脉,又开放吸纳多元艺术养分,深刻诠释了传统戏曲“守正创新”的生存智慧,不仅为传统剧种的活态传承提供了重要借鉴,也持续繁荣了黄梅戏作为经典戏曲剧种的艺术生命力与文化影响力。

关键词:文化生态;黄梅戏音乐;演进;守正创新

中图分类号:J617.5;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6)04-0027-07

Evolution and Innovation of Huangmei Opera Musi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Ecology

ZHANG Yuanning

(School of Music, Anqing Normal University, Anqing, 246133, Anhui)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ultural ecology and artistic inheritance, it analyzed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morp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logic of Huangmei Opera music, a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 this paper. It can be concluded that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uangmei Opera music were deeply rooted in the soil of specific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social structure and multicultural integration, presenting distinct artistic form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stages. Its evolution has always followed the inherent laws of art, continuously adjusting itself in the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seminators and audiences as well as the change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fields. While adhering to its regional cultural roots, it has openly absorbed diverse artistic nutrients, profoundly embodying the survival wisdom of “upholding integrity and promoting innovation” in traditional opera. It not only provide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living inheritance of traditional operas, but also continuously sustains the artistic vitality and cultural influence of Huangmei Opera as a classic opera genre.

Key words: cultural ecology; Huangmei Opera music; evolution; upholding integrity and promoting innovation

黄梅戏是我国五大剧种之一,在发展过程中有不同称谓,每种名称都与其阶段性唱腔特色、民俗文化相关,如采茶调、怀腔、二高腔等,这些名称均见证了黄梅戏的地域流变与唱腔拓展。黄梅戏音乐突出

“生活化”,鲜活灵动、淳朴流畅,在民间广泛流传。同时,黄梅戏历经从“草台小戏”到“舞台表演”,从乡村文化到地域代表、从传统演绎到现代创新的多重转型,形成了兼具民间性与专业性的艺术品格。

收稿日期:2026-01-17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青年项目(AHSKQ2023D114);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2024CXQ056)。

作者简介:张源宁(1994—),女,安徽安庆人,讲师,博士。E-mail:1051714485@qq.com

从学术研究脉络来看,既有成果已为黄梅戏音乐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时白林在《黄梅戏音乐概论》^[1]中系统梳理了黄梅戏音乐的发展特征,厘清了花腔、主调、三腔的结构体系。王兆乾的《黄梅戏音乐》^[2]则以实证研究为特色,收录大量早期艺人传唱的原始谱例,通过对比其他地区民歌与安庆黄梅戏唱腔,追溯其民间源流,证实黄梅戏音乐与鄂皖赣交界地区民间音乐的谱系关联。黄梅戏作曲家陈精耕先生^[3]从黄梅戏音乐程式化角度,探讨了声腔板式、创作布局形态等内容,为黄梅戏音乐创作的传承与创新研究奠定了学理基础。鲍红的《黄梅戏初创时期对潜山弹腔的吸收和借鉴》^[4]则探讨了黄梅戏初创时在剧目、班社等方面对潜山弹腔的借鉴,分析其根源,为黄梅戏艺术本体的产生研究提供了参考。近年来,学者从多元维度拓展黄梅戏音乐研究,深挖声腔板式变体与器乐伴奏创新,以跨学科史料解析其文化语境与审美特质,借助数字化技术探索传承新范式,聚焦跨界融合与传播革新实践等,为剧种的当代活化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5-7]。然而,需要指出,黄梅戏音乐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动态的“文化生态系统”下的产物,其流变的内在逻辑与自然环境、文化圈层、社会结构等外部因素相关。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整合研究,为传统戏曲的活态传承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路径。

1 黄梅戏音乐的生成根基

作为扎根于皖鄂赣交界地域的民间戏曲形式,黄梅戏音乐的生成与发展深度依赖于特定的区域地理、社会结构与文化圈层所构建的文化生态系统。自然环境塑造其审美底色,社会变迁推动其形态演进,多元文化则为其提供养分支撑,三者共同构成黄梅戏音乐的生态根基,并决定其“兼容并包”的发展格局。

吴楚交融的地理位置决定了黄梅戏音乐的审美基底。安庆地处长江中下游,境内河渠交织、土地肥沃,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从自然环境对审美风格的塑造来看,安庆山清水秀的自然景观,孕育了黄梅戏音乐抒情婉转的核心特质。《安庆史话》载:“它(指黄梅戏)生长在锦绣旖旎的江南,它不像秦腔那样融汇着塞北草原的高昂气势,又不像河南梆子那样充沛着黄河奔流的雄健气概,它散发着江南泥土的芳香,委婉缥缈,轻柔优雅。”^[8]所以,黄梅戏呈现的是长江的柔美风范^[9]。一方面,黄梅戏旋律多以级进为主,偶见四度以内的小跳。如《打猪草》中“对花调”的旋律线条,平缓的级进十分贴合江南

山水的静谧;另一方面,唱腔中大量使用拖腔,如《天仙配》中的“满工对唱”,其中“比翼双飞在人间”的“间”字拖腔传递出细腻绵长的情感,与安庆地区舒缓的生活节奏高度契合。从文化区位的角度来看,安庆素有“长江万里此咽喉,吴楚分疆第一州”之称,这种“襟带吴楚”的区位优势,使得黄梅戏在形成过程中得以吸收吴文化的细腻柔美与楚文化的浪漫抒情,形成兼具多元文化特质的艺术风格。如《夫妻观灯》中“闹元宵”唱段的“呀子哟”等衬词,保留了楚地民歌口语化的特征,增强了音乐的生活气息;《打猪草》中的“打猪草调”的五声音阶级进,符合吴地文化“南主清峭柔远”的特质^[10]。

此外,安庆丰富的民间艺术资源为黄梅戏音乐提供了充足养分。采茶歌、桐城歌、青阳腔等民间歌舞、戏曲,使得黄梅戏自诞生之初便具备了“采百家之长”的开放品格和优势,为其音乐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社会结构的演变是黄梅戏音乐形态发展的核心动力。清代中叶以来的社会变迁,全面且深刻地贯穿黄梅戏从民间小戏到成熟剧种的全过程。从经济形态来看,清代农耕经济背景下,黄梅戏主要活跃于乡村“草台”,演出条件简陋,音乐形态呈现出“自发性”特征。这符合黄梅戏音乐早期“三打七唱”的形式,即以三名打击乐手与七名演员为主的演出形式,艺人表演即兴性很强,形成“十腔九不同”的现象^[11]。这种简易的表演形式与农耕经济下“忙则农,闲则艺”的半职业演出模式高度适配,如望江老艺人龙昆玉与至德老艺人胡玉庭演唱的《打猪草》,在节奏、旋律上均有差异,体现了早期黄梅戏的“灵活性”^[2]。明清以来,徽商的崛起为黄梅戏音乐的职业化发展提供了经济基础。作为徽商重要集散地的石牌镇,成为黄梅戏从乡村走向城市的关键场所。城市剧场演出需求的增长,促使黄梅戏突破“三小戏”的局限,向正本大戏发展,板腔体随之萌芽,如《蓝桥会》中引入“平词”“二行”板式,以一板三眼承担叙事功能,以一板一眼推动情绪递进。这种板式结构的完善性,正是为了适应长篇剧情的表达需求。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使黄梅戏演出场景拓展至剧场、电视、网络等多元空间,音乐形态也随之发展改变。从政策制定的角度而言,黄梅戏音乐的发展方向基本与此相对应。新中国成立前,封建官府将黄梅戏视为“花鼓淫戏”,屡颁禁令。据清光绪五年(1879)上海《申报》记载:

黄梅淫戏:皖省北关外,每年有演唱黄梅调小戏者,一个班有二十余人,并无新奇足以动人

耳目。惟正戏后总有一、二出小戏,花旦、小丑演出百般丑态,与江省之花鼓戏无甚差别。少年子弟及乡僻妇女皆喜听之,伤风败俗莫此为甚。而游浪之徒每至兴高采烈时,群掷青蚨,名曰‘打采’。又有以糖饼等食物抛上旦脚头面者,旦角更得意扬扬,更显种种淫态,而愈出愈奇。又有将有人小帽、巾扇夺取以丢上台端,俟戏毕以钱往赎,以为笑乐。屡经地方官示禁,终不能绝。刻下已届秋成,又将复炽,有地方之责者宜禁之于早也。^[12]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黄梅戏艺人为了生存,常与徽剧、京剧合班演出,因而间接吸收了其他剧种的伴奏与唱腔,还借鉴了京剧的“胡琴托腔”方式。1949 年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1951 年),推动“改人、改戏、改制”。安徽省文化局随即组建专业黄梅戏剧团,时白林、王文治等文艺工作者率先加入创作团队,系统规范“主调、花腔、三腔”的声腔体系。这些文艺创作者接受过专业作曲技法训练,在黄梅戏音乐的规范创作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改革开放后,文化政策趋于宽松,各种创新剧目不断涌现。一方面,专业剧团通过创排《徽州女人》《公司》等新剧目,尝试将歌剧咏叹调、电子音乐等现代元素融入创作;另一方面,民间班社通过短视频平台传播经典唱段,吸引海内外观众,使黄梅戏音乐在新时代始终保持鲜活的生命力。

黄梅戏音乐的生成离不开安庆地区多元文化圈层的滋养。民间艺术、传统戏曲与外来文化的“三层体系”为黄梅戏音乐提供了丰富的艺术素材,并促使其逐步发展为我国五大剧种之一。首先,民间艺术是黄梅戏音乐的根基所在。黄梅戏“借鉴知名徽班的表演艺术,奠定了由‘调’向‘戏’推进的基础”^[13]。盛霞等指出,正是因为民俗活动中的推车、旱船、采茶、花篮、跑马、舞灯等民间歌舞形式,才促使黄梅戏在“二小戏”的基础上发展为“三小戏”^[14]。其次,传统戏曲对黄梅戏音乐的成熟起到关键作用。黄梅戏中的“仙腔”“阴司腔”就脱胎于青阳腔^{[1]40}。“仙腔”因曲调清丽空灵,多用于神仙出场。“阴司腔”则以悲怆哀戚的曲调,用于鬼魂出场或表现人物绝望时的情绪。如《渔网会母》中“左牵男右牵女”,商调式与悠长拖腔,均源自青阳腔的“清江引”^[15]。此外,徽剧的板腔结构为黄梅戏音乐的主调提供了借鉴。徽剧中的“平板”“二六”与黄梅戏中的“平词”“二行”有异曲同工之处。如《女驸马》中“驸马原来是女人”唱段,从散板到平词、二

行、三行、火攻,板式转换与戏剧冲突高度吻合。再有,“京黄同台”推动了黄梅戏伴奏技法的改进,“胡琴托腔”还解决了唱腔音高不统一的问题。1946 年,胡琴艺人王文治将京二胡改为高胡,并创作系统过门,使伴奏与唱腔形成“衬、包、裹、垫”的紧密关系^{[16]2}。最后,外来文化的融入为黄梅戏音乐注入现代活力,尤其是西方音乐技法与现代艺术形式的借鉴,使黄梅戏音乐得以突破传统局限以适应现代审美需求。《春香传》中“百年佳约”唱段采用“主题动机”的方式增强人物故事的叙事性。同时,流行音乐与音乐剧元素也被纳入创作,《贵妇还乡》便吸收了音乐剧“唱说结合”特征,增强了现代生活的代入感。

综上,黄梅戏音乐的生成与发展深植于地域特色,安庆“江南温情”的自然风貌与“吴楚交融”的区位优势特征,奠定了其抒情婉转、兼容并蓄的审美基底。民间艺术的滋养、传统戏曲的浸润与外来文化的融入,使其形成“海纳百川”的戏曲品格。

2 黄梅戏音乐的发展脉络

黄梅戏音乐的流变历经四个关键阶段,从清代中叶的花腔小戏,到民国时期的板腔萌芽,再到建国后的系统成熟,最终在改革开放后实现多元创新。每个阶段的音乐形态均与特定历史语境相适应,呈现出“曲牌体、板腔体、曲牌板腔融合、多元集萃”的清晰演进路径,也反映了黄梅戏音乐从民间自发创作到专业系统创新的完整发展历程。

清代中叶至辛亥革命前,是黄梅戏音乐发展的萌芽期。其唱腔以曲牌体为主,核心为“花腔”,多用于“二小戏”“三小戏”等生活小戏,形成了“一曲一戏、专曲专用”的传统。花腔大多以民间素材为主,多属曲牌体。据时白林先生统计的花腔专用小调共有 69 首^[1]。王兆乾先生的《黄梅戏音乐》中收录了花腔小调共 142 首^[2]。这些花腔或单独被使用,或缀连成套进行使用。一般来说,生活小戏中有数个专用小调互相联缀,而不同的生活小戏中的专用小调又不相同,彼此间独立存在,并不互相套用。时白林先生收集的黄梅戏传统生活小戏有 65 出,其中“花腔”有 100 余首,自此生发且如今仍在流传的小调也不在少数^{[16]2}。就以著名的黄梅戏小戏《夫妻观灯》与《打猪草》为例,前者包含“开门调、观灯调”等八个专用小调;而后者则由“打猪草男女腔、对花调和对花调对板”组成,这两出生活小戏中的曲调联缀不同,互不套用,独立成曲。花腔小戏朗朗上口,与民俗文化息息相关,来源于朴素的日常生

活,因此影响甚广。更有曲调历久弥新,如《补背搭》《打豆腐》等,活泼清新,风靡全国。

在音乐形态上,这一时期的花腔小戏具有三个显著特征。以花腔小戏《打猪草》(见图1)为例。其一,唱词以“三字句”“五字句”为主,加入大量衬词。“小女子本姓陶”为五字句,“呀子依子呀”则为衬词,既贴合安庆方言的语音语调,又增强口语化特征。其二,曲式结构简单,多为带再现的三段体和不带再现的三段体,即“A+B+B1”“A+B+C”。《打猪草》就是由“打猪草调”(A)、“对花调”(B)、“对花调对板”(B1)组成。作为对比乐段^①插入的“对花调”,使得音乐的展开方式更加具有戏剧性,也让故事情节发展更加复杂化。其三,调式调性统一。三首曲调都保持在“E宫系统调”中,更准确地说,都结束在“B徵”上,形成统一。值得注意的是,黄梅戏唱段中以“宫”“徵”为核心调式,这是因为需要保证曲调的稳定性;偶也有“商”调式等不稳定的结尾,一方面增强了戏剧冲突色彩,为剧情发展服务,另一方面使得音阶构成以“小三”度为主,而具有悲凉凄惨之意,多见于阴司腔^[17]。

打猪草



图1 花腔小戏《打猪草》中的“打猪草调”

然而,并不是所有花腔小戏中的腔调都由“花腔”组成。部分剧目已开始吸收其他腔体元素,呈现出向“板腔体”过渡的雏形。如《夫妻观灯》中的“开门调”属于花腔范畴,但四次“观灯调”的演绎,却是在“彩腔”的基础上进行变形、发展或转调形成的。甚至会有花腔小戏中不包含“花腔”的情况。因此,“花腔”并不是花腔小戏中唯一的存在,根据剧情发展的需要选择不同的腔体进行演唱,也是花腔小戏的主要特征之一。

黄梅戏在艺人随迁卖唱的过程中逐步过渡成熟,其阵地也从湖北省转到安徽安庆地区,经历了几次戏名的变更——黄梅采茶调、二高腔、花鼓戏、皖剧、徽剧等,从中可以窥见黄梅戏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所属的地方文化、区域位置乃至剧种辐射,黄梅戏之

所以被称为“采百家之长”,就在于此。起初黄梅戏的伴奏形式十分简单,以打击乐器为主,即小锣、大锣、小鼓等。发展到清末,艺人及组织的表演团队开始进入半职业化状态时,就出现了“三打七唱”的形式,这种形式一直保留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所谓“三打七唱”,即三件打击乐器伴奏、七个演员演唱。三件乐器的规制为:大鼓(堂鼓)、大锣、小锣。其分工为堂鼓一人兼打竹苑和钹,坐草台正中偏后;小锣一人坐上场门外的内侧;大锣一人,站在上场门外的内侧^{[1]304}。锣鼓点的功能主要有二:一是“闹台锣鼓”,打击乐一奏响,说明表演即将登场,延揽观众;二是“花腔锣鼓”,用于剧目的叙事场景中,配合情节发展。由于旋律乐器的缺失,早期的黄梅戏唱腔更加“自由随意”,同一唱腔旋律、节奏等均存在细微差异,这也是“口传心授”传承方式的必然结果。

辛亥革命时期至“文革”前,是黄梅戏音乐发展的成熟期。随着剧目从“生活小戏”向“正本大戏”发展,唱腔体制也逐渐突破曲牌体局限,走入板腔体体制,形成“曲牌体与板腔体并存”的格局。因此,正本戏的兴起是板腔体形成的直接动因。这一时期,黄梅戏开始上演《天仙配》《梁山伯与祝英台》《罗帕记》等人物众多、情节曲折的剧目。传统花腔的“一曲一戏”模式难以满足复杂剧情的叙事需求,艺人们遂借鉴徽剧、青阳腔等以板腔体为主的戏曲形式,创作出以“主调”为核心的板腔体体制。板腔体一般以对称的上下句为基础,利用板式(节奏变化)变化对唱段进行一定的拓展与衍生,可以理解为西方音乐中的变奏原则,通过调整节拍、节奏、调性等衍生出“平词”“火攻”“二行”“三行”等板式,形成以“板式变化”服务剧情发展的音乐逻辑。如《蓝桥会》中的“年年有个三月三”,采用“平词”板式,以舒缓的速度表现叙事内容;再如《渔网会母》中的经典唱段“左牵男右牵女”,由旦角一人演唱,但腔体转换复杂:散板+平词+二行+三行+火攻。表演中板式交替频繁,且速度越来越快,凭借腔体的转换完成了人物情绪上的推进。

这一时期的板腔体唱腔呈现出两个关键特征。其一,“男女分腔”的规则初步确立。虽然主调的男女曲调在结构、风格上基本一致,但演唱时严格遵循“女声在男声下属调”的规则,形成同主音调式交替的风格。以《游园》中的生旦对唱为例,生腔为“C宫系统调”,落音于“1”(宫音),属宫调式;旦腔为“F宫系统调”,落音于“5”(徵音),属徵调式,这种调式转换既区分了男女角色,又丰富了音乐的色彩

对比。其二,“腔体联用”模式逐渐成熟。为表现复杂的人物情感,剧目开始将不同腔体串联使用,形成“回旋式”“变奏式”两种联用模式。所谓“回旋式”,即唱段中的前一个腔体会在随后的唱段中再次出现,形成腔体间的循环往复,从而完成情感的抒发与推进。以《春香传》中的“别歌”唱段为例,春香与李梦龙之间的对唱片段腔体的转换为:女平词+男二行+女平词+男平词+女二行+男平词+女平词。且女声与男声之间分腔,春香唱段为“ bE 宫系统调”,李梦龙唱段则为“ bB 宫系统调”,这之前所说的男女分腔,调性不同相吻合。所谓“变奏式”,即唱段中不同腔体的不重复式交替进行。这种唱段一般表现出的人物情感起伏大,具有很强的戏剧冲突性,或者可以理解为“成套化”的腔体续进。如《女驸马》中的“驸马原来是女人”片段,冯素珍与公主在这段唱段中完成了从散板、八板、平词、二行、三行最后到火攻的转换。板式的运用推动了剧情的发展,公主得知冯素珍的女儿身,板式的快速推进让人物间的冲突立刻鲜明生动起来。与此同时,曲牌体的花腔并未被取代,而是与板腔体形成互补。在正本戏中,花腔多作为“插科打诨”的元素穿插使用,与剧情无直接关联,却能调动演出气氛,形成“板腔体为主、曲牌体为辅”的融合局面。

及至明末清初“戏曲改良”运动后,专业音乐工作者的加入使黄梅戏音乐从“民间艺术”走上“规范创作”。在传统“平词”“火攻”等板式的基础上,通过规范结构、丰富调式转换,增加唱腔的多样性。其一,板式结构规范化。“平词”为一板三眼,长于叙事;“二行”为一板一眼,用于情绪推进;“三行”为“有板无眼”,表现紧张情绪;“火攻”为“无板无眼”,表现大喜大悲,形成清晰的板式功能分工。其二,调式转换丰富化。突破传统“四、五度近关系转调”的局限,引入“大二度远关系转调”。如《牛郎织女》中织女唱段“空守云房无岁月”从 F 调转入 bE 调,通过调性的鲜明对比表现人物的孤独与哀怨。其三,唱腔旋律创新化。黄梅戏音乐开始借鉴西方音乐“主题动机”^②手法,形成人物类型化的音乐标签。如《天仙配》中“七仙女”标签,通过动机的展开、变形贯穿全剧,强化人物形象的塑造。

随着黄梅戏艺术形式的逐渐复杂化,早期的伴奏形式无法满足唱腔的需求,且黄梅戏又经历了与京戏同台演出的阶段,史称“京徽合演”,从而吸收借鉴了京戏中的弦乐伴奏乐器——胡琴,开始进行弦乐伴奏的尝试与探索。“京徽合演”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京剧以王少舫为首,黄梅戏则以丁永泉

为主,两边联袂演出。但在演出的过程中,有一问题无法避免,即黄梅戏只有打击乐器而无旋律乐器导致艺人们难定音高。于是,王少舫建议使用京剧中的胡琴作为托腔,并令胡琴艺人小喜子尝试伴奏。双方艺人逐渐适应,由此开创了黄梅戏使用旋律乐器的先河。抗日战争胜利后,“京徽合演”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将胡琴作为旋律乐器进行黄梅戏演唱的伴奏形式留存了下来。后有不少艺人努力尝试将胡琴彻底引入黄梅戏伴奏音乐中,但都没有成功。直到 1946 年,王文治先生开始用京二胡,后改为高胡——即今天黄梅戏的“主胡”伴奏,并创作了一系列的过门,黄梅戏才算是由“三打七唱”锣鼓伴奏走上用旋律乐器伴奏的道路^{[16]2}。这一时期,管乐也逐渐开始在黄梅戏伴奏乐器中使用,如笙、笛等。20 世纪 50 年代,黄梅戏的伴奏乐器就包括主胡、二胡、三弦、唢呐、笛、笙等。由此,黄梅戏的伴奏乐队规制基本形成,这便是俗称的“场面”。

在多元文化背景下,黄梅戏音乐已经突破传统体制局限,融合现代元素,呈现出“个性化”的发展趋势。其一,传统腔体的现代化改编。一方面,对花腔、主调等传统唱腔进行和声、旋律等方面的创编。另一方面,对传统唱腔进行功能拓展。如新编革命剧目《江姐》中的“红梅赞”唱段,以歌曲《红梅赞》为基础,调整为平词的结构,表现了革命英雄的坚定信念。其二,创腔手法的多元化表达。专业作曲家结合观众现代审美需求,创造出兼具传统韵味与现代风味的新腔体,如“歌剧咏叹调式”“流行音乐式”,上文所述《徽州女人》就是典例。此外,复调、交响化配器等手法已经广泛在黄梅戏音乐中使用,拓展了黄梅戏音乐的表现空间。

黄梅戏音乐的流变历经四个关键阶段。清代中叶以花腔小戏为核心,呈“一曲一戏”的曲牌体特征,伴奏则以“三打七唱”为主;民国时期随正本大戏兴起,确立“男女分腔”与“腔体联用”模式;建国后经“改戏改人改制”规划化、板式结构、调式转换与旋律创作系统成熟;改革开放后实现多元创新,至此完成从民间自发创作到专业系统创新的转型,彰显其适配时代语境的文化生命力。

3 黄梅戏音乐的演进逻辑

黄梅戏音乐的流变进程,本质上是传播主体与客体的互动博弈、社会文化场域的变迁整合、音乐艺术本体规律和创作自觉同构共塑的结果。这三对动力体系协同发力,不仅推动其完成从民间小调向国家级戏曲剧种的身份跃迁,更驱动其在新时代实现

艺术表达的多元创新与价值拓展。

其一,传播主体与客体的双向互动,构成黄梅戏音乐生存与发展的内外双重张力。从传播主体(表演者)的角度看,其“生存诉求”与“艺术旨归”是音乐形态流变的内在动力。早期灾民将采茶调传入安徽安庆的行为,是生计驱动下的文化迁徙。如望江老艺人龙昆玉演唱的《打猪草》,在传入安庆后,调式从羽调式转为徵调式,衬词也贴合安庆方言进行了调整,使唱腔更易被当地观众所接受。再如,黄梅戏班社为了加强管理,制定班规:“一不准鸣炮误场;二不准敲锣不归;三不准私游乡村;四不准欺师灭祖;五不准欺兄霸嫂;六不准挑拨离间;七不准招摇撞骗;八不准乱敲堂鼓;九不准挑戏拒演;十不准见班跳班。”^[18]随着半职业与职业班社的兴起,传播主体开始突破民间艺术局限、追求艺术品质的自觉探索。如“彭小佬班”通过借鉴徽剧的板腔结构,引入胡琴伴奏,提升黄梅戏的艺术品质,从而拓展演出市场。建国后,专业创作整体的介入与现代艺术理念的融入,是实现黄梅戏艺术提升的关键因素。时白林、王兆乾、陈精耕、王文治、陈汝天、何春旺等音乐工作者,突破传统民间音乐的创作范式,在创作中将西方作曲技法与中国民族音乐理念相融合:一方面,对传统过门进行规范化重构,摆脱民间伴奏的即兴性局限;另一方面,吸纳管弦乐元素丰富伴奏层次,使黄梅戏音乐既保留“清新自然”的艺术品质,又符合现代化观众的审美需求。

从传播客体(欣赏者)的角度看,其“审美期待”与“价值判断”成为音乐形态流变的外在张力。不同地域、不同阶层的审美差异,推动黄梅戏音乐从“地域民间艺术”向“全国性戏曲剧种”转变。早期乡村民众的审美期待根植于农耕文化,偏爱质朴明快、贴近生活的唱腔与叙事。如《补背褡》《观灯调》等花腔小戏,以通俗唱腔、欢快旋律契合乡村民众娱乐需要。随着表演场域向城市延伸,市民阶层成为核心受众,其较高的文化水平催生了对剧情复杂度与音乐丰富性的需求,促使黄梅戏完成向正本大戏的转变。如《梁山伯与祝英台》《女驸马》等剧目通过成熟的板腔体唱腔,丰富的伴奏配置,回应了城市受众的审美期待。此外,时代语境的变迁驱动受众审美取向不断变化,反向规约着黄梅戏音乐的创新方向。传统受众以“接地气”“易共情”为核心价值判断,塑造了黄梅戏音乐轻灵活泼的原生特质;现代受众在多元文化冲击下,既坚守对传统唱腔的文化认同,又期待着现代表达方式的融入。无论是早期对乡土生活题材的偏爱,还是当代社会对传统唱腔

的坚守,本质上都是对安庆地域文化记忆的情感维护,既防止了黄梅戏音乐在创新中陷入“失根”困境,又通过对优质创新作品的认可,使黄梅戏音乐在时代变迁中始终保持文化辨识度与艺术生命力。

其二,宏观场域的社会变迁深刻规约着黄梅戏音乐形态的演进轨迹与发展样态。首先,经济结构的转型直接重塑了黄梅戏的演出生态。清代中叶农耕经济主导的社会语境下,黄梅戏以“草台野唱”为表演场域,其音乐呈现出结构简易、旋律质朴、伴奏单一的特点。如早期花腔小戏仅以锣鼓伴奏,唱腔也多以即兴的短句反复为主。此外,录音与复制技术的缺失使得黄梅戏音乐依赖“口传心授”的传承模式,唱腔在代际传递中易发生地域性变异。徽商崛起推动城市文化消费市场成型,黄梅戏进入剧场演出,其音乐开始向复杂化、体系化方向改变,板腔体唱腔的雏形与胡琴等伴奏乐器的引入均源于此。近代录音技术与电影媒介的出现,使黄梅戏音乐得以固化为标准化的艺术音乐。在当代市场经济与文化产业深度融合的背景下,黄梅戏形成了“剧场、影视、网络”的多元传播格局,跨界化、数字化的创新方向层出不穷。其次,文艺政策为黄梅戏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制度性框架。新中国成立后,“戏曲改革”运动推动黄梅戏在音乐层面实现唱腔规范化、伴奏体系化的建构。当代数字技术与网络媒介的普及,不仅推动黄梅戏音乐进入数字化创作阶段,如电子编曲、虚拟伴奏的应用,更通过主流媒体平台实现了音乐的碎片化、圈层化传播,为传统剧种音乐的当代传承提供了新路径。

更为重要的是,黄梅戏对跨文化资源的自觉整合态度是其艺术内涵拓展的赋能引擎。首先,黄梅戏主动吸纳青阳腔“仙腔”“阴司腔”等腔体形式,丰富了情感表达方式,使音乐具备了演绎悲欢离合的戏剧张力;借鉴徽剧严谨的板腔结构,“平词”“二行”“三行”等板式体系得以构建,为本本大戏的音乐叙事提供了逻辑框架;学习京剧的专业化伴奏技法,实现了伴奏乐器从“锣鼓为主”向“丝竹同奏”的转变,完成了音乐生态与传统戏曲文化的深度融合。其次,黄梅戏音乐保持着深刻的民间性与文化辨识度。黄梅戏吸收采茶歌的核心曲调与节奏特质,形成了轻快灵动的音乐风格;与地方民歌互动,强化了唱腔的律动感;融入安庆方言的语音语调,塑造了“依嘴呀”等标志性衬词,构建了音乐生态与地域文化生态的共生格局。最后,黄梅戏对西方音乐文化进行了主动吸纳。据时白林先生所说,从1954年安徽省黄梅戏剧团移植朝鲜大型歌剧《春香传》为同

名黄梅戏,和 1955 年传统优秀剧目《天仙配》被拍成电影起,西洋乐器的弦乐组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贝司和木管组的单簧管、双簧管、长笛和定音鼓以及民乐中的琵琶、阮等才正式进入黄梅戏的乐队伴奏中,形成打击乐与管弦乐(中、西)伴奏的并重局面^{[16]3}。

其三,音乐艺术本体规律与创作自觉是黄梅戏音乐得以守正创新、长期存续的本体根基。戏曲音乐固有的“程式化”特质,推动黄梅戏音乐形成了兼具稳定性与延展性的艺术规范体系。在唱腔体系层面,黄梅戏音乐实现了曲牌体与板腔体的有机融合,逐步构建起“主调、花腔、三腔”的程式化唱腔范式;在伴奏编制层面,遵循“中西合璧”的程式化配置,形成“民族乐器为主、西洋乐器为辅”的混合伴奏体系;在创作技法层面,确立了“传统曲牌变体与西方作曲技法”并重的程式化创作路径。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程式化建构也为黄梅戏音乐的流变划定了“守正”边界,既维系了剧种音乐的艺术品质与文化认同,又为其现代性拓展预留了创新空间。戏曲音乐核心的“戏剧性”属性,驱动黄梅戏音乐不断强化叙事表现力与情感承载力。为适配复杂剧情的叙事需求,板腔体唱腔体系得以逐步发展成熟,通过“平词”“二行”“三行”等板式的灵活转换,实现了对不同戏剧冲突的精准回应。为完成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西方“主题动机”创作手法被引入,通过核心旋律的变奏与贯穿,赋予角色独特的音乐标识。正是如此,黄梅戏音乐才能恪守戏曲音乐的本体发展逻辑,同时保持与时俱进的鲜活生命力,既能深度嵌入社会文化生态的变迁过程,又始终坚守自身的艺术个性与文化根脉。在百余年的流变过程中,黄梅戏最终成长为中国传统戏曲体系中兼具地域特色与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要代表,为传统剧种音乐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了历史镜鉴。

4 结论

黄梅戏音乐的百余年流变,是地域文化生态与艺术本体演进相互作用的典型范本,其发展轨迹深刻诠释了传统戏曲“守正创新”的生存智慧。黄梅戏在自然、社会、文化的三重维度中形成了“海纳百川”的戏曲品格,它的发展实践说明一个道理:唯有扎根地域文化根脉,顺应社会发展趋势,在坚守艺术本体的基础上开放包容,才能在时代变迁中焕发新机。作为承载长江中下游地区文化记忆与审美价值的重要载体,黄梅戏音乐的未来发展,仍需在传统与现代、地域与全国中寻求平衡,延续其作为中国五大

剧种的艺术生命力与文化影响力。

注释:

- ① 对比乐段:西方音乐体制中的术语概念,一般指该乐段的材料与前一段不相同,在调式调性或织体发展方面形成对比,是乐曲展开的手法之一。
- ② 主题动机:西方浪漫主义时期流行的作曲技法,主要在交响乐与歌剧中运用,即每个主题有专属的音乐片段,每次该音乐片段的出现,就代表该主题的进入。

参考文献:

- [1] 时白林. 黄梅戏音乐概论[M].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 2022.
- [2] 王兆乾. 黄梅戏音乐[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57: 41-43.
- [3] 精耕. 黄梅戏音乐程式探微——学习传统札记[J]. 黄梅戏艺术, 1999(2): 28-35.
- [4] 鲍红. 黄梅戏初创时期对潜山弹腔的吸收和借鉴[J]. 戏曲艺术, 2022, 43(4): 86-90.
- [5] 李秀琴, 师喜秋. 黄梅戏音乐的性格化探究[J]. 黄冈师范学院学报, 2014, 34(4): 90-92.
- [6] 段友芳. 黄梅歌及新时期黄梅戏音乐的现代探索[J]. 四川戏剧, 2021(7): 65-69.
- [7] 凌雅莉. 黄梅戏音乐中的情感表达与风格演变[J]. 民族音乐, 2024(2): 8-11.
- [8] 政协安庆市文史资料工作组, 安庆市图书馆资料室, 编. 安庆史话: 初稿[M]. 1979: 175.
- [9] 王长安. 中国黄梅戏[M].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 2009: 206.
- [10] 王骥德. 曲律[M]. 叶长海, 解读.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20: 56.
- [11] 李峰. 黄梅戏“十腔九不同”探微[J]. 贵州大学学报, 2015, 29(6): 56-60.
- [12] 王兆乾. 黄梅戏的形式及其在安庆的发展[M]//安庆文史资料:第二十一辑. 合肥:安徽省新闻出版局, 1990: 101.
- [13] 张小平. 大黄梅:百年黄梅戏[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6: 13.
- [14] 盛霞, 陈昌文. 黄梅戏发展中的文化整合路径[J].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 2020, 23(5): 163-169.
- [15] 李玖久. 从特殊道路走向板腔体声腔的黄梅戏[J]. 黄梅戏艺术, 2005(1): 11-14.
- [16] 时白林. 黄梅戏音乐历程发展辨析[J]. 星海音乐学院学报, 2014(4): 1-4.
- [17] 孙晨荟. 安庆民歌与皖西南戏曲音乐关系探析[J]. 中国音乐学, 2023(3): 67-77.
- [18] 一农. 黄梅戏班的班规与习俗[M]//安庆文史资料:第二十一辑. 合肥:安徽省新闻出版局, 1990: 127.

责任编辑:张晓娜

论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的间性特征

姚 放

(上海立达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 上海 201609)

摘 要:从技术间性看,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通过技术调适,有针对性地解决了瓷绘“纸本化”技术转化问题,又以二次低温烧制法,达成了“以瓷为笺”的技术平衡。从艺术间性讲,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在吸纳新安画派艺术之长的基础上,凭借“以书入画”,开创了瓷画与文人画有机融合的新局面。从文化间性说,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在“雅降俗升”和西学东渐的语境中,以“文心”统摄“画艺”,达成中西文化融合,更坚守了中国艺术的“文心”传统和诗性美质。从“以瓷为笺”“以书入画”到“以文导艺”,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具有鲜明的间性流融特征。

关键词: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间性特征

中图分类号:J527;B8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6)04-0034-05

Transi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Light Red Porcelain Painting during the Late and After Qing Dynasty

YAO Fang

(School of Art and Design, Shanghai Lida University, 201609, Shanghai)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echnical interdisciplinarity, during the Late and After Qing dynasty period, the Light Red Porcelain Painting achieved a technical equilibrium through adaptive techniques that specifically addressed the challenge of transforming porcelain painting into a “paper-like” medium, while also employing a secondary low-temperature firing method to realize the concept of “using porcelain as paper”. From an artistic perspective, drawing upon the strengths of the Xin'an School of Painting, during the same period the Light Red Porcelain Painting pioneered an organic fusion of porcelain painting and Chinese literati painting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calligraphy into painting. Culturally, within the context of “elevating the vulgar while refining the elegant” and the eastward diffusion of Western learning, during this period the Light Red Porcelain Painting unified “literary spirit” with “painting artistry”. This not only achieved the cultural fusion but also steadfastly upheld the Chinese artistic tradition of “literary spirit” and poetic aesthetic quality. Evidently, from “using porcelain as paper”, “incorporating calligraphy into painting”, to “guiding artistry through literary sensibility”, Light Red Porcelain Painting exhibits distinct characteristics of inter-cultural fusion during the period.

Key words: the Late and After Qing dynasty; Light Red Porcelain Painting; inter-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相通共契”精神对于中国艺术具有举足轻重的价值与意义,这是艺术发展史已证明的不争事实,以至于“各种艺术精神相互为用,以相互贯通”^[1],凸显出鲜明的间性流融特征。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

创作亦是如此。首先,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以景德镇烧制成功的瓷器新品种为基础,为画师“以瓷为笺”创作提供了前提条件,体现出一定程度的技术间性特征。其次,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受到“文人

收稿日期:2025-11-09

作者简介:姚放(1989—),男,安徽蚌埠人,讲师,硕士。E-mail:152204167@qq.com

画”特别是新安画派的表现技法和审美风格的深刻影响,艺术间性特征也非常突出。再次,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同时又“以文导艺”,带有士人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特色,从“俗”文化转向“雅”文化,具有鲜明的文化间性特征。

1 以瓷为笈: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的技术间性特征

中国艺术的间性流融特征有其独特的物质基础。诸如传统建筑中的榫卯结构,文人书画使用的毛笔、宣纸、墨锭等。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也同样注重其介质,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通过技术调适,有针对性地解决瓷绘“纸本化”技术转化问题,确保从可操作性上取得技术突破;二是以二次低温烧制法实现“以瓷为笈”的技术平衡,保持彩料原有的质感、笔触的清晰、技法的生动、画面的平稳,实现瓷绘材料与技法的跨界融合。这是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技术间性的具体体现,也为我们理解中国艺术的间性特征提供富有启发性的范例。

1.1 技术调适:“纸本化”的技术转化

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技术间性的关键之处体现在对“瓷”这一载体的“纸本化”技术处理。纸本绘画凭借纸张如宣纸的吸墨性、晕染性,为笔墨的干湿浓淡、气韵生动提供了技术支撑。而瓷胎釉面则不同,因其光滑致密,不具备吸水性,对瓷绘技术和技法提出了挑战。只有艺人解决瓷绘可近似于纸张书写的笔墨效果,才能创作出理想的作品,因此,“纸本化”技术转化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解决这一技术难题。一是在彩料选用上有所创新。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所用的彩料虽不外乎氧化铁、氧化钴等矿物颜料,关键是在这类纯度较高的钴料中加入“铅粉”,使钴土矿“黑料”变成“粉料”,而高档作品会在釉面薄施一层透明“玻璃白”(含砷氧化物),形成温润的哑光基底,既增强了附着力,又使沉着之色变“浅”为“淡”。与传统的五彩、粉彩等高纯度、高玻璃质感的彩料截然不同,其特点是质地更为细腻,呈色更为淡雅,因而更接近水墨在纸张上书写的古雅感,是王国维所言古雅之境“亦得人力致也”^[2]的极好例证。二是在施彩工艺上推陈出新。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画师采用“三彩九阶”调配法,通过增减颜料配比使其浓度变化,从而形成从浅到深的色阶序列。以赭色为例,从“月白赭”(1:8 颜料水比)到“酱赭”(1:1)就分为9个色阶,确保画面晕染过渡的自然,这一工艺突破了传统五彩、粉彩的浓艳局限,为文人画风的

笔墨感奠定基础。同时,画师们在模仿纸本绘画中的“没骨”“皴擦”“点染”等技法时,能够有效地控制笔触的速度、力度,进行多次薄施、层层积染,使得瓷绘物象富有层次,墨色浓淡有致。这就是说,彩料的合理选用和施彩的有效控制,完成了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纸本化”的技术转化。

比如,程门(1833—1908),安徽黟县人,字松生,一字雪笠,号笠道人,是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艺术的集大成者。其浅绛彩山水图瓷板(见图1)运用了折带皴、披麻皴等山石皴法和侧锋干擦的手法,用较干的笔触蘸取较稀的彩料,在瓷面上反复皴擦,利用彩料在釉面的微量堆积和氧化的微妙变化,模拟出纸本墨皴法的质感。点染之法使得色彩过渡更加自然,景象更加完整。运笔用墨与所画景色达到了完美的结合,勾勒擦染随着山形水状轻重缓急,起伏有致,这是一种在多重限制中寻求突破的创造性技术实践。



图1 程门浅绛彩山水图瓷板

1.2 技术平衡:“以瓷为笈”的技术保障

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又以低温烧制技术完成了“火”的艺术对“笔墨”艺术的最终塑造。具体做法是采用二次烧制工艺,即在已经高温烧成的白瓷胎上进行彩绘,然后入窑以700℃—750℃的低温氧化烧成^[3]。这种低火度烧制工艺为“以瓷为纸”提供了关键性的技术支撑。也就是说,低温烧制工艺使得浅绛彩的彩料能够在不至于熔成玻璃体的状态下固化在釉面上,保证了彩料的原有质感和笔触的清晰感,在最大可能的前提下保留它类似纸墨绘画的韵味。这在高温烧制(因彩料熔融流动影响到牢度)状态下是不可想象的。当然,低温烧制工艺也有技术难题与新的挑战。比如,彩料与釉面结合牢度等问题必须解决。低温烧制工艺下彩料化学活性

也相应地较低,远不及高温彩料与釉面结合的强度。只有采取精确控制彩料配比的工艺,才能确保它在低温烧制工艺下形成稳定的化合物及其附着力。实际上,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画师们凭借其特有的配方解决了粘合牢度问题。又如,低温烧制工艺中呈色的稳定性也有待科学处理。低温烧制过程中,窑内温度、空气的细微变化都会导致彩料呈色发生明显变化。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画师们正是凭借丰富的经验积累,准确预判不同彩料在低温氧化气氛下的呈色状态,进而通过调整彩料的配比以及烧制的相关变量,最终达到了理想的呈色效果。

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是笔墨技巧与窑火控制技术有机结合的产物,二次低温烧制技术为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以瓷为笈”提供了技术保障。通过窑火的洗礼、艺人的匠心与技术的改进等,促使浅绛彩瓷绘在材质特性的限制中体现笔墨创新性以及画面平稳性,为重构瓷绘新的语言体系和审美范式提供了物质基础。纸寿不过千年。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以瓷为笈”,不仅为其艺术提供了坚固而持久的载体,而且使文人画的笔墨意境在陶瓷上长久留存,从而开创了陶瓷艺术史上绚丽独特的时代风貌。

2 以书入画: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的艺术间性特征

自古书画同源。诗歌等以书法方式进入绘画即“以书入画”在文人画创作中是有传统的。而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的“以瓷为笈”,恰好打破了传统民间瓷绘工艺与文化艺术之间的壁垒,转向“以书入画”的创作形式,使作品“诗、书、画、印”四位一体,从而开创瓷画与中国文人画有机融合的全新局面。较为明显的是,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画师们深受新安画派的影响,将间性流融特征渗透到空间布局、题材内容、表现技法 and 艺术风格等方面:一是在题诗、题款、钤印方面与新安画派一脉相承;二是在山水、花卉、人物、走兽、鱼虫、翎毛等瓷绘题材上也有惊人相似;三是在着色上又模仿新安画派染以淡赭、水绿、草绿、淡蓝及紫色等,显得色调幽雅;四是在艺术风格上创造出笔法凝练、构图大胆、意境空灵幽远的系列作品,与新安画派的清旷淡雅画风具有异曲同工之妙。正因如此,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以书入画”,充分体现出其艺术间性特征。

2.1 空间布局:构图上的书法章法

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由“以瓷为笈”到“以书入画”,改变了传统瓷绘的空间布局。一方面,将题诗、题款、钤印等辅助元素变次为主,丰富了瓷绘构

图的空间语言;另一方面,吸收书法艺术“计白当黑”的空间切割技法,在视觉空间背景上大胆突破。比如,就空间语言上的创新而言,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将题诗、题款、钤印等传统意义上的辅助元素,提升为构图空间营造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以书入画”最直接的体现;同时,画师们又根据器物造型特点,将长款题跋以行草笔法书写于瓷面空白处,使文字与图像形成互文关系,丰富了空间语言表达。程门的《山水人物四条屏》就是其中的典型。该作品将七言绝句题于山峦间隙,文字走势与山石轮廓相互映衬,既平衡了画面重心,又强化了文人雅趣。这种“以书入画”的格局彻底改变了传统瓷绘或无款或小字暗款的传统,使书法章法成为瓷绘空间语言表达不可分割的审美要素。又如,“计白当黑”是书家把握空间切割辩证眼力的基本要求,即在驾驭线条运动基础上,利用“知白守黑”空间切割达到“空之白”与“线之黑”之间的辩证统一,其“肆力在实处”而“索趣乃在虚处”^[4]。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吸收了“计白当黑”空间布局方法,从而产生虚实相间的空间美学效果。

2.2 题材内容:内涵上的“文人画”意蕴

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的“以书入画”,还极大地拓展了艺术表现的题材内容。这不仅体现在程门作品中,其他代表人物如王少维(1817—约 1887,安徽泾县人,名廷佐,号画饼书生等)、金品卿(1862—1908,安徽黟县人,名诰,字品卿,号新安樵者等),与程门一道,时称“三大家”。这些大多来自徽州画师,尽管未必全部都生活在徽州,却与新安画派的画家们同属徽文化圈,彼此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文化联系,在浅绛彩瓷绘创作题材内容上明显受到新安画派的影响。比如,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的画师已不像之前的瓷绘艺人那样一人只专攻一种题材,也不仅仅钟情于吉祥图案的传统题材内容,而是兼擅山水、人物、花鸟等,涉猎广泛,内容丰富,与新安画派的“文人画”题材内容已无大的差别。比如,在山水花鸟方面,“黄山意象”诸如奇松、云海、怪石、溪流、草亭、渔舟以及梅、兰、竹、菊等进入了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画师的创作视域。而在人物题材上也像新安画派那样关注高士、隐者等,诸如“竹林七贤”“陶渊明爱菊”“东坡夜游”以及“高士图”等,均描绘文人雅士的生活情趣,画面神韵也与新安画派几无二致。显而易见,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在题材内容上具有了新安画派“文人画”的审美意蕴。

2.3 表现技巧:笔法上的新安画派墨趣

“以书入画”也深刻影响到清末民初浅绛彩瓷

绘的表现技巧。新安画派善用枯笔干墨、设色简洁淡雅,线条苍劲古朴、书法运笔随性有力,作品显得枯淡、冷逸、疏秀。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的画师特别是“三大家”吸纳了新安画派的笔法和画意,在浅绛彩瓷作品中也多用干笔皴擦,线条疏简、苍劲,具有新安画派的笔墨意韵。除了上文提及构图上的书法章法之外,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的书法题款也像新安画派那样,以中锋、侧锋、提按顿挫等笔法勾写,以“屋漏痕”“锥画沙”技法取代传统青花“铁线描”程式化线条,同时参以行草笔意,善留笔触飞白,运笔自然洒脱,呼应其“疏可走马,密不透风”的章法布局。同时,在色彩方面,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对新安画派的接受也很明显。他们在山水渲染中借鉴“破墨”“积墨”技法,以淡赭色的反复罩染表现山峦的阴阳向背,形成枯笔干墨的神韵;又以赭石、花青、草绿替代以往的彩瓷工艺化的渲染填色,将水墨淡赭成功运用于浅绛彩瓷绘创作,具有新安画派淡雅的设色神韵。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的“以诗入画”“以书入画”使得文字与书写、文字与图画之间形成互文关系,已与新安画派题诗题款铃印格式无异。可见,从用笔、用墨、用色到题诗题款铃印,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都与新安画派一脉相承。

2.4 艺术风格:审美上的萧疏淡远基调

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对新安画派的模仿,并不局限于题材内容和表现技法等方面,更体现在画师们对其空灵幽远审美意境和清旷淡雅艺术风格的吸纳。其中“三大家”就热衷于新安画派的“文人画”创作精神及其疏淡、幽远、高逸的审美风格。他们都承学浙江和查士标的“逸笔草草,不求形似”^[5]的新安画风,画面讲究疏密布局,大胆留白,充满诗的意境,追求萧疏淡远的文人书卷之气。

比如王少维浅绛彩瓷绘琮式瓶(图2),四面分别绘有山水、人物、动物,从中可以感受到它与新安画派淡墨轻岚墨韵体系相一致的绘画语言——山水一面,淡墨皴擦间烟岚浮动,舟桥隐现,得“咫尺千里”之境;人物一侧,高士宽袍曳地,浅绛设色浓淡相宜,于瓷胎之上洇染出宣纸般的水墨意趣。猴的谐谑和动态展示其擅长画猴的高超技艺,布局工致而不板滞。而瓶的四面的山水含情,人物神奕,动物有灵,集诗、书、画、印于一体,尽显精湛技艺与文人匠心的笔墨精神。画工之妙、设色之雅浑然天成,堪称浅绛彩瓷中“形神兼备”的罕见珍品,既见证晚清瓷艺的巅峰造诣,更定格了王少维“笔底烟云”的艺术传奇。显然,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完全具备萧疏淡远的新安画风。



图2 王少维浅绛彩瓷绘琮式瓶

3 以文导艺: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的文化间性特征

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不仅“以瓷为笈”“以书入画”,而且“以文导艺”,带有士人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中西文化的融合。从文化间性角度看,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既得益于中华美学“文心”文脉传统的滋养,又受到西学东渐的写实精神的影响,更在“雅降俗升”审美文化发展过程中得到质的飞跃。

3.1 雅降俗升: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互渗

清朝后期,遭受战火冲击破坏的景德镇御窑厂迅速衰落,画师们大量外流而转向民窑创作,同时科举制度的废除又使文人画师失去了进身之阶,其生存境况已逐渐接近民间艺人的生活状态,以至于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先是在民间,然后进入御窑厂,高潮时达成御窑厂与民间同生共荣”^[6]。一方面,在失去稳定工作和固定收入时,御窑画师生存空间已很逼仄(为官不成、务农不愿等),绝大部分人仍以瓷绘创作作为谋生手段;另一方面,他们具备特有的文化艺术素养,绝不会把瓷绘作品降格到江湖艺人的等次。因此文人画尤其是新安画派的审美旨趣和笔墨技法移植到浅绛彩瓷绘上,实现了中国传统书画艺术与陶瓷工艺的深度融合。

当然,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带有士人文化的特征,还有更重要的原因。一是浅绛彩瓷绘顺应“雅降俗升”审美文化的变化,以高雅文化向大众文化渗透,走向“雅俗共赏”的大众审美文化领域;二是创作主体向市场靠拢,把本属文人书斋“雅玩”的浅绛彩瓷绘作品,变成了大众消费的厅堂悬挂的“陈设品”。在这一“雅降俗升”的过程中,文化间性表现出双向流动态势:文人将高雅文化向大众文化渗透,赋予大众文化以更高的审美品味;而大众消费则反向形塑了高雅文化,使其更贴近大众生活。显而易见的是,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创作契合了“雅降

俗升”的时代审美文化发展需要和“雅俗共赏”的大众消费需求,证明了中国文化是真正的现实文化,既带有“人间的性格”“现实的性格”,又具有“历史”“现代”“将来”的价值与意义^[7]。

3.2 中西合璧:写意精神与写实美学的碰撞

伴随西学东渐,西洋画逐渐进入国人视野并影响到瓷绘创作,比如珐琅彩瓷(国外进口铜胎画珐琅料)始于康熙晚期而盛于雍乾,已是宫廷垄断的高档瓷器。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创作也受到西方文化一定程度的影响。如王少维《长江万里图》瓷板,中国帆船与西方蒸汽轮船已处同一画框,表征着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浅绛彩瓷绘画师对社会转型期的文化自觉。当然,西学东渐不仅带来题材内容上的变化,其科学精神和写实美学也影响了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创作。画师们在中国画写意精神和兴味蕴藉的基础上,对西洋画透视画法、明暗晕染与空间造型等并不排斥,而是广泛采借与吸纳,形成了“中西合璧”的视觉表达语言。如果说前期浅绛彩画师在其瓷绘作品中还带来更多的“墨分五色”“意在笔先”等写意传统的话,那后期浅绛彩画师受到西学写实精神的濡染则更加明显。其中,外销瓷(主要销往欧洲、北美和东南亚等地)更具有“中西合璧”的文化间性。比如,外销欧洲的浅绛彩作品便带有欧式器型、纹饰多样、色泽鲜艳等西化风格特征,尽可能地融入欧洲文化元素。这使得外销瓷既保持东方艺术的写意性和含蓄美,又具备西方视觉的写实性与直观性,这些作品成为欧洲上流社会人士彰显其文化品位的热捧作品,也是跨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

3.3 诗性美质:文心传统对瓷绘画艺的统摄

必须要看到,“中国传统文化,乃一最富艺术性之文化。故中国人之理想人品,必求其诗味艺术味。”^[8]正因此,中国人的心灵在其本性上是诗性的和艺术性的。而中国写意性的艺术也具有“文心”(文章内含心性、情韵)传统和诗性精神。这在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创作上也有所体现。画师们生活艺术化而艺术生活化程度非常之高,尽管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但坚持以“文心”统摄“画艺”,瓷绘作品仍具有中国本土的诗性美质。如山水的“深远”“高远”“平远”之境,蕴含“天人合一”的哲思;色彩素净、空灵、古雅,深得中国审美文化“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的旨趣;题诗契合画境,书法字体各尽其美,题款位置与大小的精心设计等无不带有书卷气……凡此种种,都是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创作坚守“文心”传统的明证,其作品具有中国诗性美质自不

待言。进言之,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以“文心”统摄“画艺”,是中国艺术诗意追求、人文情怀和诗性美质的感性呈现,蕴含着深厚的中国审美文化特征和独特的艺术魅力。

4 结论

以上从技术间性、艺术间性和文化间性三个维度讨论了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的间性流融特征。从技术间性看,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主要通过技术调适、技术平衡解决“纸本化”技术转化问题,转而“以瓷为笺”,实现瓷绘材料与表现技法的跨界融合。从艺术间性讲,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深受文人画特别是新安画派的影响,采取“以书入画”的创作形式,使作品的“诗、书、画、印”四位一体,在空间布局、题材内容、表现技法 and 艺术风格等方面吸纳新安画派艺术之优长,开创了瓷画与中国文人画有机融合的新局面。从文化间性上说,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在“雅降俗升”和西学东渐的语境中以“文心”统摄“画艺”,在“俗”文化和“雅”文化之间互转,既实现中西文化的融合,又坚守着中国“文心”传统和诗性美质,具备特有的艺术魅力和文化特征。当然,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还有很多值得深入研究的论题,如对其进行的溯源性研究、影响性研究,与之有关的传播学研究、艺术接受研究等。总的来说,在清末民初约 70 年中,浅绛彩瓷绘是诗书画印完美结合的一道亮丽的艺术风景,值得人们珍视、珍藏与深入研究。

参考文献:

- [1]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220-221.
- [2]王国维.文学小言[M]//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文集:第14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94.
- [3]肖文韬.浅绛彩瓷的创新变革探析[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3):144-149.
- [4]包世臣.艺舟双楫译释[M].祝嘉,译释.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4.
- [5]倪瓒.清閼阁全集·卷十[M]//摘藻堂四库全书荟要:第408册.台北:世界书局,1985:139.
- [6]初国卿.中国瓷本绘画:浅绛百家之序[M]//胡越竣,陈树群.浅绛百家.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5.
- [7]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自叙[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1-2.
- [8]钱穆.品与味[M]//中国文学论丛.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220. 责任编辑:谢政伟

产学研融合驱动下安徽省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研究

贺小桐,王莹莹*

(安徽建筑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基于知识价值链理论构建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体系,运用熵权-TOPSIS模型对安徽省2019—2023年16个地市的的面板数据进行测度与分析。研究显示:产学研融合质量决定区域创新能力分化格局,安徽省区域创新能力呈稳步提升态势,形成“双核引领、中部崛起、边缘滞后”的三级分化格局;产学研融合是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核心驱动源,知识流动共享与知识成果产出作为产学研融合直接相关指标权重合计超五成;产学研融合生态缺陷制约创新能力提升潜力,创新分化根源在于产学研融合质量,合肥、芜湖等地凭借深度融合机制引领创新,滞后区域受制于产学研融合松散创新能力不足。为此,提出实施梯度化精准化的产学研推进策略、强化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融合机制、夯实产学研融合的生态支撑体系等政策建议,以促进区域创新协调发展。

关键词:产学研融合;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熵权-TOPSIS模型;区域差异

中图分类号:F12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6)04-0039-10

Evaluation of Reg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in Anhui Driven by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HE Xiaotong, WANG Yingying*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Anhui Jianzhu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Anhui)

Abstract: It constructed an evaluation system for reg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in this study based on the knowledge value-chain theory, and used the entropy weight-TOPSIS model to measure and analyze the panel data of 16 cities in Anhui province from 2019 to 2023. The research showed that the quality of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IUR) determines the differentiation pattern of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The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in Anhui province are steadily improving, forming a three-level differentiation pattern of “dual-core leadership, central rise, and peripheral lag”. The integration of IUR is the core driving for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reg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The combined weight of knowledge flow and sharing and knowledge achievement output, which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integration of IUR, exceeds 50%. Deficiencies in the integration ecosystem of industry,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restrict the potential for improving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The root cause of innovation differentiation lies in the quality of the integration of IUR. Cities like Hefei and Wuhu lead in innovation with their in-depth integration mechanisms, while the lagging regions suffer from insufficient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due to the loose integration of IUR. Based on these conclusions, it puts forward policy suggestions including implementing gradient and precise IUR promotion strategies, strengthening the enterprise-centered IUR integration mechanism, and consolidating the ecological support system

收稿日期:2026-03-03 * 通讯联系人

基金项目:安徽省社科规划青年项目(AHSKQ2024D036);安徽省住房城乡建设科学技术计划项目(2023RK037);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与安徽建筑大学合作基金资助项目(HYB20230179)。

作者简介:贺小桐(1987—),女,安徽颍上人,讲师,博士;王莹莹(2002—),女,安徽定远人,硕士研究生。E-mail:c1373431814@163.com

for IUR integra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innovation.

Key words: Integration of IUR; reg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entropy weight-TOPSIS model; regional differences

科技创新已成为驱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是塑造国家竞争新优势、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的战略支撑。202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深化产学研融通创新”作为“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路径^[1]。政策语境下的新质生产力并非单点技术突破的产物,而是一条通过产学研融合打破各主体组织壁垒,各要素跨越组织边界高速流动,构建深度协同与资源共享机制,实现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2]。这里存在一个被长期忽视的关键问题,科技创新不是“投入不足”,而是“融合不畅”。创新生态系统理论为理解这一问题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创新能力是多元主体在特定制度环境与文化氛围中,通过知识流动、资源共享与协同演化所形成的系统。区域创新能力的高低,本质上反映了其创新生态系统的协调性。从生态系统视角审视,产学研融合不再是单一的技术转移或项目合作,而是揭示区域创新能力分化的深层根源。

安徽省作为长三角创新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区域创新能力的跃升高度依赖产学研融合的深度实践。2023 年数据显示,安徽省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同比增幅达 28%,企业在全社会研发投入、研发人员数量、研发机构设立以及有效发明专利持有量中的占比均超过 80%。而支撑这一成果的核心动力来自产学研融合——全省 80% 以上的研发投入由企业主导。从评价结果来看,安徽省区域创新能力在 2024 年《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的排名从 2019 年的全国第 10 位跃升至第 7 位,稳居全国前列。然而,现有区域创新能力评价体系虽在指标设计上较为成熟,却更多关注创新资源投入与产出的宏观测度,未能充分揭示产学研融合机制对区域创新能力的深层驱动作用。安徽省的创新跃升高度依赖产学研深度融合,通用评价体系难以精准识别其核心优势与现实短板,亟须从产学研融合视角构建针对性评价框架。

基于上述背景,从产学研融合机制的视角切入,构建知识价值链导向的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TOPSIS 模型及 Kernel 密度估计,测度 2019—2023 年安徽省 16 个地市的科技创新能力水平,刻画其时序演变与空间分布特征,并结合安徽省产学研深度融合发展机遇,提出促进区域科技创新水平持续提升与协调发展的优化建议。

1 研究进展

1.1 产学研的理论基础与内涵拓展

产学研(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IUR)是指企业、高校与科研机构基于互补性资源,通过契约或平台实现知识生产、技术转移与联合攻关的模式^[3]。其雏形可追溯至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硅谷的“大学-企业”互动实践、斯坦福大学与惠普等企业通过技术共享形成知识生产与商业化应用闭环,处于资源互补合作阶段。国内自 1992 年“产学研联合开发工程”启动后被广泛关注,产学研合作进入制度化阶段^[4]。1995 年由 Etzkowitz 与 Leydesdorff 提出的三螺旋理论进一步将大学、产业、政府界定为创新系统的三大核心主体,三者通过互动、重叠、边界模糊化形成非线性协同网络,推动知识资本化与产业技术升级,产学研发展进入协同阶段^[5]。国内学者陈劲结合中国情境,将三螺旋扩展为“政产学研用”协同,通过知识增值凝聚产学研的各个主体,实现产学研协同的可持续发展^[6]。

随着创新实践的不断深入,创新生态系统理论逐渐取代线性模型,为产学研融合提供了理论基础^[7]。不同于三螺旋对主体结构的关注,生态系统理论更侧重于主体、资源与环境的共生演化。Granstrand 重新定义创新生态系统,认为其是不断演化的行动者、活动和人工制品的集合,以及制度和关系,对个体行动者或行动者群体的创新绩效至关重要^[8]。Adner 提出企业需匹配创新战略与其所处生态系统^[9],后续研究将生态系统界定为多元主体协同价值创造的结构化安排^[10]。在此视角下,李燕等指出在产学研创新生态系统中,各创新主体与创新环境相互作用,形成相互依存、共生演进的良性循环网络^[11]。在生态系统理论的统摄下,产学研融合的具体机制研究也日益深入。吴洁等从协同创新理论出发,指出融合的核心在于打破组织壁垒,实现各要素的跨主体流动,通过研究、开发、产业化的价值链耦合提升创新效率^[12]。张羽飞等提出“产学研深度融合创新联合体”概念,归纳出政府主导型、高校主导型、科研院所主导型、企业主导型等四种典型类型^[13]。与早期的合作和协同阶段相比,产学研融合的内涵从单一技术合作向创新生态共建演进。早期研究大多聚焦技术转让、联合攻关等短期合作^[14],

而近年研究更关注长期稳定的战略联盟,如共建研发平台、联合培养人才^[15]、共享知识产权等,强调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绑定。

1.2 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与方法

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是检验产学研融合成效的科学判据,其指标体系与方法选择始终是研究热点。当前国际主流评价体系包括《全球创新指数》《欧洲创新记分牌》等,普遍以制度建设、基础设施、宏观经济环境等宏观维度为锚点;而国内权威指数《中国创新指数》《国家创新指数》则聚焦创新投入、创新产出、创新环境、创新能力及企业创新等维度。学界研究范围包括国家、省级层面、市县域以及经济带等特定区域,而各层级之间创新体系存在显著差异,直接套用高层级评价框架可能导致评估失真。如严晗等从创新环境、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企业创新和创新能力五个维度构建我国区域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综合评价指标体系^[16];而童金杰等主要从创新环境、创新投入、创新成效、经济社会发展等四个方面对江西省 100 个县域进行创新发展水平测度与评价^[17];赵菁奇等从知识创造获取、技术创新扩散、创新环境营造、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等五个方面构建长三角区域创新体系效能评价指标体系^[18]。现有评价体系虽在指标设计上日趋成熟,但多聚焦于创新资源的投入产出效率,对创新主体之间的互动质量、制度环境的适配性等生态系统层面的因素关注不足。

在评价方法上,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需兼顾客观性与灵活性。目前主流模型可分为综合指标模型、效率分解模型及模糊评价模型三大类,各个评价模型因原理不同适用于不同场景。综合指标模型侧重多维度信息的系统整合,效率分解模型聚焦投入产出比及边际贡献,模糊评价模型则用于处理边界不清或专家语言型评价。熵权-TOPSIS 作为综合指标模型的代表,首先以熵权法依据指标离差自动赋权,避免人为干扰;继而用 TOPSIS 法计算与理想解的欧氏距离,实现优劣排序^[19]。例如,陈枳宇等采用改进 TOPSIS 耦合协调模型对安徽 2010 年以后的三个时间节点进行实证分析^[20];梁诗等采用熵权法和优劣解距离法对中国省级行政单元的科技安全水平进行测算^[21];曹李海等人综合运用熵权-TOPSIS 等方法对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区域科技创新治理能力、特征与差异性^[22]。

通过整理文献可以发现,学者在区域科技创新领域的实证研究方法及评价体系方面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针对安徽省域层面的系统性评价仍然

不足:其一,缺乏对安徽省的实证研究;其二缺乏省内 16 个地市之间的横向对比分析;其三,缺乏 2019 年后的新面板数据分析。因此,本研究构建安徽省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体系,以 16 个地市为单元展开横向比较,并依托 2019—2023 年面板数据,为安徽省持续创新发展提供理论与实证支撑。

2 基于产学研融合的安徽省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指标体系构建

构建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指标体系需遵循科学性、数据可搜集性、针对性原则,相关数据来源于《安徽统计年鉴》《地方统计年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及地方行政规范性文件库。本研究以《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框架为纲领,借鉴 Carayannis 提出知识生产应深度嵌入社会经济系统,通过知识与社会的共振效应实现价值跃迁^[23]。引入知识价值链框架,沿知识从产生到应用的全链条构建四个一级指标,即知识创造获取、知识流动共享、知识成果产出、创新生态环境等评价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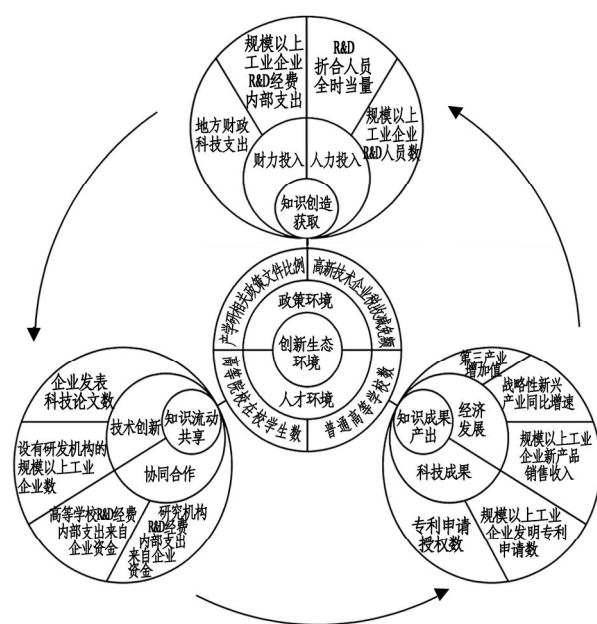


图 1 安徽省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指标示意图

知识创造获取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供给,故二级指标包括财力投入和人力投入。知识流动共享聚焦知识在各主体打破组织边界、实现跨主体互动,产学研强调企业创新的主体地位,故二级指标为协同合作和技术创新。知识成果产出涵盖科技层面的知识积累和经济层面的价值转化,二级指标包括经济发展和科技成果。创新生态环境是创新系统持续运转的外部条件,二级指标包含政策环境和人才环境

(见表1)。

表1 安徽省区域科技创新发展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单位
知识创造获取	财力投入	地方财政科技支出	万元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 经费内部支出	万元
	人力投入	R&D 折合人员全时当量	人年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 人员数	人
知识流动共享	协同合作	高等学校 R&D 经费内部支出来自企业资金	万元
		研究机构 R&D 经费内部支出来自企业资金	万元
	技术创新	设有研发机构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	个
		企业发表科技论文数	篇
知识成果产出	经济发展	第三产业增加值	亿元
		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同比增速	%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	万元
	科技成果	专利申请授权数	项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	件
创新生态环境	政策环境	产学研相关政策文件比例	%
		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额	万元
	人才环境	高等院校在校学生数	人
		普通高等学校数	所

3 研究方法

3.1 熵权-TOPSIS 法

熵权法的核心思想基于信息熵理论,信息熵反映数据的离散程度,离散程度越高的指标,其信息熵越小,权重越高;反之,权重越低^[24]。TOPSIS 法的核心思想是通过计算方案与正理想解和负理想解的相对接近度,对评价对象进行优劣排序^[25]。本研究利用熵权-TOPSIS 法对安徽省 2019—2023 年面板

数据进行分析。具体步骤如下:

步骤1:原始数据无量纲化

指标采用极差标准化处理并添加极小常数,同时为保证数据的合理性及原始数据相对差异不变,部分指标(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同比增速、产学研相关政策文件比例)非负平移后进行向量归一化处理。本研究构建的安徽省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中的17项指标均为正向型指标:

$$\text{正向指标标准化: } X'_{ij} = \frac{X_{ij} - \min(X_j)}{\max(X_j) - \min(X_j)} + 0.0001 \quad (1)$$

$$\text{非负平移: } X_{ij}^* = X_{ij} - \min(X_j) + 0.0001 \quad (2)$$

$$\text{向量归一化: } X'_{ij} = \frac{X_{ij}^*}{\sqrt{\sum_{j=1}^n (X_{ij}^*)^2}} \quad (3)$$

在公式中, X_{ij} 为第 i 评价对象第 j 项指标原始值, $\max(X_j)$ 、 $\min(X_j)$ 分别为第 j 项指标的最大值、最小值, X'_{ij} 为标准化后的值, n 为评价指标个数。

步骤2:计算各项指标的信息熵

$$e_j = -k \sum_{i=1}^m \frac{X'_{ij}}{\sum_{i=1}^m X'_{ij}} \ln \left(\frac{X'_{ij}}{\sum_{i=1}^m X'_{ij}} \right) \quad (4)$$

其中 $k = \frac{1}{\ln m}$, 且 $k > 0$, 使得 $e_j \geq 0$, m 为评价对象的个数。

步骤3:计算第 j 项指标信息熵的冗余度

$$d_j = 1 - e_j \quad (5)$$

步骤4:确定各项指标权重

$$\omega_j = \frac{d_j}{\sum_{j=1}^n d_j} \quad (6)$$

步骤5:建立加权决策评价矩阵

$$V = X'_{ij} * \omega_j = [v_{ij}]_{m \times n} \quad (7)$$

并确定正负理想解 V^+ 和 V^-

$$V^+ = \{ \max(V_{ij}) | i = 1, 2, \dots, m \} = \{ V_1^+, V_2^+, \dots, V_n^+ \} \quad (8)$$

$$V^- = \{ \min(V_{ij}) | i = 1, 2, \dots, m \} = \{ V_1^-, V_2^-, \dots, V_n^- \} \quad (9)$$

步骤 6: 计算贴进度

贴进度用 T_i 表示, 取值介于 $[0, 1]$, 其值越大, 表示越靠近最优水平。

$$T_i = \frac{\sqrt{\sum_{j=1}^n (V^- - V_i)^2}}{\sqrt{\sum_{j=1}^n (V^+ - V_i)^2} + \sqrt{\sum_{j=1}^n (V^- - V_i)^2}} \quad (10)$$

3.2 kernel 密度估计

kernel 密度估计是一种用来估计概率密度函数的非参数方法, 通过连续的密度曲线来描述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分布形态及其演变^[26]。 $L(x)$ 为在 x

点处的核密度估计值; K 为核密度函数; x_i 为第 i 个观测样本; h 为带宽参数。计算公式如下:

$$L(x) = \frac{1}{nh} \sum_{i=1}^n K\left(\frac{x - x_i}{h}\right) \quad (11)$$

4 实证结果分析

4.1 安徽省科技创新能力测度结果

根据上述计算公式, 首先得出安徽省科技创新能力评价体系各指标的信息熵、冗余度及权重如表 2 所示。

表 2 安徽省科技创新能力评价体系各指标的信息熵、冗余度及权重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	信息熵	冗余度	权重
知识创造获取	0.2562	财力投入	0.1598	地方财政科技支出	0.7785	0.2215	0.0910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 经费内部支出	0.8325	0.1675	0.0688
		人力投入	0.0964	R&D 折合人员全时当量	0.8775	0.1225	0.0503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 人员数	0.8876	0.1124	0.0461
知识流动共享	0.2185	协同合作	0.1229	高等学校 R&D 经费内部支出来自企业资金	0.8714	0.1286	0.0528
				研究机构 R&D 经费内部支出来自企业资金	0.8293	0.1707	0.0701
		技术创新	0.0956	设有研发机构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	0.9224	0.0776	0.0319
				企业发表科技论文数	0.8449	0.1551	0.0637
知识成果产出	0.2909	经济发展	0.1387	第三产业增加值	0.8540	0.1460	0.0600
				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同比增速	0.9488	0.0512	0.0210
		科技成果	0.1522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	0.8595	0.1405	0.0577
				专利申请授权数	0.8248	0.1752	0.0720
创新生态环境	0.2344	政策环境	0.0857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	0.8047	0.1953	0.0802
				产学研相关政策文件比例	0.9382	0.0618	0.0254
		人才环境	0.1487	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额	0.8531	0.1469	0.0603
				高等院校在校学生数	0.8319	0.1681	0.0691
				普通高等学校数	0.8061	0.1939	0.0796

根据表 2 计算的指标权重分析, 一级指标中与产学研直接相关的知识流动共享和知识成果产出两大维度占据绝对核心地位。聚焦企业、高校、科研机构跨主体要素协作的知识流动共享权重为 21.85%, 体现融合催生技术与经济价值的知识成果产出权重为 29.09%, 二者合计权重达 50.94%, 远超知识创造获取与创新生态环境。其中知识创造获取权重为 25.62%, 创新生态环境权重为 23.44%。

这一分布清晰印证区域创新能力提升并非依赖单一资源投入, 而是取决于产学研融合的过程质量与成果转化效率。前者以要素跨主体流动为核心, 后者以技术突破与市场落地为目标, 构成产学研驱动创新的全链条闭环。相比之下, 知识创造获取为创新提供基础资源, 且仅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 经费内部支出与产学研间接相关, 其余指标更多反映单一主体的资源储备。创新生态环境作为外部支撑,

需通过作用于融合过程间接影响创新,故权重相对较低于产学研直接关联维度。

进一步聚焦二级指标,产学研相关维度的权重优先级更凸显跨主体协作的关键价值。在知识流动共享维度下,协同合作权重为 12.29% 比技术创新指标的 9.56% 高出 2.73%,说明产学研跨主体联动比企业单一创新更关键,其中研究机构 R&D 经费内部支出来自企业资金的权重为 7.01%,高于高等学校 R&D 经费内部支出来自企业资金的权重 5.28%,印证了科研机构的技术研发更贴近产业实际需求,是产学研融合中技术供给与产业需求对接的关键节点。在知识成果产出维度中,科技成果权重为 15.22%,高于经济发展的权重 13.87%,且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为所有三级指标中权重最高项占比 8.02%,印证产学研核心价值先体现为技术突破,再转化为经济收益,前者是后者的前提,符合创新链产业链融合逻辑。此外,创新生态环境中人才环境占比最高,说明高校作为人才的载体是融合基础。而产学研相关政策文件比例权重最低仅 2.54%,但意义特殊,反映各地市政策数量差异小但实效差异大,提示需优化政策精准度而非数量。综上,从指标体系构建指标权重分布可明确,产学研融合是解析区域创新能力分异的关键线索。

根据安徽省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各指标无量纲化后的值加权形成的加权规范化矩阵,得出 2023 年安徽省 16 个地市的正负理想解,利用公式(10)计算 16 个地市贴适度,根据贴适度大小对 16 个地

市进行排序,排序结果如表 3 所示。

表 3 2023 年安徽省各市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结果

地市	正理想解距离 D_i^+	负理想解距离 D_i^-	T	排名
安庆	0.2344	0.0267	0.1021	9
蚌埠	0.2335	0.0233	0.0907	10
亳州	0.2423	0.0173	0.0665	13
池州	0.2434	0.0160	0.0616	15
滁州	0.2143	0.0650	0.2327	3
阜阳	0.2322	0.0288	0.1105	6
合肥	0.0568	0.2365	0.8064	1
淮北	0.2354	0.0286	0.1083	7
淮南	0.2356	0.0281	0.1065	8
黄山	0.2449	0.0144	0.0556	16
六安	0.2365	0.0233	0.0898	11
马鞍山	0.2176	0.0441	0.1685	4
宿州	0.2431	0.0165	0.0637	14
铜陵	0.2380	0.0225	0.0865	12
芜湖	0.1746	0.0938	0.3495	2
宣城	0.2314	0.0461	0.1662	5

同理,重复以上步骤可得 2019—2023 年间安徽省 16 个地市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结果。根据相对贴适度计算的结果,得出安徽省 2019—2023 年各地市区域科技创新贴适度(见表 4)。

表 4 2019—2023 年安徽省各市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测算结果汇总

地市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值	排名	值	排名	值	排名	值	排名	值	排名
安庆	0.0851	7	0.0914	7	0.0986	8	0.1002	8	0.1021	9
蚌埠	0.0762	8	0.0912	8	0.0831	9	0.0840	10	0.0907	10
亳州	0.0538	12	0.0582	12	0.0552	15	0.0780	11	0.0665	13
池州	0.0366	14	0.0454	15	0.0584	13	0.0692	13	0.0616	15
滁州	0.1057	4	0.1284	4	0.1754	3	0.2043	3	0.2327	3
阜阳	0.0923	5	0.1001	6	0.1016	7	0.1222	6	0.1105	6
合肥	0.6206	1	0.6388	1	0.7636	1	0.8181	1	0.8064	1
淮北	0.0872	6	0.1446	3	0.1165	6	0.1125	7	0.1083	7
淮南	0.0716	10	0.0628	11	0.0738	11	0.0970	9	0.1065	8
黄山	0.0291	16	0.0510	14	0.0550	16	0.0547	16	0.0556	16
六安	0.0433	13	0.0531	13	0.0693	12	0.0744	12	0.0898	11

续表

表 4 2019—2023 年安徽省各市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测算结果汇总

地市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值	排名	值	排名	值	排名	值	排名	值	排名
马鞍山	0.1141	3	0.1275	5	0.1420	4	0.1483	4	0.1685	4
宿州	0.0362	15	0.0403	16	0.0562	14	0.0552	15	0.0637	14
铜陵	0.0594	11	0.0876	9	0.0818	10	0.0651	14	0.0865	12
芜湖	0.2611	2	0.3103	2	0.3082	2	0.3274	2	0.3495	2
宣城	0.0745	9	0.0779	10	0.1266	5	0.1376	5	0.1662	5

根据表 4 数据,2019—2023 年期间安徽省各市科技创新能力的平均水平呈现稳步提升态势。这一趋势与安徽省持续深化产学研融合的战略导向密切相关,区域间创新能力差异显著,与各地产学研融合程度高度吻合。从头部领先城市的表现来看,合肥、芜湖始终稳居创新能力前两位,其产学研融合显著优于其他地区,其共同特征是形成了深度产学研融合网络。合肥五年间科技创新能力贴进度从 0.6206 攀升至 0.8064,持续领跑全省,作为省会城市,合肥集聚了大量高校和科研机构,如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为合肥市提供了丰富的人才资源和创新要素。通过技术扩散、平台共享等方式,对周边城市如滁州、芜湖等产生了积极的辐射带动作用,形成了核心带动周边的协同发展格局。芜湖贴进度从 0.2611 提升至 0.3495,始终位列第二。芜湖聚焦产业痛点,与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联合企业开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依托奇瑞汽车等龙头企业,与安徽工程大学等高校建立长期稳定的产学研融合机制,实现了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

中部崛起城市快速跃升,滁州五年间贴进度从 0.1057 大幅提升至 0.2327,排名稳定在第三位。核心驱动力来自跨区域产学研融合的突破,通过主动对接长三角优质高校资源,引进外部研发力量共建

创新平台,有效弥补了本地高校资源不足的短板,让跨区域的知识、技术与人才要素通过产学研合作持续流入,推动创新能力实现跨越式增长。宣城的贴进度从 0.0745 提升至 0.1662,排名从第九位跃升至第五位,关键在于深度融入 G60 科创走廊,借助区域创新共同体的优势,与沪宁等地高校建立长期稳定的产学研合作关系,通过共享研发平台、联合培养人才等方式,将外部创新资源转化为自身创新动能,印证了跨区域产学研融合对后发城市创新跃升的关键作用。

边缘滞后城市的创新能力提升缓慢,核心在于产学研融合的严重不足与机制不畅。黄山、池州、亳州等地五年间贴进度始终处于全省末位,黄山贴进度长期低于 0.06,池州、宿州等城市也未能实现有效突破。这些城市普遍存在高校与科研机构资源匮乏、产业结构以传统产业为主、企业研发投入意愿不强等问题,导致产学研融合缺乏必要的主体基础与需求导向,人才外流严重与融合载体缺失形成恶性循环,使得创新能力始终难以提升,进一步拉大了与核心城市、中部城市的差距。

为进一步分析安徽省各市之间造成差异的原因,表 5 从不同指标角度进行了分析。合肥、芜湖在构建指标全链条上表现突出,位居全省前列。

表 5 2023 年安徽省各市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指标对比表

地市	知识创造获取		知识流动共享		知识成果产出		创新生态环境		合值	排名
	数值	排名	数值	排名	数值	排名	数值	排名		
安庆	0.0690	9	0.1479	7	0.0956	7	0.0881	12	0.1021	9
蚌埠	0.0981	6	0.1056	11	0.0683	12	0.0925	11	0.0907	10
亳州	0.0550	13	0.1120	10	0.0545	14	0.0344	16	0.0665	13
池州	0.0393	14	0.0552	15	0.0829	8	0.0564	15	0.0616	15
滁州	0.2508	3	0.2386	3	0.2583	3	0.1618	5	0.2327	3
阜阳	0.0562	12	0.1663	6	0.1022	6	0.1080	9	0.1105	6
合肥	0.9937	1	0.6189	1	0.8785	1	0.8379	1	0.8064	1

续表
表 5 2023 年安徽省各市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指标对比表

地市	知识创造获取		知识流动共享		知识成果产出		创新生态环境		合值	排名
	数值	排名	数值	排名	数值	排名	数值	排名		
淮北	0.0672	10	0.1123	9	0.0474	15	0.1743	4	0.1083	7
淮南	0.0600	11	0.1908	5	0.0402	16	0.1081	8	0.1065	8
黄山	0.0215	16	0.0492	16	0.0717	10	0.0644	14	0.0556	16
六安	0.0921	7	0.0957	13	0.0756	9	0.0973	10	0.0898	11
马鞍山	0.1783	4	0.2132	4	0.1494	5	0.1294	6	0.1685	4
宿州	0.0368	15	0.0755	14	0.0695	11	0.0692	13	0.0637	14
铜陵	0.0725	8	0.0984	12	0.0612	13	0.1123	7	0.0865	12
芜湖	0.4680	2	0.2896	2	0.3137	2	0.2935	2	0.3495	2
宣城	0.1480	5	0.1430	8	0.1670	4	0.1951	3	0.1662	5

知识创造获取是衡量创新活动的初始投入,是产学研融合的物质基础。合肥、芜湖在该维度领先,其核心优势体现在财力投入的绝对优势、人力资本的高度集聚。合肥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 R&D 经费内部支出占全省比重超 30%,其地方财政科技支出是黄山的 20 余倍。这种投入优势直接转化为对本地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基础研究资助,形成财政引导与企业主导的多元投入机制。2023 年合肥 R&D 人员全时当量达 5 万人年,是亳州的 8 倍。这种人才优势不仅来源于本地中国科技大学、合肥工业大学等顶尖高校培养,更得益于产学研融合带来的人才共享机制,企业专家到高校兼职、高校科研人员到企业挂职等双向流动。反观黄山、池州等滞后地区,不仅财政科技投入有限,更缺乏吸引和留住研发人才的企业载体和科研平台,缺乏支撑产学研融合的基础资源,导致创新源头供给不足。

知识流动共享表征产学研各主体间的要素流动效率,是解析区域差异的关键。合肥、芜湖、滁州在此维度显著领先,具体表现为企业资金主导的协作模式、研发机构共建的载体优势。合肥市企业对高校及科研院所的经费支出一度高达 3 亿元,江淮汽车与合工大共建新能源汽车研究院,奇瑞汽车与安工程联合组建智能制造实验室。此外,合肥、滁州设有研发机构的规模以上企业数量分别达到 1228 家和 1440 家,而黄山仅 299 家。这些企业研发机构是连接高校科研成果与产业应用的关键节点,如科大讯飞与中科大共建的语音技术实验室,已成为全球重要的语音产业创新策源地。

知识成果产出反映创新活动的最终产出,是检

验产学研融合成效的关键指标。合肥、芜湖、滁州的领先优势体现在专利产出的高度集中、新产品的市场转化效率。合肥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占全省的 37%,如阳光电源与合肥工业大学在光伏逆变器领域的项目获授权发明专利 26 件。芜湖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新产品销售收入高达 2702.7112 亿元,远高于全省平均水平,如奇瑞汽车与高校联合攻关新能源汽车技术。值得注意的是,淮南、淮北等地尽管在研发投入上有一定基础,但成果转化效率低下,在该维度排名落后,反映出这些地区产学研融合停留在短期项目层面,缺乏长效转化机制。

创新生态环境为产学研融合提供制度保障和人才支撑。头部城市的优势体现在政策工具的精准供给、人才梯队的系统培养。合肥市高新技术企业税收减免额是黄山的 25 倍,这种政策红利显著降低了企业参与产学研融合的创新成本。宣城通过融入 G60 科创走廊,享受跨区域创新政策叠加效应,吸引了大量沪苏浙高校资源。合肥拥有高等院校 54 所,高等院校在校大学生近 70 万人,这种人才规模优势为企业参与产学研融合提供了丰富的人才储备。同时,合肥实施的产业教授、科技特派员等制度,促进了人才在产学研之间的双向流动。相比之下,黄山、亳州、宿州等地不仅高校资源匮乏,本科院校仅 1-2 所,政策支持力度也明显不足,导致产学研融合缺乏必要的制度环境和人才基础。

4.2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评价结果的稳健性,避免因赋权方法选择而导致结论偏差,采用等权重法重新计算 2023 年安徽省 16 个地市的科技创新能力综合得分,并与表

3 得到的排序结果进行 Spearman 秩相关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6 所示,两种赋权方法下各地市排名的 Spearman 秩相关系数为 0.9088,且在 1% 水平上显著($p < 0.01$)。这表明两种方法的排序结果高度一致,评价结论对权重选择不敏感,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表 6 2023 年安徽省各市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结果(等权重法)

地市	D^+	D^-	T	排名
安庆	0.2173	0.0386	0.1508	7
蚌埠	0.2197	0.0275	0.1111	13
亳州	0.2256	0.0225	0.0907	14
池州	0.2273	0.0211	0.0848	15
滁州	0.1948	0.0833	0.2995	4
阜阳	0.2144	0.0405	0.1589	6
合肥	0.0837	0.2116	0.7164	1
淮北	0.2196	0.0310	0.1237	10
淮南	0.2201	0.0305	0.1218	11
黄山	0.2288	0.0208	0.0833	16
六安	0.2182	0.0320	0.1278	9
马鞍山	0.1999	0.0552	0.2163	5
宿州	0.2239	0.0284	0.1125	12
铜陵	0.2189	0.0376	0.1467	8
芜湖	0.1587	0.0993	0.3847	2
宣城	0.2012	0.0935	0.3174	3

4.3 安徽省科技创新能力分布动态

为深度剖析 2019—2023 年安徽省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时空演化特征,本研究基于 MATLAB 软件,采用核密度估计法分析安徽省科技创新能力的动态分布特征,对省内 16 个地市的科技创新能力进行动态分析,结果如图 2 所示。

从核整体形态与演变趋势来看,核密度曲线整体分布持续右移,直观反映出安徽省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整体呈稳步提升态势,产学研融合的驱动成效在全省层面得到有效体现。同时,曲线主峰形态呈现明显波动特征,区域创新差异持续固化,2019 年主峰陡峭全省多数地市创新能力集聚于低水平;2020—2021 年主峰高度下降、宽度增加,地市间创新能力分化,发展差距逐步拉开;2022—2023 年主峰再度抬升且右侧拖尾显著拉长,形成头部引领、尾部滞后的分布结构。由此勾勒出安徽省区域创新

“双核引领、中部崛起、边缘滞后”的三级分化格局——合肥、芜湖借深度产学研融合持续领跑构成创新高地,滁州、宣城等中部城市借助跨区域融合实现快速跃升,黄山、池州等边缘城市因产学研融合机制不健全、主体联动松散长期滞后,进一步验证了产学研融合质量是决定安徽省区域创新能力分化的核心关键变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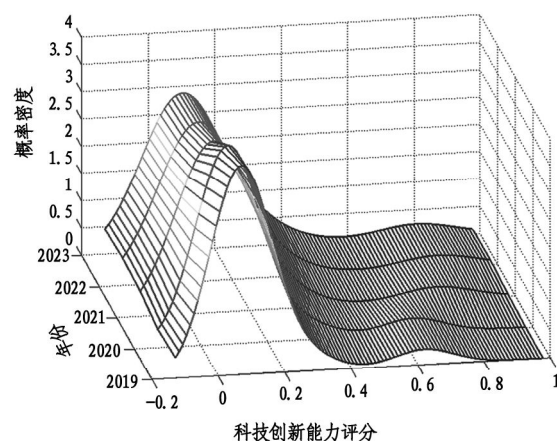


图 2 产学研融合驱动下安徽省区域科技创新能力核密度分布

5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立足于中国创新指标体系,围绕知识价值链构建安徽省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得出以下结论:一是产学研融合质量决定区域创新能力分化格局。安徽省整体科技创新能力呈稳步提升态势,但区域间差异显著,呈现“双核引领、中部崛起、边缘滞后”的三级分化格局。二是产学研融合是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核心驱动源。产学研融合相关指标对区域创新能力贡献度显著,一级指标知识流动共享与知识成果产出作为产学研融合的过程载体与成效体现,合计权重超五成;财力投入与科技成果是创新能力的核心引擎,企业向高校及院所的研发资金投入,以及企业发明专利构成核心产学研关联指标,印证产学研融合对创新能力的核心驱动作用。三是产学研融合生态缺陷制约创新能力提升潜力。创新分化根源在于产学研融合质量,领先地区通过共建研发平台、共享知识产权实现创新链与产业链耦合,滞后区域受制于产学研融合松散、转化渠道不畅,陷入低投入、低产出的循环。

为此,提出如下政策建议:一是实施梯度化、精准化的产学研推进策略。针对“三级分化”格局,加强对边缘城市的政策支持与资源投入,促进知识流动与技术转移,着力培育其内生性的产学研合作需求。同时,进一步推动核心引领城市通过共建研发

平台、共享科技成果等模式,促进创新资源向周边地区辐射,增强跨区域协同创新能力,构建区域创新共同体。二是强化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融合机制。改革科研经费管理制度,完善横向课题资金使用与成果权益分配机制,建立以企业创新需求为导向的科研项目形成机制,鼓励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打通创新链与产业链的衔接通道。三是夯实产学研融合的生态支撑体系。完善人才双向流动与共享机制,破除制度壁垒,激发人才活力,并建设面向中小企业的区域性产学研融合数字平台,公开科技成果、企业需求和政策信息,降低其参与产学研融合的门槛与风险。建立基于产学研融合实效的政策考核与激励机制,引导创新政策从单纯资源投入转向生态型制度供给,全面提升系统化支撑能力。

参考文献:

- [1]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2024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公报[EB/OL]. (2024-12-12) [2025-08-26]. http://www.gov.cn/zhengce/2024-12/12/content_6992258.htm.
- [2] 张羽飞,原长弘,石晓飞. 从协同创新到深度融合:产学研融合的概念、理论框架与展望[J]. 财会月刊,2024,45(24):122-129.
- [3] 张德祥. 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 发展新质生产力[J]. 江苏高教,2024(5):19-21.
- [4] 卢立峰,李兆友,江山. 产学研合作对推动沈阳创新型城市建设的作用及对策研究[C]//第六届沈阳科学学术年会,2009:4.
- [5] Etzkowitz H. Innovation in innovation: the triple helix of University-Industry-Government relations[J]. Social Science Information,2003,42(3):293-337.
- [6] 陈劲,阳银娟. 协同创新的理论基础与内涵[J]. 科学学研究,2012,30(2):161-164.
- [7] 郁培丽,冷丽婧. 技术转移价值创造研究综述与展望[J]. 外国经济与管理,2024,46(6):67-82.
- [8] Granstrand O, Holgersson M. Innovation ecosystems: a conceptual review and a new definition[J]. Technovation, 2020,90/91:102098.
- [9] Adner R. Match your innovation strategy to your innovation ecosystem[J]. Harvard Business Review,2006,84(4):98-107,148.
- [10] Adner R, Kapoor R. Value creation in innovation ecosystems: how the structure of technological interdependence affects firm conformance in new technology generation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2010,31(3):306-333.
- [11] 李燕,高擎. 产学研融合赋能“双循环”发展路径与对策——创新生态系统视角[J]. 科技管理研究,2023,43(22):31-37.
- [12] 吴洁,车晓静,盛永祥,等. 基于三方演化博弈的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研究[J]. 中国管理科学,2019,27(1):162-173.
- [13] 张羽飞,孙祺,李桂荣,等. 产学研深度融合创新联合体:概念衍生、特征类型与推进路径[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24,41(10):150-160.
- [14] 涂小东,肖洪安,申红芳,等. 高等院校科技成果转化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构建[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5(8):38-40.
- [15] 胡湘永,廖文和. 新质生产力视角下产学研深度融合人才培养的创新模式与协同机制[J]. 南京社会科学,2024(8):142-149.
- [16] 严晗,朱启贵,李旭辉. 大数据视角下我国区域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分析[J]. 科技管理研究,2023,43(22):102-110.
- [17] 童金杰,高燕,李涛. 江西省县域创新发展水平测度方法及其评价结果的稳定性——基于专家赋权与熵值赋权的比较分析[J]. 科技管理研究,2023,43(18):70-78.
- [18] 赵菁奇,金露露,张文君. 科技自立自强视域下国家创新体系效能建设提升——以长三角区域为例[J]. 华东经济管理,2024,38(1):26-36.
- [19] 杨力,徐悦,朱俊奇. 中国东部省份科技创新能力综合评价——基于 TOPSIS-AISM 模型[J]. 现代管理科学,2021(8):3-12.
- [20] 陈枳宇,曹卫东,范雅辰,等. 基于改进 TOPSIS 模型的安徽省城市创新能力演化及耦合协调研究[J]. 世界地理研究,2023,32(1):92-103.
- [21] 梁诗,黄栋,贺骥. 省域科技安全水平测度及时空差异演变[J]. 中国科技论坛,2025(3):98-107.
- [22] 曹李海,马芮,马宁. 中国区域科技创新治理能力的测度与时空演进——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科技管理研究,2025,45(14):91-98.
- [23] Carayannis E G, Campbell D F J, Grigoroudis E. Helix Trilogy: the triple, quadruple, and quintuple innovation helices from a theory, policy, and practice set of perspectives[J]. Journal of the Knowledge Economy,2021,13(3):1-30.
- [24] 曹佳蕾,李停. 基于熵权 GC-TOPSIS 的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与实证[J]. 统计与决策,2020,36(15):171-174.
- [25] 宁连举,肖玉贤,刘经涛,等. 跨行政区域创新策源能力评价与实证——基于熵权法、TOPSIS 法、灰色关联分析[J]. 科技管理研究,2021,41(20):44-51.
- [26] 王思童,李爽. 战略性新兴产业韧性发展水平测度及时空演变特征分析[J]. 科技经济导刊,2025,33(5):64-78.

责任编辑:冯意云

直播电商情境下心理契约对地理标志产品的购买意愿 ——基于主播专业性调节效果的实证研究

王 儒, 余 菲*

(铜陵学院 工商管理学院, 安徽 铜陵 244000)

摘 要:基于心理契约理论,构建包含交易型心理契约、关系型心理契约、信任、主播专业性及地理标志产品购买意愿的研究模型。结果表明:交易型心理契约正向影响关系型心理契约,但对其直接促进信任的作用未获支持;关系型心理契约显著增强信任,且信任完全中介其对购买意愿的正向影响;主播专业性正向调节两类心理契约对信任的作用,并强化信任向购买意愿的传导路径。研究揭示了心理契约类型对信任的差异化作用机制,验证了信任在关系型契约与购买意愿间的完全中介效应,以及主播专业性在“心理契约-信任-购买意愿”链条中的双重调节功能。理论层面,拓展了心理契约理论在直播场景的应用,明晰了信任的中介效应。实践层面,建议电商平台通过强化关系型心理契约构建与提升主播专业性,优化消费者信任培育路径,推动地理标志产品的高效转化与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心理契约;直播电商;地理标志产品;信任

中图分类号:F724.6;F713.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6)04-0049-10

Impact of Psychological Contract on the Purchase Intention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roducts in the Context of Live-streaming E-commerce by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he Professionalism of Live-streamers

WANG Ru, YU Fei*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Tongling University, Tongling, 244000, Anhui)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psychological contract, it constructed a research model including transactional psychological contract, relational psychological contract, trust, the professionalism of live-streamers and the purchase intention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roducts in this paper.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ransactional psychological contracts have a positive impact on relational psychological contracts, but their direct role in promoting trust is not supported. Relational psychological contracts significantly enhance trust, and trust fully mediates its positive impact on purchase intention. The professionalism of the live-streamer positively moderates the effect of two types of psychological contracts on trust and strengthens the transmission path of trust to purchase intention. The research revealed the differentiated mechanism of the type of psychological contract on trust, verified the complete mediating effect of trust between relational contracts and purchase intention, as well as the dual moderating function of the professionalism of the live-streamer in the chain of “psychological contract-trust-purchase intention”.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sychological contract theory in the live streaming scenario has been expanded,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trust has been clarified. At the practical level, it is suggested that e-commerce platforms

收稿日期:2025-10-31 * 通讯联系人

基金项目: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AHSKQ2020D76)。

作者简介:王儒(1991—),男,安徽宿州人,讲师,博士;余菲(1993—),女,安徽安庆人,讲师,博士。E-mail:244912858@qq.com

optimize the path of cultivating consumer trust by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relationship-based psychological contracts and enhancing the professionalism of live-streamers, so as to promote the efficient transform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roducts.

Key words: psychological contract; live-streaming e-commerce;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roducts; trust

直播电商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营销模式,正深刻重塑消费者的购物决策路径,尤其为地理标志产品这类依赖文化信任与品质背书的产品提供了重要推广渠道。然而,尽管地理标志产品具有独特的地域价值和品质保障,但其在直播场景中的购买意愿仍面临挑战。消费者对地理标志产品的复购率显著低于标准化商品,部分归因于线上场景中消费者与产品之间的信任隔阂。现有研究多从技术接受模型或品牌信任视角解析直播购物行为^[1-3],却较少关注主播与消费者之间动态交互形成的心理契约及其对信任的作用机制,更未揭示不同类型心理契约对地理标志产品购买意愿的差异化影响。

心理契约本质上是多维构念,涵盖交易型与关系型两类^[4-5]。现有研究多对其进行整体探讨,未能区分二者对信任的差异化路径。少量研究虽提示关系型契约更易促进信任,但缺乏直播情境下的实证检验,尤其在地理标志产品这类高感知风险品类中,交易型契约是否可能通过短期承诺增强信任仍未明确。信任的中介机制尚未充分链接心理契约与购买意愿。尽管信任被视为直播消费的核心驱动^[6],但其如何对心理契约产生中介作用仍存争议。关系型契约可能通过情感信任促进购买,而交易型契约依赖认知信任,两类路径的效能差异及边界条件亟待厘清。同时,主播专业性作为关键情境变量的调节作用仍被忽视。主播专业性既体现为产品知识储备,也包含互动沟通能力,其水平高低可能强化或弱化心理契约对信任的传导^[7]。然而,现有文献未深入探讨主播专业性如何调节不同类型契约与信任的关系,亦未将其纳入“有调节的中介”框架,限制了对直播营销策略的精细化指导。

针对上述不足,本研究拟从三方面推进:其一,基于心理契约理论,区分关系型与交易型契约对消费者信任的差异化影响,并揭示信任在二者与地理标志产品购买意愿间的中介作用;其二,引入主播专业性作为调节变量,探讨专业性水平如何改变心理契约通过信任影响购买意愿的路径强度;其三,聚焦地理标志产品的文化属性与信任依赖性,结合直播电商的实时互动特征,解析非标准化产品在虚拟消费场景中的信任构建机制。

本研究理论贡献在于:第一,拓展心理契约理论

在直播电商领域的应用,揭示契约类型细分对消费者信任的异质性作用,弥补现有文献对心理动态交互机制的解构不足;第二,厘清信任的中介效应,深化对直播场景下“人-货-场”信任传导链条的理解;第三,验证主播专业性的调节效应,为直播营销中人设打造与内容设计提供理论依据。实践层面,研究结论可为地理标志产品优化直播策略以提升消费者信任及购买转化提供决策参考。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1.1 心理契约的类别与消费者信任构建

消费者与主播间的非正式隐性承诺是直播电商信任构建的核心。Rousseau 首次将心理契约引入组织行为研究,强调个体与组织间非书面化的相互期望与责任认知^[5]。在直播场景中,心理契约体现为消费者对主播承诺的感知与履约预期,其类型划分直接影响信任的生成机制。交易型心理契约聚焦短期利益交换,关系型心理契约强调长期情感联结,这一分类为解析直播信任逻辑提供了关键视角。

信任生成路径因契约类型而异。交易型心理契约以经济交换为核心,依赖契约履行的可验证性构建认知信任,主播通过限时折扣、品质保障等短期承诺降低地理标志产品的感知风险,消费者基于理性计算评估可信度,但过度依赖易引发承诺疲劳,推高信任阈值。关系型心理契约则通过情感纽带与价值观共鸣激活情感信任,主播借助地理标志产品的文化叙事、社群认同构建,满足消费者的归属感与自我表达需求,形成“人-货-场”的情感闭环,其信任根基更具韧性^[8]。

交易型契约可快速触发购买决策,但信任基础薄弱;关系型契约虽需长期积累,却能深化情感联结与善意感知^[9],二者并非割裂而是动态协同。消费者通过交易型契约建立的基础性认知信任,为关系型契约的情感信任培育提供锚点^[10];主播持续兑现交易承诺时,消费者对其专业能力的理性认知会转化为人格特质的积极归因,推动契约关系从工具性交换向情感性交换升级^[11]。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 交易型心理契约正向影响关系型心理契约。

H2:交易型心理契约正向影响信任。

H3:关系型心理契约正向影响信任。

1.2 心理契约与地理标志产品购买意愿

交易型心理契约以短期经济条款为核心,依赖主播即时利益兑现能力。短期利益刺激虽能快速触发购买,但易使消费者形成工具性认知,信任仅基于履约理性计算,一旦承诺偏差,信任便难以修复。对于地理标志产品而言,其品质认知高度依赖于文化背书与产地可信度,交易型契约的功利化导向会让消费者局限于“价格-功能”权衡,忽视产品的文化价值,进而降低长期复购意愿。

关系型心理契约以长期情感联结为核心,主播通过持续情感投入、价值观输出与社群营造,与消费者建立超越交易的纽带^[12]。这一特性在地理标志产品场景中尤为重要:因为消费者购买的不仅是实物商品,更是其承载的地域文化符号。关系型契约通过情感浸润强化消费者对产品文化价值的认同,将购买升华为“意义消费”,从而提升信任的稳定性与购买转化率^[13]。

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4:交易型心理契约正向影响地理标志产品购买意愿。

H5:关系型心理契约正向影响地理标志产品购买意愿。

1.3 信任的中介作用与地理标志产品购买意愿

信任作为直播电商中消费者决策的核心要素,在地理标志产品购买场景中扮演双重角色:既能降低感知风险,同时能够激活文化认同。大量研究表明,信任是影响购买意愿的重要因素^[14]。信任源于消费者对主播能力与产品质量的理性评估,情感信任则依赖于消费者与主播间的情感共鸣与社会认同。对于地理标志产品而言,其购买决策兼具功能性与象征性需求,信任恰好对应这两类需求的满足,从而成为心理契约向购买意愿传导的关键枢纽。

在交易型契约框架下,主播通过即时利益承诺与履约可靠性建立认知信任。消费者基于成本-收益分析,将信任锚定于契约条款的可验证性,进而降低对地理标志产品真伪与品质的不确定性感知。关系型契约通过主播持续的情感投入与价值观输出,激发消费者对主播真诚性与共情能力的认同,形成情感信任。这种信任促使消费者将地理标志产品购买行为视为对文化符号的“意义消费”^[15],而非单纯的交易交换。消费者因对地理标志原产地属性的

认同而购买时,信任会将其支付溢价合理化,从而提升购买意愿与支付意愿^[16]。

提出假设:

H6:信任正向影响地理标志产品购买意愿。

H7:信任在交易型心理契约与地理标志产品购买意愿之间发挥中介效应。

H8:信任在关系型心理契约与地理标志产品购买意愿之间发挥中介效应。

1.4 主播专业性的调节效应

主播专业性作为直播电商场景中“人-货”信任传导的关键情境变量^[17],通过知识权威与沟通效能重塑心理契约的作用路径。高专业性主播兼具产品知识权威性与沟通共情力,能有效弥合心理契约与信任之间的鸿沟:对于交易型心理契约,专业性通过增强信息对称性,降低消费者的认知成本^[18],使价格承诺更易被采信;对于关系型心理契约,专业性通过情感赋能将文化叙事转化为可信赖的品牌资产^[19],避免情感联结流于表面。反之,低专业性主播可能加剧契约类型与信任的错配:交易型承诺易被质疑为营销话术^[20],关系型互动则因知识缺位被视为表演性亲密。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

H9:主播专业性对交易型心理契约与信任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

H10:主播专业性对关系型心理契约与信任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

高专业性主播通过知识权威构建与沟通效能释放,能够强化心理契约向购买意愿的转化效率^[21]。在交易型心理契约框架下,主播对产地标准、生产工艺等专业知识系统阐释,可显著降低消费者对地理标志产品品质的信息验证成本,使功能价值承诺转化为可感知的购买决策依据^[22];在关系型心理契约维度,主播对地域文化符号的深度解读与情感共鸣激发,可将地理标志产品承载的人文价值升华为消费仪式感,形成文化认同驱动购买动机^[23]。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假设:

H11:主播专业性对交易型心理契约与地理标志产品购买意愿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

H12:主播专业性对关系型心理契约与地理标志产品购买意愿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提出直播电商情境下心理契约、信任、主播专业性与地理标志产品购买意愿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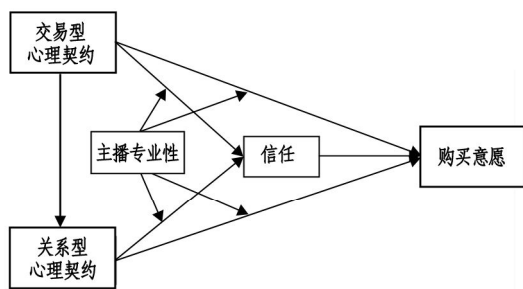


图1 研究模型

2 量表设计与数据来源

2.1 量表设计

问卷主要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调查对象的人口统计特征,包括性别、婚姻、年龄等;第二部分为整个问卷的核心内容,包括了交易型心理契约、关系型心理契约、信任、主播专业性、地理标志产品购买

意愿的题项。问卷的设计主要参照已有成果,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研究采用的心理契约量表,核心维度源于陈落初^[20]开发的成熟量表;关于信任以及主播专业性的题项分别参考陈义涛等^[8]和王家宝等^[24]的研究,关于地理标志产品购买意愿的题项主要参考张宝生等^[13]的研究,具体如表1所示,本次问卷设计运用李克特五分量表进行调查。

2.2 数据收集

研究聚焦于曾观看地理标志产品直播的群体,于2024年6月至7月期间,通过问卷星平台开展问卷调查,并借助微信、QQ等社交媒体渠道邀请有过地理标志产品直播观看经历的对象参与作答。共回收问卷522份,剔除无效问卷30份后,最终得到492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4.3%。样本基本特征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

表1 变量的测量指标

变量	测量题项	编号	参考来源
关系型心理契约	我相信主播会真心为我提供优质的地理标志产品	RPC1	陈落初(2023)
	我相信主播是真正尊重我,而不是敷衍我	RPC2	
	我相信主播真心重视我们之间的友谊关系	RPC3	
交易型心理契约	主播把我当熟客看,会给予我真正的价格优惠	TPC1	陈落初(2023)
	主播会认真执行售后服务	TPC2	
	主播会提供优惠的产品价格	TPC3	
	主播会提供快捷的补救服务	TPC4	
信任	通过浏览地理标志产品直播带货视频,我更加信任主播	TR1	陈义涛等(2021)
	我相信主播推荐的地理标志产品是其真实感受	TR2	
	我相信主播推荐的地理标志产品是值得的	TR3	
主播专业性	主播具有专业的技巧	PA1	王家宝等(2021)
	主播对推荐产品具有相关的专业知识	PA2	
	主播能够准确地解答产品的相关问题	PA3	
地理标志产品购买意愿	如果直播间里有本人所需的商品,我愿意消费	IP1	张宝生等(2021)
	将来有商品需求时,我愿意在此直播间消费	IP2	
	当他人咨询时,我愿意推荐此直播间	IP3	

3 实证分析

3.1 信效度分析

研究使用SPSS 26.0对样本数据进行因子分析。分析结果显示:KMO检验值为0.940,巴特利特球形检验值为4460.023 ($p < 0.001$),达到显著水

平,表明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最终提取出5个公因子,其累计方差解释率为70.352%。验证性分析表明,各题项因子载荷均大于0.4。此外,总量表及各潜变量的Cronbach's α 系数均高于0.7,证明量表兼具良好的结构效度与内部一致性。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为了进一步检验量表的信效度,运用组合信度 *CR* 值和平均提炼方差 *AVE* 值检验内部结构变量,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如表 4 所示。

分析结果表明:模型适配度指标表现优异,其中卡方自由度比(*CMIN/df*)为 2.418(<3),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为 0.054(<0.08),均达到理想阈值;同时,拟合优度指数(*GFI* = 0.945)、规范拟合指数(*NFI* = 0.946)、相对拟合指数(*RFI* = 0.927)、增量拟合指数(*IFI* = 0.969)与非规范拟合指数(*TLI* =

0.956)均大于 0.9,符合优秀拟合标准。此外,各潜在变量的平均方差萃取量(*AVE*)均超过 0.5,且组合信度(*CR*)均大于 0.7,综合验证了量表具备良好的信效度。

表 5 数据表明,各潜在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均低于其对应 *AVE* 值的平方根,这一特征既体现了变量间的适度相关性,又确保了变量间区分度的明确,最终验证了量表数据具有理想的判别效度质量。

表 4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变量	测量题项	因子载荷	AVE	CR
关系型心理契约	RPC3	0.712	0.505	0.754
	RPC2	0.704		
	RPC1	0.716		
交易型心理契约	TPC5	0.716	0.662	0.907
	TPC4	0.671		
	TPC3	0.658		
	TPC2	0.637		
	TPC1	0.673		
信任	TR1	0.801	0.608	0.823
	TR2	0.770		
	TR3	0.767		
主播专业性	PA3	0.819	0.632	0.837
	PA2	0.751		
	PA1	0.813		
地理标志产品购买意愿	IP1	0.725	0.561	0.792
	IP2	0.696		
	IP3	0.819		

表 5 判别效度分析

变量	1	2	3	4	5
关系型心理契约					
交易型心理契约	0.340				
信任	0.285	0.311			
主播专业性	0.293	0.326	0.347		
地理标志产品购买意愿	0.243	0.276	0.304	0.313	
AVE 的平方根	0.711	0.814	0.780	0.795	0.749

3.2 路径分析

本研究建立关系型心理契约、交易型心理契约、信任、地理标志产品购买意愿的结构方程模型,结构方程模型的各项拟合指数达到良好标准($CMIN/df$

$= 2.224$, $GFI = 0.96$, $RMSEA = 0.05$, $NFI = 0.958$, $RFI = 0.94$, $IFI = 0.976$, $TLI = 0.966$),结构方程模型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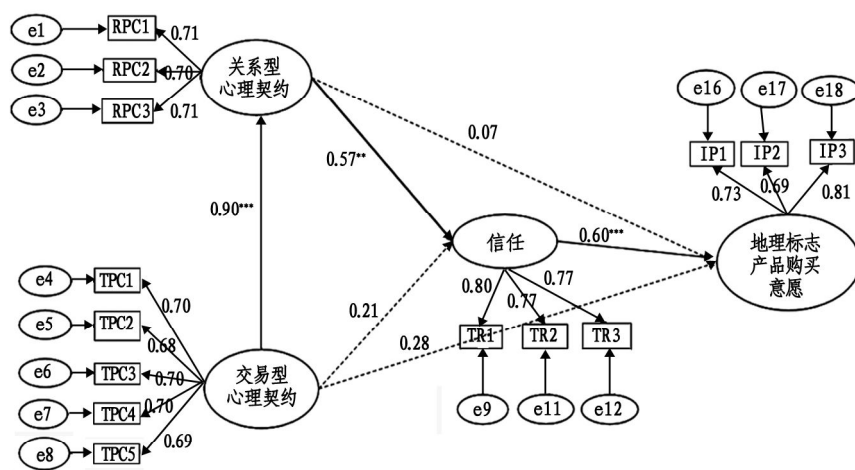


图 2 结构方程模型

根据路径分析检验结果(见表 6)可知:对于 H1,交易型心理契约正向影响关系型心理契约($\beta = 0.904$, $p < 0.001$),表明在直播电商情境下标准化履约是构建情感联结的基础,H1 通过检验。对于 H2,交易型心理契约对信任无显著影响($\beta = 0.209$, $p > 0.05$),这一结果印证了单纯的交易属性难以直接形成信任,H2 未通过检验。对于 H3,关系型心理契约正向影响信任($\beta = 0.57$, $p < 0.05$),H3 通过检

验。对于 H4,交易型心理契约对地理标志产品购买意愿直接影响不显著($\beta = 0.281$, $p > 0.05$),H4 未通过检验。对于 H5,关系型心理契约对地理标志产品购买意愿直接影响不显著($\beta = 0.072$, $p > 0.05$),H5 未通过检验。对于 H6,信任正向影响地理标志产品购买意愿($\beta = 0.595$, $p < 0.001$),结果表明信任是影响地理标志产品购买意愿的关键因素,H6 通过检验,结果如表 6 所示。

表 6 路径分析检验结果

假设	Estimate	SE	CR	p 值	检验结果
H1 交易型心理契约→关系型心理契约	0.904	0.066	12.979	***	支持
H2 交易型心理契约→信任	0.209	0.196	1.143	0.253	不支持
H3 关系型心理契约→信任	0.570	0.213	3.014	0.003	支持
H4 交易型心理契约→地理标志产品购买意愿	0.281	0.141	1.838	0.066	不支持
H5 关系型心理契约→地理标志产品购买意愿	0.072	0.163	0.424	0.672	不支持
H6 信任→地理标志产品购买意愿	0.595	0.068	7.532	***	支持

注:***表示 $p < 0.001$ 。

3.3 中介分析

本研究采用 AMOS Bootstrap 方法对信任在心理契约和地理标志产品购买意愿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 7 所示,交易型心理契约→信任→地理标志产品购买意愿路径的总效应值为 0.777,直接效应值为 0.281,间接效应值为 0.496,同时 Bootstrap 95% 置信区间 $[-0.097, 1.142]$ 包含 0,说明信任在交易型心理契约与地理标志产品购买

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显著,假设 H7 不支持。关系型心理契约→信任→地理标志产品购买意愿路径的总效应值为 0.411,直接效应值为 0.072,间接效应值为 0.339,占比 82.5%,同时 Bootstrap 95% 置信区间 $[0.032, 0.954]$ 不包含 0,说明信任在关系型心理契约与地理标志产品购买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假设 H8 得到支持。

表 7 中介效应检验

路径	总效应	直接效应	间接效应	95% CI 下限	95% CI 上限	结果
交易型心理契约→信任→地理标志产品购买意愿	0.777***	0.281	0.496	-0.097	1.142	不支持
关系型心理契约→信任→地理标志产品购买意愿	0.411	0.072	0.339*	0.032	0.954	支持

注：*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01$ ，*** 表示 $p < 0.001$ ，下同。

3.4 调节分析

为检验主播专业性的调节作用,研究运用 SPSS 与 PROCESS 软件,将“主播专业性”纳入回归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关系型心理契约与主播专业性的交互项对信任 ($\Delta R^2 = 0.045$, $\beta = 0.085$, $t = 2.093$, $p < 0.05$) 和地理标志产品购买意愿 ($\Delta R^2 = 0.061$, $\beta = 0.093$, $t = 2.52$, $p < 0.05$) 的影响均显著;交易型

心理契约与主播专业性的交互项对信任 ($\Delta R^2 = 0.0064$, $\beta = 0.103$, $t = 2.481$, $p < 0.05$) 和购买意愿 ($\Delta R^2 = 0.0075$, $\beta = 0.106$, $t = 2.835$, $p < 0.01$) 的影响也同样显著。以上结果证实,主播专业性在两类心理契约与信任及购买意愿的关系中均起显著调节作用,假设 H9、H10、H11、H12 均获得支持。主播专业性的调节效应检验如表 8 所示。

表 8 主播专业性的调节效应检验

调节关系	ΔR^2	β	t	p	方向	结果
关系型心理契约→信任	0.0450	0.085	2.093	0.037	+	支持
交易型心理契约→信任	0.0064	0.103	2.481	0.013	+	支持
关系型心理契约→地理标志产品购买意愿	0.0610	0.093	2.520	0.012	+	支持
交易型心理契约→地理标志产品购买意愿	0.0075	0.106	2.835	0.004	+	支持

4 结论与启示

研究结论:第一,揭示了心理契约类型对信任的差异化影响:研究拓展了心理契约理论在直播电商领域的应用,通过实证分析,清晰地揭示了交易型心理契约和关系型心理契约对消费者信任的不同影响路径。研究发现,交易型心理契约正向影响关系型心理契约,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在虚拟即时互动中,关系型契约所依赖的情感联结无法凭空产生,其必须植根于交易型契约可靠履行所奠定的信任基础。该路径印证了数字消费领域中交易承诺的兑现是主播进入消费者关系深化的重要条件。特别对于地理标志产品,这一机制反应了消费者从“功能价值验证”到“符号价值内化”的感知顺序。交易型心理契约对信任的直接正向影响未得到支持,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不一致。经进一步推敲,本研究对结论不一致的解释如下:这是因为地理标志产品的购买决策高度依赖文化认同与产地可信度,消费者对这类产品的信任更多源于情感信任,而非交易型契约中的理性计算;交易型契约的短期经济承诺,可能被消费者视为“标准化服务保障”,无法有效转化为情感层面的信任积累。关系型心理契约

正向影响信任,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这一结果表明在直播电商场景中,不同类型心理契约在信任构建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弥补了以往研究将心理契约视为整体而忽略其内部差异的不足,深化了对直播电商信任动态生成机制的理解。第二,消费者对主播的信任显著正向影响其对地理标志产品的购买意愿。这一发现揭示了信任在直播电商价值链中的核心枢纽地位:在虚拟消费场景中,信任不仅能降低信息不对称和感知风险,更能激活地理标志产品的文化属性与情感价值。具体而言,当消费者基于主播的专业性、真诚性及过往互动形成信任后,这种心理状态会直接转化为对主播所推荐的地理标志产品的品质确信与价值认同,从而有效跨越线上消费的决策障碍,将观看兴趣转化为实际购买行为。这一路径尤其凸显了在非标准化、高文化附加值产品的直播销售中,人际信任对产品信任的关键传导作用,为理解直播电商的转化机制提供了关键实证依据。第三,明确信任的中介作用及边界条件:研究验证了信任在心理契约与地理标志产品购买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但这种中介作用存在差异。信任在关系型心理契约与购买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而在交易型心理契约与购买意愿之间的中介作用不

显著。因交易型心理契约与关系型心理契约对地理标志产品购买意愿直接影响均不显著,因此信任在关系型心理契约与地理标志产品购买意愿之间发挥完全中介效果。这一发现厘清了信任在不同类型心理契约影响购买意愿过程中的复杂机制,进一步明晰了直播场景下“人-货-场”信任传导链条的具体路径和边界条件,丰富了相关理论研究。第四,验证主播专业性的调节效应:证实了主播专业性在心理契约与信任、心理契约与地理标志产品购买意愿之间的调节作用。高专业性主播能够增强交易型心理契约和关系型心理契约对信任的正向作用,同时也正向调节这两类心理契约对购买意愿的影响。这为直播营销中主播的“人设打造”和“内容设计”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有助于优化直播营销策略。

可以从中获得的启示为:第一,平台与主播应推动核心价值逻辑实现战略性转变,即从追求即时交易效率升级为培育深度关系与信任。这要求直播间超越单一的销售功能定位,转型为融合文化传播、情感交流与社群互动的新型消费场域。主播需要系统梳理并生动呈现地理标志产品所承载的地域风物与工艺传承,通过持续且真诚的叙事,与消费者建立基于价值认同的情感联结;定期组织云端探访产地的直播活动,或设计让消费者参与产品改良的互动企划,都能有效增强消费者的文化认同感与参与感,从而构筑超越短期交易的持久关系资产。第二,应当构建一套体系化、可衡量的主播专业化发展路径。平台需联合行业机构,共同设计涵盖产品专业知识、内容创作能力及深度沟通技巧的阶梯式培训课程。同时,建立权威的专业能力认证机制,颁发由产地政府或行业协会背书的特定品类推荐官证书,将主播的专业素养转化为显性且可信的行业信用标识。这不仅能够系统性提升主播群体的整体专业水准,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清晰可靠的甄选依据,从根本上夯实了信任构建的能力基础。第三,积极利用数字技术对信任构建与转化过程进行精准赋能与透明化呈现。通过大数据分析,平台可以精准识别不同消费者群体的偏好与信任的驱动因素,从而实现个性化内容推荐与互动策略匹配,使关系维护更为高效。此外,整合应用区块链溯源、实时生产画面直播、消费者历史评价聚合等工具,将产品的品质保障流程与主播的服务承诺记录予以直观展示。这种信任的可视化能够大幅降低消费者对于产品真伪与品质的信息核实成本,使抽象的信任感知变得具体可感知。第四,平台应当通过优化治理规则与激励机制,引导整个生态从流量竞争转向信任资本的健康积累。关

键举措在于改革流量分配算法,加大对用户复购率、满意度及社群活跃度等关系质量指标的权重,对善于经营长期信任的主播给予持续的资源倾斜。同时,设立面向主播和商家的长期价值奖励计划,并定期发布基于多维信任指标评估的榜单或认证,将市场声誉与信任度直接挂钩。此举旨在树立行业标杆,激励所有参与者致力于提升用户体验与信任水平,最终推动直播电商生态实现可持续的良性发展。

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本研究虽然在理论构建与实践方面取得了一定进展,但仍存在若干局限,这些局限也为未来研究指明了方向。首先,在样本层面,受限于研究条件,研究采用的便利抽样方法导致样本群体呈现年轻化、高学历的显著特征,未能充分覆盖更广泛的消费者群体,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研究结论的外部效度。未来研究应采用更具代表性的抽样方法,以检验模型在不同人群中的普适性。其次,在测量层面,研究基于经典量表修订的测量工具,在捕捉直播电商即时、高互动特性方面可能存在不足,未来可结合质性研究开发更具针对性的新量表。在研究设计上,横截面数据难以严格推断因果关系,也无法揭示变量间可能存在的动态反馈,未来采用纵向追踪或实验设计将能更严谨地验证因果链条与演化过程。最后,在理论模型上,研究聚焦于核心变量关系,未来可将平台特征、社会影响、消费者个体差异等更多元因素纳入模型,以构建更为全面立体的理论解释框架。

参考文献:

- [1] 赵林艳. 基于技术接受模型的电商直播消费者满意度分析[J]. 科技创新与生产力, 2023, 44(9): 43-45, 48.
- [2] 龚立新, 展书静, 孔栋, 等. 直播电商的发展现状、研究主体及展望——一个系统性文献综述(下)[J]. 南阳理工学院学报, 2023, 15(3): 49-54.
- [3] 孙凯, 刘鲁川, 刘承林. 情感视角下直播电商消费者冲动性购买意愿[J]. 中国流通经济, 2022, 36(1): 33-42.
- [4] 魏峰, 李焱, 张文贤. 国内外心理契约研究的新进展[J]. 管理科学学报, 2005(5): 86-93.
- [5] 陈加州, 凌文铨, 方俐洛. 心理契约的内容、维度和类型[J]. 心理科学进展, 2003(4): 437-445.
- [6] 张艳芬, 徐琪, 孙中苗. 考虑主播带货努力与影响力的直播电商供应链激励契约研究[J]. 管理学报, 2023, 20(2): 278-286.
- [7] 左晶晶, 李盈盈. 电商主播专业性对消费者冲动购买行为的影响及机制[J]. 消费经济, 2023, 39(4): 94-102.
- [8] 陈义涛, 赵军伟, 袁胜军. 电商直播中心理契约到消费意愿的演化机制——卷入度的调节作用[J]. 中国流通经济, 2021, 35(11): 44-55.

- [9] 陈义涛,刘茜,蒋雅琼. 微信公众号技术可供性如何促进用户价值共创行为?——心理契约的中介作用[J]. 经济与管理,2025,39(2):41-49.
- [10] 焦燕莉,赵涛. 高竞争行业中基于心理契约的顾客忠诚培育策略[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1):113-116.
- [11] 彭宇泓,韩欢,郝辽钢,等. 直播营销中关系纽带、顾客承诺对消费者在线购买意愿的影响研究[J]. 管理学报,2021,18(11):1686-1694.
- [12] 王建荣. C2C 环境下服务承诺、消费者心理契约与消费意愿分析[J]. 商业经济研究,2020(9):63-66.
- [13] 张宝生,张庆普,赵辰光. 电商直播模式下网络直播特征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消费者感知的中介作用[J]. 中国流通经济,2021,35(6):52-61.
- [14] 刘洋,李琪,殷猛. 网络直播购物特征对消费者购买行为影响研究[J]. 软科学,2020,34(6):108-114.
- [15] 黄贤涛,王文心,李士杰. 加强原产地保护建设现代农业强国——关于加强和完善地理标志制度的思考[J]. 求实,2012(7):40-43.
- [16] 周安宁,应瑞瑶. 我国消费者地理标志农产品支付意愿研究——基于淘宝网“碧螺春”交易数据的特征价格模型分析[J]. 华东经济管理,2012,26(7):111-114.
- [17] 刘本琪. 直播电商关系纽带、心流体验与消费者冲动性购买意愿[J]. 商业经济研究,2023(2):78-81.
- [18] 赵金晓,马东升. 电商直播信息特征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机制[J]. 商业观察,2025,11(2):82-87.
- [19] 曾小圆,高明杰,姚盛辉. 助农直播消费者参与意愿影响因素研究——以品牌认知和情感态度为中介[J]. 现代商业,2025(2):3-7.
- [20] 陈落初. 电商直播情境下主播营销话术与消费者冲动购买行为——基于心理契约调节的中介作用[J]. 商业经济研究,2025(3):82-85.
- [21] 刘红娜,宋钦睿. 心理契约视域下知识型主播对消费者购买意愿的影响[J]. 新媒体研究,2024,10(9):63-67.
- [22] 李茸,马宝龙,张鹏,等. 电商 AI 主播特征影响消费者购买意愿的机制——基于技术感知与社会互动双重视角[J]. 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7(1):127-144,187.
- [23] 朱虹,郭峻豪,郑先勇. 基于商品流通原则的欧盟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研究[J]. 商业经济研究,2020(7):162-165.
- [24] 王家宝,武友成,王全丽,等. 电商主播属性、消费者信任与购买意愿关系研究——基于商品价格和电商平台声誉的调节作用[J]. 价格理论与实践,2021(12):151-154.

责任编辑:费瑞波

(上接第 12 页)

4 结论

将习近平文化思想系统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学是价值逻辑、内容逻辑、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是需要持续推进的系统工程和长期任务。既要深刻把握其精髓要义与铸魂育人的价值,又要遵循青少年“拔节孕穗期”成长发展的规律,着力破解各学段目标、内容脱节、方法单一、保障乏力等现实难题,更要注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强大精神力量。未来,可通过人工智能这一推动融合进程的强大引擎,以更加鲜活、更为精准、更具吸引力的方式浸润青少年心灵,使其真正入耳、入脑、入心,持续筑牢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的力量根基,引导青年坚定文化自信、涵养家国情怀,成为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 人民日报,2025-10-29(1).
- [2] 习近平对学校思政课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不断开创新时代思政教育新局面 努力培养更多让党放心爱国奉献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N]. 人民日报,2024-05-12(1).
- [3]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N]. 人民日报,2022-10-26(1).
- [4] 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强调: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N]. 人民日报,2019-03-19(1).
- [5] 习近平. 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J]. 奋斗,2020(17):4-16.
- [6]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N]. 人民日报,2016-12-09(1).
- [7] 毕红梅,谭江林. 思想政治教育主客体问题的三重论域[J]. 思想教育研究,2021(6):24-30.
- [8]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165-166.
- [9]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5.
- [10] 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民盟民进教育界委员时强调: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支撑作用 形成人才辈出人尽其才尽其用生动局面[N]. 人民日报,2025-03-07(1).

责任编辑:徐雪莲

AI 赋能高校财务数字化管理: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创新路径

柯萍¹, 吴艳艳^{2*}

(1. 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财务处, 安徽 芜湖 241002; 2. 蚌埠学院 财务处, 安徽 蚌埠 233030)

摘要:在数字经济与教育强国战略融合背景下,高校财务数字化管理是提升治理效能的核心抓手,AI 技术为破解传统财务模式的数据孤岛、流程繁琐等难题提供了新方案。基于资源依赖、流程再造与数据治理理论,通过剖析 AI 赋能高校财务数字化管理的内在逻辑与核心价值,结合实践案例指出转型面临的现实困境。进而从顶层架构重构、数据生态搭建、业务流程再造、风险防控体系升级、人才文化培育等五个维度提出创新路径,旨在为高校财务从“核算型”向“价值创造型”转型、构建现代财务治理体系提供理论与实践参考。

关键词:人工智能;高校财务;数字化管理;创新路径

中图分类号:G647.5;TP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6)04-0059-06

AI-Empowered Digital Management of University Finance: Theoretical Logic, Practical Challenges and Innovative Pathways

KE Ping¹, WU Yanyan^{2*}

(1. Department of Finance, Anhui Technical College of Mechanical and Electrical Engineering, Wuhu, 241002, Anhui;

2. Department of Finance, Bengbu University, Bengbu, 233030, Anhui)

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national strategy to become a leading country in education, digital financial management in universities serves as a core means to enhance governance efficienc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technology has provided a new solution to address such challenges in traditional financial models as data silos and cumbersome processes.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resource dependency, process re-engineering and data governance, it analyzed the intrinsic logic and core value of AI-empowered digital financial management in universities in this paper. Combined with practical cases, the practical predicaments encountered in the transformation were pointed out. Furthermore, innovative approaches were proposed from five dimensions: top-level architecture restructuring, data ecosystem construction, business process reengineering, upgrading of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and talent & culture cultivation. It intended to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universities to transform their financial management from an accounting-oriented model to a value-creating one and to establish a modern financial governance system.

Key word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university finance; digital management; innovative pathways

《国务院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驱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应通过统筹推进政务应用系统在各行各业各领域的集约建设与互联互通,构建数字化、智能

化的运行新态势^[1]。并且,《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 2024 年工作要点》明确提出要全面推动智慧财政在行政事业单位的应用^[2]。《财政部会计改革与发展“十四五”规划纲要》也强调要充分发挥数据

收稿日期:2026-02-26

* 通讯联系人

作者简介:柯萍(1985—),女,湖北黄冈人,会计师,硕士;吴艳艳(1972—),女,安徽明光人,高级会计师,硕士。E-mail: 342714950@qq.com

的协同优化作用,并实施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行动^[3]。高等院校作为开展科学研究、培养人才以及提供社会服务的重要阵地,其各项管理工作面临着重大挑战,特别是财务管理工作,面临着经费规模持续扩大、业务场景日益复杂、监管要求不断提高等诸多难题。传统高校财务管理模式以线下核算与人工审核为主,由此引发了流程链条冗长、数据传输滞后、资源配置低效等突出问题,难以适应新时期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需求。人工智能技术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驱动力,凭借独特的数据采集、智能分析以及自动化处理等优势,正对各行各业的管理模式进行深度重塑。

在国家政策导向与技术驱动的双重影响下,国内有多所高校率先开展了 AI 赋能财务数字化转型的实践探索,通过搭建智能报销系统、财务大数据平台、风险预警体系等,在提升服务效率、强化监管效能、优化资源配置等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从全国范围来看,高校的财务数字化管理仍处于初级阶段,AI 技术普遍存在应用浅层化、碎片化的问题。如何有效发挥 AI 技术的赋能价值,搭建高效的财务数字化管理体系,已成为当前高校治理现代化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为深入了解高校财务数字化管理的实际情况,本研究于 2025 年 3 月至 6 月对安徽省 8 所高校进行了系统调研,包括公办本科院校 5 所、民办本科院校 3 所。调研采用问卷调查与半结构化访谈相结合的方式,共回收有效问卷 109 份(其中财务人员问卷 68 份,师生问卷 41 份),访谈财务部门负责人、信息化部门负责人及校级领导共 12 人。本研究基于调研数据,系统分析 AI 赋能高校财务数字化管理的理论逻辑、现实困境,并探索可行的创新路径。

1 理论基础与核心价值

1.1 核心概念界定

人工智能(AI):包含机器学习、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机器人流程自动化(RPA)等核心技术,能够模拟人类的智能行为,实现数据的自动采集、分析与处理,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自主决策。在高校财务工作领域,其主要应用于票据识别、流程审批、风险预警、数据分析等场景。

高校财务数字化管理:指高校对传统财务流程进行重构与优化,借助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数字化技术,实现财务数据全生命周期管理以及业务流程的自动化、智能化处理。其核心特征为数据一体化、流程协同化、决策智能化、服务精准化,最终

目标是提升财务治理工作效能,推动财务从“核算型”向“价值创造型”转变。

1.2 理论基础

资源依赖论:主张组织的生存与发展主要依赖于获取外部资源,以及内部资源的有效配置^[4]。高校财务管理工作的核心目标是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在传统模式下,财务部门与业务部门之间存在资源信息不对称,使得配置低效。本调研显示,安徽省 8 所高校中财务资源配置低效问题较为突出,平均预算执行率仅为 82.3%,科研经费闲置率达 8.7%。进一步分析发现,闲置经费中有 76.2% 可归因于财务部门与科研、教学等业务部门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调研中已初步应用 AI 技术的高校,通过打破部门间信息壁垒,实现财务资源与业务需求的精准匹配,其平均预算执行率提升至 91.4%,科研经费闲置率降至 3.5%。这一数据对比印证了资源依存理论在 AI 赋能高校财务数字化管理中的适用性,即通过技术手段降低信息不对称,能够有效提升资源配置效率,减少组织对外部不确定性的依赖。

流程再造论:主张为了实现提高效率、降低成本等核心目标,应当对组织的业务流程进行根本性的重新构建^[5]。传统高校财务工作流程存在环节冗余、审批繁琐、响应滞后等问题。本研究调研数据显示,受访高校传统财务流程中非必要冗余环节占比平均达 31.7%,人工干预环节占比达 67.8%,导致报销审核平均时长为 3.2 个工作日,出错率达 4.2%,财务人员重复性工作量占比超过 60%。AI 技术通过 RPA 自动化、智能审核等技术手段,能够有效精简优化财务流程。调研中应用 AI 技术进行流程再造的高校,其财务流程中冗余环节平均减少 64.5%,人工干预环节减少 77.6%,报销审核时长平均缩短至 0.7 个工作日。这一实践效果与流程再造理论“去除冗余、提升效率”的核心观点高度契合,体现了该理论对 AI 赋能高校财务流程优化的指导价值。

数据治理理论:数据治理理论强调通过建立完善的数据标准、流程与制度,实现数据资源的有效管理与价值挖掘^[6]。在高校财务数字化管理中,数据是核心要素,AI 技术的应用需要以高质量的数据为基础。数据治理理论为构建高校财务数据标准体系、规范数据采集与处理流程、保障数据安全提供了理论指导。本研究调研显示,68.2% 的受访高校尚未建立统一的数据标准,导致其 AI 系统分析结果偏差率平均达 17.6%。而少数已建立较完善数据治理体系的高校,其 AI 系统分析结果准确率平均达到

92.3%,数据安全事故发生率降至 0.3% 以下。这一对比充分说明,数据治理理论能够为 AI 赋能高校财务数字化管理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是破解数据层面核心瓶颈的关键所在。

1.3 AI 赋能高校财务数字化管理的核心价值

在教育数字化转型深入推进的当下,人工智能与高校财务管理深度融合,打破传统财务流程繁琐、数据割裂、管控滞后的痛点,重构财务工作模式,成为高校优化资源配置、强化内控管理、提升治理水平的核心动力,其核心价值集中体现在四大方面^[7]。

一是提质增效,释放人力价值。传统高校财务充斥票据审核、凭证录入、账务处理等重复性工作,人工效率低、差错率高。AI 借助 OCR 识别、RPA 机器人技术,实现票据自动验真查重、单据智能审核、凭证自动生成,全面替代基础手工操作,大幅压缩业务办理时长,减少核算误差。同时将财务人员从机械事务中解放,聚焦预算管理、绩效分析等高质量工作,盘活人力效能。二是智能风控,筑牢合规防线。高校资金来源多元、监管难度大,传统事后核查模式难以防控潜在风险。AI 依托大数据建模搭建动态预警体系,实时监控预算执行、经费支出、报销合规等环节,对违规支出、预算超支等问题自动预警拦截,实现事前预警、事中管控。同时规范业务流程、统一数据标准,强化财经制度约束,有效防范资金风险,保障高校资金安全规范运行。三是数据赋能,支撑科学决策。传统财务存在数据孤岛,跨部门数据无法互通共享,决策缺乏数据支撑。AI 打通财务与教务、科研、资产等系统壁垒,搭建统一数据中台,整合分析收支结构、经费效益、资源配置等核心数据,精准研判资金运行规律,为预算编制、经费分配、成本管控提供量化依据,推动财务从“核算型”向“管理决策型”转型,提升资金使用效益^[8]。四是优化服务,贴近师生需求。AI 打造全天候线上智能财务服务,通过移动端自助报销、智能客服等功能,打破时空限制,实时响应师生咨询、报销、查询需求,解决传统财务“排队久、手续繁”的痛点。智能化服务既提升财务服务效率,也优化师生办事体验,助力高校完善内部治理,为教学科研工作提供财务保障。

2 现状与现实困境

2.1 发展现状

近年来,在政策驱动与技术引领的双重影响下,国内高校对财务数字化转型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断深化,AI 技术在财务领域的应用也持续拓展,主要呈现以下特征:第一,应用场景持续延伸。AI 技术

应用从智能报销逐步拓展至预算管理、资金管理、风险防控、绩效评估等领域,覆盖范围不断扩大。第二,技术融合水平提升。从单一技术应用向多技术融合发展,如将机器学习与大数据分析相结合构建决策支撑模型,技术应用深度不断增强。第三,实践案例日益丰富。一批具有可复制性与可推广性的经验举措相继涌现,如福州大学通过构建智慧财务生态,实现了财务数据的精准分析与风险预警功能,使智能报销系统全流程实现数智化^[9]。

本调研显示,安徽省 8 所高校中 6 所已启动财务数字化转型,占比 75.0%,4 所应用 AI 技术,占比 50.0%。从院校类型来看,公办本科院校财务数字化转型启动率达 80%,AI 技术应用率达 60.0%;民办本科院校数字化转型启动率为 66.70%,AI 技术应用率为 33.4%;整体呈现出“公办本科领先、民办本科滞后”的不均衡态势。

2.2 现实困境

2.2.1 缺乏顶层设计,统筹规划不足

部分高校管理层对财务数字化转型的战略意义认识不足,未能将其纳入学校整体发展规划,导致顶层设计缺乏系统性和前瞻性。本研究调研显示,4 所(50.0%)高校将 AI 赋能财务数字化管理纳入学校整体发展规划;2 所(25.0%)高校的财务数字化建设为零散推进状态,各部门各自为政,难以形成协同效应;2 所(25.0%)高校未明确财务数字化转型的归口管理部门,责任分工不清,导致建设过程中出现推诿扯皮、进展缓慢等问题^[10]。此外,由于缺乏长期规划和经验交流机制,部分高校存在短期投入、急于求成的现象,制约了转型成效。

2.2.2 数据融合困难,标准体系不健全

数据是 AI 赋能财务数字化管理的基础,但当前高校财务数据管理存在诸多问题。首先,数据孤岛现象严重。本研究调研中,7 所(87.5%)高校反映存在不同程度的数据孤岛问题,财务系统与教务、科研、资产等系统未能有效打通。其次,数据标准缺失。同一类数据的定义和采集口径在不同部门之间不一致,进而导致数据质量参差不齐。本研究调研中,5 所(62.5%)高校未建立统一数据标准;在应用 AI 技术的 4 所高校中,3 所(75%)反映数据质量影响应用效果,数据缺失率平均达 11.5%,数据错误率平均达 5.6%。

2.2.3 技术应用浅层化,核心价值未充分发挥

当前多数高校的 AI 应用仍停留在浅层阶段,未能充分发挥技术的核心价值。本研究调研显示,在已应用 AI 技术的 4 所高校中,3 所(75.0%)将 AI

应用于智能报销、票据识别等基础核算环节;仅有1所(25.0%)应用于决策支持环节;1所(25.0%)应用于绩效评价环节;2所(50.0%)高校反映智能报销系统在复杂票据识别时准确率较低,需要人工复核。整体来看 AI 应用主要集中在基础业务领域,与决策支持的深度融合不足。

2.2.4 人才队伍适配性差,复合型人才匮乏

人工智能财务数字化管理需要复合型人才,既懂财务、金融方面的专业知识,又掌握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方面的技术。本次调研的8所高校中,一是现有财务人员知识结构老化。财务人员具备 AI 相关技能的仅占23.5%,复合型人才占比仅10.3%,79.4%的财务人员表示需要提升数字化技能;二是专业技术人才缺乏。调研的8所高校中有7所高校财务数字化建设依赖外部服务商;三是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不健全。高校对财务人员的数字化培养力度不足,仅3所高校开展了系统性的数字化技能培训;同时,由于薪酬待遇、发展空间等因素制约,引进外部复合型人才也面临较大困难。

2.2.5 体制保障滞后,资金投入不足

财务数字化转型需要完善的制度保障,但当前高校相关制度建设明显滞后。主要表现在:一是配套管理制度缺失,现有财务制度与数字化转型需求不相适应。本研究调研显示,6所(75.0%)高校缺乏适配数字化转型的财务管理制度,4所(50.0%)高校数据安全保障体系不够完善。二是制度宣贯执行不到位,师生对数字化财务制度了解不足,影响制度落实效果。本研究调研中5所(62.5%)高校师生对数字化财务制度了解不深入,3所(37.5%)存在制度执行不到位的问题。三是近年来高校预算资金普遍紧张,财务部门难以划拨充足资金支持信息化建设。资金投入不足严重制约了 AI 技术引进、系统升级和人才培养,成为制约转型的关键瓶颈。

3 AI 赋能高校财务数字化管理的创新路径

3.1 重构顶层架构,强化统筹规划

制定系统性战略规划。高校应从战略高度出发,将 AI 赋能财务数字化管理纳入学校整体发展规划和数智校园建设规划,明确转型目标、阶段任务与实施步骤。财务数字化转型规划可借鉴河北省某高校经验,分阶段推进:第一阶段,完成统一数据标准、破解系统孤岛、清理数据资产等工作;第二阶段,以财务、业务系统的整合为工作重点,推进业务流程线上化、自动化;第三阶段,以数据驱动打造决策支持体系,深化智能技术应用。同时,建立跨部门协同工

作机制,成立由校领导牵头,财务、信息、科研、教学等部门共同参加的财务数字化改造工作专班,明确各部门职责分工,统筹协调推进各项工作。

明确归口管理和责任机制。确定财务部门为归口管理部门,负责统筹协调、统筹推进,实现财务数字化改造;信息部门则为系统建设、维护和安全保障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各业务部门负责整理、对接本部门的业务资料。对转型工作推进不力、推诿扯皮的部门和个人,要建立健全责任追究机制,实行责任追究。同时,建立常态化的沟通协调机制,定期召开工作推进会,及时解决转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加强校际交流与资源共享。广泛推广福建省、湖南省、安徽省等高校的先进经验,搭建高校财务数字化转型工作交流平台。鼓励高校互相开展合作,共同研发智能财务系统、共享数据资源与技术成果,降低建设成本。在政策和管理要求允许的范围内,可由教育主管部门牵头,组建高校财务数字化联盟,推动标准统一、经验共享与协同发展。

3.2 搭建数据生态,实现业财深度融合

构建统一数据中台。以数据治理理论为指导,实现数据整合与共享,需要有效载体。因此,高校财务数字化工作,需要搭建高校财务数据中台,作为数据整合与共享的核心载体。数据中台应具备数据采集、清洗、整合、分析、共享等功能,实现对财务、科研、教务、人事等多系统数据的集中管理。通过 API 接口等技术,打通系统壁垒,实现数据的实时互通。例如,西南政法大学整合了科研、收费、预算等多渠道数据,借助财务大数据平台,做到业务数据“一次录入,全程留痕,共享资料”^[11]。

建立健全数据标准体系。为建立健全数据标准体系,制定适应高校的统一财务数据标准。首先要明确数据定义、采集口径、格式要求和分类规范。其次,要规范资料收集流程,做到资料真实、准确、完整。最后,要建立数据质量考核机制,做到定期检查数据,并优化质量。例如,福建省某高校对20多个财务、业务流程进行了梳理,制定了200多条规范业务审核细则和20多套操作规范,为资料的规范性打下了基础。同时,推动数据标准在全校范围内的应用,确保各部门数据采集与处理符合标准要求。

深化数据价值挖掘。借助 AI 技术对海量数据进行深度分析,精准挖掘数据背后的价值。一方面,通过构建多维度数据分析模型,如预算执行分析、资源配置效率、科研经费效益等,为学校管理层提供科学精准的决策支撑。例如福建省某高校为实现对金融数据的精准分析与风险预警,搭建了智能预测模

型;另一方面,通过对学科建设资金投入产出数据的分析,为优化学科布局提供量化参考。同时,整合并分析业务数据与财务数据,推动数据赋能业务发展,为学校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的财务支撑。

3.3 再造业务流程,推动智能化转型

优化核心业务流程。以流程再造理论为指导,全面梳理并优化高校财务核心业务流程。通过简化冗余环节、取消不必要的审批流程,实现财务流程的精简高效。例如,安徽省某高校升级智慧财务平台,优化报销单据流转流程,推行“优先派单、限期办结”工作机制;福建省某高校汇编财务报销手册,推动“一次提交、一次办好”服务落地。同时,将内控要求数字化,把报销审批流程、资金支付权限、预算控制标准等内控规则全部嵌入财务系统,实现财务风险的实时精准防控。

拓展 AI 技术应用场景。推动 AI 技术在财务领域的应用从基础业务场景向深层次场景延伸。在预算管理方面,运用机器学习算法构建预算预测模型,结合历史数据与业务需求,实现预算的精准编制与动态调整;在资金管理方面,通过智能算法实时监控资金流向,优化资金调度,提升资金使用效率;在绩效评价方面,搭建多维度财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依托大数据算法自动完成计算分析,生成绩效评价报表;在服务咨询方面,上线智能客服机器人,提供 24 小时在线答疑服务,提高服务响应效率。例如,湖南省某高校计划搭建线上全面预算管理系统,探索构建信息化支撑下的全面内控提醒机制,为师生提供实时化的财务服务支持^[7]。

打造一体化的智能财务平台。整合现有财务体系,打造集预算管理、报销管理、资金管理、风险防控、决策支持等功能于一体的智能财务综合平台。该平台需具备良好的兼容性与扩展性,能够与其他业务系统实现无缝对接;同时聚焦用户体验,为师生提供简洁明了、操作便捷的交互界面。建立“需求收集-问题反馈-系统优化”的服务闭环机制,依据师生反馈及时迭代完善平台功能。例如,福建省某高校搭建智慧财务网上综合服务平台,整合智慧查询、网上报销、预算申报等 19 项功能;安徽省黄山学院则接入微信小程序,实现多项财务功能的移动端便捷办理。

3.4 升级风险防控体系,保障财务安全

构建全流程智能风险预警机制。以 AI 技术为支撑,构建覆盖“事前稽核-事中审计-事后监控”全流程的智能风险预警机制^[12]。事前依托大数据分析精准识别潜在风险点,提前制定风险防范与控

制预案;事中借助智能稽核系统实时审核财务业务,对违规操作自动拦截;事后深入分析财务数据、归纳风险规律、迭代优化预警模型,进一步筑牢事后监控防线。例如,湖南省某高校搭建预设 44 类业务规则与审计规则的智能报账系统,实现风险事项全程自动识别。

强化数据安全保护。通过综合运用加密技术、门禁管控、安全审计等多种技术手段,构建完备的数据安全保障体系,切实保障财务数据的安全性与隐私性。进一步明确资料查阅权限,实施严格的分级授权管理,从根源上杜绝资料外泄与滥用现象。同时,定期开展数据安全评估与应急演练,全面提升对数据安全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有条件的高校可运用区块链技术对财务资料进行加密存储,确保数据的不可篡改性,建立规范的数据使用与传输流程,完善数据安全管理体系。

完善内部审计与监督机制。借助 AI 技术构建智能审计系统,实现对财务业务的自动化审计与实时监控,提升内部审计的效率和质量。通过数据比对分析,及时发现稽核疑点,提高稽核工作的精准性。针对审计中发现的问题,督促相关责任部门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进而形成审计工作闭环管理。同时,强化对智能财务系统的监督管理,定期评估系统运行状况与功能效果,确保系统合规、稳定运行。

3.5 培育人才文化,夯实转型基础

打造复合型人才队伍。一方面,加强对现有财务人员的数字化培训,制定涵盖 AI 技术、大数据分析、智能系统操作等内容的系统化培训计划,增强财务人员技术应用能力和数字化素养。例如,福建省某高校组织财务团队开展专题培训,累计覆盖师生 500 余人次。另一方面,加大人才引进力度,招聘兼具财务专业知识与技术背景的复合型人才,进一步充实财务数字化建设的人员队伍。同时,建立健全人才激励机制,鼓励财务人员积极参与数字化改造工作,对表现突出的人员要予以表彰奖励。

培育数据驱动型组织文化。通过强化数据驱动文化的宣传与培育工作,致力于提升全校师生对财务数字化建设的认知程度与认同水平。采用专题讲座、宣传手册、操作视频等多样化形式,普及数字化财务知识与实操技能。充分发挥领导层的示范引领效能,推动数据驱动理念在全校落地扎根。有效挖掘典型案例,宣传数字化转型的显著成效,引导全校师生积极投身数据治理及应用实践。结合安徽某高校经验,通过多渠道宣传财务数字化相关政策与操作流程,有效提高了师生的知晓度与参与度。

提升师生数字素养。针对师生开展财务数字化系统使用培训,编制通俗易懂的操作指南和视频教程,助力师生快速掌握系统操作方法。建立 24 小时线上服务,针对系统使用中师生遇到的疑难问题,及时进行解答。开展下沉式服务,安排财务骨干深入二级学院及各部门,提供一对一指导与帮扶。例如,西南政法大学组织财务人员到各二级单位,上门推广智能报销系统,面对面、手把手为师生答疑解惑。

4 AI 赋能高校财务数字化管理的保障机制

4.1 技术保障:构建稳定高效的技术支撑体系

加强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服务器、存储设备、网络设施等关键硬件资源的配置力度,为智能财务系统的稳定运行提供硬件保障。有条件的高校可依托云平台部署财务数字化系统,进一步提升系统运行的稳定性与可扩展性。同时,加强与科技企业、科研院所的合作,引进先进的人工智能技术和解决方案。建立技术服务长效合作机制,保障智能财务系统的及时维护和迭代升级。高校可深化银校合作,在信息系统建设方面获取资金和技术等多维度支持;此外,与人工智能技术企业开展联合研发,打造符合高校发展需求的智能财务系统。

推进技术标准与规范建设。进一步加强系统架构、数据接口、安全防护等技术要求的规范性,制定智能财务系统建设与运行的技术标准^[13]。推动技术标准在全校范围内的统一应用,确保各系统之间的兼容性与互通性。高校可参照国家相关标准,结合本校实际情况,制定契合本校需求的财务数据接口标准、系统安全标准等。

4.2 制度保障:完善数字化转型的制度体系

完善核心管理体系。制定并完善数据治理体系、智慧财务体系运行规范、安全管理体系、绩效评估体系等核心制度体系,为财务数字化转型提供制度支撑。明确各部门在资料管理、制度执行、安全防护等方面的责任,确保各项工作有章可循、有据可依。例如,安徽省某高校修订完善 17 项财务制度,编制完成《内部控制手册》,进一步完善了财务管理制度体系,提升了财务治理能力。

优化扶持政策措施。出台资金支持、人才激励、考核评价等政策,为财务数字化转型提供政策支撑。在预算分配中优先保障财务数字化建设资金,设立专项经费,用于系统搭建、技术升级和人才培养。将数字化改造工作成效纳入相关部门及人员的考核,提高其在考核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权重。高校可将数据共享率、系统使用率、师生满意度等指标纳入考

核,以此调动各部门参与数字化改造工作的积极性。

加强制度宣传与执行。通过多种渠道强化制度宣传,确保各项制度能够得到全校师生的准确理解和严格遵守。建立制度落实督查机制,定期开展制度执行情况检查,及时发现和解决制度执行中的问题,并督促限期整改。如福建某高校编制发布了 8 类服务指南,常态化开展专题培训^[8],切实提升了财务数字化管理制度的知晓范围与执行效力。

4.3 人才保障:建立长效的人才培养与引进机制

完善人才培养体系。构建分层分类的人才培养体系,针对财务人员、技术人员、师生等不同群体,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开设与财务数字化相关的课程,联合高等院校与培训机构共同培育复合型人才;同时,建立轮岗交流机制,鼓励财务人员到信息部门、业务部门履职,全面提升综合业务能力。例如,高校可与金融、经济类院校合作开设财务智能化专属课程,组织财务人员参与行业交流活动,学习先进的实践经验^[14]。

加大引才力度。制定引才优惠政策,吸引具备财务专长和 AI 技术背景的复合型人才。通过校园招聘、社会招聘、柔性引进等途径,拓宽人才引进渠道。高校可设置专项岗位,招聘 AI 技术专家、数据分析师等专业人才,充实财务数字化转型工作团队。

建立人才激励机制。建立有效的人才激励机制,搭建良好的职业发展平台,明确晋升通道,将薪酬待遇与个人能力、工作业绩紧密关联,充分激发人员工作的积极性与创造性。高校对在数字化改造工作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人员,可给予奖金奖励或提拔任用;同时,为财务工作人员提供与职业发展相适配的数字化技能提升培训,助力能力进阶、成长成才。

5 结论

人工智能技术的迅猛发展,为高校财务数字化管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其核心价值集中体现在提质增效释放人力价值、智能风控筑牢合规防线、数据赋能支撑科学决策、优化服务贴近师生需求四个方面。当前高校财务数字化转型虽取得一定成效,但仍然面临顶层设计缺位、数据融合困难、技术应用层次浅、人才队伍适配性差、体制保障滞后、经费投入不足等现实难题。高校要从重构顶层设计、构建数据生态、再造业务流程、升级风险防控体系、培育人才文化五个维度推进创新实践,同时构建“技术-系统-人才”三位一体保障机制,确保转型工作顺利进行,充分发挥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价值。

(下转第 97 页)

输入频率与多模态语境视角下二语词汇习得的 条件与路径研究

朱悦

(安徽三联学院 文学部,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以克拉申的输入假设与投入量假设为理论视角,将影响二语词汇习得的输入条件拆解为输入频率与多模态语境两个可操作维度,考察二者对词汇习得效率的作用路径,并检验元认知策略在其中扮演的中介角色。结果显示,输入频率与多模态语境均对词汇习得效率具有正向影响,二者存在交互效应:高频输入在丰富语境下对词汇长时保持的促进效果更明显;元认知策略在上述路径中起部分中介作用。由此推断,提高词汇习得效果应优化输入结构,即兼顾频率的间隔分布与语境的模态整合,二者协同方可提升词汇习得效果。

关键词:输入条件;输入频率;元认知策略;多模态语境;词汇习得

中图分类号:H319.3;H0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6)04-0065-07

Conditions and Pathways of Second Language Vocabulary Acquis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put Frequency and Multi-modal Context

ZHU Yue

(School of Literature, Anhui Sanlian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Anhui)

Abstract: It drew on Krashen's Input Hypothesis and the Involvement Load Hypothesis as the theoretical lens, broke down the input conditions that shape second language vocabulary acquisition into two manipulable dimensions, namely input frequency and multi-modal context, and investigated how these two dimensions affect vocabulary acquisition efficiency, along with the mediating role of meta cognitive strategies in this paper. The findings showed that both input frequency and multi-modal context positively influence vocabulary acquisition efficiency, and that an interaction exists between the two. Specifically, high-frequency input in a rich context produced a stronger effect on long-term retention. Metacognitive strategies played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in this process. These results suggested that to improve vocabulary acquisition, input structure should be optimized by coordinating the spaced distribution of frequency with the multimodal integration of context, allowing the two to work together.

Key words: input conditions; input frequency; metacognitive strategies; multimodal context; vocabulary acquisition

二语词汇习得作为二语能力构建的基石,其效能的高低直接关乎学习者语言体系的丰盈度与交际能力的流畅性。在诸多影响词汇习得的变量中,语言输入作为最基础、最持续的外部刺激源,其重要性

不言而喻。克拉申提出的输入假设将可理解性输入置于语言习得引擎的核心位置,认为学习者唯有接触并内化略高于其现有水平($i+1$)的语言材料,方能实现真正的习得^[1]。这一理论为理解二语发展

收稿日期:2026-03-10

基金项目:安徽省人文社科类青年科研项目(2025AHGXSK40002);安徽三联学院人文社科重点项目(SKZD2024008);安徽三联学院质量工程项目(24zlgc098)。

作者简介:朱悦(1992—),女,安徽宿州人,讲师,博士。E-mail:312875437@qq.com

的宏观机制提供了强大解释力,然而,在“可理解”这一基本前提之下,输入本身的条件特质,其质与量的配置、呈现的语境与频率,如何系统性影响词汇知识从初步感知到深度内化、直至灵活提取的完整认知过程仍有待探索。

为此,本研究将输入假设聚焦于词汇习得领域,对“有效输入”进行精细化解构。具体而言,研究试图回答两个问题:第一,输入频率与多模态语境如何分别影响词汇知识的内化与保持?第二,二者是否存在协同效应?其内在的认知加工机制是什么?通过对这两个可精确操作属性的系统考察,本研究期望构建一个整合输入环境、认知加工与习得成效的分析框架。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理论分析

输入条件对习得效果的影响并非直接、单向的。学习者主动采用的词汇习得策略是连接外部输入与内部认知的关键中介机制^[2]。不同的输入条件会诱发不同的策略使用偏好,这些策略进而直接调控词汇信息被加工、编码与提取的深度与效率。Schmit 在论述词汇研究方法时强调,理解策略在习得过程中的作用是揭示学习机制的关键^[3]。这揭示了输入条件如何通过影响学习者认知行为来最终影响习得成效的核心环节。

为构建解释输入条件影响二语词汇习得的统一理论路径,本研究整合了三个具有互补关系的理论框架,并在解释层级上形成清晰的分工。输入假设确立宏观前提,可理解性输入是习得的起点,但未解释输入如何转化为习得;投入量假设揭示作用机制,输入通过引发认知投入(需求、搜索、评估)促进习得^[4];认知负荷理论界定加工约束,学习者的认知资源有限,输入结构需优化以降低外在负荷、增强相关负荷^[5]。三者层层递进,共同构成本研究的整合性理论框架(见图1)。

理论框架揭示了输入条件通过认知投入与负荷优化影响习得效果的基本路径,这一路径并非完全由外部输入单向决定,学习者主动采用的词汇习得策略,在其中扮演着关键的中介角色^[6]。根据 Oxford 的分类体系,词汇习得策略是一个包含认知策略与元认知策略的多层次系统^[7]。其中,认知策略直接处理词汇信息,元认知策略则居于高层调控核心,负责对学习过程进行规划、监控与评估。元认知策略并不直接处理词汇信息,而是通过调控具体认知策略的启动、执行与调整来发挥作用。因此,元认知策略在本研究中承担着核心中介变量的功能。测量元认知策略的激活水平,能够有效反映输入条件影响习得整体策略性加工的变化,从而揭示输入条件如何通过影响学习者的认知行为来最终影响习得成效的内在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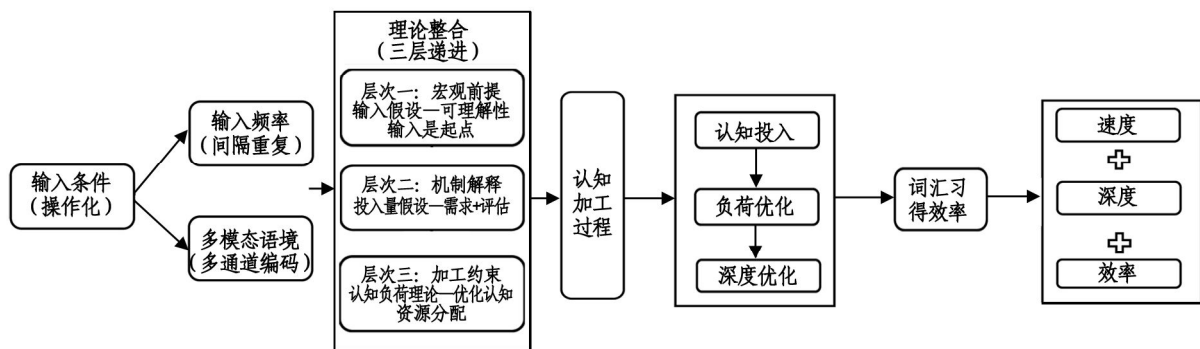


图1 研究理论框架

1.1.1 输入假设

克拉申的输入假设将“可理解性输入”置于语言习得的核心,主张学习者需接触略高于其当前水平的语言材料方能实现习得。对于词汇习得而言,这一理论意味着新词必须镶嵌于学习者可大致理解的语境之中,通过上下文线索实现意义的推断与协商。因此,输入的可理解性是词汇被摄入认知加工系统的前提。然而,输入假设主要强调了输入的整体可理解性这一必要条件,并未进一步揭示输入内

部的结构性特征:其呈现频率、模态组合,如何具体调节词汇从感知、内化到提取的微观认知过程。因此,本研究着手于在“可理解”这一宏观命题之下,对输入条件进行精细化解构,以探明其影响词汇习得的具体路径。

1.1.2 投入量假设

为补充输入假设在微观机制解释上的具体内容,本研究借鉴 Laufer & Hulstijn 的投入量假设^[8],将输入视为能够诱发并调节认知投入的外部条件。

该假设指出,词汇习得效果取决于学习任务引发的认知投入程度,具体表现为需求、搜索与评估三个维度。其中,需求维度涉及学习者对目标语言形式的注意指向与加工意愿,评估维度涉及对新信息进行辨析、整合与价值判断的深度认知操作。基于此,本研究聚焦于输入的两个可操作化属性,并将其与投入量维度进行理论关联。

研究中,输入频率对应需求维度,其理论可界定为目标词汇在时间维度上有结构、有梯度的复现模式,而非简单堆积。高频输入是依据记忆的间隔效应进行系统性复现,通过计划性的重复持续唤起和维持学习者的注意资源,防止加工自动化导致的注意衰减。这一设计强化了学习者的“需求”强度,使其在多次接触中持续投入认知资源。多模态语境对应评估维度。基于 Paivio 的双重编码理论^[9]及 Mayer 的多媒体学习认知理论^[10],研究将多模态语境界定为融合语言、图像、声音等多种符号资源,以构建信息互补、意义协同的输入环境。多模态输入能同时激活言语与非言语表征系统,为学习者进行语义辨析、信息整合与图式建构提供丰富的线索和认知支架^[11]。这一设计深化了学习者的“评估”深度,促使其对不同通道信息进行整合、比较与评价。

1.1.3 认知负荷理论

投入量假设揭示了输入通过认知投入促进习得的机制,但未说明认知资源的有限性如何制约这一过程。认知负荷理论为此提供了补充解释,同时将认知负荷分为三类,即内在负荷、外在负荷和相关负荷^[12],分别由材料复杂度、不当教学设计、促进图式建构的加工产生。有效的教学设计应在控制内在负荷的前提下,降低外在负荷,增强相关负荷。这一理论应用于输入条件研究,意味着输入的结构与呈现方式需有效分配学习者的认知资源。具体而言,输入频率的间隔分布应避免重复疲劳导致的注意衰减,即降低外在负荷;多模态语境应通过多通道整合促进语义图式建构,即增强相关负荷。认知负荷理论为本研究检验输入频率与多模态语境的独立及交互效应提供了“为何优化输入结构能提升习得效

果”的加工层面的解释。

1.2 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1:较高的输入频率对二语学习者的词汇习得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2:丰富的多模态语境对二语学习者的词汇习得效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

H3:输入频率与多模态语境对词汇习得效率存在交互效应,即在丰富语境下,高频输入的效果更优。

H4:词汇习得策略在输入条件(输入频率与多模态语境)与词汇习得效率之间起显著的中介作用。

2 研究对象

2.1 研究对象

研究一(问卷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法,选取国内某综合性大学英语专业一至三年级本科生作为研究对象,共回收有效问卷 220 份(男生 98 人,女生 122 人,平均年龄 20.3 岁, $SD = 1.2$)。所有被试母语为汉语,英语学习年限均超过 8 年,且语言能力均达到大学英语四级相当水平。

研究二(实验室实验)从同一总体中独立招募 160 名英语专业本科生作为被试(男女各 80 人,平均年龄 20.1 岁, $SD = 1.1$)。所有被试视力或矫正视力正常,无阅读障碍。通过标准化前测确保其对目标词汇无预知知识。被试被随机分配至四个实验组,构成 2(输入频率:高/低)×2(多模态语境:丰富/贫乏)的受试者间设计,每组 40 人。

2.2 变量操作化定义与实验材料

2.2.1 自变量

本研究聚焦两个自变量,其理论定义与操作化设计如表 1 所示。关键控制在于:所有实验材料总时长(5 分钟)与总文本长度保持一致;丰富与贫乏语境材料使用完全相同的一组 20 个目标词汇与核心谓语,且贫乏语境句子由丰富语境故事拆解重构而成,以隔离无关变量。

表 1 自变量理论定义与操作化设计

变量维度	理论定义	操作化水平	实验操控具体说明
输入频率	目标词汇在单位时间内的系统性复现模式	高频	目标词在 5 分钟材料中出现 6 次,按扩展间隔序列(如第 1、2、4、8、15、30 句)嵌入
		低频	目标词在相同材料中出现 2 次,仅在第 1 句与第 30 句嵌入

续表
表 1 自变量理论定义与操作化设计

变量维度	理论定义	操作化水平	实验操控具体说明
多模态语境	词汇输入所伴随的语义连贯性与多感官支持程度	丰富语境	目标词嵌入一个情节连贯的 5 分钟动画故事中, 配同步字幕、动态画面、音效及背景音乐
		贫乏语境	目标词出现在一系列从上述故事拆解出的、语义孤立的纯文本句子中, 无任何视听线索

2.2.2 因变量

词汇习得效率作为本研究的核心因变量, 采用多维度、分阶段测试进行综合评估, 旨在全面考察词汇知识在速度、深度及稳固性三个层面的发展。测量分为即时后测与延时保持测试。

即时后测于实验干预结束后立即实施, 旨在评估新词汇的初步习得效果。第一部分是接受性知识测试, 采用计算机化的词汇和释义匹配任务, 在限定时间内要求被试从四个中文释义选项中选出目标词汇的正确对应项, 程序同步记录其选择正确率与反应时, 以量化词汇识别速度与初步理解精度。第二部分是产出性知识测试, 目的是进一步考察词汇的深度理解与运用能力, 该部分由语境填空与句子生成两个子任务构成, 前者要求学习者在完整句子语境中从近义选项中选择恰当的目标词填空, 后者则要求其使用指定目标词自主造句, 所有产出答案均由两名不知实验分组的评分者依据语义准确性与句法适切性进行独立评判, 评分者间信度(组内相关系数)高于 0.90, 确保了评分的一致性。

延时保持测试于实验干预一周后进行, 旨在评估词汇知识在长时记忆中的保持强度与提取稳固性。测试使用与即时后测在题目内容、形式及难度上平行但经过题目顺序重组与干扰项替换的试卷, 再次对接受性知识与产出性知识进行测量。通过对比即时与延时两次测试的成绩, 可计算出每位被试

的词汇知识保持率, 从而客观反映不同输入条件下词汇习得效果的持久性差异。

2.2.3 中介变量

相较于具体的认知策略, 元认知策略是对认知资源的全局性分配与监控。研究仅选取元认知策略, 是因为它能更稳定、更本质地反映学习者在面对不同输入频率与多模态语境时, 如何主动规划、调配自身有限的认知负荷, 是连接外部条件与内部习得效能的核心中枢。

为测量该中介变量, 实验任务完成后立即要求被试填写一份问卷, 该问卷以语言学习策略理论为基础, 针对本实验情境进行改编, 涵盖计划(如“我尝试预测后续内容”)、监控(如“我留意了自己是否理解了新词”)和评估(如“我反思了刚才的学习方法”)三个子维度, 共 12 个题项。问卷采用李克特六级量表(1 = 完全不符合, 6 = 完全符合), 内部一致性信度(Cronbach's α)为 0.89。

2.3 研究程序

实验从《新学术英语词汇表》中筛选出 20 个低频学术名词与动词, 确保对目标学生群体而言属于新词或半新词。创作一个约 500 词, 主题为科学探险的连贯故事脚本。继而, 严格依据自变量的操作化定义, 由此脚本派生出符合“高频-丰富”“高频-贫乏”“低频-丰富”“低频-贫乏”四种实验条件的材料版本。实验流程图如图 2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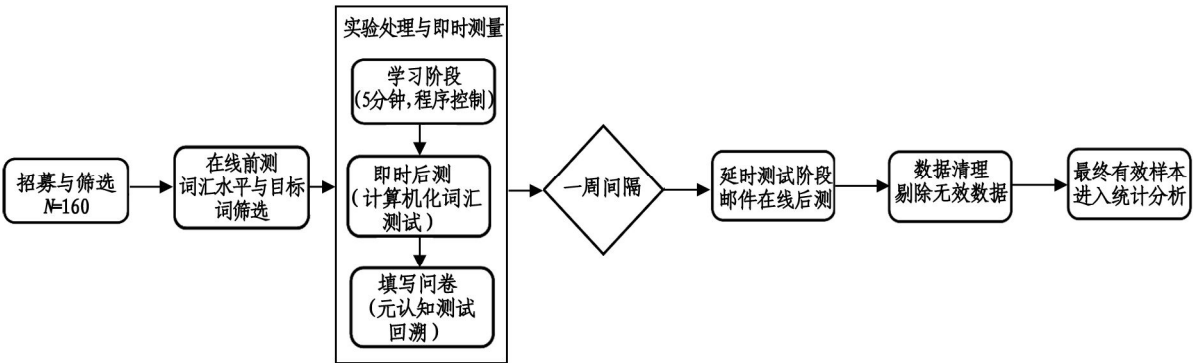


图 2 实验流程图

实验邀请 20 名符合条件但未参与正式实验的学生进行预实验,旨在检验实验材料的可理解性、时长适宜性、目标词的视觉或听觉突显度,并根据反馈对频率间隔的节奏、多模态线索的清晰度等进行微调,以确保实验操控的有效性。研究采用 SPSS 26.0 与 AMOS 24.0 软件进行数据分析。

3 实证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与信效度检验

3.1.1 样本特征

如表 2 所示,样本在年级与性别上分布较为均衡。所有量表数据的偏度与峰度绝对值都小于 2,表明数据符合正态分布,适合进行后续的参数检验。

表 2 样本人口学特征分布($N=220$)

变量	类别	人数	百分比/%
年级	大一	75	34.1
	大二	72	32.7
	大三	73	33.2
性别	男	98	44.5
	女	122	55.5

3.1.2 测量工具信效度

各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优良:输入条件总量

表 3 主要变量的均值、标准差与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	M	SD	1	2	3	4	5
1 输入频率	4.12	0.68	0.65**	1			
2 多模态语境	4.05	0.74	0.59**	0.62**	1		
3 习得策略	3.87	0.63	0.41**	0.38**	0.45**	1	
4 习得效率	78.32	9.45	0.48**	0.44**	0.52**	0.47**	1

注:**表示 $p < 0.01$;表中相关系数为皮尔逊积差相关系数。

3.3 实验数据分析结果

对控制性实验数据的多因素方差分析显示(见表 4):

在即时测试中,输入频率主效应显著($F(1, 216) = 18.37, p < 0.001, \eta^2 = 0.08$),高频率组表现优于低频率组;多模态语境主效应显著($F(1, 216) = 32.15, p < 0.001, \eta^2 = 0.13$),丰富情境组表现优于贫乏情境组。二者交互作用并不显著。

在延时保持测试中,多模态语境的主效应依然显著($F(1, 216) = 25.42, p < 0.001, \eta^2 = 0.11$),而输入频率的主效应减弱($F(1, 216) = 4.89, p =$

表 $\alpha = 0.89$,各子维度 α 在 0.78—0.85 之间;词汇习得策略总量表 $\alpha = 0.91$;词汇知识测试各部分的 Cronbach's α 在 0.76—0.84 之间。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输入条件三因子模型拟合良好($\chi^2/df = 2.31, CFI = 0.96, TLI = 0.95, RMSEA = 0.06$),各题项标准化因子载荷在 0.58 至 0.79 之间,平均方差抽取量(AVE)均大于 0.50,组合信度(CR)均大于 0.80,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与区分效度。

3.2 相关分析

为初步检验研究假设并探查各变量间关系,本研究首先对问卷调查数据($N=220$)进行了皮尔逊相关分析。如表 3 所示,输入频率与多模态语境均与词汇习得策略、词汇习得效率呈显著正相关(所有 r 值介于 0.38 至 0.62 之间, $p < 0.01$)。具体而言,输入频率与多模态语境之间的显著相关表明二者在自然学习环境中常相应出现,但相关系数未达到高度共线性水平。更重要的是,输入频率与多模态语境不仅分别与词汇习得效率显著正相关,为 H1 与 H2 提供了初步支持,且二者均与元认知策略显著正相关,同时策略与习得效率之间也存在显著关联,这共同满足了检验词汇习得策略中介作用(H4)的前提条件。

0.028, $\eta^2 = 0.02$),且二者出现显著交互作用($F(1, 216) = 6.23, p = 0.013$)。简单效应分析表明,仅在丰富情境下,高频率输入($M = 82.4$)相比低频率输入($M = 78.1$)对词汇保持有显著优势($p < 0.01$);在贫乏情境下,频率差异无显著影响,印证了“情境”在词汇长时记忆中的核心地位,并表明频率效应需以意义理解为前提。

以上结果进一步证实了多模态语境对词汇长时记忆稳固性的核心作用,并提示频率效应需在优质情境的协同下方能最大化。

表4 实验组词汇测试成绩的方差分析摘要表

测试时间	变异来源	平方和	<i>df</i>	均方	<i>F</i> 值	<i>p</i> 值	偏 η^2
即时测试	频率	245.78	1	245.78	18.37	<0.001	0.08
	情境	430.12	1	430.12	32.15	<0.001	0.13
	频率×情境	18.45	1	18.45	1.38	0.241	0.01
	误差	2888.10	216	13.37			
延时测试	频率	67.22	1	67.22	4.89	0.028	0.02
	情境	349.69	1	349.69	25.42	<0.001	0.11
	频率×情境	85.66	1	85.66	6.23	0.013	0.03
	误差	2971.44	216	13.76			

4 结果与讨论

本研究基于投入量假设理论框架,将传统上较为笼统的“语言输入”概念解构为输入频率和多模态语境两个具有明确可操作化定义的变量,通过严格的实验设计检验了二者对二语词汇习得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不仅验证了投入量假设的基本主张,还通过精细化操作揭示了输入条件内部结构的作用规律。

输入频率的深度加工机制。在输入频率维度,研究结果显示基于艾宾浩斯记忆曲线设计的间隔重复模式显著优于简单重复^[13]。从认知加工深度理论解释来说,间隔重复要求学习者在不同时间节点重新激活记忆机制,这一再激活过程涉及更深的加工水平和更强的认知努力。与机械重复相比,间隔重复避免了加工自动化导致的注意衰减,使每次接触都能维持较高的加工深度。这种效应在投入量假设框架下可理解为,合理的间隔安排增强了任务的需求维度,促使学习者投入更多认知资源进行词汇的加工和整合。

多模态语境的语义整合功能。在多模态语境中,词汇信息同时通过语言和非语言通道(视觉、听觉等)进行编码,形成了更丰富的心理表征网络^[14]。这种多通道编码不仅增强了记忆痕迹,还提供了更多的提取线索。在投入量假设框架下,多模态语境强化了评估维度,学习者需要对不同通道的信息进行整合、比较和评价,这一过程促进了更深层次的语义加工^[15]。

频率与语境的交互协同效应。当高频输入发生在丰富语境中时,产生了显著的协同增效作用,丰富语境降低了单个词汇的加工负荷,使得更多的认知资源可用于建立词汇间的语义联系;而合理的重复

间隔则确保这些语义网络得到巩固和强化。这种协同效应表明,投入量假设中的各个维度并非简单的累加关系,而是存在复杂的交互机制。这对语言教学具有重要启示,即单纯增加输入频率或改善输入质量都不足以获得最佳学习效果^[16],必须将二者有机结合,设计出既能提供充分复现机会又能保持加工深度的输入条件。

研究反思与展望。本研究对元认知策略的测量主要依赖实验后的回溯式自报告问卷,虽经信效度检验,但自陈数据难以完全避免社会期许效应与回溯偏差的影响,因而仍可能受到社会赞许效应与记忆偏差的影响。该测量更适合反映学习者对自身策略使用的主观知觉,而非全过程中的实时策略行为。同时,事后回忆也可能遗漏或简化实际发生的策略调整。未来可结合眼动、反应时、学习日志、点击轨迹、口头报告或过程性行为编码等方法,以提高中介机制检验的生态真实性和证据强度。

本研究的另一局限在于采用实验室实验,对5分钟输入时长、材料结构与目标词类型进行了严格控制,有效分离了输入频率与多模态语境的独立及交互效应。然而,这种高度控制的实验情境与真实学习环境存在明显差距,在生态效度方面存在局限。真实课堂或自然学习环境中,输入往往呈现更长的时间跨度、更多样的语料来源以及学习者自主调控的空间。此外,研究中采用的人工构建的语料,虽便于变量控制,但可能缺乏自然语料的复杂性与真实性。自然语料中的词汇频率分布、语境多样性、语义关联度等特征可能对词汇习得产生额外影响。针对上述局限,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跟踪设计,将实验周期延长至数周或数月,考察输入条件在长期学习中的累积效应。同时,引入自然语料环境,利用真实教材、影视材料或网络资源作为输入材料,在更接近真

实学习的条件下检验本研究结论。

5 结论与启示

通过精细化的实验设计,为投入量假设提供了更精确的实证支持,并揭示了输入条件内部结构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超越了传统上对“输入量”的笼统讨论,转向对输入质量的精细化分析,对二语词汇习得的启示有以下三点:

一是优化输入源,实现质与量的双重升级。教师与课程设计者应超越传统教材的局限,系统引入并整合真实性、分级化的多模态语料库,如精选的纪录片片段、新闻报道、博客文章、社交媒体内容。这不仅能提升输入的语境丰富性,还能确保学习者在不同语境中反复接触高频词汇,实现优质输入与合理频率的自然统一。建议利用技术工具建立班级或个人的可理解性输入资源库,按主题、难度和语言特征进行标注,便于学生根据自身水平进行选择性和重复性学习。

二是设计深度情境化任务,促进词汇的认知整合。词汇教学应从孤立的单词表讲解,转向基于主题的、任务驱动的项目式学习。例如,围绕“气候变化”主题,组织学生通过观看短片、阅读资料、进行角色扮演辩论等方式,在解决真实问题的过程中反复运用相关学术词汇。这种深度情境化不仅提供了丰富的多模态语境,也迫使学习者为了意义表达而主动调用和加工词汇,从而促进深度习得^[17]。

三是显性教授词汇习得策略,提升输入利用的自主性。教师必须将词汇习得策略的显性教授置于教学的核心环节,系统提升学习者对输入信息的自主加工与利用效能,这意味着,策略训练应超越零散的技巧提示,被明确、结构性地纳入教学计划与课堂活动中。应指导学生掌握利用上下文线索与构词法知识推测词义的方法,增强其在真实语流中理解新词的自主性与信心。还要积极引导成为自身词汇学习的管理者,设定具体目标、制定个人计划,并使用词汇日志等工具监控进度、利用如阅读、影音等,定期评估不同输入源的实际学习效果,从而基于反馈,优化学习路径。在巩固策略方面,应系统介绍诸如间隔重复系统、语义地图及结构化词汇笔记本等科学工具,帮助学生遵循记忆规律进行复习,建立词汇间的语义网络。

参考文献:

[1] Krashen S. The input hypothesis: issues and Implications

[M]. New York: Longman, 1985: 118-120.

- [2] Zhang Caihui, Sala G, Gobet F. Effectiveness of L1 and pictures in multimedia conditions on learning second-language vocabulary: a meta-analysis [J]. Educational Research Review, 2025, 47: 100681-100681.
- [3] Hoagland, B M, Schmitt N. Researching vocabulary: a vocabulary research manual [J]. Language Teaching Research, 2014, 18(3): 418-419.
- [4] 李雪芳. 任务投入量对附带习得词汇知识的影响[J]. 现代英语, 2024(17): 92-94.
- [5] Sweller J. Cognitive load during problem solving: effects on learning [J]. Cognitive Science, 1988, 12(2): 257-285.
- [6] Asghar A G, Hooshang Y, Amin M M. The role of metacognitive strategy training in fostering vocabulary acquisition [J]. Learning and Teaching in Higher Education: Gulf Perspectives, 2019, 16(1): 45-57.
- [7] Stojnoff S. Oxford's language learning strategies: what every teacher should know (Rebecca Oxford) [J]. Bilingual Research Journal, 1993, 17(1/2): 117-121.
- [8] Laufer B, Hulstijn J. Incidental vocabulary acquisition in a second language: the construct of task-induced involvement [J]. Applied Linguistics, 2001, 22(1): 26.
- [9] Paivio A. Mental representations: a dual coding approach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53-83.
- [10] Mayer E R.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multimedia learning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31-48.
- [11] 赵继政, 谢娅琦. 多模态视角下第二语言词汇习得频率效应研究综述[J].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23, 22(1): 67-72.
- [12] 陈妍. 认知负荷理论视域下的高中英语阅读教学策略研究[J]. 英语广场, 2025(20): 132-136.
- [13] 祁爱玲. “艾宾浩斯遗忘曲线”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实践应用探析[J]. 海外英语, 2024(3): 1-3.
- [14] Ceal F I, Lockhart R S. Levels of processing: a framework for memory research [J]. Journal of Verbal Learning and Verbal Behavior, 1972, 11(6): 671-684.
- [15] Teng Mark Feng. The roles of second-language proficiency level and working memory on vocabulary learning from word-focused exercises [J]. RELC Journal, 2024, 55(2): 296-312.
- [16] 孟俊澎. 基于认知语言学的词汇习得研究[J]. 海外英语, 2025(3): 60-62.
- [17] LI Min. Application of deep learning in English culture and situational teaching [J]. Discove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26, 6(1): 191.

责任编辑:寇国庆

翻译美学视域下《黄帝内经》核心养生话语的英译研究

徐燕, 冷冰, 刘维静, 汪媛*

(安徽医科大学 国际学院, 安徽 合肥 231200)

摘要:以翻译美学为研究视角,对《黄帝内经》核心养生话语的英译进行分析。研究表明,《黄帝内经》养生话语英译涉及医学意义、文化内涵与审美表达的综合转换,主要表现为凝练结构的重构、哲理概念的阐释、民族意象的保留和含蓄审美的转化。不同类型话语对直译、意译、增译和释译的依赖程度存在差异。核心养生话语英译应在医学意义准确、文化内涵可理解和审美效果再现之间形成平衡。

关键词:翻译美学;《黄帝内经》;核心养生话语;中医典籍翻译;文化负载词

中图分类号: H059; R2-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297X(2026)04-0072-08

Study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ore Health-Preservation Discourse in *Huangdi Neij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Aesthetics

XU Yan, LENG Bing, LIU Weijing, WANG Yu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 Hefei, 231200, Anhui)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aesthetics, it analyzed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core health discourse of *Huangdi Neijing*. The research showed that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health preservation discourse of *Huangdi Neijing* involves the comprehensive transformation of medical significance,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aesthetic expression, which is mainly manifested in the reconstruction of condensed structure, the interpretation of philosophical concepts, the preservation of national imag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implicit aesthetics. Different types of discourses have different degrees of dependence on literal translation, free translation, amplific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ore health preserving discourse should form a balance between accurate medical meaning, understandable cultural connota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aesthetic effect.

Key words: translation aesthetics; *Huangdi Neijing*; core health-preservation discourse; translation of TCM classics; culture-loaded words

随着中医典籍对外传播的不断深入,如何准确传达其中的医学思想、文化内涵与审美特征,已成为中医翻译研究的重要问题。《黄帝内经》中的养生话语语言凝练、意蕴丰富,既体现中医整体生命观,也蕴含独特的中国哲学和审美表达,因此有必要从翻译美学视角对其英译进行分析。

1 翻译美学概述

翻译美学是从美学角度研究翻译活动的理论,强调译文不仅要传达原文意义,还应再现原文的语言形式、文化意象和审美价值。对《黄帝内经》这类典籍而言,翻译对象并非是单纯的医学知识,而是融

收稿日期: 2026-04-18 * 通讯联系人

基金项目: 安徽省教育厅高等学校质量工程教育教学管理项目(2024jxg1018);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社科普及项目(2025KY004);安徽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2025AHGXSK30230)。

作者简介: 徐燕(1981—),女,安徽霍山人,讲师,硕士。E-mail: 2007500009@ahmu.edu.cn

合医学、哲学、文化与文学表达的复合文本。因此,译者既要处理术语意义,也要关注语言节奏、内在含义和思想韵味。中医翻译研究已由早期术语对译逐渐转向文化传播、读者接受和跨文化阐释等层面^[1]。文佳等从翻译美学角度研究《黄帝内经》回环辞格英译,指出其修辞形式具有独特的审美功能,英译时需兼顾意义准确与形式美感^[2]。

翻译美学视域指从语言美、意象美、哲理美和含蓄美等方面考察《黄帝内经》核心养生活语的英译效果。其重点不在于单纯判断译文是否“忠实”,而在于分析译者如何在英译中实现医学意义、文化内涵与审美表达的协调转换。与一般术语翻译研究相比,翻译美学更重视译文能否保留典籍话语的凝练感、象征性和思想张力,这也是《黄帝内经》养生活语区别于普通医学说明文本的重要方面。

2 《黄帝内经》核心养生活语概述

《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形成的重要经典,内容涵盖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气血津液、病因病机、诊疗原则和养生防病等方面。其中,养生思想集中体现了中医对生命、健康和疾病预防的整体认识。从英译研究看,《黄帝内经》已有多个英文译本,不同译本在术语选择、句式处理、文化解释和读者定位上均存在差异。Ye等梳理了《黄帝内经》的不同英译本,指出译者背景和翻译目的会影响译文的呈现方式^[3]。Yang对早期英译本的研究也表明,《黄帝内经》进入英语世界的过程伴随着术语不统一、理解差异和文化阐释不足等问题^[4]。

核心养生活语是指《黄帝内经》中集中体现养生理念和健康原则的关键表达,如阴阳平衡、顺应四时、形神统一、饮食有节、起居有常等。这些话语既有医学指导意义,也具有哲学和文化内涵,是研究《黄帝内经》英译审美转换的重要对象。

2.1 《黄帝内经》养生思想概述

《黄帝内经》的养生思想以整体生命观为基础,强调人体健康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自然环境、时间节律、精神状态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其核心目标并非单纯治病,而是通过调摄身心、顺应自然、节制生活来预防疾病、保持健康。依据中医理论发展脉络,养生与治疗在长期实践中相互关联,呈现出整体调护、身心平衡和顺应自然的特点^[5]。《黄帝内经》中的“道”是理解其养生思想的重要概念,既具有哲学意义,又关系到生命运行规律和人与自然的协调关系^[6]。

《黄帝内经》的养生观并非零散经验的堆积,而

是以“顺道”“法自然”“重平衡”为核心的系统生命观。其养生原则既落在饮食、作息、劳逸等日常实践层面,也上升为天人关系、形神关系和阴阳关系的理论表达。正因如此,这类话语在英译时往往同时承担医学说明、哲理呈现和文化传播三重功能。

2.2 核心养生活语的内涵

《黄帝内经》核心养生活语指文本中集中表达养生原则、生命规律和健康观念的典型语句或概念,其内涵主要包括医学、哲学和文化审美三个层面。从医学内涵看,相关话语多涉及阴阳、气血、脏腑、形神、饮食、起居等内容,能够直接说明人体健康维护和疾病预防的原则。从哲学内涵看,“天人相应”“阴阳平衡”“形神合一”等词语体现了中医整体观和辩证思维。从文化审美内涵看,《黄帝内经》中许多养生活语语言凝练、表达含蓄,常以象征、对举和隐喻方式呈现生命规律。

2.3 核心养生活语的类型

根据思想内涵和表达功能,《黄帝内经》核心养生活语分为阴阳平衡类、顺应四时类、形神调摄类和饮食起居类四种。Zhang等指出,《黄帝内经》中大量文化专有词是典籍英译时的重点和难点,对它们的翻译不仅涉及词义转换,也涉及文化内涵的传递^[7]。因此,对核心养生活语进行类型划分,有助于更清晰地把握典籍的文化属性和翻译重点。

2.3.1 阴阳平衡类

阴阳平衡类话语是《黄帝内经》养生思想中最基础的类型。其核心在于强调人体生命活动处于阴阳相互制约、相互依存和动态转化之中。健康状态表现为阴阳协调,而疾病往往源于阴阳失衡。因此,这类话语在英译时既要传达医学意义,又要体现中国哲学中对立统一的思维方式(见表1)。Zhou等以《阴阳应象大论》两个英译本为对象,比较了阴阳相关文化负载词的翻译,认为此类词语的英译需要兼顾术语准确性与文化解释性^[8]。沈晓华等指出,“虚实”的英译不能简单对应为 deficiency 与 excess,还应结合语境体现其病机判断和辨证含义^[9]。

2.3.2 顺应四时类

顺应四时类话语主要体现《黄帝内经》中“天人相应”的养生观。其基本思想是人体生命活动与自然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节律相互关联,养生应根据季节变化调整起居、情志和行为方式。此类话语具有鲜明的时间意识和自然意象,是《黄帝内经》养生活语中最具中国传统生态思维的部分(见表2)。潘海鸥等从跨文化传播角度研究《黄帝内经》运气学说文化负载词的英译,指出运气相关概念具

有复杂的天文、气候和医学内涵,英译时应重视其文化解释^[10]。刘跃良等对颜色词“苍”的英译研究也说明,《黄帝内经》中的颜色词常与季节、五行、方位等文化系统相关,不能只作普通颜色词处理^[11]。

表 1 阴阳平衡类养生话语及英译

原文	关键词	英译
阴平阳秘,精神乃治	阴、阳、精神	When yin is calm and yang is secured, the spirit remains harmonized.
阴阳者,天地之道也	阴阳、道	Yin and yang constitute the way of heaven and earth.
阳化气,阴成形	气、形	Yang transforms into qi, while yin takes form.
阳生阴长,阳杀阴藏	生长、收藏	Yang gives rise to growth, while yin supports storage and preservation.
邪气盛则实,精气夺则虚	虚、实	Excess is formed when pathogenic qi prevails; deficiency appears when essential qi is depleted.

表 2 顺应四时类养生话语及英译

原文	季节/意象	英译
春三月,此谓发陈	春/生发	The three months of spring are called renewal through unfolding.
天地俱生,万物以荣	春/荣发	Heaven and earth are both enlivened, and all things flourish.
夏三月,此谓蕃秀	夏/繁盛	The three months of summer are called luxuriant flourishing.
秋三月,此谓容平	秋/收敛	The three months of autumn are called containment and balance.
冬三月,此谓闭藏	冬/闭藏	The three months of winter are called closure and storage.

2.3.3 形神调摄类

形神调摄类话语强调身体与精神的统一调养,是《黄帝内经》养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典籍中,“形”涉及形体、脏腑、经络和生命物质基础,“神”则涉及精神、意识、情志和生命主宰功能。这类话语传达的信息是,养生不仅是身体保养,还包括精神情志的调摄(见表 3)。钱振雄等研究《黄帝内

经·素问》中“神”的英译,指出“神”在不同语境中可指 spirit、mind、vitality 等,英译时必须根据具体语义确定译法^[12]。袁恺文等对术语“筋”的英译研究也可用于补充“形”的层面,“筋”既涉及解剖意义,又与运动功能、肝系统和生命活动相关,所以不能简单等同于 tendon^[13]。

表 3 形神调摄类养生话语及英译

原文	关键词	英译
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	形、神	When the body and spirit are both preserved, one may live out the natural span of life.
恬憺虚无,真气从之	情志、真气	With serenity and freedom from excessive desires, genuine qi flows smoothly.
志闲而少欲,心安而不惧	心志、欲望	When the will is at ease and desires are few, the mind remains peaceful and fearless.
精神内守,病安从来	精神、内守	When spirit and essence are guarded within, how can disease arise?
肝主筋	筋	The liver governs the sinews.

2.3.4 饮食起居类

饮食起居类话语主要指《黄帝内经》中有关饮食节制、作息规律、劳逸适度和生活方式调养的表达。这类话语最接近日常生活,也是《黄帝内经》养生思想中实践性最强的部分。其核心并不在于提出复杂治疗方法,而是强调通过规律生活维护人体正气,避免因饮食不节、起居失常、劳倦过度而损伤身

体(见表 4)。Wei 等关于“湿”话语的研究表明,中医健康表达常借助生活化隐喻来说明身体状态,如“湿气”常与饮食习惯、环境条件和身体感受联系在一起^[14]。Guenier 等关于中医隐喻与跨文化健康传播的研究也指出,隐喻能够帮助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理解中医健康观念^[15]。

表 4 饮食起居类养生活语及英译

原文	类型	英译
饮食有节	饮食	Be moderate in eating and drinking.
起居有常	作息	Keep regular daily routines.
不妄作劳	劳逸	Do not overstrain oneself recklessly.
食饮有节,起居有常	综合调摄	Eat and drink with moderation, and live with regularity.
美其食,任其服	生活态度	Take delight in simple food and feel at ease with ordinary clothing.

3 翻译美学视域下《黄帝内经》核心养生活语的英译特点分析

从翻译美学视角看,《黄帝内经》核心养生活语的英译并不是单纯的术语转换,而是语言形式、思想内涵、文化意象和审美表达的综合再现。其文本既具有医学知识属性,又具有典籍语言的凝练性和哲理性。因此,译者在英译时需要同时考虑“准确传意”和“审美传达”。中医术语英译标准化研究表明,中医翻译长期面临术语不统一、文化内涵难以完整传递等问题^[16]。同时,《黄帝内经》的英译还受到译者身份、翻译理念和目标读者的影响^[17]。

3.1 语言形式的简洁性

《黄帝内经》核心养生活语在语言形式上具有明显的简洁性。许多表达采用短句、四字格、对偶句或省略句等形式,字数不多,却能概括复杂的医学思

想和养生原则。周莉等对《黄帝内经》叠词特征及英译进行研究,指出叠词不仅具有语义功能,也具有节奏和形式美感^[18]。黄礼勤等关于“缓急”的英译研究也表明,《黄帝内经》中许多词语具有高度概括性,英译时往往需要根据上下文进行适当展开^[19]。

简洁性在英译中常面临“保留形式”与“补足意义”双重要求。由于汉语典籍话语常以少量词语承载较丰富的医学知识和养生原则,若完全依照字面形式翻译,译文容易出现生硬、晦涩或逻辑关系不清的问题;若过度解释,又可能削弱原文的凝练感和节奏美。因此,译者需要在目标语自然表达与原文形式美感之间取得平衡,通过短句化、动词化和适度补充隐含语义等方式,使译文既便于英语读者理解,又尽量保留原文简约、整齐和含蓄的语言风格。语言形式简洁性的英译表现,如表 5 所示。

表 5 语言形式简洁性的英译表现

原文类型	例句	英译处理	审美转换重点
四字结构	法于阴阳	follow the laws of yin and yang	以简洁动词结构呈现顺应规律之意
对举表达	早卧晚起, 必待日光	go to bed early and rise, early waiting for daylight	以两个相应分句保留作息要求的对照节奏
凝练短句	呼吸精气, 独立守神	breathe in essential qi and preserve the spirit within	以连续动词结构呈现调息与守神的内在联系
省略表达	(养生方法) 和于术数	harmonize with established methods of health cultivation	补出原句省略的行为对象,使语义关系明确

注:小括号中的词语为省略内容。

3.2 思想内涵的哲理性

《黄帝内经》核心养生活语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以简洁语言承载深厚哲理。其养生思想并不局限于具体保健方法,而是建立在阴阳平衡、天人相应、形神统一、虚实转化等观念之上。这些观念既是中医理论术语,也是中国传统哲学思维在医学文本中的体现。苏琳等以“经”为例研究《黄帝内经》一词多义英译,指出同一术语在不同语境中可能具有不同

含义,英译时不能机械套用固定译法^[20]。谷峰从认知术语学角度研究“厥”族词英译,强调应区分术语之“名”与医学之“实”,即不能只看表层词形,还要理解其背后的医学含义^[21]。

哲理性概念的英译关键在于避免把中医概念简单压缩为单一西方医学术语或普通哲学词汇。由于《黄帝内经》中的许多表达都兼具医学、哲学和文化三重属性,译者若只追求字面对应,容易造成概念范

围缩小;若完全采用解释性译法,又可能削弱原文的术语稳定性和文化标识。因此,哲理性话语的英译应在术语固定性与语境阐释性之间建立连接:一方面保持核心概念的基本译法相对稳定,另一方面结

合具体语境说明其所体现的生命观、身体观和辩证思维。这样才能使译文既保留中医概念的含义范围,又避免目标语读者将其误读为普通经验性描述。哲理性概念英译处理,如表 6 所示。

表 6 哲理性概念英译处理

核心概念	基本译法	语境化说明
阴阳	yin and yang	强调对立统一和动态平衡
虚实	deficiency and excess	结合病机判断解释
形神	body and spirit	避免简单套用身心二分
天人相应	correspondence between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突出人与自然节律的关联

3.3 文化意象的民族性

《黄帝内经》核心养生话语具有鲜明民族性的文化意象。文中大量使用“气”“神”“精”“五脏”“四时”“阴阳”等词语,这些词语不仅是医学术语,还承载着中国传统宇宙观、身体观和生命观。因此,英译时若只追求表层意义对应,容易造成对文化意象的弱化甚至误读。Shao 等研究《黄帝内经》文化专有项的翻译与传播策略,指出中医典籍翻译需要在语言、文化和传播三个维度之间取得平衡^[22]。徐丹娜等以《黄帝内经·素问》脉象英译为例,指出典籍脉象术语具有明显的中医认知框架,英译时应结合中医理论背景解释^[23]。

文化意象的民族性并不意味着所有词语都必须采用音译,也不意味着完全转换为英语普通词汇即可。对文化负载较强的养生话语而言,译者需要根据读者类型、文本功能和术语出现频率选择不同方式处理:首次出现时可适当补充概念背景,以建立读者理解入口;在连续论述中则应保持译名相对稳定,以维持术语系统性。若译文过度归化,容易削弱中医概念的文化身份;若过度异化,又可能增加阅读障碍。因此,文化意象词的英译应在“保留文化标识”与“保证理解效果”之间取得平衡,使译文既能传递中医特有的身体观和生命观,又能适应英语读者的接受习惯。文化意象词英译处理,如表 7 所示。

表 7 文化意象词英译处理

文化意象词	英译	处理原则
气	qi/vital qi	首次出现可音译加释义
神	spirit/mind/vitality	依据语境区分精神、意识和生命活力
精	essence	必要时说明为生命物质基础
五脏	five zang organs	避免直接等同现代解剖器官
四时	four seasons	补足时令养生和自然节律含义

3.4 审美表达的含蓄性

《黄帝内经》核心养生话语的审美表达具有明显的含蓄性。其常借助隐喻、摹状、回环、对举等方式表达医学思想,使抽象的生命规律具有形象性和审美意味。例如,四时养生话语常以自然景象说明人体调养原则;形神调摄话语则常以简练句式表达内在修养要求。程颜等对《黄帝内经》“摹状”修辞格英译进行研究,指出这类修辞通过描摹状态、形貌和变化增强表达效果,英译时应注意其形象性和审美功能^[24]。姚秋慧等从概念整合理论角度研究《黄帝内经·素问》隐喻英译,认为隐喻表达不仅具有修辞效果,还反映中医概念的建构方式^[25]。

含蓄性表达的英译不能只追求直白说明,否则容易削弱原文的审美层次。《黄帝内经》中含蓄表达常以短句呈现复杂的生命关系,其意义并不完全停留在文字层面,而是通过自然景象、身体状态、情志变化和行为劝诫等方式间接传达养生思想。英译时,译者既要揭示其中隐含的医学逻辑,又要尽量保留原文的委婉语气、形象性和节奏感。因此,含蓄性话语的翻译应在意义明晰与审美保留之间取得平衡,使译文既能传达养生原则,又能呈现典籍含而不露的语言风格。含蓄性表达及英译转换,如表 8 所示。

表 8 含蓄性表达及英译转换

表达类型	原文	英译	转换重点
隐喻	春三月,此谓发陈	the three months of spring are called the season of renewal,when the old gives way to the new	保留“发陈”由陈旧转向新生的隐喻意义
摹状	若伏若匿	as if concealed and stored within	保留潜藏收敛的状态描写
回环	寒极生热,热极生寒	extreme cold generates heat,while extreme heat generates cold	保留“寒-热、热-寒”的词语倒置结构,呈现寒热相互转化、循环往复的关系
对举	清阳出上窍,浊阴出下窍	clear yang emerges through the upper orifices, whereas turbid yin passes through the lower orifices	保留“清阳-浊阴”“上窍-下窍”的对应关系,通过相反概念并列突出阴阳升降和清浊分化

4 翻译美学视域下《黄帝内经》核心养生活语的英译策略

在翻译美学视域下,《黄帝内经》核心养生活语的英译应兼顾医学准确性、文化传达性和审美再现性。由于《黄帝内经》语言凝练、意象丰富,译者不能采用单一方法处理所有内容,而应根据词语性质、文化负载程度和目标读者接受能力选择不同策略。王尔亮对汉学家文树德《黄帝内经·灵枢》英译的研究表明,文树德在中医典籍英译中重视术语解释、文本注释和文化阐发,其译法体现出较强的学术性和阐释性^[26]。因此,核心养生活语英译可主要采用直译法、意译法、增译法和释译法。这四种策略并非

彼此割裂,而是可以根据具体语境灵活配合使用。对于同一类话语,译者也可先通过直译保留文化标识,再通过增译或注释补充医学含义,从而避免译文在“过度异化”和“过度归化”之间摇摆。

4.1 直译法

直译法是指在不影响目标语理解的前提下,尽量保留原文词语形式、意义关系和文化特征。对《黄帝内经》中已经具有较高国际认知度,或具有鲜明中医文化标识的术语,直译能够较好地保留原文的民族性和典籍色彩。蔡娟等关于病名术语“癫”的英译研究指出,中医病名术语英译应遵循简明性和忠实性原则,避免过度解释造成概念偏移^[27]。直译法应用,如表 9 所示。

表 9 直译法应用

原文	英译	适用理由
表里	exterior and interior	含义及对应关系相对清晰,便于直接对应
寒热	cold and heat	含义及对应关系清晰,便于直接对应
营卫	ying and wei	具有鲜明中医文化标识,适合保留术语身份
三焦	sanjiao/triple energizer	属于中医特有功能系统,宜保留其特有含义

4.2 意译法

意译法是指不拘泥于原文表层形式,而根据语境传达其核心意义。对《黄帝内经》中哲理性较强、字面意义较抽象或难以被英语读者直接理解的养生活语,意译法更能保证译文的可读性和接受度。倪润丰等从变译理论角度研究《黄帝内经》肾系病名英译,说明病名英译需要根据语义、语境和接受效果进行灵活转换^[28]。

意译并不意味着放弃原文文化特征,而是在译入语语境中重构其功能意义。《黄帝内经》中部分

养生活语具有高度概括性和哲理性,若完全按照字面顺序翻译,容易导致译文生硬、语义模糊或文化误读。因此,意译法强调在准确理解原文语境的基础上,将其隐含的养生原则、情志调摄意义和生活态度转化为英语中自然、清楚的表达。译者需要避免机械性的逐词对应,而应根据英语读者的理解习惯重组句式和语义,使译文既符合英语表达规范,又能保留原文所体现的修养观念和审美意味。意译法应用,如表 10 所示。

表 10 意译法应用

原文	直译可能问题	意译
去世离俗	易误解为“离开世界、脱离习俗”	withdraw from worldly distractions
积精全神	字面抽象,语义不够清楚	preserve essence and maintain mental integrity
嗜欲不能劳其目	逐词翻译生硬	excessive desires do not disturb the eyes
淫邪不能惑其心	字面意义不清	harmful temptations do not confuse the mind

4.3 增译法

增译法是指在译文中适当补充原文隐含的信息,以帮助目标语读者理解中医概念、文化背景和审美意蕴。苏琳等关于《黄帝内经》隐喻类疾病名英译的研究指出,隐喻类术语英译存在文化信息缺失和意义转化不足等问题,应结合术语内涵采取相应对策^[29]。在《黄帝内经》养生话语中,许多表达省略了行为主体、条件关系、医学机制或文化背景,汉语读者可凭借传统语境加以理解,但英语读者往往难以准确把握其深层含义。因此,译者可在不改变原文基本意义的前提下,适当补出时间条件、因果逻辑、理论对象或行为目的,使译文更加清晰连贯。增译法应用,如表 11 所示。

辑、理论对象或行为目的,使译文更加清晰连贯。增译法应用,如表 11 所示。

4.4 释译法

释译法是指通过解释性翻译说明原文概念的深层含义,适合处理文化负载词、隐喻词、术语性表达和难以直接对应的典籍话语。与增译法相比,释译法更强调对概念本身的解释,常用于译文正文、脚注、括注或术语说明中。翟书娟等关于《黄帝内经》科普读物英译实践的研究表明,面向普通读者的《黄帝内经》英译需要增强可理解性和传播效果^[30]。释译法应用,如表 12 所示。

表 11 增译法应用

原文	英译	增译内容
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	The sage does not merely treat diseases after they have developed, but prevents them before they arise.	after they have developed; prevents
正气存内,邪不可干	When healthy qi is preserved within the body, pathogenic factors cannot invade it.	when; within the body; pathogenic factors
藏德不止	virtue is stored and cultivated without interruption	cultivated; without interruption
春夏养阳,秋冬养阴	nourish yang in spring and summer, and nourish yin in autumn and winter according to seasonal changes	according to seasonal changes

表 12 释译法应用

原文	释译
精	jing, the essential substance that supports growth, reproduction and life activities
志	zhi, the will or mental orientation associated with emotional regulation in TCM
藏象	zangxiang, the theory of visceral manifestations and functional systems in TCM
腠理	couli, the interstitial spaces and surface structures through which qi and fluids move in TCM

5 结论

《黄帝内经》核心养生话语集中体现了阴阳平衡、顺应四时、形神统一和饮食起居有节等养生观念。研究表明,此类话语具有语言凝练、哲理深厚、意象鲜明和表达含蓄等特点,英译时不能仅停留在术语对应层面,而应兼顾医学意义、文化内涵和审美

表达。不同类型话语的翻译重点有所差异,应根据语义密度、文化负载程度和读者接受能力,灵活运用直译、意译、增译和释译等方法。译者应在准确表达医学意义的基础上,通过术语规范、语境补充和修辞转换,提高译文的可理解性与审美表现力,从而促进中医典籍的对外传播。

参考文献:

- [1] Wang Fang, Chen Jixiang. Translation studies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 China: achievements and prospects [J]. Sage Open, 2023, 13(4): 1-15.
- [2] 文佳, 牛海燕, 姚欣. 翻译美学视域下《黄帝内经》回环辞格英译研究[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18, 24(11): 1628-1630, 1645.
- [3] Ye Xiao, Dong Minhua. A review on different English versions of an ancient classic of Chinese medicine: Huangdi Neijing[J]. Journal of Integrative Medicine, 2017, 15(1): 11-18.
- [4] Yang Yu. On two early English versions of Huangdi Neijing [J]. Journal of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2023, 55(1): 46-52.
- [5] Pradhan S K, Todeschini G, Schürer Q, et al. A chronological overview of common Chinese medicine treatment methods[J]. Asian Journal of Medical Humanities, 2025, 4(1): 1-18.
- [6] 刘郁恒, 李晶. 交往伦理学视角下《黄帝内经·素问》中“道”的英译[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24, 44(9): 1130-1134.
- [7] Zhang Xuan, Shi Yunzhong.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ulture-specific lexicon commonly seen in Huangdi Neijing [J]. Chinese Journal of Integrated Traditional and Western Medicine, 2008, 28(10): 941-944.
- [8] Zhou Zhiwei, Li Yanqing, Li Haiying. A comparative research of two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the chapter “comprehensive discourse on phenomena corresponding to Yin and Yang” in Huangdi’s Internal Classic[J]. Chinese Medicine and Culture, 2022, 5(1): 52-57.
- [9] 沈晓华, 刘昕. 论中医典籍中“虚实”的英译——以《黄帝内经》译文为例[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21, 27(6): 999-1003.
- [10] 潘海鸥, 王琳琳, 邹玮晨, 等. 跨文化传播视角下《黄帝内经》运气学说文化负载词英译策略研究[J]. 中华中医药学刊, 2025, 43(9): 99-104.
- [11] 刘跃良, 龚长华. 《黄帝内经》中颜色词“苍”的英译探讨[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22, 42(3): 366-369.
- [12] 钱振雄, 周恩. 《黄帝内经·素问》中“神”的英译研究[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21, 41(8): 1004-1009.
- [13] 袁恺文, 陈博, 林勋. 《黄帝内经》所载术语“筋”的英译探究[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23, 29(2): 301-305.
- [14] Wei Shuang, Chen Mei, Zhao Jialing. “Dampness enters the body as oil pours into the flour”: exploring discursive construction of eliminating dampness in Chinese social media[J]. Journal of World Languages, 2025, 11(2): 388-407.
- [15] Guenier A W, Wang Binhua, Li Min, et al. How metaphors facilitate intercultural health communication: insights from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octors in UK clinics [J]. Journal of World Languages, 2025, 11(2): 319-342.
- [16] Ye Xiao, Zhang Hongxia. A history of standardization i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erminology [J]. Journal of Integrative Medicine, 2017, 15(5): 344-350.
- [17] Jiang Chenxue, Wang Yinquan. From TCM practice to classic texts: the case of Henry C. Lu’s a complete translation of the Yellow Emperor’s Classics of Internal Medicine and the Difficult Classic (Nei-Jing and Nan-Jing) [J]. Chinese Medicine and Culture, 2022, 5(3): 143-147.
- [18] 周莉, 刘娅, 崔家平. 《黄帝内经》叠词基本特征及英译研究[J]. 时珍国医国药, 2021, 32(8): 1958-1960.
- [19] 黄礼勤, 张瀚麟, 林郁桐, 等. 《黄帝内经·素问》中“缓急”的英译研究[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23, 43(6): 746-751.
- [20] 苏琳, 周恩. 《黄帝内经》一词多义英译策略——以“经”为例[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22, 42(1): 112-116.
- [21] 谷峰. 认知术语学视角下《黄帝内经》“厥”族词英译的“名”与“实”[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24, 44(6): 741-746.
- [22] Shao Mi, Chen Huilin. Translation and communication strategies of culture-specific items in the Yellow Emperor’s Inner Canon [J]. Journal of Humanities, Arts and Social Science, 2025, 9(5): 977-986.
- [23] 徐丹娜, 姚欣. 框架理论视域下典籍脉象的英译策略——以《黄帝内经·素问》为例[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21, 41(8): 1000-1003.
- [24] 程颜, 吴文华, 王培松. 《黄帝内经》“摹状”修辞格英译研究[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22, 28(6): 975-978.
- [25] 姚秋慧, 陈战. 概念整合理论视阈下《黄帝内经·素问》隐喻英译对比研究[J]. 时珍国医国药, 2021, 32(8): 1955-1957.
- [26] 王尔亮. 汉学家文树德及其《黄帝内经·灵枢》英译探析[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23, 38(8): 3863-3866.
- [27] 蔡娟, 任荣政. 《黄帝内经》中病名术语“癰”的英译探析[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21, 27(11): 1806-1809, 1820.
- [28] 倪润丰, 贺娜娜. 变译理论视角下《黄帝内经》肾系病名英译研究[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23, 29(5): 819-822.
- [29] 苏琳, 周恩. 《黄帝内经》隐喻类疾病名英译的现状与对策[J]. 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 2023, 29(9): 1535-1539.
- [30] 翟书娟, 吴青. 《黄帝内经》科普读物英译实践与研究[J]. 中国中西医结合杂志, 2025, 45(1): 105-109.

责任编辑: 张晓娜

新工科视域下高质量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研究

韦文联,李大胜*,孙兰萍,盛 蒂,赵建军,鲁 琦

(蚌埠学院 教务处,安徽 蚌埠 233030)

摘 要:基于新工科建设的基本内涵和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要特征,结合二者的价值耦合分析,就地方高校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深化课程体系建设、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强化实践教学体系、打造“双能”师资队伍、改革教育教学方式、健全质量保障体系等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建设问题,提出了一些具有针对性、操作性和实效性的对策。

关键词:人才培养体系;应用型人才;新工科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6)04-0080-06

Construction of a High-Quality Applied Talent Cultivation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WEI Wenlian, LI Dasheng*, SUN Lanping, SHENG Di, ZHAO Jianjun, LU Qi

(Academic Affairs Office, Bengbu University, Bengbu, 233030, Anhui)

Abstract: Based on the core connotations of 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and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applied talent cultivation, as well as an analysis of their value convergence, it put forward targeted, operable and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local universities from seven aspects: optimizing the structure of disciplines and majors, improving the curriculum system, innovating talent cultivation models, strengthening the practical teaching system, building a dual-qualified faculty, reforming teaching methods, and perfecting the quality assurance system.

Key words: talent cultivation system; applied talents; 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要努力建设一支爱党报国、敬业奉献、具有突出技术创新能力、善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工程师队伍^[1]。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培养造就更多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等各类人才”^[2]的要求。这对地方高校以“新工科”理念培养高质量应用型人才,提出了新的时代使命。地方高校应当切合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迫切需要,主动适应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为特征的新经济时代要求,紧跟科技发展新趋势,努力培养实践能力强、创新能力强和具备国际竞

争力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为教育强国和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重要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作用。

1 新工科建设的基本内涵

从国际科技竞争来看,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加速推进,欧美及日本等制造强国通过工程教育创新抢占科技制高点,面对此形势,我国需加快工程教育改革以提升国际竞争力;从国内经济转型需求看,产业转型升级和旧动能转换迫在眉睫,急需具备跨学科知识、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型工程人才,甚至能够引领未来科技发展的工程人才;然而,从传

收稿日期:2025-12-17 * 通讯联系人

基金项目:安徽省重大教学研究项目(2023jyxm0826);安徽省“四新”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2023sx125);安徽省“101计划”项目(2023ylyjh056)。

作者简介:韦文联(1965—),男,安徽合肥人,教授,硕士;李大胜(1978—),男,安徽固镇人,教授,硕士。E-mail:bbxyjdx@126.com

统工科存在的弊端看,传统工科教育难以满足新经济、新产业对人才的多元化、高层次需求,迫切需要对工程教育进行理念更新和模式创新。在此背景下,新工科应运而生,它是基于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新理念、服务国家战略发展新需求以及顺应国际竞争新形势、迎接国际高等工程教育新挑战和满足立德树人新要求而提出的工程教育改革发展战略。

1.1 新工科建设的内涵

“新工科”的“新”集中体现在教育部《关于开展新工科研究与实践的通知》提出的工程教育改革的新理念、新结构、新模式、新质量、新体系。

新理念。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强调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全球视野、人文精神、创新能力和职业道德的卓越工程人才。注重工程教育与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结合,通过通识教育与专业课程的有机融合,塑造适应未来社会需求的复合型人才。

新结构。构建以专业结构和课程结构为核心的工科新体系。一是以互联网和工业智能为核心,优化本科专业设置,新增数据科学、AI、物联网等相关工科专业;二是将云计算、AI、智能制造、机器人等用于传统工科专业的升级改造;三是推动现有工科以及工科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应用理科向工科延伸,形成新兴交叉学科专业。

新模式。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驱动,探索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创新模式。通过项目化学习、企业实习等方式,提升学生的工程实践和创新创业能力,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

新质量。建立国际实质等效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制度,制定新兴工科专业教学质量标准。通过多维度的质量评价体系,确保培养出符合产业需求的高素质工程人才。

新体系。构建分类发展的工程教育体系,根据高校办学特色和区域产业需求,形成差异化培养路径。同时,完善资源配置机制,推动工程教育资源向优势高校和特色专业集中。

1.2 新工科建设的鲜明特点

“新工科”突破了传统工科的属性与范畴,强调学科的交叉融合,以新兴技术对传统工科专业进行改造,注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跨学科思维能力,具有鲜明的特点。一是融合性:打破学科壁垒,推动工科与理学、医学、人文社科及AI等领域的深度融合;二是智能性:将AI、大数据等技术深度融入教学,培养技术感知与适应能力;三是前瞻性:面向科技前沿,主动适应经济与技术快速迭代;四是实践性:紧密对接产业需求,解决实际工程问题;五

是创新性:鼓励学生在学习和实践中勇于探索、敢于突破,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六是适应性:根据产业发展和科技进步,及时调整人才培养目标、更新课程体系。

1.3 新工科建设的实践成果

2017年以来,教育部积极推进新工科建设,先后形成了“复旦共识”“天大行动”和“北京指南”等新工科建设的“三部曲”^[3]。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界全力探索,先后实施了两轮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新工科建设取得了丰硕的实践成果,也开拓了工程教育改革的新路径。国务院印发的《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进一步明确,要全面深化工程教育改革,推动新工科建设高质量发展。

新工科建设克服了传统工科教育存在学科专业相对单一、与产业需求脱节以及学生创新能力和跨学科素养培养不足等弊端^[4],按照新工科建设“更加注重产业需求导向,更加注重跨界交叉融合,更加注重支撑服务”^[5]的核心要求,紧紧围绕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培养具有家国情怀、全球化视野、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时代新人的根本任务,聚焦“新的工科专业、工科的新要求”^[6],以实施“卓越工程师计划2.0”为抓手,按照体现“工科特色、专业特点、行业特性、岗位特征和学生特长”的思路,在优化新工科专业结构、推动学科交叉融合、深化课程体系建设、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推动产教深度融合以及构建适应新技术、新产业、新经济发展的工程教育体系和培养引领未来技术与产业发展的卓越工程人才等方面,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工科建设模式,创造了新工科建设的中国经验,引领着世界新工科建设的发展。

2 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要特征

培养应用型人才是适应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人才需求的客观需要,是解决高等教育同质化带来的人才结构性问题和提高毕业生就业率的必然选择,是加强地方本科院校内涵建设和推动地方本科院校特色发展的内在要求,是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的迫切需求,是实现教育强国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任务。教育部颁发《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后,地方高校应用型转型迅速呈现出星火燎原之势。经过十多年的努力,地方本科院校在办学类型、办学思路和人才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培养模式以及学科专业建设、课程体系建设、实践教学建设和应用科学研究等方面顺利实现了转型。

2.1 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

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为:紧紧围绕地方经济社会需求,培养面向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第一线的应用型人才^[7]。此目标内涵集中体现在“六性”鲜明特征上:一是立足地方性,坚持本土化战略,紧密对接地方经济社会需求培养人才,以便“好就业”;二是突出应用性,以应用技术能力培养为核心,培养学生运用理论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便“用得上”;三是强化实践性,加强学生实践动手能力训练,以便“上手快”;四是强调技术性,聚焦职业素养、行业标准、岗位要求,培养学生生产、管理实务操作技术和 AI 等数智技术,以便“干得好”;五是体现特色性,人才培养方案体现办学特色、专业特点和行业特性、岗位特征,以便“有特长”;六是注重创新性,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方法以及集成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能力,以便“后劲足”^[7]。

2.2 应用型人才培养规格

应用型人才培养规格由其培养目标与质量标准决定^[7],相对于学术型人才,其学术性和理论性要求低些,而实践性和技术性要求高些;相对于技能型人才,其理论性和技术性要求高些,但实践技能要求低些。也就是说,应用型本科人才应该具备宽厚的知识基础、坚实的专业功底、较强的实践能力和较高的职业素养,且具有一定的创新精神,能够从事社会生产(管理)一线的技术(专业)工作。培养规格的基本要素——知识、能力和素质有着鲜明特点:知识结构方面,突出表现为“实用、够用、复合”,应用性知识是其核心要素;能力结构方面,突出表现为“应用、技术、创新”,应用技术能力是其核心要素;素质结构方面,突出表现为“综合、敬业、实干”,综合职业素养是其核心要素。

2.3 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特点

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应当遵循“融知识、能力和素质为一体,融教学、科研和生产为一体,融专业、行业和就业为一体,融教育、技术和职业于一体,融人文精神、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为一体”的原则,体现“产学研相结合、教学做一体化”的核心要求。深化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应当体现“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工学交替、协同育人”的思路。

3 新工科建设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价值耦合

新工科建设的本质特征集中地体现为融合性、智能性、前瞻性、实践性、创新性和适应性。应用型

人才培养的本质特征集中地体现为地方性、应用性、实践性、技术性、特色性和创新性。两者有着天然的相互融合、共生耦合的关系,发挥着并联叠加、双向赋能的作用。

教育理念的同源性。一是成果导向教育理念(Outcome Based Education, OBE),其核心内涵是“学生中心、成果导向、持续改进”;二是工程教育理念(Conceive Design Implement Operate CDIO),强调通过产品全生命周期的主动学习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包括工程基础知识、个人能力、人际团队能力、工程系统能力^[8];三是能力本位教育理论(Competency Based Education, CBE),主张教育应以培养学生的能力为核心,强调知识的运用和实践技能的培养;四是建构主义理论,强调学习的社会性和实践性,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这些教育理念为新工科建设和应用型人才培养提供了顶层设计逻辑。

培养目标的一致性。新工科建设以服务国家战略和产业升级为导向,强调培养具备跨学科能力、创新意识和实践技能的适应未来社会需求的复合型卓越工程人才;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核心是培养具备扎实理论基础、较强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复合型人才,以满足社会和产业需求。两者培养目标的一致性主要体现在教育目标与产业需求的深度对接、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的协同提升以及综合素质与职业发展的有机统一。

培养规格的契合性。“新工科”培养的人才,要具有扎实的工程知识、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尤其是创新能力,同时具备全面的综合素质,还要具有全球视野、工程素养;应用型人才应该具备宽厚的知识基础、坚实的专业功底、较强的实践能力和较高的职业素养,且具备创新创业精神^[7],注重综合素质与职业发展的融合。可见,两者的培养规格具有高度的契合性。

培养路径的协同性。新工科建设强调学科交叉、理实结合、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强调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工学交替、学做一体。两者人才培养模式的共同特征是,注重教育与产业、行业、企业等资源要素集聚、优势叠加以及加强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生产实践、高新技术的紧密结合,走产业链、创新链、教育链、人才链的深度融合之路。

4 新工科视域下高质量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建设路径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加速推进以及发

展新质生产力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呼唤,迫切要求新工科建设与应用型人才培养同频共振、相得益彰。为此,新工科视域下的地方应用型高校的时代使命是立德树人,办学理念是实现“四化”:即科学技术化、技术科学化、人才科技化、科技产业化,实施路径是学科交叉、专业升级、课程更新以及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人才培养体系创新,办学目标是培养适应当前产业发展和引领未来产业变革需要的应用能力强、创新能力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为此,新工科视域下高质量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应当在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深化课程体系建设、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强化实践教学体系、打造“双能”师资队伍、革新教育教学方式、健全质量保障体系等方面下功夫。

4.1 优化学科专业结构

强化学科专业调整的需求导向。加强对地区及行业发展趋势的跟踪研判,围绕地方新兴产业和区域产业发展需求,主动把握人才需求侧的变化走向,定期公布紧缺学科专业名单和就业去向落实率低的学科专业名单,建立基于人才需求预测预警的学科专业调整机制,为优化学科专业结构提供依据。

增设服务新兴产业的学科专业。满足国家战略发展需求和地区产业升级对人才的需求,加快布局支撑关键核心技术突破的学科专业。优先设置新兴产业发展、重大民生急需、填补地区空白点的学科专业,大力发展与战略性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相关的学科专业。面向新技术、新产业、新经济等开展微专业建设。积极推动现有工科交叉复合、工科与其他学科交叉融合、应用理科向工科延伸,形成新兴交叉学科专业^[9]。

加大现有专业存量的调整力度。建立“招生—培养—就业”联动机制,通过建立专业定期评估制度、毕业生跟踪调查制度、专业“预警清单”制度等,健全专业退出机制。对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需求的部分专业适时进行“关、停、并、转”,对需求不旺、水平不高、竞争力不强的学科专业实行限招、隔年招生等措施。

加强传统学科专业的改造升级。推动现有传统学科专业的数字化改造,加大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适应性调整,如融合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AI 新技术,推进传统工科专业改造,实现传统学科专业新发展,提高传统专业的竞争力。发挥传统学科专业师资力量强、办学经验丰富、教学资源充裕等优势,与领军企业、科研院所、产业联盟等合作共建一批新型学科专业。

4.2 深化课程体系建设

重构课程体系。按照体现“学科交叉、能力本位、素质复合和应用特色”要求,重构由通识教育、学科基础、专业必修、专业选修以及实践教学等课程构成的多元化课程体系,做到更加注重前沿知识和学科交叉知识体系建设,更加注重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课程体系建设,更加注重创新实践课程体系建设。通识教育要融科学教育、人文教育于一体,注重创新精神与职业素养的培养;学科基础要注意学科知识体系的系统性、逻辑性及其对专业核心课程的支撑度,并起到拓宽专业口径的作用;专业必修要面向行业企业需求设置课程,核心课程要体现专业特色,注意与行业标准的匹配度^[7];专业选修要注重前沿知识、新兴技术的掌握运用以及满足学生个性发展和创新创业能力需求;实践教学课程设置要注重职业性、应用性、技术性和创新性。

优化课程结构。坚持“产业导向、能力本位、应用特色、个性发展”的原则,有机整合课程,合理确定比重,科学安排进程。全面优化传统课程结构,增设实践课,压缩理论课;增设选修课,压缩必修课;增设应用类课程,压缩通识类课程;增设前沿选修课程,淘汰陈旧知识课程;增设计性、综合性实验项目,压缩演示性、验证性实验项目;同时,增设职业能力训练和产教融合实习实训课程以及创新创业教育课程^[7]。

更新教学内容。组织编写体现新工科建设特点、应用型人才培养特征以及产教融合特色的教材,将行业标准融入课程标准、职业要求融入课程体系、岗位能力融入课程实践,还要积极构建纸质教材与数字教材相结合的立体化教材建设体系。切实推进信息技术与教材的深度融合,将学科前沿知识、最新的理论研究动态、实践发展成果、行业最新技术以及相关新知识、新技术、新经验及时融入课堂教学内容。鼓励教师将具有高阶性、创新性和挑战度的内容充实到教学过程中。引导教师在教学环节有机融入课程思政元素,系统充实职业素养培育内容。

4.3 强化实践教学环节

深化实践教学体系改革。按照与培养目标相适应、与理论教学相辅成、与岗位要求相匹配、与创新创业相结合的思路,将课程实验与认知实习和生产实习、课程设计与毕业设计、实习实训与创新创业实践以及社会实践等有机结合起来,进行优化配置,构建起全过程、渐进式、开放性的“平台+模块”^[7]的实践教学体系。一是公共基础实践平台,内设综合素质和公共基础实践训练两个模块,训练学生工具

性能力、学习能力、社交能力和综合素质等;二是专业基础实践平台,内设职业素养和专业基础实践训练两个模块,训练学生专业认知能力、职业素养和专业基本技能;三是专业技术实践平台,内设专业技术实践和创新创业实践训练两个模块,训练学生专业技术、运用新技术和创新创业等综合应用能力。

加强实践教学平台建设。有效整合校内实践教学资源,依托校内各基础、专业实验室,各学科研究中心、实习实训基地等,建立起数量充足、设施完备、技术先进、效果仿真的校内实践教学场所。加强校内嵌入式企业实践基地建设,积极拓展校企合作实践教学基地和产学研合作平台。同时,以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以校企合作、产教融合为路径,利用校外优质实践教学资源,建设一批面向产业急需的现代产业学院和面向未来发展趋势的未来技术学院等实习实训平台。

活用多元实践教学载体。在充分发挥实验、实训、实习和生产实践、毕业论文(设计)以及创新创业实践平台、产学研合作育人平台等传统实践教学载体作用外,要不断创新和丰富多元化实践训练载体,如建设 AI 体验馆、开设 STEAM 教育活动课程、虚拟仿真实验平台、开放重点实验室和协同创新中心,组织参加“挑战杯”、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学科竞赛、技能竞赛、KAB 俱乐部,开展社会机构技能培训考证,创立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实施“第二课堂成绩单”制度,推行暑期互派学生开展实践教学小学期制,以及各类校园文化活动和校外社会实践活动等多元化实践教学活动。

4.4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优化人才培养方案。认真落实 OBE 先进教育理念、CBE 能力本位教育理论和 CDIO 工程教育模式,按照体现“五育并举、以德为先、能力为重、全面发展、需求导向、产学结合、强化特色”的原则,修订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要体现对人才培养目标和人才培养规格的达成度。知识结构要体现学科交叉融合和基础宽厚,能力结构要突出应用技术和新兴技术应用,素质结构要强调复合型和职业化。公共基础课与学科基础课、专业基础课与专业课、必修课与选修课、理论课与实践课等,要有机衔接递进、合理确定比重、科学安排进程。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要有机结合,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要贯穿渗透教育教学全过程。

建立协同育人机制。高校应主动对接地方优势主导产业、新兴产业,建立深化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长效机制,与企业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

案,实行“专业共建、课程共担、教材共编、师资共享、基地共用、人才共育”的产教融合模式,促进专业链与区域产业链、课程内容与行业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行业生产过程的有效对接。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创新创业教育基地和面向新兴产业领域的产业学院等,真正实现专业链、产业链、创新链、教育链和人才链的深度融合。

完善学生评价体系。积极构建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的综合评价体系,并落实到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办法中。一是改进结果评价,相对于知识,更加注重能力,并强调与过程评价相结合;二是强化过程评价,相对于结果,更加注重动态监测学习过程中的思想行为表现,并强调与增值评价相结合;三是探索增值评价,更加关注发展进步的净增值,强调成长和成就的可持续性;四是健全综合评价,要克服重知识轻能力、重理论轻实践、重第一课堂轻第二课堂、重结果轻过程以及重智、轻德轻体轻美轻劳的倾向,要求用系统的观点全面评价学生的成长成才。此外,要借助现代信息技术赋能学生评价,提高学生评价的全面性、客观性和精准度。

4.5 打造“双师双能”师资

做好师资队伍规划。围绕教育教学、专业技能、AI、科技创新、应用研究和社会服务等方面能力建设,特别是强化工程实践能力,全面打造兼具教师与工程师职业资格、融合理论教学与产业实践能力的“双师双能型”高水平专兼职教师。应用型专业的“双师双能型”教师比例不低于 60%;专兼职教师中,取得非教师系列的专业技术任职资格证书、执业资格证书、技能等级证书等人数应超过“双师双能型”教师的 85%^[7];实习实训指导要按照 60:1 师生比配备专兼职教师。

加大引进培养力度。一是引进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创新能力强的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二是鼓励教师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和培训活动,开展基于云计算、AI、物联网、虚拟仿真、教育大数据等新兴技术的教学应用研究,提高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三是有计划地选送教师到企业挂职工作和接受实践锻炼,引导教师与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帮助他们提高专业技能、实践教学和应用研究能力。

推行兼职教师制度。柔性引进行业企业资深专家、专业技术骨干、管理人才和高技能人才作为实践教学兼职教师,担任实习实训和创新创业指导工作。逐步扩大“校内导师+企业导师”的“双导师”指导学生毕业设计的比例,实现校企协同培养应用型人才。行业企业兼职教师一般应占 25% 以上。

4.6 改进教育教学方法

深化课程思政改革。大力推动思政教育与专业教育的深度融合,引导专业教师深入挖掘专业课程中蕴含的理想信念、国际视野、家国情怀、职业素养、法治意识、创新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思政内容以及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人民、爱集体等思政元素,并贯穿教材编写与选用、教学内容设计、教学资源建设、课堂教学、实验实习实训、作业布置以及第二课堂等各环节,努力提高课程育人的效果。

采用信息化教学手段。通过开展运用信息技术教学技能专项培训、专项比赛等活动,提升教师运用信息技术的能力,推进信息技术与教学的深度融合;围绕混合式学习、翻转课堂等,探究信息技术下新工科专业的课堂教学模式改革;推广以3D网络环境、AI等信息技术为支撑的讨论式、参与式、探究式教学方式;倡导教师运用微课、MOOC(慕课),借助学习通、雨课堂、云班课等进行课堂教学,探索“AI+”“互联网+”教学模式,研究新兴技术促进工程教育实践教学的方法。

促进教学相长。充分发挥教师主导作用与学生主体作用,注重在启发学生工程思维、设计思维、数字化思维和批判性思维以及培养创新精神、提升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上下功夫。践行OBE先进教育理念、CBE能力本位教育理论和CDIO工程教育模式,教学过程要切实体现理实结合、产教融合,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方法以及集成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新和创新创业能力。

4.7 完善质量保障体系

健全教育质量保障体系。立足国际工程教育改革前沿,研究制定新工科专业质量标准和卓越工程师培养标准,作为专业设置、专业评估的基本遵循。构建新工科专业人才培养各主要教学环节质量标准体系,完善逐级递进的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管理闭环系统,夯实教学质量保障与监控体系,构建“自觉、自省、自律、自查、自纠”大学质量文化,形成“标准实施—数据监测—专项评价—信息反馈—持续改进”的良性循环。

完善工科专业认证制度。稳步扩大专业认证规模,覆盖工科类专业,并将通过专业认证作为“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版)”验收的必要条件。建立认证结果发布与使用制度,并纳入本科教学质量报告等评估体系中。支持行业部门参与相关专业人才培养的质量标准制定、毕业生质量评价等工作。

健全教育质量监控体系。实施教学评价、教学评估、教学督导、数据监测等多元化监控措施。构建

学生、教师、行业、用人单位等利益相关方参与的社会评价机制,定期对“人才培养目标的达成度、社会需求的适应度、师资和条件的保障度、质量保障运行的有效度、学生和用人单位的满意度”进行评价,并与新工科应用型人才培养形成联动机制,推动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持续提升。

5 结论

新工科建设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价值耦合是高质量人才供给的核心逻辑。研究提出的人才培养体系建设路径,切合新工科内涵要求与应用型人才培养规律,为地方应用型高校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体系提供理论参考。然而,人才培养供给侧改革需适应产业需求侧变化而持续深化,高校应当主动服务和引领社会经济发展、科技进步和国家战略需求,不断优化“以我为主”的全链条人才培养机制。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N]. 光明日报, 2021-09-29(1).
- [2] 本书编写组, 编著.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M]. 北京: 党建读物出版社, 学习出版社, 2025: 21.
- [3] 张逸群, 骆慧婷, 辜方清. 新工科背景下新兴交叉学科的知识模块化教学设计系统路径探析[J]. 中国现代教育装备, 2023(19): 84-86.
- [4] 黄承宁, 李娟, 朱玉全, 等. 新工科背景下计算机类专业“六维”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J]. 牡丹江大学学报, 2025, 34(6): 102-108.
- [5] 教育部办公厅. 关于公布首批“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的通知(教高厅函[2018]17号)[EB/OL]. [2018-03-21].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1803/t20180329_331767.html.
- [6] 教育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国工程院. 关于加快建设发展新工科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教高[2018]3号)[EB/OL]. [2018-10-08].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moe_742/s3860/201810/t20181017_351890.html.
- [7] 韦文联. 能力本位教育视域下的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研究[J]. 江苏高教, 2017(2): 44-48.
- [8] 杨宗仁. “新工科”建设的理念内涵及模式综述[J]. 兰州交通大学学报, 2019, 38(6): 132-136.
- [9] 史耀广, 刘斌. 新工科背景下地方高校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人才培养改革探索[J]. 中国现代教育装备, 2023(19): 87-89.

责任编辑: 李云

治理转型视域下高校辅导员沟通边界的建构逻辑

王 敬

(安徽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数字创意学院,安徽 合肥 230011)

摘 要:考察了角色维度边界、情感交互边界以及关系网络边界的形成机理。通过对制度规范执行场域、突发事件处置情境及共识达成协商过程三个典型工作场境的深入剖析,清晰呈现辅导员的沟通实践在追求权力运行与平等对话之间的平衡,工作方法在规则刚性与包容弹性之间保持必要张力,育人策略在权威塑造与信任培育之间实现有机统一。围绕专业素养强化、制度供给优化路径以及共同体精神培育机制三个维度展开论述,提出一系列提升辅导员边界治理效能的可行性建议。这些研究发现对完善高校学生工作理论体系与实践模式具有双重启示价值。

关键词:高校辅导员;角色张力;边界治理;育人策略;学生工作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6)04-0086-05

On the Logic of Constructing the Communication Boundaries of College Counselors un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ance

WANG Jing

(School of Digital Creativity, Anhui Vocational College of Urban Management, Hefei, 230011, Anhui)

Abstract: It focused o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role dimension boundary, emotional interaction boundary and relationship network boundaries in this paper. Through the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three typical working fields of the implementation field of system norms, the situation of handling emergencies, and the negotiation process of consensus reaching, it clearly showed that the communication practice of counselors lies in pursuing the balance between power operation and equal dialogue, the working method lies in maintaining the necessary tension between the rigidity of the rules and the flexibility of tolerance, and the education strategy lies in realizing the organic unity between the shaping of authority and the cultivation of trust. Focusing on the three dimensions of strengthening professional quality, optimizing the path of system supply, and cultivating the community spirit, a series of feasible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ounselors' border governance were proposed. These research findings have dual enlightenment value for improving the theoretical system and practical model of college student work.

Key words: college counselors; role tension; boundary governance; education strategy; student administration

在我国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不断深化的当下,承担着双重使命的高校辅导员群体日益受到学界关注。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骨干力量和日常管理事务的直接责任者,高校辅导员工作面临着新的时代挑战。值得关注的是,“00”后已经成为当前大

学生群体的主体。他们个性鲜明、自主意识强烈、价值取向多元。在数字化浪潮席卷之下,新媒体技术已经深度融入大学生的学习与生活过程,这一客观事实使得辅导员的传统沟通方式遭遇前所未有的适应性挑战^[1]。

制度化管理所具有的刚性特征,要求辅导员在

职业操守上必须坚守原则和底线。但与之相对的是,大学生群体对人文关怀的渴求与日俱增,期待被理解、被共情的心理诉求愈发强烈。在实践中,一些辅导员的沟通方式逐渐显露出行政化倾向,简单机械的工作方法屡屡导致师生关系疏离;另一些则陷入过度迁就的误区,边界意识的严重缺失最终造成教育效能弱化,这些现象必须引起重视。

当前学界对该议题的研究呈多元态势:有学者基于角色理论,探讨辅导员多重身份的冲突与调适;有学者从沟通技能出发,论证共情与倾听的实践价值;亦有学者从关系伦理学视角,阐释师生互动的理论依据。现有研究虽具价值,但多沿用“刚柔并济”的二元对立分析框架,侧重静态平衡探讨,对动态融合机理剖析不足。面对个体化时代学生疏离感增强、边界意识薄弱、易产生过度依赖等现实问题,传统研究思路已难以适配现实需求。

本研究主张将辅导员沟通实践重新概念化为边界建构的动态过程,核心聚焦三个关键问题:辅导员实务工作中需确立的关键边界类型为何?这些边界在不同工作情境中的动态调整机制如何?辅导员边界实践能力的培育路径怎样设计?对上述问题的系统回应将为辅导员专业发展提供全新理论视角与实践指引。

1 分析框架构建:基于管理沟通的三重边界性理论

在社会科学视域中,边界被定义为“区分不同社会类别或群体的概念性分界线”。聚焦于高校辅导员工作场域时可见,边界的本质特征绝非表现为静态隔离屏障,而是呈现出动态调节功能的弹性区间。沟通边界对于辅导员群体而言具有双重保护:一方面构建专业实践保护机制,有效规避角色超载与情感资源枯竭风险;另一方面发挥学生社会化引导效用,促进其对社会互动规范尺度的认知内化。具体到实践层面需要强调的是,辅导员群体的沟通行为应当着力构建三重基础性边界框架。

1.1 角色定位维度的边界划分:专业身份的情境适配机制

角色边界是边界体系的核心基础。身负教育实施者、管理执行者与服务供给者三重身份叠加的辅导员群体,其不同身份维度对应的沟通范式具有显著差异化特征:当以教育者身份开展工作时,沟通行为必须强化思想深度与导向作用;处于管理者角色定位时则要求遵循规范标准与权威效力的沟通准则;而作为服务者角色发挥作用则体现在回应效率

与人际亲和力并重的沟通特质。

教育者、管理者、服务者三个维度,共同构成辅导员沟通工作的基础性身份体系,各维度功能既有差异又保持整体协调。教育工作者维度的核心任务在于价值观塑造与思想启发活动,其沟通模式呈现出显著的引导特质化倾向。通过专题教育活动、个别谈心以及典型示范案例展示等途径,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行政管理者维度的核心职能集中于秩序维持与规范执行层面,其沟通范式表现出明显的制度规约特性。规章制度的落实以及违规行为处理流程的严格执行,对于保障校园常规秩序具有基础性作用。考勤管理事务处理过程中,规则条款的具体要求与违纪行为的相应后果必须予以明确说明。服务者维度的工作重心放置于需求满足与发展支持领域,其沟通机制展现出突出的回应及时特征。立足学生实际需求进行诉求倾听、解决具体困难与供给发展资源是该维度的基本工作要求^[2]。当学生面临就业压力等困境时,辅导员既要耐心接纳他们的焦虑情绪,又要有针对性地提供就业信息,从简历修改到面试指导给予多方面指导,这就要求沟通要具备亲和力、同理心与实用性。

角色转换的操作要点集中体现在情境识别的准确性与角色调整的灵活性。辅导员需要根据场景的性质、问题类型及学生特点,灵活调整主导角色:在处理评审、违纪等规范事务时,辅导员应当优先以管理者身份考虑问题,以确保程序公正性与过程透明性;在应对心理危机等支持需求时,辅导员应当以服务者角色为主,将传递关怀支持作为沟通的基调;而在开展主题教育等引领活动的时候,则要明确凸显教育者职能,以强化价值导向功能的有效发挥。在实际工作中出现的沟通失效案例通常源于角色定位的紊乱,典型表现为违纪事件处理过程中过分强调“理解包容”而导致制度刚性遭到削弱;在谈心交流环节过度使用行政指令式表达方式引发学生产生抵触情绪;服务支持过程中忽视价值引导作用造成教育功能缺失的实践情形出现^[3]。

1.2 情感限度设定:专业关怀的理性把握

在边界体系中最复杂且关键的部分当属情感限度设定。辅导员工作说到底就是个良心活,这份工作需要真诚的情感投入,但是过度的投入情感也不可取。在现实生活中,有部分辅导员由于接收学生的负面情绪而产生替代性创伤反应或因共情过度导致判断力下降,最终引发职业倦怠,甚至出现离职的极端个案。

健康情感边界的构建,本质上反映为“具备主体意识的关切行为”而非“无节制的情感卷入”。辅导员群体应当做到:首先要区分自身情感体验与学生情绪状态,将学生心理问题转化为个人压力的情况;其次理解学生感受的同时维持客观分析能力,理性思考不应被共情反应所取代;最后是同事间的支持性互动及专业督导机制的运用,这些情感调节途径对于工作压力的疏解具有显著效果。实例可见于失恋学生的辅导场景中。耐心倾听痛苦情绪并予以接纳固然重要,但辅导员必须坚持“个体自我成长才是困境突破的根本途径”这一原则底线。心理咨询服务的转介、社会支持网络的强化等专业化干预手段值得采用,过度介入学生成长进程的做法不可取。

1.3 互动边界的维度考察:交往规则与空间分界

作为角色边界与情感边界的外在投射形式,交往边界具体呈现于物理空间、时间范畴及媒介应用等多元层面。正式谈话场合如办公室环境中的交流模式,与宿舍走访情境下的沟通氛围存在明显不同;工作时间与非工作时段之间的联络预期应当明确化,“全天候在线”这种非理性期待必须防止;微信工作群组的公共信息传递功能与私人聊天性质需要严格区分,日常交流与官方发布的不同属性也应被准确识别。

在师生互动关系的健康化构建过程中,清晰边界的确立亟需规范化准则予以支撑。工作群组内的信息交流应当严格遵守职业化表达范式,口语化倾向及随意性表述必须彻底杜绝。合理设定回应时限尤为重要,如非紧急类事务可允许 24 小时响应周期,以确保辅导员私人休息时段不受侵扰。这些看似琐碎的操作规范,实则构成辅导员职业形象维护与工作效能提升的关键保障要素。

2 实践场域解析:三类典型情境中边界维度的动态调适

边界实践绝非静态规章制度的简单套用过程,而是基于具体情境展开的适应性调整行为。选取辅导员工作中最具代表性的三种情境类型为例证,清晰呈现三重边界的协同作用机制。

2.1 制度实施情境:刚性结构框架内的弹性表达

在辅导员日常事务中制度执行工作展现最强刚性特征,评优评奖活动的组织、违纪行为的处理、日常考勤管理等均属此列。此类情境下首要条件在于规则边界的明确性与坚定性——程序环节任何模糊地带或疏漏现象皆可能损害制度公平性,管理权威

亦随之面临挑战。优质的制度实践案例表明“一刀切”式强硬执行绝非理想模式。相反,在保持刚性框架前提下融入人文关怀要素,“刚柔并济”的管理成效方为可行路径。

在具体实践操作层面,可归纳总结出三个维度的实施路径。首先是程序规范性与解释灵活性的有机结合。执行制度规定时,应当严格遵守流程标准化的要求,确保各环节操作透明公开、记录完整可查。通过开展个别深度访谈活动、组织专题政策解读会议等形式,耐心细致地向学生阐释制度设计的初衷所在与价值取向^[4]。其次在于决策坚定性与态度温和性的协调统一。作出纪律处分等不利决定时,必须严格遵循事实依据与规章制度要求,保持立场明确态度特征。但在决定传达过程中应当充分融入人文关怀要素。最后执行严格性与后续跟进性的有效衔接机制。对学生做出处分,不是教育的终点,恰恰应该是起点。关键是要建立一条长期的关注线,看到他们好的变化就肯定,把一次严肃的处理,变成一次成长的契机,这才是真正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2.2 危机干预情境分析:柔性支持框架下的刚性原则坚守

面对学生心理危机干预及突发事件,处置这类特殊情境情感支持要素固然是工作的出发点,但同时必须坚守专业底线要求与安全保障原则。既不能因态度冷淡错过最佳干预时机,也不应因界限模糊陷入权责不清的困境状态。有效的边界管理实践可从三个层面展开:

第一层面体现在情感支持与专业界限的并行实施策略。先通过无条件接纳和耐心倾听为学生构建安全的情感依托空间,与此同时需要清晰界定专业助人的范围边界,如哪些问题需转介心理咨询中心、哪些情况必须启动危机预案流程,这些都应该做到心中有数。第二层面表现为共情表达与风险评估的协同运作,充分理解学生当下痛苦感受的同时避免任何评判性回应。比如在面对具有自伤倾向的学生时,既要表达真诚关切之意也要明确告知保密原则,坚定地帮他们对接专业的帮助资源^[5-6]。第三层面涉及短期介入与长期边界管理的平衡调节,危机处置阶段可适当放宽常规工作边界限制,增加沟通频次和介入深度。但当学生状态趋于稳定后,就需要逐步将支持责任移交至专业机构或社会支持网络,恢复常规工作,避免让学生产生过度依赖。

2.3 日常交往情境探讨:柔性互动过程中的隐性规范存在

在日常教育场域中,师生关系的紧密化构建往往依托于班级活动、课外交流时段以及线上平台互动等基础性场景。这些场景是师生信任关系建立的载体,同时也是动态把握学生状况的有效途径。

实践层面的操作方略可归纳为三个关键维度:首先是亲近感与敬畏感的平衡调控问题。参与学生主导的主题活动、分享个人成长经历片段、运用幽默化语言表达等手段确实有助于缩短师生间的心理距离。然而必须强调的是,师者尊严的保持和价值引导的自觉性不容忽视。其次是倾听功能与引领作用的有机统一问题。辅导员应当鼓励学生充分表达差异化观点,并对各种声音采取包容态度,但在涉及价值导向等原则性问题时则必须展现出明确立场和坚定态度。最后是线上与线下互动的边界厘定问题^[7]。通过新媒体平台如微信、微博等进行内容点赞或优质资源分享确实能增强“在场感知度”,然而必须严格区分公私领域:工作群组内杜绝发布私人生活相关内容,个人社交账号避免介入学生间的纠纷事件。“两微一频”平台的互动规范需要明确建立,以此维护辅导员的专业化形象和职业伦理准则。

3 路径探索:辅导员边界实践能力培育路径

辅导员边界实践能力的培育,是一项涉及个体成长、制度保障与文化形塑的复合型系统工程。基于前文对边界类型与情境调适逻辑的剖析,结合当前高校学生工作的现实诉求,从个体能力进阶、制度支撑体系、文化生态建构三个维度,提出辅导员边界实践能力的系统培育路径。

3.1 个体维度:从边界自觉到实践智慧的能力进阶

辅导员边界实践能力的养成,表现为个体从认知觉醒到行动自觉的渐进式提升过程,其核心在于实现从被动遵循到主动建构的能力跃迁。

边界自觉之强化亟待实现。对辅导员群体而言,角色理论体系与沟通伦理知识的学习应系统化开展,不同场景中边界要求的认知需明确化建立。在日常工作中自我反思的实践不可或缺:何种情境下易出现边界过紧抑或过松之现象?与学生互动过程是否契合角色定位之要求?实例可见,在面对学生深夜非紧急咨询的处理中,辅导员对工作时间的说明既要体现坚定性又要保持温和态度,如此方能避免边界失守现象发生。

边界实践能力的核心,体现在四项关键技能的协同提升。一是边界表达能力,在态度温和与立场坚定之间把握平衡,以委婉但清晰的方式传递边界

要求,避免因态度生硬造成师生隔阂,或因表述模糊导致边界失守。二是情境研判能力,能够快速识别不同场景下的边界特点,合理把握调整尺度,如制度执行中严守规范、危机干预时适度突破、日常交往中保持弹性。三是情感调控能力,在情感投入与专业距离之间保持动态平衡,既不因过度疏离影响师生信任,也不因情感过深造成角色混淆。四是媒介管理能力,针对即时通讯工具带来的边界模糊问题,建立线上沟通规范,明确使用场景与回复时限,让技术工具服务于育人工作,而非侵蚀工作边界。

3.2 制度维度:从权责厘清到机制创新的系统保障

权责边界之明晰化要求迫切。“事事皆管却事事难精”的角色超载问题表明权责不清的危害性。学校层面应当制定详细的辅导员工作职责说明文件,核心职责与转介范围的界定必须清晰明确。

在构建分级响应机制方面,突破边界保障安全,再逐步复位,形成“分类施策、动态调整”的响应体系——这一机制贴合前文三类典型情境的边界调适逻辑,让边界实践更具针对性。

在完善培训督导体系建设方面,需将边界管理内容纳入辅导员岗前培训与继续教育核心模块,摒弃传统的“理论灌输”模式,采用角色模拟、案例研讨等实操性强的培训方式,模拟前文所述的制度实施、危机干预、日常交往三类典型情境,让辅导员在实践模拟中提升边界调适能力。同时,建立常态化督导机制,定期开展边界实践专项指导,及时纠正边界失守或边界僵化问题。

3.3 文化维度:从氛围营造到价值引领的生态建构

边界实践能力的培育,最终需要植根于健康的组织文化和校园生态,形成具备支持性、包容性的育人环境。

高校应当通过校园宣传、入学教育、师德建设等多种渠道,系统传递健康的师生关系理念,引导学生形成对辅导员专业边界的正确认知。要让学生理解辅导员的“合理拒绝”不是冷漠推诿,而是对专业职责的坚守;工作时间的边界不是服务意识的缺失,而是保证工作可持续性的必要前提。通过持续的文化浸润,逐步消解“全能保姆式”的不合理期待,培育相互尊重、边界清晰的师生交往生态。

学校管理层应强化组织支持,赋予辅导员拒绝不合理诉求的权利。保障其工作生活的平衡,并且建立相应的同伴支持系统,助力辅导员互助成长。

优秀实践案例的示范作用不可忽视。从边界实践成效显著者中,发掘典型辅导员个体化样本,其工作方法具有可复制性特征,值得提炼。另外,可通过

经验分享会与专题性讲座等形式实现方法论的传播并释放引领示范效应。

综上所述,辅导员边界实践能力的培育,需要在个体层面实现从边界自觉到实践智慧的进阶,在制度层面完成从权责厘清到机制创新的转变,在文化层面推动从氛围营造到价值引领的深化。三者的协同推进,方能构建起支撑辅导员边界实践能力持续发展的生态系统,使其在复杂多变的育人情境中,既能坚守专业边界,又能实现有效引领。

4 结论

研究发现的核心结论如下:第一,边界实践这一关键抓手对于刚柔并济目标的达成具有决定性意义。非简单机械叠加的“刚”与“柔”,在具体工作场景中体现为边界的建立过程动态化与调整机制持续化——原则坚守的明确性、尺度灵活的可控性、领域闭合的必要性、空间开放的适度性均包含其中。制度刚性适用范围的划定由边界完成,情感柔性传递余地的预留同样如此。

第二,具体情境中持续动态演化,始终是边界实践活动的根本特质。所谓放诸四海皆准的“标准化边界”概念,实则并不存在于现实场域之中。体现优秀辅导员核心能力的关键维度,恰恰在于其能够依据学生个体差异性特征、问题具体化属性以及场景实际化需求这三个层面,灵活调控边界松紧度的适配性能力。这种因情境而变、因对象而异的调适性素养,最为生动地诠释了辅导员专业化发展的本质内涵。

第三,绝非孤立个体行为模式的边界实践活动,实则亟需多元化主体力量的协同性支撑。辅导员的个人化探索过程从来不是孤立无援的单向度努力——唯有在学校层面明确权责划分边界、提供实质性专业支持体系的双重保障下,结合校园环境内边界认知与尊重文化氛围的培育实例可以看出:辅导员群体唯有在管理规范性与情感温度二者辩证关系中才可寻得动态平衡点。如此既能切实承担育人使命之重担,亦可有效维系职业幸福感与归属感这对重要心理资本。

需要指出的是,本研究仍存在若干局限性:当前

成果仍主要集中于理论框架梳理与场景模拟推演,这两个基础层面鲜活细节的捕捉工作尚未系统展开。后续研究可沿着两个路径延伸:其一是通过深度访谈法与参与式观察法等研究手段深入辅导员日常工作,还原真实情境中的边界调适过程;其二,借助问卷调查扩大样本覆盖范围,对比分析不同院校类型、不同职业发展阶段辅导员的实践模式,深入挖掘其差异化形成的深层原因。相关实践案例表明,该研究方式能够显著提升研究成果的现实指导价值。

当高等教育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当下,辅导员工作正在经历由事务性管理向艺术性育人的转型。这一转型过程的核心要义在于把握边界智慧的辩证法则——既要坚守原则底线的刚性要求以呼应“00 后”学生的个性化诉求,又要投入真挚情感能量消解潜在的心理距离;既要规避过度干预导致的职业倦怠风险,又不陷入无能为力的实践困境。当自觉践行边界实践者角色的辅导员群体能与学生逐渐形成师生互动关系,便超越了单向度管理模式,从而走向基于互信关系的协同治理新范式,教育活动的本质由此呈现为“向美而生”。

参考文献:

- [1]冯刚,布超.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建构的生成逻辑[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3(1):14-20.
- [2]段军鹏.新时代高校辅导员学生管理工作创新思路研究[J].才智,2024(22):121-124.
- [3]李华伟.高校辅导员专业发展内驱力的内涵、特性及激发路径探究[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3):83-90.
- [4]李莉.对专业化发展下高校辅导员角色的思考[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0(12):14.
- [5]王国良,何书贤.高校辅导员对大学生入党行为的影响及策略分析[J].蚌埠学院学报,2025,14(1):82-87.
- [6]冯刚,刘宏达.新时代高校辅导员工作十讲[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 [7]王洛忠,陈江华.当前高校学生工作面临的主要挑战与应对[J].思想理论教育,2015(10):97-100.

责任编辑:徐雪莲

大学生志愿服务动机的智能识别与分层管理研究

张成孜^{1*}, 王琮²

(1. 安徽科技工程大学 电气与电子工程学院, 安徽 蚌埠 233030; 2. 亳州学院 中药学院, 安徽 亳州 236800)

摘要:针对大学生志愿服务中动机工具化与参与表层化并存的现实困境,基于计划行为理论(TPB)与自我决定理论(SDT)的整合视角,探讨志愿服务行为意向的核心驱动因素,并运用XGBoost、随机森林(RF)和人工神经网络(ANN)等机器学习算法构建行为意向预测模型。研究发现,自我效能感、内在动机与社会规范被确认为驱动志愿服务行为意向的三大核心变量;在模型性能方面,随机森林算法在识别低动机群体时展现出最优的特异度(0.927)与整体稳健性(平衡错误率BER为0.170);此外,性别、年级及培训经历对动机结构具有显著调节效应。基于此,建议借助机器学习实现对学生精准画像,开展分层干预,针对不同动机特征群体设计差异化的激励措施、培训内容与项目匹配策略,以推动志愿服务参与模式由外在工具性驱动向内在动机主导转变,提升高校志愿服务的精细化管理水平。

关键词:大学生志愿服务;动机识别;机器学习;分层管理;自我效能感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6)04-0091-07

Intelligent Identification and Stratified Manage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Motivation for Volunteer Service

ZHANG Chengzi^{1*}, WANG Cong²

(1. School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ing, Anhu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Bengbu, 233030, Anhui;
2. School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ozhou University, Bozhou, 236800, Anhui)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intertwined challenges of instrumental motivation and superficial participation in college students' volunteer services, it investigated the core determinants of behavioral intentions in this study by integrating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 and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administered by machine learning algorithms, including XGBoost, RF and ANN, which were employed to construct predictive models of behavioral intention. The results identified self-efficacy, intrinsic motivation, and social norms as the three pivotal driving factors. Among the algorithms, RF demonstrated the highest specificity (0.927) and overall robustness (balanced error rate is 0.170) in detecting low-motivation subgroups. Furthermore, gender, grade level, and training experience exerted significant moderating effects on the motivational structure. It suggested the adoption of machine learning-based precise student profiling to implement stratified interventions, with differentiated incentive designs, training modules and project-matching mechanisms tailored to distinct motivational profiles. Such approaches are expected to facilitate a transition from extrinsically driven participation to intrinsically motivated engagement, and enhance the efficiency of targeted management in university.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 volunteer service; motivation identification; machine learning; stratified management; self-efficacy

收稿日期:2026-04-16 * 通讯联系人

基金项目:安徽科技学院校企合作项目(20240117, 20240547);教育部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项目(230905695270547)。

作者简介:张成孜(1981—),女,安徽凤阳人,讲师,硕士;王琮(1995—),男,安徽淮北人,博士。E-mail:980758024@qq.com

志愿服务是高校实践育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青年学子参与社会实践、培养综合能力的关键途径。志愿精神所蕴含的奉献、友爱、互助、进步内涵,不仅有助于塑造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还能有效促进其个人成长与适应社会。随着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化与社会实践需求的拓展,大学生志愿服务领域已从传统的校园公益延伸至乡村振兴、社区治理、大型赛会等多元场景,成为观察青年群体社会参与行为与心理动因的重要窗口^[1]。

参与动机的多元化也带来了新问题。部分学生以学分获取或履历积累为主要目的,服务持续性不足。已有研究多采用线性回归等方法描述动机类型,但在捕捉自我效能感、社会认同等变量间的非线性交互方面存在不足,难以支撑精准干预目标^[2]。

本研究整合计划行为理论与自我决定理论,构建包含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及内外动机的分析框架,引入 XGBoost、随机森林等机器学习算法,对 750 名某高校在校生(有效问卷 600 份,回收率 80%)的数据进行特征挖掘与分类建模。目的在于量化自我效能感等关键因素对行为意向的非线性影响,为分层管理和精准干预提供实证基础。

1 文献综述

志愿服务的核心是自愿性、无偿性与公益性^[4]。在高校中,它已从单一的校园活动延伸至乡村振兴、大型赛事等多元化项目^[5]。已有研究表明,深度参与者对弱势群体权益的关注度更高,集体协作意识也更强。解释大学生志愿服务参与动机,学界主要借助计划行为理论(TPB)与自我决定理论(SDT)两条路径^[6],综合来看,大学生的志愿动机并非单一向度,而是利他倾向、个人发展诉求与情境因素交织的复合体。

尽管志愿服务在高校已普遍开展,但“动机工具化”与“参与表层化”的问题依然突出。约 60 的学生的参与动力来自获取学分或充实履历,功利取向降低了他们参与的持续性。性别与年级的分布也不均衡——女生活跃度高于男生,高年级学生的参与率随学业压力上升而明显下降。同时,70.83% 的志愿者从未接受过系统培训;缺乏专业支撑的服务容易退化为形式任务,削弱了获得感和组织效能^[7-8]。现有管理策略多以宏观指导为主,对动机特征不同的群体缺乏精细化干预方案。

传统线性回归在捕捉心理学变量间的非线性交互方面能力有限。近年来,随机森林、XGBoost 和人工神经网络等方法逐步引入行为研究^[7,9],能更有

效地识别变量间的复杂关联。已有研究显示,神经网络在区分高动机与流失风险群体方面预测精度较高,随机森林在降低误判率方面有一定优势。这些方法已在健康管理^[7]、精准行为健康^[9]等领域得到应用,也为高校差异化激励与留存干预提供了技术可能。

现有研究在以下三个层面存在短板:第一,在理论机制层面,多数研究沿用 TPB 或 SDT 单一理论框架,缺乏将二者有机整合,以同时解释行为意向的外部社会认知前因与动机内化的心理需求过程;第二,在精准管理层面,现有对策建议多为宏观指导,未能基于实证数据对志愿者群体进行细分并提出差异化的精准管理方案;第三,在技术应用层面,志愿服务领域的量化研究仍以线性统计方法为主,机器学习算法的引入尚处于探索阶段,其在处理多维动机非线性交互、识别高风险流失群体方面的潜力尚未得到充分挖掘。本研究拟整合 TPB 与 SDT 双理论框架,引入 XGBoost 与随机森林等集成学习算法,对大学生志愿服务行为意向进行特征挖掘与分类预测。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

以安徽省某高校 750 名在校本科生为对象,采用分层随机抽样,覆盖文科、理科、工科、医学等学科。通过《大学生志愿服务行为影响因素量表》收集数据。研究已获伦理审批,所有参与者签署知情同意书,调查为完全自愿且匿名。

2.2 问卷设计与信效度检验

问卷基于 Ajzen 的 TPB 框架,经调整与预测试后编制完成,共包含 41 个题项(见表 1),涵盖基本人口学特征及 6 个核心维度。34 个题项隶属于理论模型中的各个量表,其余 7 个题项用于收集参与者的基本人口统计学信息。各量表均采用李克特七点计分法(1 = 完全不赞同,7 = 完全赞同)。

信效度检验结果:整体问卷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892,各分量表 α 系数均超过 0.80 的可接受标准。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六因子模型拟合良好($\chi^2/df = 2.34$, CFI = 0.912, RMSEA = 0.058, SRMR = 0.047)。各维度 AVE 均大于 0.50,CR 均大于 0.80,聚合效度良好;各维度 AVE 平方根均大于其与其他维度的相关系数,区分效度符合要求。Harman 单因素检验显示,未旋转的第一个因子解释变异量为 29.4%,低于 40% 临界值,不存在严重共同方法偏差。

为明晰变量测量逻辑,对以下三个核心研究变

量进行概念界定与操作化定义:

自我效能感 (self-efficacy):指个体对完成志愿服务所需能力的信心程度,以知觉行为控制量表中的“克服困难信心”(Q31)、“时间冲突处理能力”(Q27)和“任务胜任力”(Q26)三项观测,得分越高表明自我效能感越强。

内在动机 (intrinsic motivation):指源于个体对志愿服务本身的兴趣与自我实现感,以态度量表中

的“服务成就感”(Q18)、“目标契合度”(Q20)和“帮助他人的享乐感”(Q17)三项测量为依据,得分越高表明内在动机越强。

社会规范 (social norm):指个体感知到的来自重要他人与社会期待的参与压力,以主观规范量表中的“家人朋友支持”(Q21)、“学校社团鼓励”(Q22)和“社会主流价值观认可”(Q23)三项测量为依据,得分越高表明感知到的社会规范压力越大。

表 1 大学生志愿服务行为影响因素量表

部分	题号	题目内容	测量尺度
基本信息	1	您的性别:男/女	分类
	2	您的年级:大一/大二/大三/大四	分类
	3	您的专业类型:文科/理科/工科/医学/其他	分类
	4	过去一年参与志愿活动的频率:0 次/1-2 次/3-5 次/5 次以上	分类
	5	参与志愿活动的主要类型(可多选): 社区服务/赛事协助/公益宣传/专业技能服务/其他	分类
	6	获取志愿活动信息的主要途径:学校通知/社交媒体/朋友推荐/其他	分类
	7	是否接受过志愿服务培训:是/否	分类
志愿服务认知	8	我清楚志愿服务的定义和核心精神	1-7
	9	我了解不同类型志愿活动的具体内容	1-7
	10	我知道如何通过正规渠道参与志愿活动	1-7
	11	我了解志愿活动可能带来的风险与权益保障	1-7
	12	我认为志愿服务对社会有重要价值	1-7
	13	我理解志愿服务与社会责任感之间的关联	1-7
	14	我清楚志愿服务对个人发展的潜在影响	1-7
	15	我了解高校志愿服务相关政策(如学分认定)	1-7
志愿服务态度	16	我认为参与志愿服务是一件有意义的事	1-7
	17	我享受通过志愿服务帮助他人的过程	1-7
	18	志愿服务能让我感受到自我价值的实现	1-7
	19	我愿意投入时间和精力参与志愿活动	1-7
	20	我认为志愿服务与我的个人目标一致	1-7
主观规范	21	我的家人/朋友支持我参与志愿服务	1-7
	22	我所在的学校/社团鼓励我参加志愿活动	1-7
	23	我认为社会主流价值观认可志愿服务行为	1-7
	24	我周围的人(如同学、导师)认为我应该参与志愿服务	1-7
	25	我认为参与志愿服务是大学生应尽的责任	1-7
感知行为控制	26	我相信自己有能力完成志愿活动任务	1-7
	27	我有足够的时间参与志愿活动	1-7
	28	我能获得参与志愿活动所需的资源(如信息、培训)	1-7

续表
表 1 大学生志愿服务行为影响因素量表

部分	题号	题目内容	测量尺度
志愿服务意向	29	我能平衡学业与志愿活动的时间冲突	1-7
	30	我对志愿活动的风险(如安全、健康)有应对能力	1-7
	31	我有信心克服志愿活动中的困难	1-7
	32	我计划未来一年积极参与志愿活动	1-7
	33	我会主动寻找新的志愿服务机会	1-7
	34	即使遇到困难,我也愿意坚持参与志愿服务	1-7
	35	我会优先选择与个人兴趣或专业相关的志愿活动	1-7
	36	我希望长期参与某一类型的志愿服务项目	1-7
志愿服务行为	37	我愿意向他人推荐参与志愿服务	1-7
	38	我在过去一年中主动参与了志愿活动	1-7
	39	我曾多次参与同一类型的志愿活动	1-7
	40	我曾向他人分享志愿服务经验或推荐活动	1-7
	41	我因志愿服务获得了实质性成长(如技能、认知提升)	1-7

2.3 数据分析方法与技术参数

在数据预处理阶段,设定三项过滤标准——作答时间 ≥ 60 秒、信息完整、逻辑一致——剔除无效样本。缺失值以 R 语言 Mice 包进行多重插补($m = 5$, Rubin 规则合并), Z-score 标准化消除量纲差异。

在特征工程环节,研究构建了基于集成学习的协同筛选机制。首先利用 XGBoost 算法捕捉变量间深层的非线性交互关系,提取对志愿动机具有显著贡献的特征项;随后引入随机森林(Random Forest, RF),通过排列重要性分析验证特征在不同子集下的稳健性。这种双重校验策略有效实现了特征降维,精准锁定了自我效能感与主观规范等核心驱动因素。XGBoost 特征重要性阈值设定为 ≥ 0.05 ,随机森林排列重要性筛选标准为 $p < 0.01$ 。

模型构建与验证阶段,将数据集按 7:3 比例划分为训练集($n = 420$)与测试集($n = 180$),采用分层抽样确保高/低动机群体在两个集合中比例一致。构建涵盖随机森林、人工神经网络(ANN)、分类回归树(CART)及逻辑回归(Logit)的多元模型矩阵。各模型具体参数设置如下:RF 模型设定决策树数量 $n_estimators = 500$ 、最大深度 $max_depth = 10$,采用 Gini 系数作为节点分裂准则;XGBoost 模型设定学习率 $learning_rate = 0.1$ 、最大深度 $max_depth = 6$ 、迭代轮次 $n_estimators = 100$;ANN 模型采用单隐层结构(50 个神经元、ReLU 激活函数),输出层采用 Sigmoid 函数进行二分类;所有模型均采用 5 折交叉验

证评估性能稳定性,以 AUC、准确率(ACC)、灵敏度、特异度、阳性预测值(PPV)和阴性预测值(NPV)作为模型性能评估指标。

3 结果与分析

3.1 样本概况与志愿服务参与现状

本次调查采用匿名方式共发放问卷 750 份,剔除作答时间不足 60 秒的随意作答样本、关键变量缺失样本及选项重复率 $\geq 70\%$ 的无效样本,最终获得有效样本 600 份,有效回收率为 80.0%。

性别、年级、参与频率及培训经历对志愿服务行为具有显著影响($p < 0.001$,见表 2)。其中高年级参与率显著下降,可能受学业压力与就业竞争影响。

参与现状方面,70.8%的受访者未接受过系统化培训,未受训群体的行为意向与自我效能感均显著低于受训群体,表明培训缺失会降低任务胜任力,进而影响参与的持续性。

3.2 基于集成学习的动机特征识别与机制解析

RF 与 XGBoost 共同识别出 7 个核心变量,覆盖自我效能感、规范态度与行为意向三个维度(见图 1)。在权重分布上,“专业相关性”(Q35)与“目标契合度”(Q20)综合排名最高,表明志愿服务与个人专业及发展目标的契合程度是驱动参与意向的首要因素。自我效能感维度的“克服困难信心”(Q31)与“时间冲突处理能力”(Q27)印证了知觉行为控制的基石作用,学生对自身应对复杂情境与平衡多

重任务能力的感知,直接影响其参与决策。“服务成就感”(Q18)与“目标契合度”(Q20)则对行为持续性具有关键维持作用,兴趣驱动与自我实现感是长期参与的核心心理资源。“专业相关性”(Q35)与“推荐意愿”(Q37)的强关联性进一步显示,技能

应用与口碑传播共同构成志愿服务可持续发展的外部支撑网络。风险保障意识(Q11)直接权重虽相对有限,但作为潜在调节变量,其在降低参与不确定性、增强决策安全感等方面仍发挥着不可忽视的支撑作用。

表 2 人口统计学特征与志愿服务行为差异检验

问题	分类	占比/%	p 值
性别	女/男	56.7/43.3	<0.001
年级	大一/大二/大三/大四	30.5/31.3/19.8/18.3	<0.001
学科	艺术/工科/医学/理科/其他	22.3/21.8/18.2/17.5/20.2	0.237
志愿频率	0 次/1-2 次/3-5 次/5 次以上	40.7/29.7/19.3/10.3	<0.001
活动类型	社区服务/活动支持/专业服务/宣传活动/其他	17.8/20.3/22.2/18.8/20.8	<0.001
信息来源	好友推荐/社交媒体/学校通知/其他	15.8/28.3/51.2/4.7	<0.001
培训经历	是/否	29.2/70.8	<0.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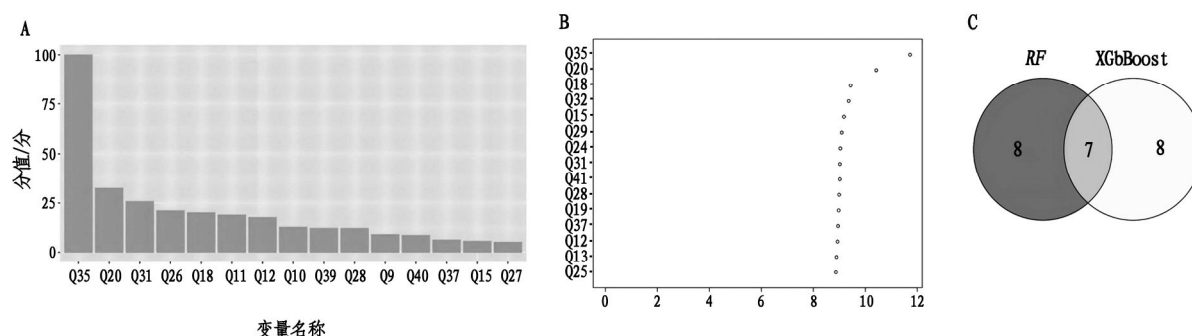


图 1 大学生志愿服务动机关键影响因素的特征选择结果

图 1 中(A)为 XGBoost 特征选择柱状图,纵轴为标准化后的特征重要性分值,横轴为关键变量名称;(B)为随机森林特征选择排序图,以均值减少准确率(Mean Decrease Accuracy)为衡量指标;(C)

为 RF 与 XGBoost 特征选择结果的 Venn 图。

3.3 预测模型构建与性能评估

以识别出的 7 个关键特征为输入变量,4 个模型在独立测试集上的分类性能如表 3 及图 2 所示。

型在独立测试集上的分类性能如表 3 及图 2 所示。

表 3 不同机器学习预测模型的性能指标评估汇总

模型	灵敏度	特异性	ACC	BER	FPR	PPV	NPV
RF	0.732	0.927	0.865	0.170	0.070	0.839	0.875
CART	0.725	0.894	0.838	0.191	0.107	0.772	0.868
ANN	0.806	0.890	0.862	0.153	0.110	0.785	0.903
Logit	0.739	0.917	0.858	0.173	0.084	0.815	0.876

注:ACC 表示准确率;BER 表示平衡错误率;FPR 表示假阳性率;PPV 表示阳性预测值;NPV 表示阴性预测值。

图 2 以假阳性率(FPR)为横轴、真阳性率(TPR,即灵敏度)为纵轴,绘制 4 种模型的 ROC 曲线。ANN 模型的 AUC 值最高(0.943),4 种模型的 AUC 均超过 0.85,表明均具备优异的分类判别能力。值得注意的是,虽然 ANN 在整体 AUC 上领先,

但在低 FPR(<0.10)区域,RF 曲线明显高于其他模型,体现了其在避免假阳性误判方面的显著优势。进一步分析发现,RF 模型虽在灵敏度(0.732)上略低于 ANN(0.806),但在特异度(0.927)与阳性预测值(PPV=0.839)上表现最优,且假阳性率(FPR)最

低(0.070)。这意味着 RF 模型在避免假阳性误判(即防止将低动机学生误判为高动机)方面具有显著优势,能够更精准地锁定真实的高意愿群体,为资源定向投放与分层干预提供可靠的技术依据。

图3为 RF 模型在测试集上的混淆矩阵可视化。纵轴为真实标签(高动机/低动机),横轴为预测标签(高动机/低动机),对角线单元格以深色填充表示正确的分类样本数。高动机召回率、低动机特异度的整体分类准确率为86.5%。混淆矩阵右下角以数值标注假阳性(7.3%)和假阴性(26.8%)的比例分布,直观呈现了 RF 模型在控制假阳性误判方面的优异性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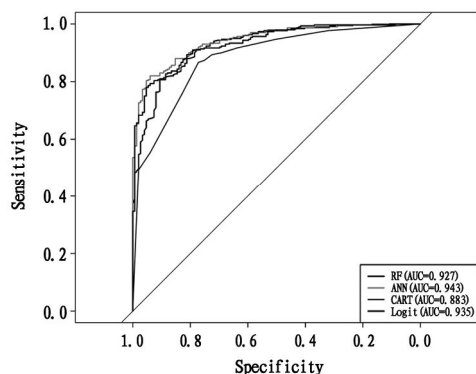


图2 四种预测模型在识别大学生志愿动机分类中的 ROC 曲线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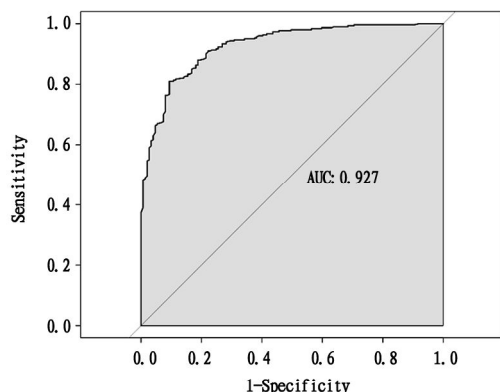


图3 随机森林模型在志愿动机预测中的分类决策性能表现

3.4 综合讨论与精准管理策略

与已有研究的对比分析。本研究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实现了三方面推进。于国内研究而言,在证实志愿服务对非认知能力因果效应的基础上^[11],进一步揭示了自我效能感的动机中介机制,并将“知觉行为控制”由单维指标深化为任务胜任力、时间管理与困难应对的多维解构^[12]。于方法学而言,首次将随机森林的高特异度优势应用于低动机群体预警

(BER = 0.170, 特异度 0.927),拓展了机器学习在行为科学中的应用边界^[13-14]。于理论整合而言,通过集成学习显性化了传统线性模型难以捕捉的隐性关联^[15-16],实现从“线性相关”到“非线性交互”、从“群体均值比较”到“个体风险预测”的范式转型。

差异化分层管理策略。针对低年级高动机群体,构建梯度化项目进阶路径,结合专业匹配推荐系统实现志愿服务与学科实践的精准对接。针对高年级高流失风险群体,设计单次不超过2小时的“微志愿”项目,并建立服务经历向就业能力转化的量化档案。针对占比70.8%的无培训经历群体,开发基础通识、专业技能、督导提升三级课程体系,以形成“培训-能力-信心-持续参与”的路径。针对工具性动机主导群体,引入服务日志与月度反思双轨记录机制,以成就感与目标契合度为过程性指标,推动外部驱动向内在认同转化。

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本研究存在四点局限:样本来源较为单一,跨区域普适性有待验证;横截面设计无法揭示动机的纵向演化轨迹;自我报告数据存在社会赞许性偏差;分层干预策略尚未经过实证检验。未来研究应拓展多区域多类型样本、采用纵向追踪设计、引入行为实验或数字足迹进行交叉验证,并对低动机群体开展随机对照试验,形成“识别-干预-评估-优化”闭环。

4 结论

本研究综合运用问卷调查与机器学习技术,系统解析了大学生志愿服务动机结构及其行为预测机制。结果表明,自我效能感、内在动机与社会规范是驱动行为意向的三大核心要素,其中自我效能感预测贡献最大,内在动机对长期参与的维持作用最为关键。随机森林算法在低动机群体识别中特异度达到0.927,可在控制误判前提下精准锁定高流失风险个体。性别、年级与培训经历对动机结构具有显著调节效应,女性及低年级学生参与积极性更高,高年级与未培训群体构成主要流失风险来源。整合TPB与SDT理论框架、引入集成学习,弥补了传统线性模型的方法局限,所提出的差异化分层管理策略为高校精细化管理提供了可落地的实施方案。

参考文献:

- [1] 王刚. 志愿服务赋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探究[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 2024(17): 68-71.
- [2] 蔡颖蔚, 周航. 志在乡土: 农村大学生志愿服务经历与返乡就业意愿研究[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 版),2025(6):104-114.
- [3] 罗红雪. 大学生志愿服务的实践育人功能及其提升路径研究[D]. 大连:大连海洋大学,2024.
- [4] 植亚见. 艺术赋能乡村振兴中的志愿者行为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与动机功能理论的实证分析[J]. 中华志愿者,2024(5):24-26.
- [5] 孙欣雨. 新时代大学生志愿服务的育人功能及实现对策研究[D]. 沈阳:沈阳师范大学,2024.
- [6] 刘刚,卢金逵,徐菡. 高校大学生体力活动行为的预测理论模型——基于计划行为理论与自我决定理论的整合[J]. 体育风尚,2023(10):53-55.
- [7] 何佳莉,柏涌海,王一浩,等. 人工智能在心理健康管理中的应用:基于“三早”视角[J]. 海军军医大学学报,2026,47(3):300-308.
- [8] Teferra B G, Perivolaris A, Hsiang W N, et al. Leveraging large language models for automated depression screening[J]. PLOS Digital Health, 2025, 4(7): e0000943.
- [9] Walsh C G, Chaudhry B, Dua P, et al. Stigma, biomarkers, and algorithmic bias: recommendations for precision behavioral health wit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J]. JAMIA Open, 2020, 3(1): 9-15.
- [10] 胡平平,牛新春,汪卫平. 志愿服务参与能培育大学生非认知能力吗——基于追踪调研和双重差分技术的因果分析[J]. 复旦教育论坛,2024,22(2):54-63.
- [11] 田蓓,马建青. 党建引领下高校志愿服务育人工作的提升进路[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3(22):67-70.
- [12] 张华,李明. 大学生志愿服务动机的类型学分析——基于潜在剖面分析[J]. 高等教育研究,2025,46(3):78-89.
- [13] Ajzen I.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991, 50(2): 179-211.
- [14] Ryan R M, Deci E L.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the facilitation of intrinsic motiv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well-being[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0, 55(1): 68-78.
- [15] Taylor S, Todd P A. Understand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usage: a test of competing models[J].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1995, 6(2): 144-176.
- [16] Bandura A. Self-efficacy: toward a unifying theory of behavioral change[J]. Psychological Review, 1977, 84(2): 191-215.

责任编辑:朱家席

(上接第64页)

研究认为,AI赋能高校财务数字化管理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对传统财务治理模式的根本性变革。其核心在于通过技术手段,推动财务数据与业务数据的深度融合,促进财务管理工作从“核算型”向“价值创造型”转变,最终实现高校财务治理效率的提升,为学校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财务支撑。高校应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差异化的转型策略,坚决避免盲目跟风与重复建设。展望未来,AI赋能的高校财务数字化管理将实现从“智能服务”向“智慧治理”的跨越,构建更加高效、智能、安全、协同的现代化财务治理体系,为高校落实教育强国战略、实现高质量发展筑牢财务保障根基。

参考文献:

- [1] 国务院. 关于加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Z]. 国发[2022]14号,2022.
- [2] 教育部. 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2024年工作要点[Z]. 教办厅函[2024]32号,2024.
- [3] 财政部. 会计改革与发展“十四五”规划纲要[Z]. 财会[2021]27号,2021.
- [4] 龙凤飞. 资源依赖理论下企业社会工作项目运作研究[D]. 广州:广东工业大学,2022.
- [5] 桂春萍. 业财融合下财务共享中心的流程再造研究[J]. 上海商业,2025(11):193-195.
- [6] 李丽. 数据治理视角下高校财务数字化转型路径研究[J]. 财政研究,2023(7):102-110.
- [7] 吴庆芳. 中南大学用智能技术解决财务报销慢、监管难等问题 报账单自动“跑”起来[N]. 中国教育报,2025-04-24(1).
- [8] 福建教育厅. 数字赋能财务管理,高校这些做法获省教育厅推介[Z]. 福建教育工作简报,2025-08-25(13).
- [9] 刘温. 数字赋能重构财务数据治理体系[N]. 河北经济日报,2025-11-28(3).
- [10] 黄山学院财务处. 稳中求进 砥砺前行 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财务发展新篇章[EB/OL]. (2025-05-21) [2025-11-18]. <https://www.hsu.edu.cn/08/70/c3716a198768/page.htm>.
- [11] 西南政法大学计划财务处. 提档升级,优化服务加强财务工作智能化建设[EB/OL]. (2022-11-07) [2025-11-19]. <http://jhcwc.swupl.edu.cn/xwdt/f636b55ee7ae44269ba16f75634a138d.htm>.
- [12] 魏利平,张娟娟,隋宇晨,等. 数智化驱动的高校财务风险预警机制构建[J]. 教育财会研究,2025(2):46-52.
- [13] 胡洁. 人工智能视域下财务管理模式创新路径——以高校财务工作为例[J]. 大理大学学报,2025(9):122-128.
- [14] 解丹阳,朱丽. 数智化背景下会计专业人才培养的新要求与新应对[J]. 财会月刊,2025(21):24-29.

责任编辑:冯意云

潘杨关系及北宋杨业之死新探

——兼论文献、口碑之利用

梁家贵*, 李维康

(阜阳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安徽 阜阳 236037)

摘要:潘美与杨业同是北宋早期的名将,雍熙北伐时立下赫赫战功,但由于一系列原因,杨业于陈家谷兵败殉国。随着后世文学作品的广泛传播,杨业逐渐被塑造成因奸臣陷害而兵败殉国的忠烈形象,以潘美为原型的潘仁美也被描绘为祸国殃民的大奸臣。经文献梳理得知,固然潘美对杨业之死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宋廷的决策失机、将帅所用非人、兵制的弊病等都是致使杨业殉国的重要原因。通过潘杨关系及杨业之死史实的梳理及分析,可以为正确使用文献、口碑提供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杨业;潘美;雍熙北伐;宋朝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6)04-0098-07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Pan-Yang Relationship and the Death of Yang Ye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 Discussion on the Utilization of Textual and Oral Sources

LIANG Jiagui*, LI Weikang

(School of Historical Culture and Tourism, Fuyang Normal University, Fuyang, 236037, Anhui)

Abstract: Pan Mei and Yang Ye were both renowned generals of the early Northern Song Dynasty, achieving remarkable military exploits during the Yongxi Northern Expedition. However, due to a combination of factors, Yang Ye was defeated and died a martyr for his country at Chenjiagu. With the widespread circulation of later literary works, Yang Ye was gradually portrayed as a loyal and heroic figure who was framed by treacherous officials and died in battle, while Pan Renmei—a character based on Pan Mei—was depicted as a treacherous minister who brought disaster to the nation. A review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reveals that although Pan Mei bears undeniable responsibility for Yang Ye's death, the Song court's flawed decision-making, the appointment of incompetent generals, and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military system were also significant causes of Yang Ye's demise. By examining and analyzing the historical relationship between Pan Mei and Yang Ye, as well as the facts surrounding Yang Ye's death, valuable insights can be gained for the proper use of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oral traditions.

Key words: Yang Ye; Pan Mei; Yongxi Northern Expedition; Song Dynasty

在我国部分地区,流传着“潘杨两姓不结亲”的民俗,这一习俗至今仍为一些地区的潘杨两姓家族所坚持。这一习俗发源于有关北宋初期潘杨两家纠葛的民间传说,即北宋初期潘美与杨业的矛盾,借助明清以来与其相关的小说、戏曲、评书等传播途径,

这一传说逐渐发展为家喻户晓,最终演变为大众所熟知的杨潘两家忠奸对立的故事。探究北宋初期潘杨矛盾冲突的起源与原因,对于了解北宋初期杨家将群体的产生发展,加深对赵宋早期皇权与军队之间争夺较量的认识,剖析这一时期宋朝军队北伐屡

收稿日期:2026-01-03 * 通讯联系人

作者简介:梁家贵(1968—),男,山东聊城人,教授,博士;李维康(2000—),男,山东聊城人,硕士研究生。E-mail:910254036@qq.com

屡失利的原因,以及更加正确地理解民间文学作品对社会认识的深刻影响,都有重要意义。

1 潘杨矛盾的由来及分歧

北宋初期有关潘杨两家的民间文艺作品主要有《杨家将》以及因之衍生的小说、戏曲、评书^[1]。此类作品均以潘仁美为首的潘家和以杨继业为代表的杨家为主角,其中潘仁美作为反派,压制陷害忠臣良将。因杨七郎格杀其子潘豹,潘仁美对杨家怀恨在心,屡出奸计,金沙滩一战杨家七郎八虎凋落殆尽,陈家谷之役杨继业战死沙场,之后又多次企图截杀杨延昭;杨家上下对潘家亦恨之入骨,直至杨六郎告御状,朝廷定罪潘仁美,杨家趁机斩杀潘仁美方告结束。

在史籍记载中,潘仁美的原型潘美担任雍熙北伐的西路军主帅,因其指挥失当、治军不力,致使杨继业的原型即宋将杨业在陈家谷战败被俘,杨业宁死不屈被杀,潘美因此一度被降职。

魏晋以来,潘杨之睦在历史上传为佳话^①。但自北宋初期杨业、潘美之后,潘杨之争风头逐渐盖过前者。经查,最迟应在元代,已有多部与杨家将相关的杂剧形成^{[2]98-104}。明清以后,杨家将的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3],杨继业的忠心报国和潘仁美的老奸巨猾,无疑激发了民众心中的朴素正义感。史籍记载潘美因致丧良将而降职,也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潘美对杨业之死负有责任,且《宋史》系仓促写就,遗漏颇多,为后人留下了较多的想象空间。正如余嘉锡在《杨家将故事考信录》中指出“杨家将虽小说,而实一时人心之所同,故能与学者之作相表里”^{[2]95}。民众既然对潘美陷害杨业的故事耳熟能详,在朴素的善恶观引导下,部分杨姓家族形成的“潘杨不结亲”的约定流传了下来。

但是,民间流传的潘杨传说,总会因创作者、创作年代、创作背景等的不断变化而改变,其内容、人物形象在不断充实的同时,也会逐渐偏离历史的本来面貌。例如,杨业、杨延昭在历史记载中虽然“父子皆名将”^[4],但远非文艺作品描绘的那般将宋朝安危系于一身,其后代则更难承其实,鲜有能跻身朝堂中心者。一些富有怀疑精神的人多以此为基点,借助《宋史》等证明杨业之死的主责不在潘美,甚至矫枉过正,质疑杨家将在宋朝历史上的实际贡献。诚如《曲海总目提要》所言:“信者悉以为真,而疑者又皆以为子虚乌有。”^[5]

清代朴学兴起,杨家将亦在考据之列,如翟灏作《通俗编》^[6]、俞樾作《小浮梅闲话》^[7]、李慈铭撰

《郇学斋日记》^[8]等,对杨家将史事考证具有开创性作用。这一类考据大都仅依赖《宋史》对史事进行考订,然宋辽金三史系仓卒而成,内容多照抄实录及诸家传记,漏略颇多,随意删改,牴牾屡见。单纯以《宋史》考证史事,未免有以讹传讹、谬种流传之嫌,故这一类考证于历史研究而言,建树较少。

《宋史》是元末修撰的三史之一,主要依据宋朝国史、实录、日历等编纂而成,保留了许多现今早已失传的原始资料,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但又因此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对宋朝统治集团美化的事件,其篇幅浩大,但成书时间却很短,存在诸多问题。明代以来一众学者尝试重修《宋史》,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也曾多次指出,《宋史》内容繁芜,史实常有错谬,论述也常常失当^[9]。所以,《宋史》虽然保存着大量文献档案的原文,但需要结合保存下来的文献以及文物碑刻等一系列其他资料进行校对分析,方能去浮求实,探究历史的本来面貌。

由于杨家将历史故事的广泛传播,潘奸杨忠,正邪势不两立的认知已深入人心,但《宋史》等文献中对潘美等人的罪责描述和事后判罚又十分简略、隐晦和回护,造成诸如上述双方观点的对立与混乱。近代以来,许多研究者在理清史籍记载和艺术形象的区别上做出了诸多贡献。例如,卫聚贤作《杨家将及其考证》^[10]、沈起炜的《杨家将的历史和传说》^[11]、常征的《杨家将史事考》、李裕民的《杨家将史事新考》^[12]、杨光亮的《杨家将研究》^[13]等论作,都对杨家将的事迹进行了一番研究,不同程度上对杨家将群体,以及相关的历史人物展开叙述,对于后世了解杨家将这个游离于史籍与民间演义中的群体有极大帮助。再如,蔡向升、杜雪梅主编《杨家将研究·历史卷》^[14],广泛搜集有关杨家将的论作,对于研究此段历史,辨别文艺形象和历史形象有莫大作用,同样有助于了解这一时期北宋王朝的真实情况。

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关杨家将研究的期刊论文极其丰富。例如,余嘉锡作《杨家将故事考信录》对杨家将戏曲故事进行辨析,较为细致地记载以杨业为代表的几代人生的人生轨迹;聂崇岐作《麟州杨氏逸闻六记》^[15],对杨业家族的籍贯,重要成员如杨业、杨延昭、杨文广、杨重勋一脉子孙等进行了细致介绍;顾全芳作《对〈杨家城和杨家将〉的商榷与补充》^[16]《杨家将研究中的几个问题》^[17]《杨家将研究质疑(一)》^[18]《杨家将研究质疑(二)》^[19]等文章,对杨业籍贯及其在北汉政权时期的经历,余太君是否真实存在,戏剧中的金沙滩、杨六郎、孟良焦赞等人物形象进行全方位的探究;靳生禾作《杨家将

人物考略》^[20],对杨业、杨延昭、文广三代人以及与其相关的妻室、部将进行论述;任崇岳作《杨业新论》^[21],对杨业身世,宋太宗重用杨业原因等进行分析;赵捷民作《杨家将考辨》^[22],对杨家将、杨门女将、杨家部将、辽宋相关文武臣子进行了广泛论述;李裕民作《杨家将新考三题》^[23],对杨业个人品质,刘吉为杨业鸣冤,古北口杨无敌庙等问题展开论述;张琼洁等撰《真实与虚构之间:宋辽交通线杨家将传说与正史比较研究》^[24],从交通地理方面,对杨家将的叙述与传播进行考究;韩军作《杨家将戏曲溯源——基于宋金时期杨家将故事的文艺形态考察》^[25],通过对宋元时期杂剧和宋元人物笔记等进行考察,探寻杨家将的故事渊源。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对以杨家将为代表的宋初历史进行了一番阐述。

针对历史中潘美在杨业殉国一事上到底负有多大程度的责任,以及谁是导致杨业之死的主凶,也是研究潘杨关系的重点。例如,余嘉锡的《杨家将故事考信录》,邓广铭、张希清的《评杨业兼论潘杨关系》^[26]、李裕民的《杨家将史事新考》《杨家将新考三题》等,认为潘美是造成杨业之死的罪魁祸首;闻立鼎作《潘美陷害杨业考辨》^[27]、顾全芳作《替潘美翻案》^[28]等文章,则反对将潘美列为首罪。此外,张其凡撰《杨业之死发覆》^[29],认为侯莫陈利用有可能是导致杨业之死的奸臣。

2 潘杨关系辨析

为了厘清潘美与杨业之间的纠葛,探究潘杨关系,有必要对二人的经历进行一番梳理。依据史书,并结合前辈学者的考证研究,所得到的两人基本情况如下:

潘美,字仲询,大名(今河北省大名县)人,渴望建功立业,最初在后周做官,被柴荣引为亲信,受其重用。又与赵匡胤交厚,宋取代后周,潘美奔走朝堂内外,帮助宋太祖稳定政局,益见推崇,参与平定南方各割据势力,立功颇多。赵匡胤征北汉时,潘美为副帅战于汾上。赵光义继位后,再次征讨北汉,任命潘美为北路都招讨,从征幽州。宋军失利,宋太宗令其兼任三交都部署,屯兵备边,封检校太师。太平兴国七年(982)雁门大捷后,封代国公。次年改忠武军节度,进封韩国公。雍熙二年(985),潘美次女成为宋真宗赵恒的第一任妻子。雍熙三年(986)北伐,潘美为西路军统帅,大军克寰、朔、云、应等州,其后军退,因杨业被俘而亡,而遭削秩三等,责授检校太保。次年恢复检校太师,知真定,不久,复判并州

事,加封同平章事。卒,赠中书令,谥武惠^②。

杨业,并州太原人,后汉麟州刺史杨弘信之子,原籍麟州,本名重贵,北汉世祖刘崇赐名为刘继业。倜傥任侠,善骑射,好畋猎。初事北汉,以骁勇闻名,累迁建雄军节度使,国人号为“无敌”。宋太宗征北汉,杨业降宋,恢复杨姓,宋廷以为右领军卫大将军,后授郑州刺史,因杨业久经战阵,迁为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杨业多筑城寨州垒防备辽军进犯^[30],屡建奇功,对之后河东防备多有裨益^[31]。雁门之战,杨业率骑兵出西陉至雁门北口,向南夹击契丹,大败敌军,以功迁为云州观察使,仍判郑州、代州,威镇边关,而主将戍边者多忌之,常常上书毁谤杨业。雍熙三年(986),宋军再次北伐,以忠武军节度使潘美为云、应、朔等州行营都部署,云州观察使杨业副之,西上阁门使、蔚州刺史王侁,军器库使、顺州团练使刘文裕,磁州团练使郭超^③等皆在其军。西路宋军连拔寰、朔、应、云四州,杨业立功无数。其后东路宋军交战不利,岐沟关一战东路军更是大败,宋军战线崩溃,中路军急忙退守定州,西路军退屯代州。东路宋军大败前后,赵光义诏杨业与潘美等率军护所拔诸州百姓南迁。辽军举兵向西,复破应州、寰州。杨业建议佯攻应州,掩护云州、朔州等地百姓南徙,不可与辽军正面交战,王侁、刘文裕等持反对意见,主张与辽军交锋。王侁说:“君侯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杨业无奈出兵,将行,请求主帅潘美等在陈家谷设兵,以接应杨业部宋兵。潘美起初在既定位置布阵,但王侁贪功擅离,潘美不能止,后闻杨业被围兵败,急退。杨业败退至谷口,宋军已尽撤,遂力战被擒,子杨延玉、将领贺怀浦、王贵等力战阵亡,杨业感叹为奸臣所迫出兵致败,尽节而死。其后宋廷追查,追赠杨业为太尉、大同军节度使,赐其家布帛一千匹、粮食一千石,其子官职各有所提升。潘美则降职三级,王侁免官、流放金州,刘文裕免官、流放登州^④。

从上述潘杨二将事迹的大体介绍来看,潘美的确有漠视、放任以至假借他人之手陷害杨业的可能性。首先,杨业归宋前,曾多次与宋军交战,潘美则是宋方的主将之一,双方交战十余年,从杨业“无敌”的称号看,包括潘美在内的宋军将领,恐怕不乏与之交锋失利的经历。宋太宗第一次北伐失利后,任命潘美为三交都部署,杨业为三交驻泊兵马部署,《宋史·杨业传》载杨业雁门之捷后,“主将戍边者多忌之,有潜上谤书斥言其短”^[32]⁹³⁰⁴。此时统辖并州边防的正是潘美。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潘武惠公美传》记载:“雍熙二年,太宗为真宗娶美次

女为夫人……将成礼,召美还都,数月归屯所。”^[33]以此可知直至雍熙二年,潘美仍长期担任并州驻屯宋军主将。杨业因功颇受赵光义赏识,不可避免地引起了一部分旧臣宿将的忌憚、嫉妒和排挤,何况杨业以降将身份成为并州防线副帅,屡立战功,“契丹望见业旌旗即引去”^{[32]9304},对于以功名为务的潘美,杨业无疑是与他争夺功名的一大劲敌^⑤。且杨业阵亡后,曾一度受人栽赃。《宋会要》曾记载杨业赐赠,数目种类均少于一般观察使死亡赐赠,张咏《赠刘吉》亦有“冒死雪忠臣”,可见杨业曾受诬陷。能够做到这件事的,并且和杨业有直接矛盾的,恐怕只有潘美、王侁、刘文裕等一干人。

其次,雍熙北伐期间,潘美为西路宋军主将,理应掌握军队调度,但王侁、刘文裕等与杨业争论作战方略时,身为主将的潘美却游离于争论之外。王侁以下犯上,窘辱副帅,潘美未加劝阻。杨业被逼出战,王侁率军轻动,潘美未加阻止。宋军闻杨业兵败而慌忙撤退,潘美亦未制止,反而率军撤退,以致陈家谷伏兵尽撤,置杨业部于绝境。潘美于此战所作所为并无半点一军主将之担当,丧失良将,潘美罪责难逃。辽朝在东线刚刚大胜宋军,辽军以得胜之师西进,亦多次击败各地守军,潘美不会不了解辽军的强悍战力。军事会议中下达让杨业出兵的军令,潘美于其中无疑有默许、纵容甚至威逼杨业出兵的嫌疑。况且,其在军事会议及陈家谷时所作所为究竟如何,更要打上问号。

最后,从战后对杨业殉国的罪责处罚看,潘美、王侁、刘文裕等受降贬,虽不一定以此判定潘美为杨业之死的主责,但作为一军之帅,下不能制诸将,又在战中擅自撤兵,其失职之责难辞其咎。战后,宋廷以“不能申明斥候,谨设隄防,陷此生民,失吾骁将,据其罪戾,合置严诛”^[34]、“群帅败约”^{[32]9305}处理,也可窥见潘美在杨业之死一事上罪责不小。

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武将之间产生冲突十分普遍^⑥。潘、杨作为宋朝元老宿将与宋帝重用的新兴降将的代表,早已在宋汉战场上交手,此时又同在一个战线为正副长官,两人性格志向又存在差异,势必产生冲突。加之宋太宗过分压抑武将权力,潘美或出于自保,或出于积怨,故而放任杨业失败。

3 造成杨业殉国的主要原因

雍熙北伐、岐沟关之战后,宋朝虽丧失大量兵员粮草,但仍存有一批精锐部队。西路宋军退守代州,中路退守定州,东路李继隆部及其他败散溃兵亦保有一定战力。如果部署得当,本可以更好应对辽国

反攻。然而,宋朝上下一系列决策失误,导致陈家谷兵败,宋军实力再度损失^[35]。北伐失败后,宋人即已开始分析原因,近现代以来,论述更加透彻。通过探究导致杨业殉国的原因,也可窥见雍熙北伐失败,以至北宋军队主动出击常常失利的原因。

其一,赵光义诏令潘美、杨业等护送云、朔、寰、应四州吏民南徙失策。代北诸州百姓策应宋军北伐出力颇多,辽军反攻,此间民众尤其曾支持宋军者,难免受到迫害。宋廷已在各州设置官僚,无论从道义上,还是政治考量上,撤退四州吏民势在必行,但护送撤退的时机并不十分合适。辽军在东线胜利后,就着手收复西线陷落地区,但宋朝决策者显然对辽朝的政治局势及辽军战略走向产生误判,或以为辽军不会在短时间内向西线进攻,或以为云、应等四州能够防御辽军的攻势,以致没能在第一时间撤离吏民。当宋廷下达诏令时,西路宋军主力已经退至代州,此时受命北上护送四州吏民南撤,辽军业已攻克寰州。在情况如此变化后,撤退四州吏民无疑要冒更大的风险,但宋廷并未考量战局变化。陈家谷之战损兵折将,宋廷最高层决策失机,优柔寡断,不依据军事变化及时变更指令,无疑是重要原因。

其二,主帅不作为与将领龃龉,将帅目光短浅。前文已提,西路主将潘美在军事会议上并无发言记录,其在陈家谷既不能制止王侁擅动,撤军之际又全无计划,虽然有潘美本人谨小慎微的性格和惧怕赵光义亲信的心理作祟,但于国家而言,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危而不持,颠而不扶,是其写照。王侁、刘文裕与杨业之争,本属于战略方针之争,王侁甚至以“君侯素号无敌”等语刺激杨业,会议结果是杨业被逼出战。王侁等因此前的一系列胜利而过于自大自信,显然对宋辽军事实力变化估计不足,又争功擅动,窘辱将领,损公肥私,以致损兵折将。战后,几人又疑似诿过杨业。从宋廷处责诏令也可看出几人在杨业殉国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34],此后宋人议论此战时也往往论及此^⑦。

其三,所用非人,奸臣贵侍不知兵而任其职。杨业被俘后曾言“为奸臣所迫”^{[32]9305}。刘敞《杨无敌庙》:“痛哭应知贾谊意,世人生死两鸿毛。”^[36]苏辙《奉使契丹二十八首过杨无敌庙》载:“我欲比君周子隐,诛彤聊足慰忠魂。”^[37]贾谊被同僚排挤,周处为朝臣所迫、司马彤所逼,明显表明杨业亦为同僚奸臣逼令进军。王安石也认为杨业为奸人所害,不得其死^[38]。刘、苏、王等人皆北宋时人,距当时不远,当有所依据。张咏于雍熙年间为著作佐郎,更是亲历者,其曾作《赠刘吉》“冒死雪忠臣”^[39]表明杨业

曾蒙冤负罪。

《宋会要·赠赠》曾载:“云州观察使杨业,雍熙三年八月北征阵歿,赐绢布各百匹,粟一十石。”比之《杨业传》所载追赠,相差悬殊,以《赠刘吉》佐证,《宋会要》所载明显是最初赐赠。宋制,观察使卒,依例应赐钱三百贯,绢布各二百匹,酒五十瓶,羊五十口。杨业最初赐赠如此之少,当是为奸人诬陷,故刘吉方才冒死为忠臣雪冤,此处诿过杨业之人,当在潘美、王侁、刘文裕等人之中,抑或其全部参与。

然而杨业殉国后加害推卸责任与逼迫杨业出兵之所谓奸臣,并不能等同视之。邓广铭、李裕民等认为此处奸臣应指潘美。但无论潘美,还是王侁、刘文裕,战后虽然都一度被降职贬斥,但几人未被宋人视为奸佞,三人或老死,或病死,没有像苏辙诗中所言受“诛”,因而三人为奸臣论据并不一定准确。

张其凡据此诗结合史料考证,认为奸人应为侯莫陈利用。利用其人列入《佞幸传》,以幻惑等术颇得赵光义宠信,横行无忌,雍熙北伐期间曾担任并州驻泊都监^[40-41]。其后仍蒙宋太宗宠信,数年后经赵普努力搜集罪证,方得诛。利用骄肆僭侈,宋人即目视奸人,在时权势逼人,众不敢犯,故张咏称赞刘吉冒死为忠臣雪冤,论据较为合理。其后侯莫陈利用伏诛,亦可与苏辙诗中“诛彤聊足慰忠魂”相照应,侯莫陈利用奸臣说最为合理。

但是,杨业视角的“奸臣”与宋人所指“奸人”或许并不对等。杨业败退至陈家谷被擒,子侄将校阵亡。其口中的奸臣当是令其出兵又失信撤军之人,潘美、王侁、刘文裕等也有可能是杨业认知中的“奸臣”。

其四,宋太宗猜忌武将,兵制的弊病与混乱,压抑武将自主性。赵光义对武臣的忌疑颇重,对曹、潘等太祖朝旧臣,防范尤为严格。雍熙北伐的东路统帅曹彬就曾被诬告并获罪罢黜,因而东路军撤回雄州时,富有军事经验的曹彬,理应制止诸将的浮躁冒进,但他为避免皇帝猜忌而默许,以致岐沟关惨败。西路主将潘美对上司极谨慎,又有曹彬罢黜的教训,故坐视杨业出征殉国。王夫之评论说:“曹彬之谦谨而不居功,以避权也;潘美之陷杨业而不肯救,以避功也。将避权而与士卒不亲;将避功而败可无咎,胜乃自危;贸士卒之死以自全,而无有不败者矣。”^[42]观曹彬、潘美等兵败不久即被赦免,王夫之所论确有合理之处。

北宋实行更戍制,兵无常帅,帅无常师,虽降低了武将拥兵自重的可能性,但也极大削弱了部队的战斗力。宋太祖时期,在三边之地实行特殊政策,选

任李汉超等十四将,久在边境任职,“征榷回图之利,恣其所取,骁勇之士,听其自募”^[43],边军战斗力尚未遭到严重削弱。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取消回图贸易特权,边将更难招募骁勇之士,边军战力遭到进一步削弱。同时,宋廷为分将领军权,各部宋军不相管辖,常常配合不力。这既表现在雍熙北伐全局上东路冒进以致全线宋军功败垂成,也反映在东线曹彬为部下诸将所逼裹粮往攻涿州,西线王侁窘辱副帅,冒进擅退而潘美不能制止。张洎曾评价涿州之战说:“元戎不知将校之能否,将校不知三军之勇怯,各不相管辖,以谦谨自任,未闻赏一效用,戮一叛命者”^[44]。显然,此役评价所反映的将帅士卒互不信任的弊病同样适用于西线。这一弊端造成的恶果在此年冬季的君子馆之役中再一次展现^⑧。

4 结论

综前所述得知,潘美目光短浅,自保为上,在杨业之死中,负不可推卸的责任。他是造成杨业殉国的重要一环,而宋廷朝堂内斗,宋太宗宠幸奸佞,将从中御,压制武将自主性则是造成兵败的更深层因素。

口碑与事实真相存在一定的关联,因其更多反映的是社会的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民众的好恶,所以很容易出现较大的出入。以潘杨两姓为例,潘美作为宋廷认定的导致杨业殉国的主要责任人之一,虽然遭受惩处,不久却官复原职,继续镇守并州。虽然有宋太宗对曹彬、潘美等替帝受过的愧疚,以及时局所迫等因素影响,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廷姑息纵容的态度。这种迅速起复行为无疑会带来民间同情杨业、质疑潘美的后果,伴随宋元话本和明清小说的兴盛,潘美遂成为杨家将系列文艺作品中的主要反派。由潘美推及他人,参与雍熙北伐筹划的诸如贺怀浦等,也被描绘成参与陷害杨家将的帮凶。同时,杨业在宋朝朝野评价中的功绩地位也是不断变化的。杨业在归顺宋朝至其殉国,同时背负降将与亲信重臣两重身份,因而导致诸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如赵光义示以优厚而同僚常常构陷,杨业殉国至刘吉雪冤前则一度背负宋军失败的罪名。查明原委后,赵光义为摆脱责任,一方面厚礼追赠杨业,一方面淡化遵循太宗旨意行事的主帅潘美罪责。太宗之后,伴随皇位更替,为尊者讳的约束放松,加之边疆冲突不断,如此一来,杨业父子逐渐受到宋朝上下以及民间的赞誉。

显然,在潘杨关系演变过程中,作为口碑重要组成部分的民间文艺作品无疑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潘杨之睦是魏晋以来形成的表述两个姓氏世代结亲交好的重要典故,隋唐时期得到进一步传播,使用这一典故的多为掌握知识的文人阶层。然而自北宋杨业殉国后,伴随世俗文化的逐步兴盛,民众将造成杨业兵败归罪于潘美,潘杨对立的认识在民间流传开来。在中上层与底层的叙事对抗与大众认知度方面,后者无疑更为成功,而这种胜利也影响了民众自身,所以部分杨姓家族流传着“潘杨不结亲”的习俗。随着教育普及和教育水平的提升,学者们对历史事实的挖掘探讨,大众传媒的深入,以及依靠各类媒介传播的科普类图书、视频等,人们能够以用更加全面和理性的视角看待雍熙北伐中的潘杨矛盾,所谓“潘杨不结亲”的隐形禁锢逐渐放松。人民群众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者,他们根据现实需要创造出辉煌的文艺作品,而文艺作品又反过来重构民众认知。文艺作品为民众创建出超脱历史事实的榜样与反面教材,塑造一系列耳熟能详的故事,在激励民众去恶向善、了解历史人物及事件的同时,又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自我搭建的对立,令民众在追寻历史真相中产生偏离,造成历史形象与文艺塑造形象的交织与混乱。

当然,因潘杨矛盾产生的一系列分歧也与史料的冲突有关。官方所修史书,常“为尊者讳”,难免隐去有损朝廷高官的材料,本身就常常自相矛盾。例如,以宋朝官方史料为主要史料撰成的《宋史》为例,就存在不少遗漏、错谬和自相矛盾。因此,学界在探讨诸如“潘杨矛盾”这类深入人心的历史公案时,常面临史料来源的根本性分野:一端是代表官方意志、体系严谨却可能“为尊者讳”的官修史书;另一端是情感鲜明、传播广泛却屡经艺术加工的民间文艺作品。研究者若仅执一端,便易陷入两种偏差。例如,若过度依赖《杨家将》等文艺叙事,则可能不自觉地接受其将潘美塑造为单一反面角色的逻辑,从而简化甚至扭曲了复杂的历史权责关系;反之,若为纠偏而全然摒弃民间话语,只依《宋史》等正史进行辩护,又可能不自觉地落入传统史官“曲笔”的窠臼,弱化了历史人物在具体情境中应负的政治与道德责任。

这一困境实则揭示了历史研究中的双重挑战:既要对抗民间记忆的过度戏剧化,也要警惕官方记录的选择性遮蔽。因此,严谨的学术工作必须在两者间建立起批判性的对话:一是在史料层面“去伪存真”,二是在文艺层面“理解共情”,从而形成一种立体的历史观照。换言之,要以经过批判性考证的史实为“本”,阐明历史镜像的逻辑理路,同时对以

口碑为重要组成部分的民间文艺作品的深刻理解为“据”,洞察该镜像在长时段民间社会文化中激起的回响。它启示人们,面对任何在正史与民间文艺作品间存在巨大张力的历史主题,唯有坚持“史实核查”与“情感阐释”并重,才能在朝廷书写与百姓口传的峡谷间架起一座通往更丰富、更深刻历史理解的桥梁。

注释:

- ① 西晋荥阳中牟潘氏家族与同郡宛陵杨氏家族世代联姻,被视为士族间门当户对通婚的典范,故有“潘杨之睦”之说,后指婚姻美满、夫妻和睦、两姓世代交好。唐代李白《早夏于将军叔宅与诸昆季送傅八之江南序》云:“前许州司马宋公蕴冰清之姿,重傅侯玉润之德,妻以其子,凤凰于飞,潘杨之好,斯为睦矣。”(《李白集校注》,瞿蜕园、朱金城整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576页)
- ② 依据《宋史·潘美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8990—8993页),《名臣碑传琬琰集》之下卷一《潘武惠公美传》(杜大珪,钦定四库全书本,第1—7页)等。
- ③ 史书多有记载,如“磁州团练使郭超充押阵都监”(《宋太宗皇帝实录校注》卷35,雍熙三年二月壬子条,第436页)、“磁州团练使郭超为押阵都监”(《宋会要辑稿》,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6888页)、“磁州团练使郭超充押阵都监”(《名臣碑传琬琰集》下卷一《潘武惠公美传》,第6页)
- ④ 依据《宋史·杨业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9303—9306页),《宋史·贺令图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540页),《辽史·耶律斜轸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302—1303页),《续资治通鉴长编》雍熙三年八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621—623页),《东都事略·杨业传》(卷34,第274—276页)等。
- ⑤ 北宋防辽前线主要分为河东与河北两地,潘美、杨业为并州方面的正、副长官。河东与河北相距甚远,杨业与其他防区长官并无利益冲突,但多人跨防区上书谗毁非本防区的副帅,主帅却完全置身事外,同样不符合逻辑。即使是其他防区的主将毁谤杨业,也不能排除本防区官员暗中交结的可能性,如这一时期知邢州郭贵的族人被知德州的梁梦升依法惩处,郭贵就曾委托好友史珪诬告梁梦升。
- ⑥ 共事不一定相处和谐,古代将领常因旧日经历、双方身份差距及升迁恩宠等原因,一方或相互敌视,如三国时期的张辽、李典不和,邓艾、钟会伐蜀争权;隋代的韩擒虎、贺若弼灭陈争功;后唐李存孝、李存信彼此攻讦;南宋郾琼、王德因统兵权冲突以致淮西军变,岳飞赠楼船而张俊嫉恨,比比皆是。
- ⑦ 如蔡襄曾上书:“太宗朝,曹彬、潘美兴兵北举而无成功

者何也?……盖监军刘文裕、王侁贪功立异,主将不能夺之。”(蔡襄:《请改军法疏》,蔡襄:《蔡襄集》,吴以宁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年,第 403 页)

- ⑧ 君子馆之战是辽对宋雍熙北伐的报复性作战。此战宋军大败,李继隆失期不至,退保乐寿,桑赞部交战不利撤军,刘廷让部几乎被全歼。贺令图被俘,杨重进、李敬源等战死,刘廷让仅以身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30 雍熙三年条,第 625 页;《宋史》卷 5《太宗纪二》,第 79 页)宋军在君子馆之战的再次失利,使得北宋初期的精锐宋军实力进一步受损,助长了党项部李继迁的野心,挫伤北宋收复燕云十六州的信心,影响了北宋的对辽政策。(王晓波:《宋太宗雍熙北伐失败后的对辽策略》,《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 年第 4 期,第 100—106 页)

参考文献:

- [1] 付爱民. 明清杨家将文学与图像的接受史研究[M]. 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2016.
- [2] 余嘉锡. 杨家将故事考信录[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
- [3] 常征. 杨家将史事考[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287-322.
- [4] 欧阳修. 欧阳修全集[M]. 北京:中华书局,2001:443-444.
- [5] 董康. 曲海总目提要[M] // 俞为民,孙蓉蓉. 历代曲话汇编. 合肥:黄山书社,2009:140.
- [6] 翟灏. 通俗编[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232-233.
- [7] 俞樾. 春在堂全集[M]. 同治十年(1871)刻本:21-22.
- [8] 李慈铭. 越缦堂日记[M]. 北京:北京浙江公会,民国影印本,1920.
- [9] 赵翼. 廿二史札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4:500-516.
- [10] 卫聚贤. 杨家将及其考证[M]. 重庆:说文社,1944.
- [11] 沈起炜. 杨家将的历史和传说[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 [12] 李裕民. 宋史新探[M].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198-223.
- [13] 杨光亮. 杨家将研究[M]. 太原:三晋出版社,2013.
- [14] 蔡向升,杜雪梅. 杨家将研究:历史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 [15] 聂崇岐. 宋史丛考[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439-450.
- [16] 顾全芳. 对《杨家城和杨家将》的商榷与补充[J]. 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3):77-80.
- [17] 顾全芳. 杨家将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 河北学刊,1983(3):66-69.
- [18] 顾全芳. 杨家将研究质疑(一)[J]. 山西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1):20-24.
- [19] 顾全芳. 杨家将研究质疑(二)[J]. 山西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0(2):39-44.
- [20] 靳生禾,谢鸿喜. 杨家将人物考略[J]. 太原大学学报,2012,13(3):48-53.
- [21] 任崇岳. 杨业新论[J]. 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4):59-64.
- [22] 赵捷民. 杨家将考辨[J]. 天津社会科学,1987(2):92-96.
- [23] 李裕民. 杨家将新考三题[J]. 晋阳学刊,2000(6):67-73.
- [24] 张琼洁,万心瑶,郝一帆. 真实与虚构之间:宋辽交通线杨家将传说与正史比较研究[J]. 宋史研究论丛,2024(2):291-312.
- [25] 韩军. 杨家将戏曲溯源——基于宋金时期杨家将故事的文艺形态考察[J]. 皖西学院学报,2025,41(4):105-110.
- [26] 邓广铭,张希清. 评杨业兼论潘杨关系[N]. 上海文汇报,1981-4-6(3).
- [27] 闻立鼎. 潘美陷害杨业考辨[J]. 江苏师院学报,1981(1):40-43.
- [28] 顾全芳. 替潘美翻案[J]. 晋阳学刊,1982(6):15-20.
- [29] 张其凡. 杨业之死发覆[J]. 史学月刊,2008(5):33-40.
- [30] 徐松. 宋会要辑稿:第八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57:7619.
- [31] 毕沅. 续资治通鉴:第二册[M]. 北京:中华书局,2021:988.
- [32] 脱脱. 宋史:第二十七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 [33] 杜大珪. 名臣碑传琬琰集:下集[M] //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四四九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6.
- [34] 宋大诏令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62:346.
- [35] 曾巩. 隆平集校证[M]. 北京:中华书局,2012:495-496.
- [36] 刘敞. 公是集[M] // 北京大学儒藏编篡与研究中心. 儒藏·精华编二一七.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413.
- [37] 苏辙. 栾城集:上册[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396.
- [38]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一七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95:5775.
- [39] 张咏. 张乖崖集[M]. 北京:中华书局,2000:13.
- [40] 徐松. 宋会要辑稿:第七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57:6888.
- [41] 脱脱. 宋史:第三九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77:13679.
- [42] 王夫之. 宋论[M]. 长沙:岳麓书社,2011:58.
- [43] 吕陶. 历代名臣奏议[M]. 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5:2930.
- [44] 李焘. 续资治通鉴长编:第三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95:668.

责任编辑:张晓娜

生命周期视域下我国非遗文化品牌建设困局审视与破局

杜朝运*, 王佳雄

(泉州师范学院 商学院, 福建 泉州 362000)

摘要:加强文化品牌建设有助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但不同非遗项目因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不同而在文化品牌建设上存在差异,可以引入生命周期理论进行审视。以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作为分水岭,将非遗文化品牌建设分成原生命周期和新生命周期,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的升华。生命周期一般包含开发、成长、成熟、衰退四个阶段,处在不同阶段的非遗文化品牌具有不同的特征,也存在不同的问题。基于新生命周期对非遗文化品牌建设的考察,能够及时发现其所处阶段面临的困局,在推进非遗文化品牌建设上形成客观认识并进行精准施策。

关键词:非遗;文化品牌;生命周期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6)04-0105-06

Dilemmas and Breakthroughs in Chin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rand Building: A Life Cycle Perspective

DU Chaoyun*, WANG Jiaxiong

(School of Business, Quanzhou Normal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00, Fujian)

Abstract: Strengthening cultural brand building is beneficial to the protection and inheritanc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However, due to the varying developmental realities of different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jects, differences in cultural brand building were observed, and the life cycle theory can be introduced for examination.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Convention for the Safeguarding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y UNESCO in 2003 was used in this study as a watershed, divi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brands into the original life cycle and the new life cycle, with the latter being an elevation of the former. The life cycle generally includes four stages: development, growth, maturity, and declin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brands at different stages exhibit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face different challenges. Based on the new life cycle, exami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brands can help promptly identify the dilemmas faced at their respective stages, fostering an objective understanding and precise implementation of measures to advanc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brand building.

Key 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cultural brand; the life cycle theory

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与物质文化遗产不同,非遗是对传统生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的延续,具有活态属性,此即意

味着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具有特殊的实践性,体现作为主体的现代人与作为客体的非遗在历史长河里的信息交流,非遗保护和传承的难度由此可见。有鉴

收稿日期:2026-01-20 * 通讯联系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8BJL079)。

作者简介:杜朝运(1973—),男,福建泉州人,教授,博士;王佳雄(1999—),男,陕西咸阳人,硕士研究生。E-mail:cydu@xmu.edu.cn

于此, 各界人士纷纷献计献策, 有的强调非遗本质上是民众生活的一部分, 故其保护与发展的主体应是社区民众、传承人及相关社会各方, 并应遵循民众固有的方式与传统^[1]; 有的指出非遗保护作为一项较新的事业, 需坚持“见人见物见生活”的基本理念, 注重实践, 并尊重传承人群的主体地位和权利^[2]; 还有的提出非遗保护应通过“以文化想象铸牢共同体意识、以文化智慧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以文化创新提升国家实力和影响力”这三条路径, 积极融入国家战略^[3]。随着 200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通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和 2011 年我国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作为标志, 并成为一种文化品牌。本研究拟基于生命周期理论对非遗的文化品牌建设进行探索。

1 文献综述

品牌不仅是一种标识, 更是一种无形资产。作为一类特殊的品牌, 非遗应基于工匠精神、义利兼顾的经济伦理和东方生活美学, 打造“真品牌”“善品牌”与“美品牌”^[4]。实施非遗品牌化运营能够激发非遗自身活力、延续传承能力, 并通过保护知识产权, 推动非遗从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生产力^[5]。有学者甚至认为非遗保护最有效的策略是导入品牌化管理, 认为只需找到适合品牌定位的文化主题, 其他问题便可迎刃而解^[6]。但当前非遗文化品牌尚存在概念模糊、定位不准、关系处理不当、本土文化保护意识偏弱等问题^[7], 数字时代的传播特征如可塑性、流变性、无界性、共享性和交互性也给非遗文化品牌建设带来了挑战^[8]。为此, 非遗文化品牌建设要与现代市场需求结合, 以盘活文化资源和激发其经济价值^[9], 并且要通过技术赋能与传播创新, 促进非遗的活态传承与数字转型。还有一些研究则针对具体的非遗项目, 探讨其品牌建设问题, 如泉州提线木偶戏, 应将其视觉元素与现代设计相融合, 通过品牌化视觉转化, 助推该非遗项目的保护与传承^[10]; 又如山东省惠民县通过设计民俗曲艺集市——胡集书会的文化品牌形象方案, 有效地推广与宣传了这一地方民俗文化盛会^[11]。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发现, 虽然在非遗的保护和传承方面, 加强文化品牌建设已基本成为共识, 且已有各种具体的技术路线或行动方案, 但基本上都是就品牌论品牌, 鲜有研究着眼于非遗文化品牌的整体发展脉络。鉴于此, 本研究引入生命周期理论, 聚焦非遗文化品牌的发展过程, 从规律上把握不同生命周期阶段非遗文化品牌面临的问题及相应发展对

策, 以期对非遗的保护和传承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解决思路。这也是本研究在非遗文化品牌研究方面的边际贡献所在。

2 非遗文化品牌的生命周期概念解读

生命周期从本义上来看是指生命个体从生到死的发展过程。现其概念被广泛应用到经济、环境、社会、政治、技术等多个领域。不仅非遗自身, 由其衍生出的文化品牌也同样具有生命周期。200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引起世界各国对非遗的重视并相继出台相关政策, 成为非遗保护一个重要的分水岭: 之前非遗及非遗文化品牌的发展多处于自生自灭的自发状态, 之后则处于积极主动的自觉状态。为此将非遗文化品牌的生命周期分为两个阶段: 原生命周期和新生命周期。

2.1 非遗文化品牌的原生命周期

处于原生命周期成熟阶段的非遗。在这一阶段非遗传承人更多是为了维持生活所需, 但对于非遗如何在成熟期保持稳定发展势头、避免过早衰落的思考仍然较少, 对非遗保护的重视程度不够, 难以形成有竞争力的非遗文化品牌。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渐确立, 非遗产品面对市场上出现的越来越多的物美价廉的替代品, 其生存地位受到威胁, 成熟发展的稳定状态被打破, 面临的竞争日益激烈。例如, 作为具有 1000 多年历史的南海非遗藤编是我国藤编代表之一, 改革开放之后国家支持手艺人个体创业, 加之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对物质产品需求增加, 使南海藤编不仅迅速进入了成长期并且进入了成熟发展阶段, 短期内南海大沥便有上千家藤厂作坊, 各家各户都在门口编藤的场景成为当地的一大特色。但好景不长, 恶性竞争越来越严重, 由于塑料制品以及其他廉价便捷的生活物品涌入市场, 其成熟阶段犹如昙花一现, 随后藤编行业便遭遇了雪崩, 大批的个体户关门倒闭, 非遗藤编快速走向衰退。可见, 对于处在原生命周期成熟阶段的非遗, 如果在思想上不能未雨绸缪, 又缺少科学保护的手段, 非遗就存在发展的脆弱性, 容易遭受外力的破坏, 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

处于原生命周期衰退阶段的非遗。应该说, 目前大多数非遗都处于这个阶段, 亟待保护。在这个阶段, 非遗受到来自市场、科技、时代观念等因素的多重冲击, 发展难以为继。以景德镇瓷器为例, 瓷器制造曾是景德镇的经济支柱, 但在 20 世纪 90 年代景德镇的制瓷业就进入了衰退期, 制瓷业在景德镇

的经济占比中越来越少。面对社会所需的艺术瓷、生活瓷的供给空白,景德镇的小作坊制瓷产业分散且欠缺专业人才,无法进行深入研究,其发展模式多年不变,产品种类单一缺乏新意,制瓷技艺传承断裂。加上知识产权保障不力,盗用景德镇瓷器品牌、侵犯景德镇瓷器外观设计专利等事件屡见不鲜,使景德镇瓷器的市场份额缩水价格滑落。可见,景德镇作为千年瓷都,在非遗原生命周期的衰退阶段,由于缺少合理的介入手段,使得制瓷业、制瓷工艺以及瓷器品牌均遭受到严重的冲击。这也说明,处于衰退期的非遗单靠自身力量无法应对外界的多重冲击,必须注入新的活力使其实现蜕变,形成更高层次的发展。

2.2 非遗文化品牌的新生命周期

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之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法规,例如在国家层面先后发布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以及制定《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等具体法律,这不仅为非遗的保护和发展注入新活力,更让非遗进入了新生命周期。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理论,非遗的新生命周期不是对原生命周期的全盘否定,而是对原生命周期的扬弃,在原生命周期的基础上实现新的升华。这意味着,在新的发展环境下,在外界有利因素介入之后,处于原生命周期成熟阶段的非遗不仅不会衰退还会呈现出发展向好的势头,处于原生命周期衰退阶段的非遗则有了再度重新发展的机会。通过对非遗资源更加有效的整合利用,对非遗保护和发展规律更加科学的把握,可以促使其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以凤翔泥塑为例,在新生命周期里,胡新明等传承人在生产方面不断对用料、工艺、造型进行创新,并将新技术传授给其他凤翔泥塑制作者,形成协同发展,变“单打独斗”为“抱团发展”,实现规模化量产打造出“中国泥塑第一村”的招牌。在销售方面主动利用现代信息传播技术,扩大凤翔泥塑的传播面和影响力,使凤翔泥塑这一非遗文化品牌成功根植在市场之中,2023 年泥塑产业达到年产值 5280 万元,带动了乡村振兴和文化振兴。

非遗凤翔泥塑已有千年历史,但在新生命周期里依旧焕发出新的生机并保持旺盛的发展势头。其经验在于非遗的保护和发展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外界的能量,包括新生命周期良好的政策和社会环境、先进的现代科技元素、时尚的流行概念等。既保持非遗的原真性,又融合更多元的外界因

素,非遗才能突破原生命周期里自身发展的局限,具备更强的环境适应性和发展韧性。

3 我国当前非遗文化品牌建设的困局审视

加强非遗文化品牌建设是我国非遗保护和发展的的重要组成部分。厘清非遗文化品牌建设存在的问题不宜笼统地大而化之,因为不同的非遗项目文化品牌处于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因此必须合理判断所研究的非遗项目处于生命周期中的具体阶段(开发阶段、成长阶段、成熟阶段或衰退阶段),据此精准分析存在的问题,这样才能在推进非遗文化品牌建设时有明晰的方向和针对性的策略。

3.1 开发阶段存在的问题

打造非遗文化品牌的目的是为了扩大非遗的影响力并推动非遗的长足发展,期望在保护和发展的同时,又能使非遗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处于开发阶段的非遗文化品牌具有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一些非遗文化品牌在建设初期便夭折。品牌意识薄弱、品牌定位模糊是非遗文化品牌在开发阶段存在的主要问题。

品牌意识薄弱。尽管非遗承载着许多历史价值和文化传统,但将其转化为具有一定标识的品牌绝非易事。非遗传承人以及相关非遗从业者往往更注重非遗的技艺,缺乏对非遗文化品牌的认知,没有意识到非遗文化品牌对于非遗传承以及非遗推广的重要性。其品牌意识的缺失导致非遗文化品牌在开发阶段难以形成独特的文化理念,消费者对该品牌印象不稳定,难以形成忠诚度,也不利于拓展新市场和提升产品价值。

品牌定位模糊。精准定位是品牌成功的必要因素之一,它决定了品牌在消费者心中的形象和地位。处于开发阶段的非遗文化品牌,由于非遗自身的独特性,一方面缺乏建设品牌的经验,另一方面也缺乏对市场的深度分析和对消费者需求的充分调研,建设非遗文化品牌时定位模糊甚至不准确,导致非遗文化品牌在市场没有形成合适的市场定位和价值点,与消费者之间的情感联系薄弱,难以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3.2 成长阶段存在的问题

文化品牌的建设绝非一朝一夕之功,它不能只关注短期的业绩,而要有长期的发展策略。但在现实中,处于成长阶段的非遗文化品牌往往急功近利、急于求成,“速成”的结果就容易产生品牌内涵表层化、品牌展示手段单一、品牌建设资金不足等问题。

品牌内涵表层化。非遗是有文化积淀的,非遗

文化品牌建设的核心是文化和在文化基础上的创意。但非遗文化品牌建设求急求快的心理导致对于非遗自身内涵、细节的把握不够充分,品牌缺乏独特的文化魅力,也未能有效结合现代创意手段,影响到品牌的推广效果。

品牌展示手段单一。非遗更多是一种动态的技艺而不是通过技艺生产的非遗产品。但很多非遗文化品牌建设往往仅靠在博物馆或民俗展览馆等场所展示非遗产品,这种静态展示流于表面,无法使人们深入了解非遗的真正内涵或核心要素,形成不了共鸣,更难以转化为对非遗产品的忠诚。

品牌建设资金不足。非遗文化品牌的建设离不开资金的支持,但非遗本身在人才支撑、技艺传承、产品开发、市场推广等环节无一不需要资金。在资金来源有限的情况下,文化品牌建设因为较“虚”,投入的资金往往容易被减少。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和有效的融资渠道使非遗在发展中难以建设成具有竞争力的文化品牌。

3.3 成熟阶段存在的问题

非遗文化品牌在生命周期的成熟阶段已经具有一定的市场影响力,但随着社会不断发展、消费人群换代、消费意识更新,出现了不能及时更新品牌时代内涵、为了迎合市场倾向过度商业化以及市场竞争力下降等问题。

品牌与时代脱节以至概念老化。经过长期发展,非遗文化品牌已有一定的知名度,但由于缺乏充足的创新力以及市场洞察力,基于传统的产品以及固定的营销模式使非遗与消费者的情感联系不足,品牌共情力衰退,市场认知度与知名度不匹配等原因,非遗文化品牌在消费者视野中逐渐淡化。非遗相关者却无法及时应对非遗文化品牌老化问题。

过度商品化乃至出现文化异化。在市场化运作中,很多非遗项目只关注短期利益,为了提高销售额而盲目迎合消费者的快餐式需求,滥用非遗项目,将非遗技艺和产品简单化、粗糙化,忽略了非遗的文化价值。这样表面上看似热热闹闹,从长远看则逐渐失去非遗的文化之“魂”,不利于长远发展。

同质竞争导致市场优势弱化。在非遗文化品牌的成熟阶段,非遗项目面临着激烈的同质化的市场竞争,此时已有不少类似的文化品牌进入到市场与其抢占市场份额。而且,这些新品牌通常具备更强的市场洞察能力和创新能力,能够迅速捕捉市场所需和消费者所求,而非遗文化品牌在成熟阶段往往趋向保守,难以在市场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

3.4 衰退阶段存在的问题

当非遗文化品牌进入衰退期,其发展已经出现疲软状态,不仅产品销售量下降,市场范围缩小,而且供给也出现滑落,逐渐退出市场。这两方面的问题集中表现在产品与市场需求脱节以及非遗保护和传承困难。

产品与市场需求脱节。无法适应现代社会潮流特别是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和兴趣爱好,是很多非遗项目走向衰退的重要原因。非遗只依靠传统的产品或技艺是不够的,必须关注时代所需,与时代特色相结合,形成传统与现代的碰撞,走进年轻人的内心,获得他们的认可。

非遗保护和传承困难。非遗项目主要依靠老一辈非遗传承人通过长期实践的经验总结并以传授教习的方式对年轻非遗传承人进行传授。而在衰退期,因为市场前景不乐观,年轻人不愿意从事非遗项目,随着老一辈传承人年龄不断增长和相继离世非遗技艺传承出现断层。此时,非遗若再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政策和资金支持,则其品牌退出市场在所难免。

4 我国非遗文化品牌建设的破局对策

非遗文化品牌的建设非一日之功,在其原生命周期中已历经沧桑。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国际国内各种非遗保护制度的出台,非遗文化品牌进入了新生命周期。不同非遗项目需要从自身发展的实际情况判断处于新生命周期的何种阶段,在不同阶段面临的具体问题不同,必须有针对性地考察分析才能“对症下药”,达到“药到病除”的效果。

4.1 开发阶段的对策

尽管当前非遗面临较好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但仍有很多非遗项目品牌意识淡薄,既没有品牌建设的意识,也没有品牌建设的能力,以至非遗资源大量闲置,无法活化利用。处于开发阶段的非遗文化品牌建设的主要任务不在于如何使非遗文化品牌迅猛发展,而是要树立非遗文化品牌经营理念,明晰品牌方向定位,为之后非遗文化品牌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树立品牌经营理念。这是非遗文化品牌建设的基础与前提。文化品牌作为非遗对外形象与价值内涵的集中体现,有助于赢得外界信任与认可,并推动非遗进入良性发展轨道。面对日益多元的社会环境,非遗传承主体亟须强化品牌意识,充分认识到打造非遗文化品牌的重要性。正所谓“酒香也怕巷子深”,若缺乏品牌经营理念与系统化的品牌意识,则难以有效盘活非遗文化资源,更难以在激烈的文化

市场竞争中建立优势。树立品牌经营理念要从客户的需求出发,避免短视行为,并基于自身特色形成有效的市场区隔。

建立差异化定位和市场适配机制。非遗文化品牌定位需基于对其自身文化内核、技艺特色与历史脉络的深入理解,同时结合对目标市场及受众的细致分析,避免同质化竞争与盲目跟风。应通过挖掘非遗项目的独特基因,塑造具有辨识度的品牌形象与叙事体系,使其既彰显文化个性,又能与现代消费需求有效对接。在当前文旅融合持续深化的背景下,非遗产品的受众面不断扩大,非遗品牌更需把握市场机遇,精准定位品牌发展方向,构建与其文化价值相契合、兼具市场适应性的品牌体系。

4.2 成长阶段的对策

处在成长期的非遗文化品牌需要加强品牌宣传,进一步提高品牌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为此,必须深挖非遗品牌的文化内涵,打造核心竞争力,并在静态展示基础上加强活态展示,而这些都需要足够的资金支撑。

深挖核心文化价值内涵。非遗项目文化品牌的核心竞争力来自于对非遗项目内在价值的深度提炼与创造性转化,这包括地域特性、文化渊源、工艺特色及精神意蕴等层面。应在充分尊重非遗本真性的基础上,进行系统化的梳理与阐释,并通过现代化、艺术化的表达方式予以包装推广,使非遗项目的文化内涵得以清晰传达并与当代审美及消费需求相接轨。同时,为持续提升品牌生命力,必须建立产品优化与客户关系管理并行的动态机制。一方面,应结合市场反馈与技术可能,对非遗产品的功能、形态、体验进行迭代升级;另一方面,需重视消费者联结,通过互动传播、社群运营、服务提升等方式增强用户黏性与文化认同,从而在满足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中巩固品牌差异性与核心竞争力。

加强活态展示与沉浸式传播。非遗产品不仅承载着审美与实用功能,其更深层的价值在于背后的工艺流程、历史脉络与文化观念。为突破静态展示的局限性,应积极构建可感知、可参与、可体验的活态展示场景。通过工作坊、展演互动、传承人现场演示等形式,生动呈现出非遗的制作过程、技艺细节及其文化语境。借助沉浸式技术(如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数字孪生等)与场景化叙事,打破时空限制,营造身临其境的体验环境,不仅能够消解非遗在公众认知中的神秘感,更能激发情感共鸣与文化认同,从而在人们心中树立起鲜活、立体的品牌形象,持续深化非遗文化品牌在市场中的渗透力与影响力。

开展多元融资并强化政策协同。当前我国非遗项目众多、分布广泛,仅依靠单一财政支持难以满足发展需要,亟需构建政府引导、市场参与、社会协同的多元化资金支持体系。地方政府应通过制度创新,出台针对性的扶持政策,如设立非遗发展专项资金、提供税收优惠或项目补贴,并积极搭建对接平台,引导社会资本、金融机构与非遗项目合作。推动形成“政府-企业-非遗主体”三方联动机制:政府通过提供信用担保、采购支持、品牌推介等政策工具降低企业参与风险;企业依托市场渠道与生产资源,帮助非遗实现产品化、规模化转型;非遗传承主体则专注于技艺提升与文化内涵挖掘。此类协作不仅有助于缓解资金压力,更能促进非遗品牌在现代产业链中找准定位,实现从“输血”到“造血”的可持续发展,为其向成熟阶段迈进奠定坚实的基础。

4.3 成熟阶段的对策

非遗文化品牌进入成熟期后虽具有一定的市场影响力和受众群体,但也蕴藏着品牌老化的风险。面对新兴的市场力量,其竞争力会下降,而且为了应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往往容易过度商品化。所以,在这一阶段,非遗需要减缓品牌老化速度、协调商业性和文化性的关系,守住竞争优势。

减缓品牌老化速度。虽然品牌老化是生命周期发展的自然规律,但在成熟阶段仍然要利用各种社会资源减缓品牌老化速度、减轻品牌老化程度。非遗传承主体应保持开放包容的发展理念,主动顺应社会文化与消费市场的多元变迁,探索跨界融合的创新路径。可通过与知名企业、设计机构或文化 IP 开展联名合作,共同开发兼具非遗内核与现代审美的新产品、新服务或新体验。此类跨界实践不仅能够拓宽非遗品牌的受众范围与市场渠道,也有助于在创新中延续非遗的文化基因,并通过商业反哺为传承注入可持续动力。同时,应注重利用数字媒体、社交平台等现代传播手段,构建年轻化、互动性的品牌叙事,使非遗品牌在保持本真性的同时,持续与当代社会对话,从而延长品牌的生命周期,实现文化价值与时代生命力的双向增强。

合理融合商业价值与文化价值。非遗的活化传承并非一味迎合市场,其核心使命仍在于文化价值的阐释、保存与传播。因此,需在以下两方面协同推进:一方面,应加强政策引导与市场监管,通过标准制定、认证管理、动态评估等方式,维护非遗产品与服务中文化内涵的主体性,防止过度商业化导致的文化稀释与异化;另一方面,非遗品牌供给方必须坚守文化本真性,建立健全内部品牌管理制度,明确文

化红线与创新边界,在产品开发、营销推广等环节中,始终以传承非遗核心技艺、精神与美学为首要原则,确保其在市场环境中不失本色。只有通过制度保障与主体自觉的双重约束,非遗品牌才能在获取经济收益、扩大传播范围的同时,持续发挥其文化教育、身份认同与精神滋养的功能,最终实现商业活力与文化使命的长期平衡。

维持竞争优势。非遗文化品牌在成熟期的发展趋于稳定平缓,市场饱和度较高,这时竞争变得非常激烈,非遗经营者不能消极守成,必须不断评估市场情况,灵活采取相应策略。这要求其持续监测市场环境 with 消费趋势变化,及时调整产品结构、服务模式或传播策略,以响应甚至引领不断更新的受众需求。非遗经营者还须持续巩固并提升品牌的核心形象与价值观,通过系统化的品牌管理、稳定的品质输出、深入的文化叙事,强化品牌在消费者心中的独特地位,维护长期积累的品牌声誉,深化与用户之间的情感联结与互动关系。只有将市场端的灵活应变与品牌内核的坚守深化相结合,非遗文化品牌才能在成熟期突破增长瓶颈,延续生命力,实现在稳定中寻求新机、在竞争中保持引领的可持续发展。

4.4 衰退阶段的对策

非遗文化品牌处于衰退期,意味着非遗的供给不仅无法满足需求,而且供给自身也出现危机。因此,在衰退阶段需要解决非遗产品供给与市场需求的匹配问题以及非遗保护和传承的断层问题。

有效联结产品供给和市场需求。进入衰退期的非遗文化品牌,往往面临产品与市场需求脱节、品牌吸引力下降的困境。非遗传承主体必须主动开展系统、深入的市场调研,精准识别消费者偏好的变迁、市场需求的结构性变化,以及自身产品、服务与当代生活之间的断层。基于调研结果,应理性评估可用资源,集中力量对非遗项目进行创造性调整与转化,例如开发更符合现代使用场景的衍生产品、设计体验性更强的轻量化服务。关键在于打造既能保持非遗核心文化基因又具备当前市场接纳度的特色产品与服务,为品牌争取必要的生存空间与缓冲期。这一阶段也需保持战略耐心,在维持存续的基础上持续观察文化消费趋势与技术社会变革,积极等待或主动培育新的市场机遇,从而为品牌的复苏或转型积蓄力量。

防止非遗保护和传承的断层。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在整个生命周期中都要关注,在衰退期尤其要重

视。非遗的公共文化价值往往超越其商业价值,品牌存续的基础更依赖于非遗本体的活态传承。必须将传承人及从业者置于核心位置,采取切实措施保障传承生态的连续性。针对年长的传承人,应系统开展抢救性记录与传播工作,通过打造非遗数字化课堂、摄制影像资料库、开设线上线下传习课程等方式,打破地域与时间限制,使其技艺与知识得以完整保存并广泛传播,为更大范围内的爱好者提供学习路径,扩大传承覆盖面。对于年轻传承人与从业者,则需要通过政策倾斜、资金扶持、孵化平台等综合机制,改善其生存与发展环境,增强行业吸引力,确保人才“进得来、留得住、能成长”。只有形成老中青衔接、官方与民间协作、传承与创新并重的可持续发展生态,非遗文化品牌才能在衰退期保持根基不坠,并为未来的复苏保留文化火种与人力资源,从而真正实现非遗的保护和传承。

参考文献:

- [1] 黄涛.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J]. 河南社会科学, 2014, 22(1): 109-117, 124.
- [2] 项兆伦. 我国非遗保护的认知与实践[J]. 时事报告(党委中心组学习), 2018(5): 88-104.
- [3] 宋俊华. 非遗保护融入国家战略的逻辑与路径[J]. 文化遗产, 2024(3): 1-8.
- [4] 王红君, 张锐, 徐毅文. 《非遗里的中国》: 在特色品牌建设中弘扬真善美文化[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23(10): 46-49.
- [5] 覃萍, 张发钦. 生产性保护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品牌化运营研究——以广西为例[J]. 广西社会科学, 2014(10): 188-193.
- [6] 李辉. 现代品牌化管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运用——以山东为例[J]. 学术探索, 2013(10): 91-94.
- [7] 陈玉茜, 尹红. 艺术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视野中的区域文化品牌建设新探[J]. 四川戏剧, 2018(10): 57-62.
- [8] 吴建宏, 王莉. 非遗文化品牌的数字化转型与传播探析[J]. 科技传播, 2023, 15(12): 84-87.
- [9] 杨茜茜.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视野下文化品牌建设研究——以河东文化为例[J]. 文物鉴定与鉴赏, 2024(10): 173-176.
- [10] 师婧婧. 泉州提线木偶戏文化的品牌形象设计[D]. 北京: 中国戏曲学院, 2023.
- [11] 阎之秀. 胡集书会民俗文化品牌设计与推广研究[D]. 济南: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2023. 责任编辑: 张晓娜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高校科技伦理教育的时代意涵与实践路径

吴姗姗^{1*}, 窦余仁²

(1. 安徽大学 商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2. 安徽大学 大数据与统计学院, 安徽 合肥 230601)

摘要: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对高校科技人才培养提出创新力与伦理力兼备的要求。当前高校科技伦理教育存在课程碎片化、教学重灌输、师资与评价薄弱等困境,本研究在价值上从“技术优先”转向“人文与科技融合”,内容上纳入人工智能伦理、数据隐私等前沿议题,方法上借助虚拟现实、生成式人工智能推进沉浸式教学,进而构建四位一体实践路径:理念上确立“科技-伦理-创新”融合观;体系上打造“通识+专业+实践”模块化课程;方法上推行案例库、情境模拟与人机协同思辨;机制上强化跨学科师资、评价改革与产教协同。因此,高校科技伦理教育应升华为“责任创新教育”,为新质生产力培育负责任的科技行动者。

关键词:新质生产力;科技伦理教育;时代意涵;实践路径;负责任创新能力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6)04-0111-06

Era Implications and Practical Paths of Univers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hics Education by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WU Shanshan^{1*}, DOU Yuren²

(1. School of Busines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Anhui;

2. School of Big Data and Statistics, Anhui University, Hefei, 230601, Anhui)

Abstract: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with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s the core driving force, require universities to cultivat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s with both innovative capacity and ethical literacy. At present, th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hics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confronted with dilemmas such as fragmented curricula, cramming-dominated teaching, and inadequate teachers and evaluation systems. It expounded in this study that in terms of values, shifting from “technology priority” to the “integration of humanities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terms of content, incorporating cutting-edge issues 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thics and data privacy, in terms of methods, promoting immersive teaching with the help of virtual reality and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urthermore, it constructed a four-in-one practical path: establishing an integrated vision of “science-technology, ethics-innovation” at the conceptual level, building a modular curriculum system of “general education + specialty education + practical training”, adopting case databases, situational simulation and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ve critical thinking in teaching methods and strengthening interdisciplinary faculty development, evaluation reform and industry-education collaboration in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The study held tha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hics education in higher education should be elevated to “responsible innovation education”, so as to foster responsibl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practitioner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收稿日期:2026-04-02 * 通讯联系人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4BTJ034)。

作者简介:吴姗姗(1981—),女,安徽合肥人,讲师,硕士;窦余仁(1978—),男,安徽合肥人,高级政工师,博士生导师。E-mail: 05124@ahu.edu.cn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hics education; contemporary implications; practical approach; responsible innovation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生物技术、新材料等为代表的前沿科技正在深刻重塑社会生产方式与经济发展格局。在这一背景下,“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标志着我国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知跃升。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以高质量发展为根本目标,强调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与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有机统一。它不仅要求技术的先进性与效率性,更蕴含绿色、智能、共享、可持续等价值取向,对人才的知识结构、创新能力与价值素养提出了全新要求。高校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与创新第一动力的关键结合点,肩负着培养科技工作者与创新引领者的时代使命。然而,科技在释放巨大进步动能的同时,也引发了诸如算法歧视、数据隐私泄露、基因编辑伦理争议、人工智能责任归属等一系列严峻的伦理问题。这些问题在新质生产力的催化下愈加复杂化、系统化与全球化,使得科技伦理教育从“附加项”逐渐转变为“必选项”。反观当前高校科技伦理教育的现实境况,课程内普遍滞后于技术迭代,教学方式偏重规范灌输而缺乏情境思辨,学科壁垒导致伦理教育与专业教育相互割裂,难以有效回应新质生产力对科技人才“创新力与伦理力兼具”的复合要求。因此,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视角出发,重新审视高校科技伦理教育的时代意涵,探索构建与之相适应的实践路径,既是对国家战略需求的主动回应,也是提升高校人才培养质量、推动科技向善发展的内在需要。本研究旨在系统阐释新质生产力视域下高校科技伦理教育的价值重塑、内容拓展与方法更新,诊断当前教育实践中的主要困境,进而提出理念引领、体系重构、方法创新与机制保障四位一体的实践路径,以期为新时代高校科技伦理教育改革提供学理支撑与行动参照。

1 核心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1.1 新质生产力的内涵与特征

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导、摆脱传统经济增长路径、符合高质量发展要求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从理论渊源看,它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强调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与产业深度转型升级的协同驱动^[1]。与传统生产力相比,新质生产力的核心标志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而不仅仅是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的数

量扩张^[2]。具体而言,新质生产力具有四个突出特征。第一,技术驱动性。它以人工智能、量子信息、生物制造、清洁能源、新材料等前沿技术为技术底座,技术迭代速度显著加快,交叉融合特征日益明显。第二,系统融合性。新质生产力推动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使研发、生产、管理与服务各环节形成高度耦合的生态系统,单一技术突破往往引发系统性变革。第三,价值导向性。新质生产力内在地包含绿色、智能、安全、共享等价值取向,要求科技创新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公平与生态可持续,而非单纯追求经济产出。第四,动态迭代性。由于技术演化加速,新质生产力在释放巨大进步动能的同时,不断催生出前所未有的伦理风险与治理难题,如算法歧视、数据垄断、基因编辑边界模糊等。这些特征共同决定了新质生产力对人才素质提出了全新的复合要求:科技工作者不仅需要具备跨学科的知识整合能力与技术创新能力,更要具备对技术社会后果的敏锐感知与伦理判断力。

1.2 高校科技伦理教育的内涵与目标

高校科技伦理教育是指高等学校面向全体学生(尤其以理工科及新兴交叉学科学生为重点对象)系统开展的,旨在培养其科技伦理意识、伦理推理能力与负责任创新能力的教育实践活动。就其内涵而言,可从知识、能力与态度三个维度加以把握^[3]。在知识维度,科技伦理教育涵盖科技活动应遵循的基本伦理原则,以及特定技术领域的前沿伦理议题。在能力维度,它强调培养学生识别伦理问题、开展道德推理、权衡多方利益、作出负责任决策的实践技能。在态度维度,它致力于塑造科技向善的价值取向、对不确定性的敬畏之心以及服务公共福祉的担当精神。基于此,高校科技伦理教育的目标可以从三个层次加以界定。首先是基础目标:使学生了解科技活动中的基本伦理规范与法律法规,具备识别常见伦理风险的能力。其次是核心目标:培养学生的伦理敏感性与道德想象力,使其能够在技术设计、实验研究、成果转化等环节中主动进行价值反思与伦理预判。最后是升华目标:塑造“负责任的创新者”,即能够在技术不确定性与利益冲突中,坚持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推动科技发展真正惠及人类与自然。值得强调的是,高校科技伦理教育不应被窄化为规避法律风险的“合规教育”,而应升华为融入专业教育全过程的“价值启蒙教育”与“责任创新教

育”。

1.3 新质生产力与科技伦理教育的逻辑关联

新质生产力与高校科技伦理教育之间并非简单的背景与回应关系,而是呈现出深刻的逻辑互嵌与功能互补。首先,新质生产力为科技伦理教育提供了新的内容场景与方法工具。新质生产力催生出一系列传统伦理框架难以完全覆盖的新兴议题,例如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责任归属困境”、自动驾驶汽车的“算法抉择难题”、基因驱动技术的“生态影响不确定性”等^[4]。这些鲜活议题天然适合作为伦理教育的案例素材与思辨抓手,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批判性思维。同时,新质生产力所依赖的大数据、虚拟现实、数字孪生等技术,也为伦理教学创造了沉浸式、交互式的模拟环境,使学生在接近真实的伦理困境中进行体验式学习与决策训练。其次,科技伦理教育是新质生产力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性保障。历史经验表明,缺乏伦理规约的科技创新可能带来隐私侵蚀、社会歧视、生态破坏乃至人类安全风险,从而反噬生产力发展的长期成果。高校作为科技人才的主要供给方,其伦理教育质量直接决定着未来科技活动中的伦理风险防控能力。只有将伦理教育深度嵌入科技人才培养体系,才能从源头培育出既敢于创新又心怀敬畏的“负责任的科技行动者”,从而为新质生产力的行稳致远提供价值导航与制度韧性。综上,新质生产力视域下的高校科技伦理教育,本质上是一场回应时代需求的教育范式重构:它要求打破传统伦理教育与专业教育彼此隔离的“两张皮”现象,推动科技知识生产与伦理价值反思的深度融合。

2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高校科技伦理教育的时代意涵

新质生产力的崛起,不仅重塑了生产力发展的内在逻辑,更对高校科技伦理教育提出了深层次的变革要求。这种变革并非零散的修修补补,而是涉及价值取向、内容体系与教学方法三个维度的整体性重构。准确理解这些时代意涵,是构建有效实践路径的认识前提。

2.1 价值重塑:从“技术优先”到“人文与科技融合”

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容易在实践层面形成“技术优先”的隐性假设,即认为技术突破本身就是目的,效率提升天然等同于进步。然而,新质生产力所内含的绿色、智能、共享、可持续等价值导向,恰恰要求超越这种单一的技术决定论。

相应地,高校科技伦理教育的首要时代意涵,在于推动价值取向的根本重塑:从以“技术可行性”为中心,转向“人文与科技深度融合”的教育理念^[5]。具体而言,这种重塑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重新定位科技人才的价值坐标。传统教育侧重专业技能的培养,将伦理素养视为锦上添花的软实力;而在新质生产力视域下,伦理判断力与技术创新力同等重要,是不可或缺的核心素养。第二,强化“科技向善”的价值引领。教育不应止步于告知学生“能做什么”,更要引导他们追问“应该做什么”,在面对技术不确定性与利益冲突时,能够自觉地将人的尊严、社会公正与生态可持续发展作为价值底线。第三,倡导“负责任创新”的实践逻辑。这意味着在科技研发与应用的全过程中,伦理考量不再是事后补救的“质检环节”,而应前置为设计的约束条件与评估的核心指标^[6]。通过这种价值重塑,高校科技伦理教育将助力培养既能驾驭前沿技术又能坚守人文精神的“新型劳动者”,从而为新质生产力注入有温度的价值内核。

2.2 内容拓展:回应新质生产力中的新兴伦理议题

新质生产力催生了大量难以直接套用传统伦理框架的新兴议题,这迫使高校科技伦理教育必须大力拓展其内容边界。如果说过去的科技伦理教育更多聚焦于科研诚信、实验安全、知识产权等相对稳定的规范领域,那么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教育内容需要向前沿性、动态性与系统性方向深度延伸。首先,要纳入由颠覆性技术直接引发的新型伦理问题。例如,人工智能领域的算法偏见与歧视、黑箱决策的可解释性、生成式内容的责任归属;数据领域的隐私边界模糊化、数据垄断与数字鸿沟;生物技术领域的基因编辑生殖应用、合成生物学的生态风险以及自动驾驶、智能武器等自主系统的“道德编程”困境^[7]。这些议题具有高度的情境依赖性与价值冲突性,是训练学生伦理思辨能力的理想素材。其次,要关注新质生产力带来的系统性伦理挑战。不同于传统生产力的局部影响,新质生产力往往通过技术-产业-社会的联动机制产生跨领域、长周期的影响。例如,大规模自动化引发的就业结构转型与分配正义问题;碳捕获、地球工程等气候干预技术涉及的跨代责任与全球治理难题以及技术加速背景下的人性异化与自主性侵蚀风险。这些议题要求伦理教育突破个案分析,培养学生从复杂系统视角识别、评估与回应伦理风险的能力。最后,内容拓展还应包括积极的“设计伦理”与“价值敏感设计”方法。教育不仅要让学生知道“什么不该做”,更要教会他们如何在

技术研发早期就将伦理要求转化为可操作的设计参数,实现“事先的伦理嵌入”。通过系统性地回应上述新兴议题,高校科技伦理教育才能切实提升学生应对新质生产力伦理挑战的胜任力。

2.3 方法更新:基于技术手段的教育创新

新质生产力不仅改变了教育“教什么”,也深刻影响了“怎么教”。科技伦理教育长期面临一个核心难题:伦理困境往往具有高度的情境性、模糊性与情感张力,而传统的课堂讲授、条文背诵难以真正培养学生的伦理感知与决策能力^[8]。新质生产力所提供的一系列前沿技术工具,恰恰为破解这一难题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因此,方法的时代意涵集中体现为:以新质生产力的技术手段反哺科技伦理教育,实现从“说教式”到“体验式、参与式、生成式”的根本转变。具体而言,可从四个方面把握。第一,沉浸式情境教学。利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与数字孪生技术,构建高度逼真的伦理困境场景,例如自动驾驶汽车在紧急情况下的抉择模拟、人工智能系统在资源分配中的偏见测试、基因编辑婴儿的伦理听证会等。学生在沉浸式体验中进行角色扮演与即时决策,能够更深刻地理解伦理冲突的复杂性,并从中获得情感共鸣与反思契机。第二,数据驱动的案例教学。依托大数据分析与自然语言处理技术,动态抓取真实的科技伦理事件,建立实时更新的伦理案例库。这些案例贴近时代脉搏,具有高度的时效性与典型性,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批判性思维。第三,人机协同的思辨训练。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构建“伦理辩论助手”或“对立观点生成器”,让学生在与AI的对话博弈中识别论证漏洞、完善推理链条和理解多元立场。这种人机互动模式既锻炼了学生的逻辑思辨能力,也促使他们反思人工智能自身的伦理边界。第四,跨学科的项目式学习。借助数字化协作平台,组织理工、人文、社科、法学等不同专业的学生共同完成科技伦理项目,例如为一项新兴技术制定伦理准则、开展负责任创新评估等。这种项目式学习不仅培养了团队协作与沟通能力,更让学生在实践中体认到科技伦理本质上是跨学科的共同事业。通过上述方法的更新,高校科技伦理教育将从被动接受知识的“听众模式”,转向主动建构判断力的“行动者模式”,从而更有效地实现其培养目标。

3 当前高校科技伦理教育的现实审视

在新质生产力对科技人才伦理素养提出更高要求的背景下,客观审视当前高校科技伦理教育的现

实状况,识别其存在的突出问题并剖析深层成因,是构建有效实践路径的必要前提。总体而言,尽管近年来部分高校开始重视科技伦理教育,但从整体上看,教育实践仍滞后于时代需求,存在系统性短板。

3.1 当前高校科技伦理教育存在的问题

当前高校科技伦理教育在课程体系、教学方式、师资力量与评价机制等方面均存在一定问题。

第一,课程体系碎片化,缺乏系统性与前沿性。多数高校尚未建立独立的、贯穿培养全过程的科技伦理课程体系。科技伦理内容多以零散章节或课外讲座的形式嵌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科研道德课或个别专业课,缺乏逻辑连贯的顶层设计。同时,课程内容严重滞后于技术迭代,大量讲授仍停留在科研诚信、实验规范等传统议题上,而对人工智能伦理、数据隐私、基因编辑边界、负责任创新等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关的前沿议题覆盖不足,导致学生所学与时代所需之间形成明显“时差”。

第二,教学方式偏重理论灌输,实践性与参与性不足。当前科技伦理教育的主流模式仍是教师讲授伦理原则与规范条文,学生被动记忆^[9]。这种“说教式”教学难以激发学生的内在伦理动机,更无法培养其在真实情境中识别伦理困境、权衡多元价值的实践能力。伦理思辨本质上需要情境触发、角色代入与冲突体验,而现行教学中缺少案例研讨、角色扮演、模拟决策等参与式环节,使得伦理教育沦为“纸上谈兵”。

第三,师资力量薄弱,多学科协同机制不健全。科技伦理教育天然具有跨学科属性,要求教师既懂科技前沿知识,又接受过伦理学、法学、社会学等人文社科学术训练。然而,高校现有师资多只有单一学科背景:理工科教师缺乏系统的伦理学素养,人文社科教师又往往对技术细节把握不准^[10]。更为关键的是,高校普遍缺乏促进理工科教师与人文社科教师深度协作的制度,跨学科课程开发、联合授课、共同指导等机制形同虚设,导致科技伦理教育陷入“各自为战”的困境。

第四,评价体系缺失,缺乏有效的激励与约束。当前高校对学生学业质量的评价高度集中于专业知识和技能,伦理素养很少被纳入正式的考核范围,即便有所涉及,也多以开卷或论文形式进行“软性”考查,难以真实反映学生的伦理判断力。相应地,教师投身科技伦理教学、开发新型课程、开展教学方法改革的努力,在职称晋升、教学工作量核算等方面缺乏制度认可,导致“教好教坏一个样”,严重抑制了他们进行教学创新的积极性。

3.2 当前高校科技伦理教育存在问题的原因

上述问题的产生并非偶然,而是多种结构性因素长期交织的结果。深入剖析其原因,有助于为后续实践路径的提出提供精准靶向。

首先,对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科技伦理需求的认知滞后。国家层面虽然已提出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构想,但在高等教育领域,对这一概念如何具体转化为人才培养要求的理论阐释与实践指导尚不充分。许多高校管理者与一线教师尚未意识到,新质生产力已经将科技伦理从“附加要求”升级为“核心素养”^[11]。这种认知上的迟滞,直接导致科技伦理教育在资源配置、课程建设、政策支持等方面长期被忽视。

其次,科技伦理教育的学科建制与资源配置不足。在我国现行学科目录中,科技伦理学虽可依托哲学一级学科下的伦理学二级学科存在,但在绝大多数以理工科为主的高校中,相关研究力量极为薄弱甚至空白。科技伦理教育的开展缺乏稳定的学科建制作为学术支撑,也就难以获得持续的教学经费、编制岗位与平台资源。与此同时,高校普遍将有限资源优先投向“高影响力”的科研产出与热门专业课程,科技伦理教育因其短期内“显性收益”不高而经常被边缘化。

再次,跨学科协作的制度障碍难以突破。高校传统的院系结构以学科分割为基本特征,教师的考核、晋升、薪酬等均归属所在院系。跨院系开设课程或联合指导学生,在课时计算、业绩归属、经费分配等方面常常面临制度壁垒。理工科教师与人文社科教师缺乏定期交流的平台与合作的激励机制,导致“合而不作”或“作而不深”。科技伦理教育作为典型的跨学科领域,在这种制度环境下自然举步维艰。

最后,教学评价体系的导向偏差。现行高等教育评价体系深受量化思维影响,对教学效果的评价多侧重可测量、易比较的显性指标。科技伦理教育的核心成果——伦理敏感性、道德推理能力、负责任创新意识——恰恰是难以量化的内隐性素质。在“重显绩、轻素养”的评价导向下,伦理教育自然沦为“软任务”,缺乏刚性约束与实质性激励。此外,由于缺乏科学有效的伦理素养测评工具,高校即使有意强化伦理教育,也面临“如何评价改进效果”的方法论困境。

4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高校科技伦理教育的实践路径

针对课程体系碎片化、教学方式偏重理论灌输、

师资力量薄弱且多学科协同不畅、评价体系缺失等突出问题,以“科技-伦理-创新”融合为核心理念,从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师资建设、评价机制四个维度构建针对性的实践路径,形成从问题识别到路径解决的完整闭环。

4.1 课程体系:从碎片化到系统化的递进重构

破除课程零散化、内容滞后化的困境,关键在于以模块化、跨学科为导向,重构科技伦理教育的课程体系。

第一,构建“通识+专业+实践”三层递进课程结构^[12]。在通识层面,面向全体学生开设“科技伦理导论”“人工智能与社会”等基础性课程,普及科技伦理的基本原理与核心议题;在专业层面,针对不同学科领域开发嵌入式的伦理模块,如面向计算机学生的“算法伦理”、面向生物专业学生的“基因编辑伦理”、面向工程类学生的“负责任设计”等,使伦理教育与专业教学深度交融;在实践层面,设置科技伦理工作坊、案例研讨课、伦理听证模拟等实践性环节,强化学生的情境判断力。

第二,开发新质生产力相关伦理专题模块。围绕人工智能伦理、数据伦理、气候工程伦理、合成生物学伦理等前沿领域,建设动态更新的专题课程库。这些模块应保持与科技发展的同步性,可采用“热点议题快速响应机制”,将最新伦理事件转化为教学案例,消除“学生所学”与“时代所需”的时差。

第三,建立跨学科课程开发机制。打破院系壁垒,组建由理工科、哲学、法学、社会学等不同专业背景教师共同组成的课程团队,采取“双师授课”“接力讲授”等模式,确保课程既扎根技术实际又兼具伦理深度。同时,鼓励学生跨专业选修科技伦理课程,设置跨学科学习认证证书,激发学生自主构建复合型知识结构的积极性。

4.2 教学方法:从理论灌输到沉浸参与的范式转换

针对当前“说教式”教学导致学生参与度低、实践能力不足的问题,高校应积极采用新质生产力提供的技术手段,推进从“灌输式”向“体验式、参与式、生成式”的教学范式转型^[13]。

一是建设科技伦理案例库与情境模拟平台。依托大数据技术,动态收集、整理国内外真实的科技伦理事件,构建分类清晰、标注规范、定期更新的案例资源库。在此基础上,利用虚拟现实、增强现实与数字孪生技术,开发沉浸式伦理困境模拟系统,让学生在“自动驾驶决策”“人工智能偏见测试”“基因治疗风险权衡”等情境中进行角色扮演与即时决策,通过亲身体验深化对伦理冲突复杂性的理解。

二是引入项目式学习与设计伦理工作坊。组织学生以团队形式,围绕一项真实或假想的技术产品,开展全生命周期的负责任创新评估。学生需要识别潜在的伦理风险,提出设计方案修正建议,与利益相关方沟通博弈,最终形成伦理评估报告。这种项目式学习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协作与沟通能力,更使其在实践中掌握“价值敏感设计”等方法论工具。

三是探索人机协同的思辨训练模式。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构建“伦理辩论助手”,让学生在人机对话中识别论证漏洞、完善推理链条、理解多元立场。同时,教师应引导学生批判性地审视人工智能本身的伦理边界,使技术工具也成为伦理反思的对象。

四是推行“案例-辩论-反思”三阶教学法。第一阶呈现真实或虚构的伦理案例,激发学生的问题意识;第二阶组织结构化辩论,要求学生在不同立场之间切换,锻炼多视角思考能力;第三阶引导学生撰写反思日志或伦理自传,将课堂所学与个人价值观进行整合,完成知识的内化与升华。

4.3 师资建设:跨学科协同机制的建立与运行

破解师资单一学科背景、理工与人文“各自为战”的困境,需要从人才引进、能力提升、制度激励三个层面系统推进。

第一,优化师资引进与结构。设立“科技伦理教学特聘岗位”,引进兼具理工与人文背景的复合型人才。同时,鼓励现有理工科教师通过进修获取伦理学第二学历,或人文社科教师深入技术实验室参与项目研究,促进双向知识融合。

第二,提升在职教师的跨学科教学能力。定期组织“科技伦理教学研讨工作坊”,邀请国内外专家进行教学设计培训;实施“理工教师伦理学轮训计划”,每学年为理工科教师提供不少于20学时的伦理学系统课程。通过持续的专业培训与学习,弥补单一学科背景的短板。

第三,建立“理工+人文”联合备课与联合授课制度。将跨学科协作纳入教师工作量核算与业绩评价体系,对联合开发课程、共同指导学生、合作发表教研论文的团队给予绩效奖励。同时,依托校级科研平台设立“科技伦理教育研究中心”,承担课程开发、师资培训、教学研究、资源建设等支持功能,为跨学科协同提供组织保障。

4.4 评价机制:多元指标与产教融合的双重驱动

针对伦理素养未被纳入正式考核、教师教学创新缺乏制度认可的突出问题,应从学生评价、教师评价、产教协同三个维度构建长效激励机制。

首先,优化学生学业评价体系。将伦理素养纳

入学生学业评价的核心指标,改变当前仅以专业知识和技能论成败的导向。开发情境判断测验、伦理反思论文、项目伦理评估报告等多元评价工具,实现对隐性素养的有效考查。例如,在课程考核中设置“伦理案例分析题”权重不低于20%,在毕业设计中增设“伦理影响陈述”必填环节。

其次,完善教师教学激励机制。将课程建设、教学方法创新、教材开发、案例库建设等科技伦理教育成果,纳入教师职称晋升与教学奖励的认定范围,与科研论文、纵向课题同等对待。对在科技伦理教育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设立专项教学奖,并在绩效分配中给予倾斜,切实解决“教好教坏一个样”的问题^[14]。

最后,深化产教融合与校企协同评价。引入企业真实科技伦理案例,邀请企业伦理官、法务专家、工程师参与课堂教学与案例研讨,建立“高校-企业”双向互动的人才培养生态。有条件的高校可与行业组织共同开发科技伦理能力标准与认证体系,将企业用人单位的伦理能力要求反向传导至校内评价标准中,增强伦理素养培养的社会适配性。

5 结论

在新质生产力加速重塑经济社会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下,高校科技伦理教育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本研究从新质生产力的理论视角出发,系统阐释了高校科技伦理教育的时代意涵,诊断了当前教育实践中的主要困境,并提出了理念引领、体系重构、方法创新与机制保障四位一体的实践路径。研究表明,新质生产力不仅为科技伦理教育提供了新的内容场景与技术工具,更从根本上要求教育价值取向从“技术优先”转向“人文与科技融合”,教育内容从传统规范拓展至前沿伦理议题,教育方法从说教灌输转向沉浸体验与参与式建构。只有深刻把握这一时代意涵,并在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师资建设、评价机制等方面进行系统性改革,高校才能培养出既具备强大创新能力又坚守伦理底线的“负责任的科技行动者”,从而为新质生产力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与价值导航。

需要指出的是,科技伦理教育是一个动态演进的领域,随着新质生产力催生出更多颠覆性技术,新的伦理议题将不断涌现。未来研究可进一步聚焦以下方向:一是开发更科学有效的科技伦理素养测评工具,为教育效果评估提供方法论支撑;二是开展高校科技伦理教育的比较研究,借鉴国际先进经验;三是探索科技伦理教育与专业教育 (下转第128页)

安徽花鼓灯融入音乐专业核心素养的路径建构研究

朱 虹

(蚌埠学院 音乐与舞蹈学院,安徽 蚌埠 233030)

摘 要:深植于淮河乡土社会的安徽花鼓灯以其独特的地域审美资源与地方性知识,为音乐专业核心素养的培育提供了鲜活的实践载体。剖析安徽花鼓灯在特定地理环境、社会生态与民俗语境中形成的艺术特质,从审美感知、艺术表现、文化理解与创意实践维度系统阐释花鼓灯与音乐专业核心素养之间的内在契合性,进而从课程体系结构化融入、教学模式与方法创新、实践平台与评价体系建设等方面,构建花鼓灯有效融入音乐专业核心素养教学的实施路径,具有理论与现实的双重意义。

关键词:安徽花鼓灯;音乐专业;核心素养;路径

中图分类号:J722.212;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6)04-0117-06

Construction Path of Integrating Anhui Flower-Drum Lantern into the Core Competencies of Music Majors

ZHU Hong

(School of Music and Dance, Bengbu University, Bengbu, 233030, Anhui)

Abstract: Anhui Flower-Drum Lantern, which is deeply rooted in the local rural society of the Huaihe River, has provided a vivid practical carrier for the cultivation of core competencies in music majors with its unique regional aesthetic resources and local knowledge. Therefore, it was of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analyze the artistic characteristics of Anhui Flower-Drum Lantern formed in specific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social ecology and folk custom context, systematically explain the internal compatibility between Flower-Drum Lantern and core competencies in music majors from the dimensions of aesthetic perception, artistic expression, cultural understanding and creative practice, and then construct the implementation paths for the effective integration of Flower-Drum Lantern into the teaching of core competencies in music majors from the aspects of structured integration into curriculum system, innovation of teaching modes and methods, and construction of practical platforms and evaluation systems.

Key words: Anhui Flower-Drum Lantern; music major; core competencies; path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音乐专业在体系化、规范化取得长足进步的同时,也面临着“主体缺失与音乐身份建构的抉择”^[1]。学生虽娴熟于普适性音乐理论与技巧,却与滋生于本土的活态音乐存在距离,导致其艺术感知与创造力扎根不深、立基不稳。与此同时,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持续强调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引导高等教育肩负起传承与创新优秀传统文化

的使命。“知识的后现代转型也促成了人们开始关注和重视被科学知识型所规训、排斥、挤压的地方性知识或本土知识。”^[2]

在此双重背景下,将深植于淮河乡土的安徽花鼓灯艺术系统地融入地方高校音乐专业人才培养体系,便具有了深刻的理论意义和广泛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安徽花鼓灯艺术可为音乐专业教育注入无

收稿日期:2026-02-26

基金项目:蚌埠学院教育教学改革重点项目(2024jyxm5,2025jyxm10);蚌埠学院人文社科重点项目(2025SK02zd)。

作者简介:朱虹(1980—),女,安徽蚌埠人,讲师。E-mail:z2026ps@163.com

可替代的区域性审美资源与地方性知识,使核心素养的培育从抽象概念落于具体声响与实践之中,有效弥合“技术”与“文化”之间的裂隙;另一方面,音乐专业则为花鼓灯的非遗传承开辟出创造性转化与学术性深耕的崭新场域,使其生命律动得以在现代化教育的接续中绵延不息。

1 安徽花鼓灯的艺术特质

安徽花鼓灯艺术形态的生成深植于淮河流域特定的地理历史、南北交融的文化区位以及乡土社会的仪式生活之中,是特殊地理、自然条件、社会经济与民间信仰共同作用下的综合性艺术呈现。

1.1 地理文化生态中的安徽花鼓灯音乐

“特定地理、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下来并进而发展生产的先决条件,也是产生和形成不同种族、不同地区的文化传统、文化面貌的重要基础。”^[3]“淮河水系作为中国最重要的一条南北分水岭,它的地貌物候、人情世故、民间艺术及其风格,在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文化过渡带的特色。”^[4]安徽花鼓灯艺术的形成正是这一特殊过渡带的产物,呈现出“兼收并蓄、刚柔并济”的混融性特征,既含有北方锣鼓激昂奔放节奏,又蕴含南方歌谣婉转细腻的旋律。另外也是这种地理文化“边缘效应”在音响形态上的直接体现。

淮河流域特定的自然与经济条件从根本上塑造了安徽花鼓灯的情感基调与表现张力。该区域在历史上旱涝灾害频发,是典型的农耕文明与水患文化交织地带。严酷的生存环境催生了民众坚韧务实、苦中作乐的精神。安徽花鼓灯“紧打慢唱”所形成的强烈节奏对比以及唱词中的直抒胸臆,正是这种精神在艺术形式上的外向投射。其表演常在农闲、节庆时进行,具有明显的周期性 with 集体娱乐功能,通过这种特定时空内的仪式性表演完成了社群情感的集中表达与秩序再确认,符合社会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Radcliffe Brown)所认同的“仪式具有整合社会现象、增强集体情绪的作用”^[5]。

安徽花鼓灯的形成与其社会功能密不可分。它的表演常与祈福、禳灾、酬神等民俗诉求相关联,其喧闹的锣鼓、高亢的歌声、炽烈的舞蹈共同营造出一个“集体狂欢”的世界。在这里,“强大的自然力量与内在本能从内外两方面使人类在不自由的处境中时时感受原始的生命激情”^[6]。这种“狂欢”甚至突破了日常生活的等级与规范,强化了社区成员的平等参与感和文化认同感。因此,安徽花鼓灯音乐的生成本质上是在淮河地理文化的底色上,由自然生

态、社会经济结构、民俗信仰共同编织而成的结果,是其作为地方性知识音响化存在的深层根源。

1.2 艺术形态的本体特征与地方性呈现

安徽花鼓灯包括的灯歌、锣鼓经及音乐是其内在文化基因最为直接的音响外化。每一处旋律的曲折、节奏的律动乃至音色的组合无不凝结着淮河流域独特的地方性知识,构成了一个自足且富有表现力的乡土音乐话语体系。

“地方传统音调与方言声调一样,也是分布状态的。每一个不同的地方音调区,均有本地区惯用的音调来影响与制约民歌旋律。”^[7]花鼓灯歌的声腔韵味源自淮北方言的语音特质,以阜阳话、蚌埠话为代表的淮北方言其语调起伏相对平缓,语气词丰富,入声字发音短促,直接影响灯歌旋律的线条进行与节奏疏密,以《送郎》为例(见图1)。



图1 《送郎》谱例

《送郎》的旋律围绕“A-D-B-G-E”等音级展开,音域宽广,起伏较大,在衬词的穿插下形成粗犷奔放、诙谐俏皮的独特风格。唱词“小小的烟袋(哎哟)四寸长”中,“哎哟”一词位于旋律高点后继续上行(D-G 四度跳进),既强化了语气,也推动了旋律的自然流动;衬词“呀儿哟”“哎哟”等在句尾反复出现,不仅延展了句式结构,更成为重要的音乐动机和情感放大器。尤其“送郎送到一庙门”句,旋律在高音位的调式主音G处形成转折,又突出了对应的“门”字之“别离”的隐喻性,字调与音高走向高度吻合,体现了方言声调对旋律走向的内在制约。这些源自生活口语的音响材料经过艺术化加工,构成了灯歌独特的地域性声腔标识,实现了从方言到乐音的创造性转换。

锣鼓经作为花鼓灯的节奏骨架与音乐动力引擎,是一套高度体系化、程式化的乡土节奏语汇。花鼓、大锣、镲、小锣等乐器在音高、音色与音强上各异,在演奏中形成清晰的声音层次与对话关系。如《老三番》《小五番》就包含引子、主体、变奏、收束等段落,具有完整的叙事逻辑。其节奏与音色组合既

有对自然声响(如风啸、水浪)或劳动动态(如挑担、犁地)的模仿,也有对社会情绪(如欢腾、紧张)的抽象渲染。这种节奏语汇来源于乡土生活经验,是对周边声音的艺术化提炼与重组,其演奏中即兴的加花、速度的“撤”与“催”,依赖于艺人间深厚的默契与共同的地方性听觉经验,是书面乐谱难以完全承载的“活态”知识。

1.3 传承谱系中的“人”与“地”

安徽花鼓灯的活态传承本质上是一种根植于特定地域社会网络与文化土壤中的,以“人”为核心的身体实践与知识传递过程。这一过程既塑造了极具个人标识的艺术风格,又依赖于一套深嵌于乡土逻辑的集体组织形式。

在代表性艺人的艺术实践与地域风格互塑层面,微观个案揭示了个体能动性 with 地方传统间的动态对话。怀远流派传承人冯国佩(艺名“小金莲”)的表演具有泼辣、奔放、略带诙谐的风格,是对淮北乡土社会中女性生命力与坚韧气质的一种艺术提炼与夸张呈现,是地方性审美经验的浓缩与人格化体现。同样,凤台流派的陈敬之(艺名“一条线”)以身形轻盈、步法流畅著称,这种风格与凤台地区相对细腻的表演传统以及观众审美趣味的长期认同密不可分。这些艺人不仅是技艺的承载者,更是地方文化特质通过身体语言表达的“转译者”,他们的个人风格一旦获得认可,便能反向强化该地域流派的艺术标签,形成“地以人显,人以地传”的共生关系。

“灯班子”作为花鼓灯传承与运作的基本社会组织单元,其模式深刻体现了乡土社会的内在逻辑。一个典型的乡村灯班,通常以自然村落或家族为纽带组成,成员间交织着地缘、血缘与业缘关系,“口传心授”是其传承的核心方式。人类学家保罗·康纳顿(Paul Connerton)强调,“体化实践(incorporating practices)是社会记忆的重要载体,社会记忆主要通过仪式的操演来完成,而仪式表演的反复操演则是由具体的身体实践来实现,以此才能保证群体社会记忆的传播与保存”^[8]。花鼓灯中复杂的锣鼓经配合、舞蹈身段和唱腔韵味,正是通过老艺人与年轻成员在排练、表演中反复磨合与不断纠正才得以延续。

灯班的运作高度依赖于乡土社会的仪式周期与伦理规范,演出活动常与村落祭祖、庙会酬神、节庆娱乐紧密结合,艺术表演因而成为社区公共生活与信仰实践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种组织与传承模式深深嵌入社群生活以及文化认同的“活态传统”当中,成为安徽花鼓灯这一地方性艺术能够世代相

传、保持生命力的关键。

2 安徽花鼓灯与音乐专业核心素养的契合

安徽花鼓灯作为一种淮河流域乡土社会的特色民间艺术形式,其音乐特质与表演体系蕴含着丰富的地方性知识。将这一知识资源系统融入音乐专业教育,需对音乐专业核心素养的维度进行细致解析,并探寻其与花鼓灯具体元素之间的内在契合点,从而为后续的路径建构提供学理依据。

2.1 审美感知素养:从乡土音响到专业听觉的转化

审美感知素养强调对音响本体及其文化意蕴的敏锐觉察与深入理解。安徽花鼓灯音乐中“紧打慢唱”的节奏处理、高亢与低回交织的旋律线条,深刻反映了当地民众在艰苦自然环境中形成的群体性格,既具有顽强的生命韧性,又不乏情感的即时宣泄。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的“深描”(thick description)理论强调,“人类学研究应把地方文化结构加以分类甄别并进行精细化解读”^[9]。借鉴这一视角,感知花鼓灯的艺术之美即是引导他们超越表层音响去“深描”其背后所承载的乡土情感,理解其在特定地理环境与文化心理中产生的审美意蕴。

对学生听觉素养的提升应聚焦于花鼓灯独特的地方性音乐语汇。灯歌的韵味与淮北方言尤其是阜阳话、蚌埠话的声调、语调密不可分,唱腔中如“哎哟”“呐嘞哟”等大量衬词和特有的润腔方式正是这种方言口语韵律的音乐化延伸。同样,锣鼓乐的节奏组合、力度变化与速度转换蕴含了丰富的自然声响或劳动节奏张力。音乐形态学认为,“音乐形态诸要素的选择和音乐审美观的理解因民族、地域、时代的不同而形成差异”^[10]。在教学实践中,引导学生对比分析不同地域同一灯歌曲目的腔韵差异,辨识锣鼓经中的核心节奏形态及其变奏规律,从而将原本感性的“乡土味道”分解为可描述、可比较的具象音乐参数,将大大提高学生的听觉辨析素养。

2.2 艺术表现素养:掌握地方性音乐表现技艺

花鼓灯所蕴含的地方性表演技艺为音乐专业学生提供了从“知识认知”转向“身体认知”的路径,也为艺术表现素养在声乐、器乐、舞蹈诸方面的提质提供了条件。

花鼓灯的声乐技艺表现在方言演唱所要求的特殊声音控制与情感投射方式。原生态灯歌的演唱并非标准化的美声或民歌唱法,它更强调方言咬字的口语化韵律、气息运用的直白顿挫以及润腔的情感渲染。民族学家认为:“任何一场民俗仪式音乐表

演,既有作为仪式有效性表征的声音文本,又有作为身体叙事符号程式化与即兴性的呈现。尤其后者在现场的音乐表演语境中,拓展了音乐表演的叙事空间,也制约着音乐表演文本的音响构成与文化象征意义的建构过程。”^[11]学习花鼓灯的演唱,必须搁置学院派恪守的传统发声观念,深入体验淮北乡土社会直抒胸臆的声音表达美学及其文本构成的全部,才能形成完整的演唱表现素养。

在器乐表现层面,花鼓灯锣鼓乐是一套集体性、互动性节奏语汇的身体化组合。演奏花鼓、大锣、镲、小锣不仅需要熟练掌握演奏技法与“锣鼓经”口诀,更关键的是在合奏中形成精准的默契与即兴应答能力。通过集体排练,学生不仅学习了锣鼓乐多变的节奏型,更在身体协同中内化了乡土器乐合奏中特有的交流逻辑与能量流动模式,这对标准化节奏训练也是宝贵的经验补充。

花鼓灯“歌、舞、乐”三位一体的表演形式为综合性艺术表现实践提供了范本。将灯歌演唱与锣鼓伴奏结合并辅以舞蹈身段的表现,能使学生切身理解地方性艺术中各种元素不可分割的有机关系,打破声乐、器乐、舞蹈在专业教学中的割裂状态,引导学生从整体视角理解艺术表现的多元性,把身体、声音、节奏作为一个统一的表意系统融入、内化为艺术素养,最终外显为舞台表演的全面释放。

2.3 文化理解素养:解读区域性音乐文化基因

文化理解素养要求超越音乐形式的表层认知,深入解读其背后复杂的历史脉络、社会结构与观念体系。安徽花鼓灯的生成与演变是特定地理历史进程的产物。文化地理学研究表明,地方乐种的风格形态常与历史上的移民路线、经济贸易网络及行政区域变迁紧密相关。淮河流域历经多次大规模的移民迁徙与频繁的水患治理,塑造了该地人口的复合构成与流动特性,这为花鼓灯音乐风格的多样性提供了深层的历史注脚。理解安徽花鼓灯,必须结合于淮河地理与历史积累的宏观语境。

在共时性层面,文化理解素养体现为对“地方性知识”多样性的辨识能力。安徽花鼓灯虽统称一体,但其内部存在着以县域或代表性艺人为标志的微观风格差异。民族音乐学的“音乐方言区”比较研究方法是理解这种差异的有效工具。通过系统对比分析淮北、淮南等地不同流派在调式音阶、代表性曲目、锣鼓组合与表演程式上的细微差别,使学生明确同一乐种的文化基因会因具体地区的传统、审美与传承人而表现出变异性。这种比较分析有利于培养学生对文化内部多样性的敏感度与尊重。

文化理解的最高层次在于对乡土艺术当代价值的深刻反思与批判性洞察。在全球化和城市化进程中,像花鼓灯这样的传统艺术面临着存续与转型的双重挑战。社会学与文化遗产理论认为,理解传统艺术的当代价值,不仅关乎艺术形式的保存,更关乎其所承载的社区伦理、人际纽带、生态智慧及地方认同感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重构。反思花鼓灯中蕴含的集体协作精神、人地和谐观念以及充满生命力的审美表达,能够为当代音乐创作与音乐教育提供反哺,回应现代人的精神需求与文化寻根的渴望。

2.4 创意实践素养:本土音乐资源的创造性转化

创意实践素养的核心在于培养学生基于深厚传统认知的创造性思维与转化能力,使本土音乐资源成为当代艺术创新的活水源头。

对花鼓灯音乐元素的创造性运用首先应立足于内在语法与精神的深入理解。实践音乐教育哲学强调,“音乐素养的获得与深化必须通过有意义的、情境化的音乐制作”^[12]。例如对花鼓灯锣鼓点“老三番”的节奏骨架进行变奏发展,或选取一段《送郎》的旋律动机进行横向扩展与和声编配,这种练习要求学生分析其原生结构逻辑的基础上进行再创造,是将传统知识内化为个人创作语言的关键步骤。

跨媒介的实验性探索为花鼓灯的当代转化开辟了更广阔的可能性场域。花鼓灯各部分核心元素可以与电子音乐、影视配乐、现代舞剧或交互式新媒体艺术进行对话与融合。例如将唢呐音色采样后进行电子化处理,或将灯歌的衬词作为人声素材融入氛围音乐创作,通过新的技术语境与审美观念重新激发花鼓灯内在表现力与情感共鸣,探索其在当代听觉文化中的新位点。

对花鼓灯的创意实践是一次深刻的文化理解与价值重构之旅。它要求学生不仅“知道”传统是什么,更要思考它“可能成为什么”。通过创造性转化,学生得以亲身参与传统的演进,理解文化传承的动态性与开放性,从而培养一种既尊重历史根基又面向未来发展的综合性创新能力。

3 安徽花鼓灯融入音乐专业核心素养的路径建构

将安徽花鼓灯融入高校音乐专业核心素养培养中,需要构建一套系统化的融入路径,在课程体系、教学模式、创新实践等方面发力,促成“乡土文化语境”到“专业教育场域”的深度对接与创造性转化。

3.1 课程体系的结构化融入

首先开发特色课程。特色课程模块应摒弃传统

的技能学习痼疾,构建“文化认知-技能体验-分析反思-田野联系”的复合结构。文化认知模块旨在奠定理解基石,通过系统学习花鼓灯赖以生存的历史地理背景、社会民俗环境,探究其作为特定社群表达与仪式实践的文化根源;技能体验模块强调具身化的学习,指导学生切身掌握原生态灯歌的方言咬字与特色润腔,锣鼓乐器的演奏技巧与经典“锣鼓经”的配合,初步体验歌、舞、乐结合的综合表演状态;分析反思模块则是通过对代表性曲目、音像资料的形态进行分析探讨音乐结构、节奏特征、旋律发展的逻辑,进而比较不同区域流派的风格差异,理解其内部的多样性;田野联系模块是将课堂与原生土壤连接起来,组织学生深入花鼓灯流传的乡村进行田野采风,完成实地调研记录与报告,使学生真正理解音乐与文化生态水乳交融的关系。

其次,将花鼓灯元素有机渗透至现有音乐专业课程体系,实现其与既有知识模块的对话与互嵌。例如,在民族民间音乐、中国传统音乐概论等课程中可将花鼓灯作为典型案例进行深度剖析,在音乐鉴赏课程中引入原生态表演影音,在视唱练耳中精选特色灯歌旋律与复杂锣鼓节奏型作为训练材料,在作曲技术理论、歌曲写作课程中设置花鼓灯音调素材的创作练习。这种渗透式融合旨在打破地方性音乐文化与普遍性音乐知识之间的壁垒,使其成为音乐专业素养中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最后,配套的教材与资源建设至关重要。教材内容既应包含音乐形态学分析,也要融合人类学的语境描述。资源库建设需注重本真性与典型性,广泛采集不同流派、不同代际艺人的高质量音视频资料,并附以时间、地点、表演者、文化场合等详实的元数据说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伦理原则》中强调,对非遗的记录应确保“社区、群体或相关个人的积极参与和事先知情同意”^[13]。资源建设过程本身应成为一项恪守学术伦理与传承主体协作的文化实践。

3.2 教学模式与方法创新

花鼓灯融入音乐专业的教学模式创新是将“单向传授”转移至“多元互动”与“体验生成”的轨道上,在“请进来”“走出去”上下功夫。

“请进来”是邀请民间传承人进课堂,建立“民间艺术家工作站”。“请进来”模式能够更好地将乡土性与学院式两种知识体系融会贯通,提高花鼓灯融入音乐课堂的生动性。教育学家吉鲁(Henry A. Giroux)主张教学主体双方应“把不同文化的思想、观念、价值集结在一起,创造一个文化边缘地带,引

导学生去认识、分析、批判、重构”^[14]。在“请进来”语境中,在学生和传承人中建立“边界”,让“边界”双方更好地观察彼此并建立客观的、良性的互动,以此完成知识的共建。

“走出去”就是组织学生进入花鼓灯社区进行田野采风、资料收集,用人类学的方法提高具身体验和文化浸润。学生沉浸于村落、庙会等具体文化空间,观察表演如何组织、如何与民俗仪式结合、如何被观众接受,并尝试完成小型的民族志调研报告。这种在地化学习能深刻纠正学生对民间艺术“去语境化”的片面理解。

在“请进来”“走出去”基础上大力推行常规课堂内的情境化与体验式教学。通过模拟节庆场景、重构表演语境,引导学生在“做中学”(learning by doing)^①,在“玩灯”的集体氛围中感受音乐的社交性与功能性。“具身认知”(embodied cognition)理论强调,“身体是文化的主体,是文化存在的基础”^[15]。认知过程深深植根于身体的感知运动系统。学习花鼓灯的锣鼓演奏或身段动作,正是通过身体的模仿与协调来内化其节奏逻辑与表达风格。此外,采用“项目式学习”(PBL),如策划一场与乡村联动的花鼓灯展演或创作一部融合花鼓灯元素的跨媒体作品为驱动任务,能有效整合审美感知、艺术表现、文化理解与创意实践等多项素养,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与协作精神。

3.3 实践平台与评价体系建设

实践平台的搭建旨在将学习从课内延伸至课外。通过成立“花鼓灯传习社”或学生艺术团,提供排练、创作与内部研讨的空间,营造一个持续性的“实践社区”^②。在实践社区平台上,积极推动安徽花鼓灯的创作与展演,鼓励师生以花鼓灯为元素进行新音乐创作、小型歌舞编创或学术性改编,并通过专场音乐会、艺术节、网络平台等多种渠道展示成果,检验学习成效,提高创造性成果的转化率。

在实践平台建设的同时必须配套推进评价机制改革,从侧重结果、技能的考核方式转向过程性、综合性评估。引入“档案袋评价”,收集学生从田野笔记、学习心得到创作草稿、表演录像的全过程材料;采用“表现性评价”,在模拟或真实的表演情境中评估其艺术表现力与文化理解深度;结合“研究报告评价”衡量其分析、反思与研究能力。这种多元评价体系更符合民间艺术学习强调体验、理解与创造性应用的综合目标。

3.4 保障机制的系统化构建

在课程体系、实践模式、平台建设改革创新的同时

时,应从师资建设、政策与资源协同以及文化伦理等层面进行顶层设计,构建一套系统化的保障机制。

首先是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现有的音乐专业教师大多接受学院式音乐教育,对地方戏安徽花鼓灯认知与实践经验可能存在不足。因此,一方面需对现有教师进行系统性、持续性培训,通过田野采风、专家工作坊等形式提升其对花鼓灯艺术特质的理解与教学能力;另一方面,应积极引进民间艺术功底深厚、教育教学与研究能力卓越的复合型人才,优化师资结构,实现学院知识与民间智慧的有效对接。其次是资源与政策的协同。特色课程开发、民间专家聘任、田野采风组织、实践平台运营等环节均需要稳定的政策支持与经费投入。高校教学管理部门应与地方文化、教育、财政等部门建立有效的协同机制,将非遗传承与创新纳入高校社会服务与特色发展的整体框架中,争取专项资金与政策倾斜,为融入路径的持续推进提供稳定的资源基础。最后是文化伦理机制的规范与构建。在花鼓灯融入专业教育的过程中,必须始终秉持对乡土文化及其传承主体的充分尊重,遵循“事先知情同意和鼓励参与”的伦理原则,既要避免简单化、猎奇化的表面利用,也要避免过度学院化、技术化的改编。应致力于构建一种学院与社区平等对话、互利共赢的可持续传承模式,让高校成为花鼓灯活态传承的积极节点,而非异化的终端。

总之,安徽花鼓灯融入音乐专业核心素养是一个从课程内容到教学方法,从实践平台到评价体系,再到保障机制的全方位、系统性建构过程。它要求教育者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文化的调适者与桥梁的搭建者,最终目标是在专业教育的框架内守护那份源自乡土的、鲜活的音乐智慧与文化基因,并激发其在新时代的创新活力。

4 结论

安徽花鼓灯与音乐专业核心素养的融合,实质上是推动乡土智慧与学院体系在双向滋养中共同成长。这一过程不仅为音乐专业人才培养注入了鲜活的地域文化基因,也使传统艺术在高等教育的语境中获得阐释、传承与创新的持续动力。通过课程的结构化融入、教学模式的体验化转向、实践平台的开放建构以及评价体系的综合改革,安徽花鼓灯得以超越单纯的“素材”角色,成为联结审美感知、艺术表现、文化理解与创意实践的综合性教育载体。在此路径中,教师成为文化的调适者与引路人,学生由被动接受转向主动探索与创造,逐步形成扎根本土、

面向未来的音乐素养。最终,通过融合构造一种既尊重文化本源又具备开放视野的专业教育生态,使源自淮河乡土的声响与情感能在现代音乐教育的土壤中持续脉动,生生不息。

注释:

- ① “做中学”,是美国现代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儿童教育理论的核心思想,包括“从做事里求学问”“从调查研究中得学问”“从经验中学习”三重含义。
- ② “实践社区”是指对某一知识领域有着共同关注和兴趣的一群人,借助社区平台相互交流、相互帮助,最终提升自身在该领域内的知识水平。倡导“实践社区”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社会学家艾蒂安·温格(Etienne Wenger)等。

参考文献:

- [1] 管建华. 21 世纪的抉择——从中国高校音乐教育的三个“缺失”问题谈起[J]. 人民音乐, 2015(1): 74-78.
- [2] 朱玉江, 储冀璇. 论新文科建设背景下的中国高等音乐教育[J]. 人民音乐, 2021(5): 44-48.
- [3] 苗晶, 乔建中. 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7: 9.
- [4] 乔建中. 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其地理历史背景研究[M]. 上海: 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 2009: 285.
- [5] 郭于华. 仪式与社会变迁导论[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2.
- [6] 王建刚. 狂欢诗学——巴赫金文学思想研究[M]. 北京: 学林出版社, 2001: 111.
- [7] 杨匡民. 民歌旋律地方色彩的形成及色彩区的划分[J]. 中国音乐学, 1987(1): 105-117, 2.
- [8] 黄凌飞, 熊艺. 缘于“地方感”的“体化实践”——纳西族汝卡人传统乐舞“阿卡巴拉”传承实践研究[J]. 云南艺术学院学报, 2023(2): 78-85.
- [9] 克利福德·格尔茨. 文化的解释[M]. 韩莉,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 11.
- [10] 王耀华, 杜亚雄. 中国传统音乐概论[M]. 福州: 福建教育出版社, 2013: 2.
- [11] 赵书峰, 杨声军. 语境·身体·互文·权力: 音乐表演民族志研究再思考[J]. 音乐研究, 2021(3): 81-89, 133.
- [12] 储冀璇. 实践音乐教育哲学的课程观研究[J]. 中国音乐, 2025(2): 145-162.
- [13] 邢晶晶. 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保护法律问题研究[D]. 南宁: 广西民族大学, 2023.
- [14] 郑金洲. 美国批判教育学之批判——吉鲁的批判教育观述评[J]. 比较教育研究, 1997(5): 15-18.
- [15] 胡艳华. 身体与具身性[J].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 43(4): 11-16, 58. 责任编辑: 张晓娜

民俗仪式的空间建构及其文化功能 ——以淮河流域“剃辮子”仪式为例

谭 昭

(湘潭大学 文学与新闻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摘 要:民俗仪式通过空间建构与意义生产达成现实文化转化,并确保其功能的正常发挥。淮河流域“剃辮子”仪式的空间建构,集中体现了空间与文化的二元互构关系,其确认受礼主体身份的核心功能,正是通过改变主体对文化空间的经验与感受得以实现。显然,“剃辮子”仪式作为过渡礼仪的本质,是依托不同阶段的空间场域建构完成主体身份的转换。基于此,民俗仪式对主体与空间诸要素之间关联域的形塑,既是仪式传承的实践路径,也是文化功能彰显的基本形式。

关键词:淮河文化;民俗仪式;“剃辮子”;空间建构;文化功能

中图分类号:K892.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297X(2026)04-0123-06

Spatial Construction and Cultural Function of Folk Rituals by the “Cutting the Pigtail” Ritual in the Huaihe River Basin

TAN Zhao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Hunan)

Abstract: Folk rituals achieve the transformation of cultural reality through spatial construction and meaning production, thereby ensuring the effective performance of their functions. The spatial construction of the “Cutting the Pigtail” ritual in the Huaihe River basin epitomizes the dual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ce and culture. Its core function of affirming the identity of the ritual subject is realized precisely by altering the subject’s experience and perception of the cultural space. Evidently, the essence of the “Cutting the Pigtail” ritual as a rite of passage lies in accomplish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ubject’s identity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spatial fields at different stages. Based on this, the shap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ubject and various spatial elements by folk rituals serves both as a practical pathway for ritual form and as a fundamental aspect of manifesting cultural functions.

Key words: Huaihe River Culture; folk ritual; “Cutting the Pigtail”; spatial construction; cultural function

民俗仪式在民间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兼具神圣性与世俗性双重特征,是文化象征与社会关系生产与再生产的基本场域。民俗仪式的空间建构得到学界充分关注。涂尔干认为,仪式具有凝聚群体的集体意识与情感的功能^{[1]589}。范热内普则关注“礼仪之动力性”^[2],即仪式的进程。同时,随着列斐伏尔“空间生产”概念的提出,社会空间被视为

“社会的产物”^[3]。空间的介入为仪式研究提供了新路径。社会结构与符号象征高度凝结的仪式发生场域,则成为实践拓展空间理论的高地。

“剃辮子”仪式主要分布在淮河流域的诸多地区^①,指男孩自出生起仅在后脑勺处留出桃形或椭圆形的发区,并编成辮子,待到一定年龄由家长主持将辮子剃去的仪式。仪式寄寓着长辈的美好祝福,

是庆祝平安长大的习俗,象征着其从儿童顺利成长到少年阶段。剃辫子仪式的空间实践,本质是通过文化空间的符号化操演,完成个体生命阶段的转化。因此,通过分析仪式在不同阶段空间场域的动态建构与文化变迁的过程,聚焦仪式形塑主体与空间内诸要素之间关系的方式,以及仪式与空间的互动,进而剖析民俗仪式与地方文化的再生产机制,最终为民俗仪式的活态传承提供可参考空间实践策略与功能转化路径。

1 仪式的发生概况与内在结构

淮河流域支流众多,历史上降雨量因季节差异较大,频繁的旱涝灾害令沿岸人民的生活尤为贫困,幼童早夭现象较为常见。因此,人们欲通过留辫子仪式祈求神灵护佑孩子平安和家中人丁兴旺,故辫子又被称为“命辫儿”。民间对剃辫子的男孩俗称“金”,即“金贵”之意。《安徽省志》中有“满月之日给婴儿剃发需在脑后留一撮‘胎毛’”的记载,称之为“鸭骚子”,故剃辫子又有“剪鸭尾”一说^[4]。仪式多在男孩3岁、6岁或9岁时举行,且通常选在农历“二月二,龙抬头”之日,故又称“剃龙头”。究其原因,仪式日期的选定应是受民间社会“正月不可理发”的禁忌影响。江绍原以为,人之发须爪甲的修剪有择日的必要,需“择吉”“祛祟”^[5]。幼童择日剃发之风,久而弗替。托名许逊《玉匣记》中标示了涵盖民众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吉凶之日,其中便载有剃胎发的忌日与剃小儿头的吉日。故民间借“龙抬头”之祥瑞,以佑孩童健康成长。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随着现代化程度和经济水平的提升,剃辫子仪式呈现出两极分化现象。一方面,随着仪式不断调和自身以适应社会发展,部分地区剃辫子仪式的参与人群逐步扩大,导致仪式在不同程度上被异化;另一方面,仪式在部分地区却渐渐销声匿迹,最终消失在民众日常生活之中。考虑到孩子进入校园和与之伴随产生的自尊心与羞耻心的因素,多选在男孩3岁或6岁时举办。仪式在当代社会中的压缩与简化,反映出对社会制度的让位与自我调和,即民俗仪式永远是活态生存着的,它不会僵化地固守传统,而是在社会结构的变化中不断调整以适应新的生存土壤。

一般来说,剃辫子仪式主要包括请亲、取水、剃辫、系鱼、放生、祭拜等流程。

请亲。仪式之前,需装饰家中各处,并通知家中亲戚。其中,男孩的舅舅为仪式的核心人物之一,是仪式最重要的见证者与参与者。在此次仪式中,

“舅舅理发”或“舅舅抱剪”是重要环节。舅舅作为母系亲属的代表,在外甥人生转折点上的缺席,会被视为仪式的不完整。如舅舅无法到场,则需在男孩身边置一蒜白,以白与舅音同,来替代舅舅。此外,还需“定响”,即请唢呐班子或戏班子在仪式中演奏,以营造氛围。

取水。取水环节声势浩大,一众人在鞭炮声与唢呐班子的演奏中前往河边。正式取水前需在河边燃放鞭炮,并向河神跪拜祈福,随后长辈用红盆取河水,以存放事先准备好用于放生的鲤鱼。取水多存在于临水地区的仪式之中。仪式与水结缘,不仅是处置方式的不同,更是不同地域人们生命观念的体现。

剃辫。仪式多选在场地开阔的院落进行。院中摆放两张铺着红布的八仙桌,上置凳子,称为“供桌”。蚌埠地区在正式剃辫前,亲友会依次上前轻拽辫子并给红包,称之为“奶奶拽”,寓意拴住福气。剃辫时,先由女性长辈为男孩梳洗辫子,并将辫子分作三股分别编入红绳,宿州等地区还会以纸币替代红绳绑在辫子上。随后为男孩裹上红毯抬到八仙桌上坐下,由男孩的舅舅将辫子左右两侧剪下,亦有请高姓理发师傅为男孩剪辫,象征着步步高升。

系鱼。对于辫子的处理也有一定的禁忌,不可随意乱扔。俗信以为人之发肤遭到丢弃或践踏会影响身体健康,即人与其发之间存在着同感的关系。剪下的辫子一条留作纪念,另外两条分别系于两条鲤鱼的鱼鳍之上放生。而在淮北、宿州等地,则多将辫子系于鸭子之上,“放鸭子”寓意着男孩的一生顺顺利利、飞黄腾达。

放生。上溯至古代社会,便已经存在放生的传统。民间社会的放生观多是将个体的功利目的与放生功德相关联,即仪式的“宗教疗愈”功能。不同于宗教系统内的放生仪式,淮河流域剃辫子仪式中的放生行为更多象征着主体的生命随着鲤鱼的放生实现生命价值的提升,其世俗意味更为显著。放生是一种命运的期待。无论贫富,剪下的辫子极少被随意丢弃,体现对生命的敬畏。放生一般由舅舅主持进行,将系了发辫的鲤鱼放生于河流之中。驻马店、淮北和宿州等地区亦会选择以鸭子或者鸽子为辫子载体并放生。

祭拜。淮河流域频发的旱涝灾害催生出相关的民间信仰崇拜,诸如龙王、四渎神等自然神是民众时常祭奉的对象。因此,剃辫子的男孩需在父母的带领下于河边祭拜河神,并燃炮烧香,祈佑男孩日后身体健康。祭拜河神的本质,是民众面对自然灾害时的应对策略。随着现代教育普及、科学观念深入人

心,民众对自然神祇的信仰逐渐弱化,祭祀行为逐渐失去了原有的心理基础与现实必要性,祭拜环节随之简化乃至消失。祭拜环节的淡化,也体现出仪式功能重心的转移,即从“祈神”转向“娱人”。

淮河流域是中国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中心地带,并在碰撞交往中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淮河文化。剃辫子虽普遍存在于淮河流域,但由于淮河流域横跨不同地区,且兼有不同的地理生态环境,这些地理特性决定了其民俗形态的非均质性,仪式细节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如阜南地区从蓄辫到剪辫的时间内,会有“认干亲”的过程,其他地区则无。无论从自然地理还是从人文地理来看,淮河流域均属于中间地带,呈现出“文化过渡”和“文化交融”的特征^[6]。因此,仪式呈现出“同源异流”的鲜明特征。仪式的共性源于流域共通的生存需求,个性则彰显区域独特的民俗表达。剃辫子仪式的民俗实践,呈现出在淮河这条兼具自然与文化分界意义的河流两岸,人们通过仪式来安顿生命,处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

从地理生态来看,淮河流域北部与南部有着鲜明区别。地理环境的变化为仪式的地域化演变提供了自然基础,使得同一礼俗在不同生存场景中,逐渐形成了适配该地生活方式的实践形态。此外,淮河流域不同区域的历史发展轨迹不同,河南东部作为中原文化的延伸地带,受其影响较深,仪式的庄重感更强,规范度更高。安徽北部作为淮河流域民俗传承的核心区域,受淮河文化的浸润,仪式保留较为完整,从前期请亲、备物,到核心的剃辫、系鱼、放生,再到后续的宴席庆祝,每个环节都有明确的内容,且融入了皖北特有的喜话、器物寓意,仪式感最为浓厚。江苏北部则受江淮文化与江南文化的双重影响,仪式相对简化,更注重亲友团聚的喜庆氛围,对传统祭祀环节的保留较少,呈现出简约化、娱乐化的特点。尽管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但淮河流域剃辫子仪式的核心内涵均围绕“拴住孩童、驱邪祈福、标志成长”的核心诉求展开,这正是淮河文化民俗仪式“同源”的体现,是传统生命礼俗在淮河流域的生动呈现。这种“同源异流”的特征,不仅反映了淮河流域地理环境与文化的多样性,更体现了民俗文化的包容性与适应性。

2 仪式的过渡模式与空间生产

过渡礼仪关注的是礼仪于仪式整体中的根本意义与相关位置,即仪式整体的发生顺序——过渡性^[7]。过渡礼仪的社会意义在于保障仪式主体顺

利实现从一种“社会空间”过渡到另一种“社会空间”的跨越,这种空间过渡呈现出“世俗—神圣—世俗—神圣……”的循环特征。剃辫子仪式在家庭场域内建构出具有双重属性的仪式空间,仪式实践中的空间转换机制折射出民间信仰的“圣俗一体”模式。空间与仪式的互动凸显出剃辫子仪式过程的空间特征,并能够从中剖析出仪式的动力机制与可能遭遇的时代困境。

2.1 神圣空间的区隔与杂糅

作为与幼子养育习俗相结合的人生礼仪,剃辫子仪式宣告了受礼者身份地位的过渡与转变。“分隔”在剃辫子仪式中可被视为仪式的准备阶段。在此阶段中,受礼者需在他者的帮助下完成更换衣服、梳洗辫子等系列仪式行为,此时受礼者仍处于日常生活空间之中,其身份亦维持着惯常稳定的状态。随着受礼者步入以“供桌”为核心的仪式空间,其身份便进入到一种神圣的过渡状态,八仙桌区域即成为人神交接的阈限空间。此时,桌子的日常餐饮功能被重构,转变为沟通圣俗的媒介。头发仪式在成长仪式中也起到重要作用,它反映了个人在通过这个社会制度所规定的各个阶段的过程中取得了进步^{[8]307}。仪式将男孩从过往的生活状态中区隔出来,男孩作为受礼者的社会身份发生改变,成为相对意义上的成年人,且成为家庭结构中的主要角色。

仪式是对现实日常生活的区隔。仪式以喧闹、吉庆、展演性的场景,向仪式中的众人传递空间的神圣性。仪式中的“取水”与“放生”行为,扩大了以院落为核心的神圣空间的范围,进而模糊了神圣与世俗空间的真实界限,使神圣空间呈现出一定的杂糅状态。男孩辫子的剪去,代表着受礼者生命阶段的分隔与跨越,象征着受礼者已不再是需要家长庇佑看护的孩童。此外,仪式中的神圣空间存在着一定的禁忌性。禁忌是人类社会最早的一种否定性行为规范,它规定着人对神圣的、不可侵犯的、危险不洁的事物所持有的态度和相应行为,是人们必须无条件服从的一种禁制。禁忌的根本目的无非是保佑受礼者免于灾祸,顺利渡过边缘期。仪式中处于边缘期的受礼者被认为极易沾染秽气,因此男孩在仪式结束之前双脚不能触地,否则就会招致灾厄。

2.2 世俗空间的回归与聚合

聚合礼仪在受礼者回归社会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其核心是帮助个体在经历了身份的重塑与调整之后再次融入社会并与世俗世界和谐共生。通过一套完整的程式化象征体系,使自然生命历程成功转化为被认可的伦理实践,将“生物人”系统地塑

造为“伦理人”^[9]。仪式“边缘”阶段中,受礼者所面对的既往身份的消失和新身份尚未建立的困境,在仪式的“聚合”阶段得以消除。因此,小孩子剃掉辫子的仪式,可使其自立自强意识得到增强^[10]。在完成整个流程之后,仪式的神圣性逐渐消弭,仪式空间随之转换,男孩再一次被抬进屋内,即日常生活的世俗空间。仪式后的酒席庆贺是对男孩身份的重新确认,参加仪式的人群以及受礼的男孩从仪式的神圣空间中脱离出来,进入到世俗生活之中。男孩随父亲向酒席上的亲友敬酒,象征着男孩重新进入日常生活,并得到大家对他以剃辫子为标志的成长阶段的认可。

值得注意的是,仪式中的过渡形成了主体生命中的“边缘”姿态,即特纳所言的“阈限”阶段。简言之,受礼者在履行完仪式后,便进入到一个特殊的阶段,他既不再是稚嫩的儿童,又未完全成为完整的、社会认可的“成年人”。只有当受礼者完成婚礼等相应的仪式后,他才正式成为一个独立的成年个体。总体而言,剃辫子作为过渡礼仪的一种,呈现出神圣与世俗力量之间的相互博弈与转换。在不同阶段,仪式创设的空间有着不同的特征,这种或世俗、或神圣的空间区隔旨在为仪式主体服务,即帮助受礼者顺利完成身份过渡。

2.3 仪式的空间异化与边界流动

民俗仪式与文化空间之间的关系,实质上是文化主体在时空压缩的现代社会中,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过程。剃辫子作为一种祈福色彩浓厚的仪式行为,在现代化的社会背景下,其性质、功能与仪式实践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仪式承载的信仰、祈福等功能被弱化,逐渐演变为娱乐性的“文化展演”和社交性的家族交往行为,即以仪式来聚合并强化亲属网络。

随着城市化和现代化的日益深化,剃辫子仪式的参与人群及仪式空间进一步扩大。传统的剃辫子仪式在当下的日常生活中,逐渐从“富贵的象征”转变为普通民众皆可举办的常规仪式。于是,仪式的边界进一步拓展,但仪式的原生性文化空间逐渐消亡,并驱动仪式实践与现代性的社会生活相契合。与此同时,仪式边界的扩大并未带来仪式信仰内核的强化,反而进一步消解了民俗信仰的稳固性。河神作为剃辫子仪式的信仰核心,随着仪式空间的异化而不再成为仪式的驱动力,故仪式中的“祭拜”环节往往被一笔带过,甚至不复存在。地方民众的广泛参与一方面促进了剃辫子仪式的承续,另一方面也对仪式举行的时间、地点及具体的仪式步骤进行

着改造。如亳州地区民众在仪式中对剃下辫子的处理,不再完全依循系于动物身上并放生的仪式传统,而是代以将辫子绑在氢气球升入空中。此外,仪式步骤亦相应简化,不再按照传统的仪式实践而进行。究其原因,是城市化对农村文化空间的冲击和改造所致。

剃辫子仪式在空间异化下的自我调适,本质是传统民俗仪式在现代化浪潮中的再地方化。剃辫子仪式呈现出来的功能让渡特征,实为消费主义对文化的控制和改造。现代性根植于资本的运作逻辑,资本的介入虽促进了乡村的空间生产,但在一定程度上割裂了乡村文化的脉络^[11]。在现代性的冲击之下,民间信仰、民俗仪式与文化空间之间既非单纯的支配关系,亦非单向的因果关系,而是处于不断协商过程中的文化重构。当传统物理空间的神圣性被不断消解时,民俗仪式便通过开辟新的文化空间维持其内核的稳定。

3 仪式的文化功能与象征意义

仪式与文化共生,是文化具现的一种方式。社会的每种文化与风俗都具有特定的功能。剃辫子仪式既是民众应对生命危机的方案,也是社会整和与文化认同的媒介。这一仪式在历史演变中,完成了从“护生”向“成人礼”的功能转换,而这两者在当下仪式的内在结构中呈现出叠加与并存的状态。作为一种兼具象征性、表演性并由文化传统所规定的一整套行为方式,剃辫子仪式的意义不仅在于仪式的实践过程,更重要的是仪式所表现出来的社会价值与丰富意涵。

3.1 危机禳解与群体凝聚

剃辫子仪式的成因之一是由于生活之中“缺乏状态”的出现。这种缺乏主要表现为民间社会中夫妻无子的情况:其一是婚后多年未孕而中年或晚年得子,这种情况所留辫子又被称为“百岁辫”,寓意着孩子健康长寿;其二是接连诞下女婴后得一男婴;其三是家中多代单传;其四是婴儿流产或夭折后再得男婴;其五则是以“留辫”为其舅家引子,寄托着对家道昌隆的期望。因此,仪式的核心功能实则是对“无子”这种缺乏状态的消除。同时,民间社会认为辫子能够如同长命锁一般“拴住”孩子,保护他们远离灾厄,平安成长。传统社会中,重男轻女的观念及现象尤为普遍,加之淮河流域相对恶劣的生存环境,便催生出以危机禳解和护佑受礼者身体康健为主要功用的剃辫子仪式。在这一框架下,剃辫子庆祝的不是孩子的“成人”,而是其生命的“幸存”。

此外,剃辫子仪式在凝聚家庭及族群、增强群体的认同感与内聚力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仪式以受礼者家庭为中心,联合主要亲属群体共同完成。仪式构建的场域有着明确的门槛与边界,参与仪式的人大都来自一个家族群体,因此会产生强烈的归属感与亲切感。如涂尔干所言:“人们被集合起来,他们不仅共同感受到了情感,而且还通过共同行动将这些情感表达了出来。”^{[1]530}通过仪式互动,仪式参与者达到情感的共建共享,从而实现群体关系的再生产。此外,受礼者依家族辈分次序向长者行礼的仪式行为,凸显并强化了家族秩序。剪头发象征着重新进入了社会或象征着在一种严格的统治法规下生活^{[8]308}。因此,通过仪式中诸多行为,使得剃辫子与古代中国的冠礼等成年礼一样具有同构性意义。

集体仪式实际上是日常生活的一种独特表达方式,是村民群体狂欢精神的集中表现,也是村民私人生活领域之外体验公共生活的内在诉求^[12]。对于仪式参与者而言,他们所关注的是仪式行为本身而非仪式抽象的文化意义,仪式能够满足他们群体认同的需求,增强自我归属感。作为社会文化的产物,离开社会性,仪式就失去了文化价值与意义。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个人不再局限于土地,越来越多的人涌入并定居城市,农村社会空壳化现象愈加严重,但是传统乡村的关系网络仍然是以亲属关系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差序格局。剃辫子仪式在农村社会里与婚丧嫁娶等活动同等重要,在农村情感生活、亲属关系等领域维系着社会体系的正常运转。作为社会群体定期重新巩固自身的手段,剃辫子仪式增加了家庭团聚的机会,为族群提供认识与交流的场所,从而沟通感情,重新确立社会角色与社会关系,进而实现维系乡土社会的稳定性。

3.2 仪式象征与文化传播

作为民众知识体系的一部分,仪式在特定空间与当地文化相融合,成为体现地方标志文化的载体。剃辫子仪式借助人际关系的互动与实践,通过构建仪式空间使个体在互动中进行文化再生产,从而发挥文化功能。仪式与“二月二,龙抬头”的结合,与中华传统的龙文化密切相关。仪式中的唢呐班子与戏班子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载体,是传统艺术之精华。历史上的戏曲多伴随节日、庙会、集市贸易、婚丧嫁娶、烧香还愿、剃辫子等民间民俗活动^[13]。剃辫子仪式与唢呐的融合,不仅能为仪式营造氛围,而且能够推动唢呐文化扎根人们的日常生活,进一步推进唢呐文化的传承与大众化发展。仪式是人类创造意义的行为,仪式象征的本质是多重

意义的整合与浓缩。剃辫子仪式是一个神圣的过渡过程,在仪式中受礼者易受到鬼祟的侵扰。因此,仪式中所用的绳、布、毯子、盆、剪子、帽子等器具皆为红色。红色寓意着吉祥与神圣,能够趋吉避凶,消灾免祸。此外,红色也是一种象征符号,即人们欲借助蕴含平安吉祥、辟邪禳灾等寓意的红色化解超自然力的厄运。红色在某种程度上给人们提供了一种精神安慰,可以安抚不确定性带来的不安和恐惧。

淮河文化的主体不是淮河,而是生活、繁衍、斗争于淮河流域的人民^[14]。受自然灾害的影响,淮河流域民间社会对于河神的崇拜则更贴近人们的生活。剃辫子仪式后通常要进行放生,不管放生的对象是鲤鱼、鸭子还是飞鸽,都象征着生命回归到了最本真自然的状态,以此摆脱个体所遇到的现实困境。放生行为浸润着淮河两岸人民深厚的“生命意识”,即以生命欲求为核心出发点,对生活中难以磨灭的苦难和无法言说的恐惧作出的积极回应,流露出人们对生命的热爱和生命意识的表达。同时,鲤鱼象征着好运,亦有着浓厚的生殖崇拜色彩。留辫子的预期目标便是“引子”以及孩子健康状态的维持,故鲤鱼又寓意着人们对于多子多福的期盼。剃辫子仪式的完成意味着困境的解决。因此,剃辫子仪式是理解乡土社会民众生命观与关系网络的重要切口,其神圣性与世俗化此消彼长的过程,既遵循民众功利性的日常生活逻辑,又深植于地方文化肌理。

4 结论

民俗文化的地方性特征构成了其对特定群体的价值,同时也是地方认同与识别的重要基础。剃辫子仪式作为淮河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多重社会文化功能。剃辫子仪式空间的生产与重构,是在淮河流域独特的自然环境的基础上,通过仪式中社会关系的重组等方式,利用受礼者在空间中的主体性作用得以实现。剃辫子仪式对于神圣空间的营造与实践,集中体现出文化与空间的二元互构关系,而仪式的核心功能则是通过短暂的改变主体对文化空间的经验与感受而实现。剃辫子仪式既强化了仪式参与者对地域民俗文化的感知,又通过物质交换与情感联结重构了社会关系的动态网络。人的生存与社会发展永无止境,脱胎于日常生活的民俗仪式亦不会凝滞不前。现代性视阈中的剃辫子仪式的空间实践,本质上是民俗文化的物质性展演。虽然仪式赖以生存的原生性文化空间不复存在,其驱灾避祸的信仰属性也逐渐淡化,但仪式的文化意义被进一步凸显。概言之,剃辫子仪式所具有的文化

功能是其得以存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淮河流域民俗文化独特性的生动体现。

注释:

- ① “剃辫子”仪式主要分布于淮河流域的部分地区,如安徽的蚌埠、阜阳、宿州、亳州、淮北、淮南等地区,河南的驻马店、商丘、信阳等地区以及江苏的徐州、淮安等地区。

参考文献:

- [1] 爱弥尔·涂尔干.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 渠东,汲喆,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 [2] 阿诺尔德·范热内普. 过渡礼仪[M]. 张举文,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138.
- [3] 亨利·列斐伏尔. 空间与政治[M]. 李春,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23.
- [4] 安徽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安徽省志·民俗志[M]. 北京:方志出版社,1998:76.
- [5] 江绍原. 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M]. 上海:上海

文艺出版社,1987:102.

- [6] 高正. 淮河流域村落的文化区属和基本特征[J]. 蚌埠学院学报,2020,9(6):99-101,128.
- [7] 张举文. 重认“过渡礼仪”模式中的“边缘礼仪”[J]. 民间文化论坛,2006(3):25-37.
- [8] 布赖恩·莫里斯. 宗教人类学[M]. 周国黎,译. 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
- [9] 蒋璟萍. 传统过渡礼仪的伦理审视[J]. 伦理学研究,2026(1):133-140.
- [10] 吴海涛,李良玉,张邦建. 淮河流域民俗风情[M]. 合肥:黄山书社,2022:117.
- [11] 刘璐. 现代视阈中乡村文化空间的危机与再生产[J]. 民族艺术研究,2020,33(2):102-110.
- [12] 李向振. 日常生活的隐喻:作为公共领域的村落集体仪式[J]. 世界宗教文化,2019(2):62-68.
- [13] 张殿兵. 阜阳戏曲舞蹈史略[M].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2:227.
- [14] 淮河文化办公室. 淮河文化·淮滨卷[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12. 责任编辑:朱家席

(上接第116页)深度融合的微观教学机制,推动从“制度嵌入”走向“认知融合”。期待更多研究者关注这一领域,共同推动高校科技伦理教育迈上新台阶,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培养更多德才兼备的卓越科技人才。

参考文献:

- [1] 马荣,王灏翔,焉祯. 论新质生产力:深刻内涵、生成背景、践行路径[J].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24(1):10-17.
- [2] 刘元春. 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与发展着力点[J].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4(3):41-47,158.
- [3] 李建华. 加快提升高校科技伦理治理能力[J]. 中国高等教育,2022(10):1.
- [4] 王广辉,彭新桥. 生成式人工智能内容治理责任的检视与配置[J]. 改革,2026(3):133-144.
- [5] 冯建波,王盛吉. 求真向善臻美,推进高校科技伦理教育[N]. 光明日报,2024-04-23(15).
- [6] 梅春英. 科技创新赋能新质生产力的伦理思考[J]. 广西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5,36(6):12-17.

- [7] 孙羽佳,郭雪俐,苏淞,等. 人工智能伦理问题与治理对策综述研究[J]. 经济管理,2025,47(5):25-43.
- [8] 李凌. 高校科技伦理教育课程化的价值、方向与路径[J]. 中国高等教育,2025(Z2):60-64.
- [9] 陈旭. 高校科技伦理教育存在的问题和路径[J]. 西部素质教育,2025,11(20):78-81.
- [10] 季岐卫,于雅迪. 理工科高校科技伦理教育的问题及其对策[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2020,36(3):120-123.
- [11] 刘冬梅,杨洋,李哲. 科技创新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理论基础、历史规律与现实路径[J]. 中国科技论坛,2024(7):1-7.
- [12] 刘瑶瑶,王硕,李正风. 高校科技伦理课程建设:现状、挑战与对策——基于17所高校的实证研究[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24,40(4):129-135.
- [13] 刘海龙,王晓芳. 科技伦理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J]. 教育理论与实践,2024,44(30):34-38.
- [14] 胡小玉. 高校科技伦理教育的目标、内容与路径[J]. 教育科学探索,2022,40(6):50-56. 责任编辑:李云

蚌埠学院学报

(综合类双月刊)

编辑委员会

主 任:陈国龙

副 主 任:张亚新

委 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艳春	韦文联	吕 部	吕效华	朱兰保	朱家席
邬旭东	刘 娟	许 晖	孙兰萍	孙西超	李大胜
李文瑛	李如林	李宗群	吴长法	何 蕾	张 斌
张永芳	张亚新	张茂林	陈 荣	陈发来	陈国龙
陈恩红	周仁战	郑晓奋	胡 飞	赵生学	赵东勇
袁 飞	郭有强	黄迎辉	崔执树	葛金龙	魏天路

主 编:张亚新

副 主 编:郭有强 邬旭东 朱家席

目 次

党的二十大理论创新与实践·思政理论研究

- 数字新质生产力赋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向度与规制 张宏志(1)
- 习近平文化思想融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教学的三重省思 ... 刘艳玲,胡茜茜,虞满华(8)
- “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论断的生成逻辑、辩证思维及实践指向 赵桂敏,韦 泽(117)

文学理论与新闻传播

- 论《杜诗详注》中的评点术语“玩” 陶承昊(20)

艺术创作与设计

- 文化生态视域下黄梅戏音乐的流变与创新 张源宁(27)
- 论清末民初浅绛彩瓷绘的间性特征 姚放(34)

乡村振兴·区域经济建设与管理

- 产学研融合驱动下安徽省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研究 贺小桐,王莹莹(39)
- 直播电商情境下心理契约对地理标志产品的购买意愿
——基于主播专业性调节效果的实证研究 王儒,余菲(49)
- AI 赋能高校财务数字化管理: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创新路径 柯萍,吴艳艳(59)

外国语言研究

- 输入频率与多模态语境视角下二语词汇习得的条件与路径研究 朱悦(65)
- 翻译美学视域下《黄帝内经》核心养生话语的英译研究 徐燕,冷冰,刘维静,等(72)

高等教育与教学

- 新工科视域下高质量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研究 韦文联,李大胜*,孙兰萍,等(80)

治理转型视域下高校辅导员沟通边界的建构逻辑 王敬(86)

大学生志愿服务动机的智能识别与分层管理研究 张成孜,王琮(91)

综合研究

潘杨关系及北宋杨业之死新探
——兼论文献、口碑之利用 梁家贵,李维康(98)

生命周期视域下我国非遗文化品牌建设困局审视与破局 杜朝运,王佳雄(105)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高校科技伦理教育的时代意涵与实践路径 吴姗姗,窦余仁(111)

淮河文化研究

安徽花鼓灯融入音乐专业核心素养的路径建构研究 朱虹(117)

民俗仪式的空间建构及其文化功能
——以淮河流域“剃辫子”仪式为例 谭昭(123)

Journal of Bengbu University

Vol. 15 ,No. 4 ,Sum. No. 88 ,2026

Main Contents

- On the Dimensions and Regulations of Digital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Empower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ZHANG Hongzhi(1)
- Three Reflections on Integrating Xi Jinping Thought on Culture into the Integrated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Primary ,Secondary and Higher Tertiary
..... LIU Yanling ,HU Qianqian ,YU Manhua(8)
- On the Comment Term “Wan(玩)” in *Dushi Xiangzhu* TAO Chenghao(20)
- Evolution and Innovation of Huangmei Opera Music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Ecology
..... ZHANG Yuanning(27)
- Transi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Light Red Porcelain Painting during the Late and After Qing Dynasty YAO Fang(34)
- Evaluation of Regional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apability in Anhui Driven by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HE Xiaotong ,WANG Yingying(39)
- Impact of Psychological Contract on the Purchase Intention of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Products in the Context of Live-streaming E-commerce by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he Professionalism of Live-streamers WANG Ru , YU Fei(49)
- Conditions and Pathways of Second Language Vocabulary Acquisi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put Frequency and Multi-modal Context ZHU Yue(65)
- Study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Core Health-Preservation Discourse in *Huangdi Neij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ranslation Aesthetics XU Yan ,LENG Bing ,LIU Weijing ,et al. (72)
- Construction of a High-Quality Applied Talent Cultivation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erging Engineering Education WEI Wenlian ,LI Dasheng ,SUN Lanping ,et al. (80)
- On the Logic of Constructing the Communication Boundaries of College Counselors under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ance WANG Jing(86)
- Intelligent Identification and Stratified Management of College Students’ Motivation for Volunteer Service ZHANG Chengzi ,WANG Cong(91)
-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Pan-Yang Relationship and the Death of Yang Ye in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A Discussion on the Utilization of Textual and Oral Sources
..... LIANG Jiagui ,LI Weikang(98)
- Dilemmas and Breakthroughs in China’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Brand Building :A Life Cycle Perspective DU Chaoyun ,WANG Jiaxiong(105)
- Era Implications and Practical Paths of Universit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hics Education by the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WU Shanshan ,DOU Yuren(111)
- Construction Path of Integrating Anhui Flower-Drum Lantern into the Core Competencies of Music Majors ZHU Hong(117)